

白  
凡  
逸  
志



백범일지

〔韩〕金 九 著 宣德五 张明惠 译



重庆古籍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凡逸志/(韩)金九著;宣德五,张明惠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6

ISBN 7-5366-7813-4

I.白... II.①金...②宣...③张... III.金九(1876~1949)—自传 IV.K833.126.7=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2967 号

## 白凡逸志

BAI FAN YIZHI

[韩国]金九 著

宣德五 张明惠 译

---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陈兴芜

责任编辑:陈兴芜 周显军

责任校对:廖应碧

装帧设计:金乔楠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图文制作部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20mm×1 000mm 1/16 印张:18.25 字数:291千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册

定价:48.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809955 转 8005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季羨林

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时,我就仰慕金九先生的大名。当时我们中国正被压在三座大山之下,而韩国也同样处在外寇的直接统治下。我们两国人民同置身于水深火热中,受尽了灾难。《庄子·大宗师》中有一段有名的话: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我们两国当时正如“相与处于陆”的鱼类,“相响以湿,相濡以沫”,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做而且应当做的事。我们还没有资格“相忘于江湖”。

由于所学的行当不同,我对韩国所知不多。我对于政治也没有兴趣。但是,我自认为自幼爱国,不敢后人。我爱自己的国家,也尊重敬佩其他被压迫国家的爱国志士。金九先生正是这样的志士中之佼佼者。尽管我对他的活动不甚了了;但是,同他有联系的安重根、李奉昌、尹奉吉等韩国爱国烈士,却是我所熟悉而且异常崇拜的。我对金九先生又焉得不尊敬而且崇拜呢?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到了中年竟同韩国有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今天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杨通方教授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任教。当时我正任系主任,他之所以能进北大,我应该说是尽了力的。

到了八十年代,又通过杨通方的关系认识了他的恩师,韩国大教育家,原高丽大学校长金俊焯博士。承蒙金俊焯博士的邀请,在中韩正式建交之前,我就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滔教授和杨通方教授访问了韩国。我们在那里访问了许多大学,访问了韩国社会科学院,访问了古都庆州,结识了韩国爱国大企业家金宇中先生,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韩国在各方面的辉煌成就以及韩国学者和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我万没有想到,自己竟能在垂暮之年,得此天外飞来的幸福,不虚此生矣。

从那以后,我逐渐了解到了国立东方语专的情况,了解到了东方语专增设韩语科的情况。最重要的是,我了解到了:在所有的这些情况的背后,赫然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在,这个人就是韩国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和领袖,中韩近代友谊长城的缔造者,一代伟人金九先生。

最近我又读了金九先生哲嗣金信先生的一篇文章(载《新华文摘》1993年第12期)。文中对中国的一片真情深深地感动了我,同时我对金九先生的认识也大大地提高了,加深了。我感到无比的振奋与欣慰。

金信先生于1922年诞生在中国的上海,那里是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他父亲金九先生是政府首脑,但家中极贫。他祖母提出了要金九先生找一个职业糊口。但是金九先生以国事为重,斩钉截铁地说:“我死也不离开临时政府的大门!”简短一句话,掷地作金石声,爱国之心气贯长虹,真能够惊天地,泣鬼神,今天读来,仍然虎虎有生气。没有这种精神,哪里能来韩国的独立呢?金信先生的哥哥患了肺结核。但是,临时政府没有钱给病了的同志治病,自己的儿子也决不能享受特权。就这样,儿子终于去世。金九先生悲痛万分,然而他仍然把救国放在首位。只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才能“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金九先生于1929年,在革命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写了《白凡逸志》,目的是教育儿子。1947年,革命胜利了,才写完全书。为了同外寇战

斗,金九先生把金信派往中国空军学校,学习驾驶飞机,为光复做准备。金信先生青少年时受教育,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他曾在中大附中读过书,上过西南联大。他在中国有很多极为要好的朋友。他像其他在中国住过的韩国的革命志士一样,对中国怀着万分深厚真挚的情谊。他自称是“半个中国人”,可见他对中国的感情深厚到什么程度!

金信先生回国以后,担任过许多显要的职务,比如空军参谋总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大使,现任韩国独立运动纪念馆的顾问。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他那“半个祖国”的中国。他在文章中写道:“近年以来,我每年都重返中国,重游故地,踏着父亲战斗的足迹,寻找自己青年时代的履痕。”这可以说是对华深厚感情付诸行动的表现。

又一个万万没有想到,正当我写这一篇序文的时候,我有幸亲自会见了金信先生,他正应邀到中国来访问,陪他到北大来的还有父亲是韩国革命志士的李素心女士。我们晤谈了没有多久,金信先生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们是一见如故!”“一见如故”这四个字,难道不正是我们两国人民长达几千年的传统友谊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反映吗?面对着金信先生,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多年景仰但始终没有能见面的他的尊人金九先生。站在我眼前的仿佛就是白凡金九先生本人。我对金九先生的尊敬与崇拜仿佛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我此时思绪万端,一下子回忆起来了北大东语系(现改为东方学系)韩语科(朝鲜语专业)走过来的道路。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为了加强中韩(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们培养了一批韩(朝)语人材,他们正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等许多领域内,发挥着良好的作用。现在我国驻韩国的大使就是其中之一。本书《白凡逸志》的译者也是我们的毕业生。中国有一句俗语:“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们没有忘,而且永远也不会忘我们的掘井人金九先生等一批南北方的朋友们。杨通方教授和其他一些教员也没有辜负金九先生的重望,在培养学生工作中尽了力。金九先生在天之灵看到这情况也会感到欣慰吧。我作为系的领导人也与有荣焉。

根据金信先生的介绍,他尊人的这一部自叙传在台湾出版过译本,在韩国也印刷过。但是宣德五和张明惠这一个译本所使用的材料,则超过过去的译本,不但全,而且还使用了金九先生的手稿,这个译本是最完善的本子。在译文方面,金信先生和许多韩国朋友,亲自把关,字斟句酌,务求准确、完美,译文应该说是完全可靠的。金信先生说,将来还要出英文译本,而英译本所依据的就正是现在这个汉译本,可见他对这个译本的重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的庄浦明先生慨然应允出版,并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好的装帧,把此书呈献于读者之前。总之,通过多方面的通力合作,真所谓珠联璧合,不愧是中国出版界一件壮举。此书定将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卜可知。

但是,此书之出版,其意义远远地超出了出版界。从远一点来说,这是继承中韩长期传统友谊的具体体现。从近一点来说,这又是当前中韩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合作精神的具体体现。在中国,目前全国人民正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真正的爱国主义根据我的理解应该是,决不侵略别的国家,也不允许别的国家侵略自己。我们既爱自己的国家,也尊重其他国家爱自己国家的仁人志士。真正的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永远是并行不悖,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毫无疑问,金九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会给我们极大的启发和鼓舞。

我在本文开头时,引用了庄子的一段话。现在,我国和韩国都早已取得了独立,正在意气风发地建设各自的国家。我们已经不是“处于陆”的鱼了,用不着“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了,我们已经是在江湖中,可以畅游了。但是,我相信,我们是人,不是鱼,我们是有感情懂友谊的。不但在江湖中我们不会相忘,即使是在海洋中,我们也决不会相忘,永远不会相忘。

这是我坚定的信念。是为序。

1994. 4. 17.



백범일지

## 著者的话

《白凡逸志》系我在上海和重庆时陆续写成的，本书是依照韩文拼写法把它翻成国语的译本。最后所记的是回到本国之后的事情。

我在上海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之时，是在从事一种置身于死亡边缘的危险工作，为了让已经回国去的两个幼儿以后能够知道我在国内外所经历的往事，就想写这本书，这是我写作的动机。因此，这一本书的上篇，就含有遗书的性质。

尹奉吉义士事件以后，由于中日战争爆发，丧失了我国独立运动的基地和活动的机会，一时几乎无投奔之地，只得暂时蛰伏，徐图东山再起。那时我已年近七十，自感来日无多，为了唤起在美洲和夏威夷的同胞们继续努力奋斗，想把我献身民族独立运动多年的经验和未能实现的抱负一一告诉他们，于是便写成了此书的下篇，这同样可以说是遗书。

我能够活着回到故国，而且能够出版这一本书，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原先希望在我们的国家完全独立自主之后，以这本书与同胞闲话沧桑，反而是幸耶？不幸耶？独立大业未竟，而我以风烛残年之躯回归故国，将此书呈献于同胞之前，不禁感慨万千。

几位知己挚友认为此书对同胞不无裨益，力促我把它出版，我也就

答应了。

为了发行这本书,国士院设立了出版社,由金智林和三堂侄兴斗分任编辑与受理预约之事;许多亲友和单位,有的忙着翻译和校正韩文缀字法,有的筹划经费和用纸,有的印刷发行,倍加辛劳,谨在此深致谢忱。

附于书后的一篇《我的愿望》,内容是我向国民们讲话的纲要。

凡是建立一个国家,求得这个民族的生存与生活条件,必须有一种哲学作为基础。若是没有本国的哲学,就不能统一国民的思想,今天倾倒于某个国家的哲学,明天又陶醉于另一民族的哲学,永远不能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精神的独立,只能永远依赖别人。

就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说,信仰洛克哲学的一派,想把华盛顿迁来汉城。信仰马克思、列宁哲学的这一派则想把汉城变成莫斯科。华盛顿也好,莫斯科也好,都不会变成汉城,也不可能变成汉城。因此抱着这一类主张的人,和以前主张以东京作为我们京城者毫无区别。我们的汉城必须是我们自己的汉城。我们必须研究与提出我们自己的哲学。倘若能领悟到这一点,那么这一天就是我们同胞真正具有独立精神的日子,也是我们国家真正独立的日子。

《我的愿望》即是在这样的动机、意义之下发表的。换言之,这是我所信仰、所奉行的民族大义。盼我同胞务必详读此篇,以作为每个人研讨和建立民族哲学之参考,并借此与同胞共勉。

当我写本书上篇的时候,两个儿子都不过十余岁,而现在长子仁已逝于中国重庆,身后遗有妻室幼女,次子信二十六岁,从美国回来尚未成婚,随侍在我身边。他曾是中国的军人,赴美接受飞行训练回国后,正待机献身报效国家。

本书述及的许多同志中,大部分仍都健在,继续为独立事业作贡献,但也有许多同志作古(崔光玉、安昌浩、梁起铎、玄益哲、李东宁、车利锡,他们都已不在人世)。

人有生即有死,此事自古难免,个人生死,无异草木之枯荣,但民族



生命的繁衍绵延则是永恒的、永远年轻的。我们要以血肉筑成长城，以维护我们的独立，我们要以血肉作阶石，以使我们的子孙得以登高一层，我们要以血肉作为养分，以灌溉我们文化的种子，使它开花结果。

许多先烈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先我而去，我个人对他们感到满意和感谢。我虽然老了，但将不让这躯体白白腐朽。

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并不是他人的。国家的独立自主是由我们民族自己共同创造的，而不是由别人来创造或受别人指使而创造的。假如我三千万国民每个人都能领悟这个道理，身体力行，我们的国家不仅可以独立，而且可以富强。这也是我金九生平实践笃行未能一日或忘者。我也明白自己并非一个杰出的人才，虽则如此，但我既生为大韩民国的一个国民，民族的一分子，当为国家民族独立自主而奋斗不懈，这就是我生命的意义，本书即是我这种生涯的记录。

我同意发表此书的意思，就是记录像我这样一个才能不足道的人，作为民族的一分子，一生的所作所为，我之自号“白凡”者其意也在于此，若说我对民族独立运动作过些许贡献的话，那就证明只要去做，每个韩国国民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相信我国青年男女中间，必有崇高伟大的爱国者，能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同时更恳切地盼望我同胞觉悟到这个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是我们应竭尽毕生之力为她奋斗的国家。我谨向具有这种志向的同胞们，呈献这本“凡人的自传”。

檀君纪元四千二百八十年  
十一月十五日 开天节  
一九四七年(阴历十月三日)

金 九



백범일지

## 前 言

12年前，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了大韩民国开国元勋金九（白凡）先生（1876—1949）的自叙传《白凡逸志》，为中韩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基于同一目的，重庆出版集团暨重庆出版社受金九先生哲嗣金信先生的委托，在新的世纪里重新隆重地出版该书以飨读者。特此说明。

编 者

2006年春天



백범일지

## 目 录

前言

序/季羨林

著者的话

### 上 篇

序——给仁、信两儿 / 3

1 出生和童年时代 / 4

2 加入东学党 / 17

3 清溪洞时期 / 27

4 江界城之役 / 35

5 离开清溪洞 / 43

6 鸱河浦事件 / 47

7 死刑面前争生存 / 57

8 越狱 / 69

9 三南行 / 78

- 10 麻谷寺削发为僧 / 88
- 11 转变为开化派 / 96
- 12 入基督教 / 107
- 13 献身新教育事业 / 115
- 14 安岳事件 / 128
- 15 被判十七年徒刑 / 140
- 16 西大门监狱的铁窗生活 / 158
- 17 三·一万岁事件 / 171
- 18 流亡上海 / 180

## 下 篇

绪言 / 187

- 1 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 / 190
- 2 李奉昌义士谋杀日皇未遂事件 / 196
- 3 尹奉吉义士的上海义举 / 210
- 4 遭到同胞的狙击 / 222
- 5 创建光复军 / 234
- 6 此后之事 / 246

踏上祖国的大地 / 252

我的愿望 / 257

白凡金九先生年表 / 267

跋 / 276

译后记 / 278

白



凡



逸



志



上篇

백범일지

## 序——给仁、信两儿

父亲目前正在离你们所在的家乡水陆相隔五千里以外的国家，写这一本书。由于路途遥远，不能把年幼的你们接到我身边来，唯有记下我过去奋斗的史实，留给几位同志，并托付他们，待你们长大自立，想知道父亲的生平经历的时候，再给你们看。现在你们年幼，又相距遥远，我不能和你们相聚一堂，畅叙亲情，虽感遗憾，可是世事又怎能尽如人意呢？

我年已五十又三，而你们现在仅十岁和七岁，等到你们长大成人，学识渊博的时候，我已是精神与体力都已衰退的风烛残年了。何况目前我已经向日寇宣战，时时刻刻都处于死亡的边缘，怎能预料我会活到你们长大之后，而能当面叙谈的那一天呢！这就是我现在要写这本书的原因。

我之所以记下我的经历留给你们，绝不是为了自我标榜，让你们仿效。我是衷心期望你们作为大韩民国的国民，要懂得在东西古今的许多伟大人物中，选择最值得推崇的人去崇拜效法。而你们将来长大成人，恐已无从知道你们父亲的经历，所以我才写下这一本书。

遗憾的是在这一本书里所记录的，都是对往事的追忆，遗漏的地方不少，但全都是亲身经历的事实，绝无半点虚构，自可毋庸置疑。

大韩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九年)

五月三日于中国上海 父字

# 1

## 出生和童年时代

我家祖先系安东金姓，乃金自点之旁系。当时金自点因叛逆罪遭致灭门之祸，我们的祖先遂流亡到高阳郡<sup>①</sup>。由于此地仍属近畿地区，后又逃至远乡海州邑以西约八十里的白云坊基洞八峰山杨哥峰下隐居下来。这些事情细看族谱，即可明白。故自十一代祖开始，历代祖宗的坟墓都在后浦里先山，祖母也在山下先茔内奉安。

当时是李朝全盛时期，全国都分为两班(文武)<sup>②</sup>和平民阶级，等级森严。我们祖先自然不会嫌弃两班而愿过平民生活，但为了避免灭门惨祸，也只得隐匿金自点族属的身份，当了平民。祖先们抛弃了两班文化生活，从事农耕，开垦荒地，维持生计。按照李朝的军制，当时除驿站的屯田外，还有所谓“军役田”，凡贫民都耕种这类田地，而一旦国家有事，即应征当兵服役。我家祖先挂牌耕种这类田地(基洞以北越过基洞岭，位于左边的长尾形田)，由此而永远沦为平民。由于李朝重文轻武，我家世代受到基洞邻里晋州姜姓和德水李姓的两班们欺凌与压迫。略举数例：在婚嫁方面，我们金氏门中的女子嫁给

---

① 韩国的行政区域单位，“郡”相当于我国的县，“邑”相当于镇，“面”相当于乡，“里”、“洞”相当于村。——译注。

② “两班”即世袭而有充任文武官员资格的门第，即贵族阶级。——译注

他们是光荣，可是他们的女孩却从来没有嫁到我们金氏门中的，这是婚姻上的歧视；姜、李氏世代为坊长（今之面长），而我们金家却世代担任“尊位”（受命于坊长收交坊内各户税金之职），这是政治上的压制；姜、李族中的人大施淫威，占我金门之土地，夺我金门之钱财，这是经济上的剥削；我家老人见到姜、李族中的子孙，哪怕是弱冠童子，也要使用敬语，可是姜、李门中即使是编发小儿，对金氏门中七八十岁的老人也用卑语，骄横无礼，此乃言语上的蔑视。

到了中期，我们家道中兴，在基洞地方盖了很多瓦房，祖莹上的碑碣又大又多。记得我十多岁的时候，每逢我们族中有婚丧大事，总有一个名叫“李贞吉”的人，时常来帮忙打杂。听说这个人原是我们族中的家奴，后来虽然已经赎身，但是在我们的贫贱家庭出生为奴，不能不说是命运不济。

详考历代祖先也有读书之人，可是没有能光宗耀祖、扬名于世的。曾听长辈们口头说过，我的曾祖父做过假御史，后被监押在海州营门，幸亏得到汉城某位大官的说项，才算被赦免。曾祖父兄弟四人，其中一位直到我五六岁时还活着，祖父辈的兄弟及父亲四兄弟均都健在，但不久伯永伯父去世，我还记得五岁时和堂兄弟们在一起痛哭流涕。

先父讳淳永，在四兄弟中行二，因贫困不能成家，在二十四岁时，才以一种奇异的三角婚姻方式，与长连牧甘坊文山村玄凤郭姓的十四岁小姐成婚，寄住于曾祖父家里。母亲体弱役重，倍受辛苦，但夫妇间情笃爱深。过了两三年，可以过独立生活的时候，我就出生了，当时母亲是十七岁。常听母亲说，她曾做了一场梦，在绿色的栗树丛里，找到了一粒熟透了的红栗子，于是把它珍藏起来，后来就怀了我。

基洞祖父和伯父家俗称水塘大宅，我也就在那里出生，由于我出生的日子是丙子年七月十一日子时（是祖母的忌日），也预兆我的一生将崎岖多难。出生的时候是罕见的难产，几达一星期之久，母亲



的生命垂危，家里或延医用药，或拜佛求神，想尽了各种方法来试验，仍然无效，慌乱之中，大人们强迫父亲戴上牛的馱鞍，爬上屋顶作牛吼声，我才呱呱堕地。

家境贫寒，加上母亲年仅十七岁，经受这番痛苦，所以很讨厌我，常常气愤地说：“快点死掉算了！”奶水也少，除喂稀饭外，父亲就抱着我去央求别人喂奶。听说远亲的族大母稷浦宅往往在深夜还耐心地给我喂奶。我刚过十岁，那位大人便逝世了，埋葬在基洞东麓，我每次经过她的坟前时，都要默默地凭吊，以表示心中的敬意。

我三四岁时又患过痘疮，母亲像治疗普通的脓疮一样，把我身上起脓泡的地方，用竹针挤出了脓水，因此至今我脸上犹有疤痕。

我五岁的时候，父母带着我搬家到康翎郡三街里。那里背山面海。因为叔祖父、堂叔祖等长辈们都移居那里，我家也就随从到那里定居。大约住了两年，因老虎常常伤害人畜，我们家又正当老虎出没的路口，每到夜晚不敢跨出家门一步。

白天父母种地或去海边打鱼捡贝壳，我则每天到邻村新丰李生员家，和他们的孩子一块儿玩耍，这是我的日常生活。

夏季村童只穿下衣，上身赤裸。一天我和他家孩子在他们家客房玩耍，那家的孩子有和我同年的，也有比我大两三年的，他们共谋要揍我这海州小子。我无缘无故地挨了一顿打，气愤地跑回家，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直奔李生员家，要把他们统统杀光。我心想从他们家客房正门进去，会被他们发现，就有了准备，打算破篱而入，从后门冲进去，不料被他们家十八岁的女孩子发现大声喊叫，因此我的计划成为泡影，反被那些家伙捉住揍了一顿，菜刀也被夺走了。

由于丢了菜刀怕被父母责打，心中十分害怕。当母亲找菜刀的时候，我假装着什么也不知道似的。

又有一天一个人在家闷坐，卖麦芽糖的经过我门前，喊着“破铜碗铜勺换麦芽糖啊！”我虽然想吃麦芽糖，可是曾经听大人们说过，卖糖的会剪去小孩子们的小鸡儿的，因此先紧紧地关好了门，叫来

了卖糖的，把父亲的新汤匙用脚跟踩断成两半，留下一半，另一半从窗口中伸出去，以为只有破汤匙才能换到麦芽糖。卖糖的收了我伸出的半只汤匙后，把麦芽糖团成一个拳头那么大，然后从孔中塞进来。我身边放着半只汤匙，正在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父亲回家了。我向父亲说了实话。父亲只警告我再不准做这种事情，他虽然很生气，但是并没有打我。

又有一次，也是那个时候的事情，我看见父亲把二十两铜钱塞在炕头的被窝里。等到父亲外出，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因为无聊，所以决定到村口的商店去买米糕吃，把那个二十两的钱包全部取出来缠在腰上出了门。路上碰见了三叔祖。他问：“你这小东西，带钱到哪里去？”一面挡着我的去路。我恭敬地回答说：“去买米糕吃。”

他说：“让你父亲看到，一定会把你狠狠地揍一顿，还不赶快回家去！”三叔祖取下缠在我腰上的钱，交还给父亲。没能去买想吃的米糕，我心里相当难过。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也接踵而至，他一声不吭，竟用晾衣绳把我紧紧地绑起来，吊在房梁上，用枝条鞭子抽打，痛得我几乎要死，母亲还没有从地里回来，也没有劝阻的人，因此一直吊着挨打。正在这个时候，进来了一位叫做长连爷爷的堂叔祖。他懂得医术，并且很疼爱我。对我来说真是侥幸。当这位爷爷经过我家，听到我嚎叫的声音，跑了进来。他不问青红皂白，马上把吊在房梁上的我解下来，不等父亲数完我的罪状，夺下父亲打我的枝条鞭子把父亲劈头盖脑地打了一顿，一面责备说：“小孩子怎么能这样乱打呢！”长连叔祖的年纪，虽然跟父亲相似，可是以叔祖的威严，父亲不敢反抗。看见父亲挨打我真高兴，也非常感谢长连叔祖。

长连叔祖背着我到地里去，尽量买西瓜和香瓜给我吃，又背我到叔祖的家里去。

长连叔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叔曾祖母，听说我被父亲责打，也数落道：“你爸爸真坏，不要回家，就在我家住好了。”还为我做了一些好吃的饭菜。这时我的心情非常愉快，又想起父亲挨了叔祖的揍，

更加高兴,这样就在那里过了好几天才回家。

有一年夏天连绵阴雨,我们家附近的泉水都变成了小溪,我从家里拿出红色、蓝色的染料罐,把一条小溪染成红色,又把一条小溪染成蓝色,观赏它们合流的奇观。正在得意之际,又被母亲抓住狠揍了一顿。

我还记得堂祖父在该地去世,要把灵柩运往百余里之遥的海州故里,为了方便,曾在丧輿下悬一单轮,由人们拉拽,不料反倒费劲,于是又拆掉轮子,用肩抬着走去。到了我七岁的时候,住在此地的亲族们,先后一家两户地迁回海州本乡去了。我家也在这个时候回到基洞。我记得我还是父亲和叔叔们背着回来的。

我家搬回故里后务农为业,虽然父亲识字不多,可是性情豪爽,酒量很大,每一遇见姜姓李姓族人便寻衅打架,因而常被海州官衙抓去拘禁,一年之中总有几次,引起了家族间的不安,邻近的两班们极讨厌父亲,但也似乎无可奈何。

当时乡下的习惯,要是谁被打伤了,不论死活,都要把他抬到对方家里去,因此我家每个月总有好几次抬来满身流血奄奄一息的人,躺在客房里。父亲这样打人,虽然都是酒醉肇事,可是也是因为心存愤懑所致。

父亲不管与己有无干系,只要看见恃强凌弱,就拔刀相助。正和《水浒传》所描写的英雄豪杰一样,不分亲疏打了再说。由于大家都晓得父亲的火暴性情,加以孔武有力,所以附近的平民对他都很恭敬,两班则见而生畏。

每到年终,我们家准备许多鸡、鸡蛋、烟草等物品,赠送给监营的营吏厅、使令厅等单位。他们则回赠以日历、海州墨等礼品。这是为了对付姜姓、李姓等两班,拉拢监使或判官。

同营吏厅或使令厅有人事关系的,称为“楔房”。成为这种“楔房”,即使被监使的营门或本衙逮捕拘禁,也不过是一个形式,实际

上和营吏与使令<sup>①</sup>同吃同住，纵使要受笞刑，使令们也都是假装凶狠地痛打，被打的亦假装快要打死了，这叫“歇杖”，以此蒙混过关。

甚至有时候两班反被父亲告发，他们被捕后，尽量向监使或判官行贿，以图免刑，不但受到亲父亲一派的营属们的申斥，并且白费许多钱财。听说这样整垮的富豪，一年之中，就有十几家之多。

附近害怕父亲的两班们，可能是为了安抚他，便推荐父亲为“都尊位”，可是父亲执行“都尊位”职权的时候，却异乎其他的“都尊位”，征收税金时，对两班们多征多收，对贫民则很宽容，宁可替他们纳税，也绝不苛征。就职不到三年的时间，父亲就因“亏空公款”而被免职。平日附近的两班们极其厌恶和憎恨父亲，甚至妇孺们只要一听到“金淳永”的名字，都会咬牙切齿。

父亲小时候的别名是“孝子”。那是因为祖母弥留时，父亲曾用刀子切开左手无名指，把鲜血滴入祖母的嘴里，从而延续了三天的生命。

父亲四个兄弟中，伯父（讳伯永）是诚实的农夫，三叔（讳弼永）也是个很守本分的人，唯有四叔（讳俊永）是跟父亲一样的个性，而且识字也不多。四叔是在一个冬天开始学国文的，虽然他一个字也没学会，可是酒量却很大，常常酗酒，而且醉必闯祸。父亲是只对两班耍酒疯，而俊永叔父却不论醉到什么程度，也不敢招惹两班，只是在亲友间惹是生非，因而常遭到祖父和父亲的责打。

我九岁时祖父去世，在出殡那天，叔父又找抬棺的送丧人麻烦，结果众人把他捆了起来，才完成丧礼。丧礼过后，曾祖父提议召开一次家族会议，因为像四叔这种败类实在无法再宽容，必须加以严厉惩治。商讨的结果，决定切掉他的脚跟，幸未伤及脚筋，没有致残。他每天躺在祖父家的客房里像老虎似地咆哮，因此我从来不敢接近他。现在想起来，不能不说是平民们的愚蠢行为。

---

<sup>①</sup> 皂隶衙役。——译注

记得那时候，母亲对我说：

“你们家的许多风波，都是为了酒，以后如果你也喝酒的话，我就要自杀，我决不愿意看到你喝酒的那种样子。”我一直牢记着这句话。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学会了国文，不久也会看小说了，常常向人讨教，千字文也都背熟了。但我决心发愤读书是有缘故的。

有一天，听到长辈们说：几年以前，族中有个办喜事的人家，这家的老祖父在去汉城时，顺便买了一顶髡冠（马尾冠）回来，在办喜事的那天晚上将它拿出来戴上接见亲家，被两班发现，当场撕裂了高冠。从此以后，我们姓金的再也不敢戴两班的高冠。

我听了这话，痛哭流涕地问道：“为什么他们就能做两班，而我们只能做个平民呢？”

大人们回答说：“虽然砧山姜姓的祖先不如我们，可是他们族中现在还有三个进士，鳌潭李姓也是这样。”

我问道：“怎么样才能做进士呢？”他们说要好好读书参加科举，一旦金榜题名就行了。

听了这话后，骤然引起我读书的欲望，便要求父亲送我去书院，可是父亲踌躇不决。因为我们村里并没有书院，只有送到附近的两班的书院去入学，但不知道是否肯接纳我，即使侥幸入了书院，也不知能否忍受得了两班子弟的欺侮，因此，很难草率决定。

最后，才定下募集族中的学龄儿童与邻村的平民子弟，共同设立一个书院，而聘请清水里两班李生员为老师。束脩决定在收了大麦和秋天收了稻米后交付。

李生员虽是两班世家，可是他做的文章不被赏识，两班的书院不聘请他，才到我们的书院来教书。

李老师莅临的那天，我心情十分激动，梳了头发，换上新衣，跟着父亲去迎接。远远地看到一位年纪有五十上下、身材高大的老人家走过来，父亲首先打了招呼之后，对我说道：

“昌岩啊！向老师行礼呀！”我恭恭敬敬地行过礼后，抬头瞻仰老师的风采，心想老师到底是神还是上帝呢？

从此家里客房变为书房，并由我家供奉饮食。这时我年已十二岁。

开学那一天，我学了“马上逢寒食”五个字，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可是心里非常高兴，读了好几次，晚上一面帮母亲磨小麦，一面背诵这些字眼。

第二天很早起来，先到老师的房间去念书，再转教给背着饭盒刚从远处来上学的同学们。

这样在我家过了三个月，书院又迁移到山谷申尊位的客舍去。因此早上我要背着饭盒越过山坡去上学，晚上，从书院回到家里，在来去的路上，嘴里不断地反复背诵。同学中有程度比我高的孩子，可是背诵文章，我时常是最优等。

快满半年的时候，申尊位与老师闹意见，要把李老师解聘，理由是李老师饭量太大，其实是他的子弟们愚钝而功课不好，嫉妒我功课的日益进步。

有一次在月考的时候，老师曾经对我说我是经常得优等的，希望这次能故意背不出，装着什么问题也回答不了，我就照他的话做了，好让申尊位的儿子也拿一次第一。申尊位非常高兴，那天沽酒宰鸡，酬谢老师。可是不能每次都让申尊位的儿子得第一，李老师终于被辞掉，现在想来那些平民的做法多么愚昧可悲。

一天我还没有吃早饭，老师到我家来跟我告别，我不禁抱着老师放声痛哭，老师也潸然泪下，我好几天吃不下饭，只是哭泣。后来虽然另聘了一位老师，可以继续我的学业，但好事多磨，父亲突然得病，全身瘫痪卧病在床，我不得不辍学侍候父亲。原本就已贫寒的家庭，为了延医买药，更是罗掘俱穷。经过四五个月的治疗，父亲的病转为半身不遂，虽然嘴已歪斜，语音不清，但半边的手足尚可活动，可说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尽管生活艰苦,也要设法给父亲治病,于是母亲陪同父亲开始流浪,一面挨户乞食,一面寻访高明的医生。家里连房子饭锅都卖掉了,我只得投靠在伯母家中,同堂兄弟们一起牵着牛犊,往来于山野之间,度着牧童的岁月。由于想念父母,后来我又跟随他们辗转于信川、安岳、长连等地。他们嫌我累赘,之后又把我寄托在长连一远房亲戚家(长连堂祖之妹家),自己回到故里,为祖父操办大祥祭事<sup>①</sup>。

长连的亲戚也是农家,我常和主人家一起上九月山砍柴。我小时候个子不高,背负柴捆,柴禾压着我就见不到我这个人,别人看来好像柴捆在走路似的。我头一次干这种重活,真是苦不堪言。村子里有个大书院,整天书声朗朗,我听了心情更为悲怆。

不久,父母又来看我,我坚请带我回去上学。这时父亲半身手足已能活动,精力也逐渐恢复。他嘉许我要读书的决心,于是我们踏上了回乡之路。

重返家园,衣食住全无着落,亲族们纷纷捐出钱财,替我们盖了一所栖身小屋,我又再度踏进书院,自己什么也没有,只好借别人的书看,我也没有钱买纸墨,母亲就给人家纺织,用赚来的钱给我买纸墨,我心中的感激是无法以言辞来形容的。

到了十四岁时,渐渐觉得老师的浅陋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他们以五石、十石谷子等束脩的多寡来判定老师的资格,这些老师不但学问不足,而且在为人处事方面亦不足为人师表。

那个时候,父亲曾对我说:“俗语说得好,想赚钱最好是做买卖。不要打算研究艰深的文学而枉费苦心,只要学点应用文牍就行了。”他叫我学习“右明文标事段……”等土地文契的写法,“右谨陈诉旨段……”等诉状的写法,“维岁次敢昭告于……”等祭文的写法,“仆之第几子未有伉俪……”等婚书的写法,“伏未审……”等书信的写法。因此我一有空的时候就去学习,于是在文化贫瘠的村里我变成

---

<sup>①</sup> 两周年祭。——译注

了才子。亲族都对我寄以厚望,期待我有朝一日登上高位。

其实我的汉文程度只不过是粗通文字罢了。读通鉴、史略的时候,看到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或刘邦仗剑斩蛇,韩信乞食漂母等等事迹的时候,不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虽想继续念书,但以我贫寒的家境而言,不可能离家外出,就学于高明的老师,父亲为此非常苦闷,然而恰巧这时发现了读书的新途径。

在我们村子的东北大约相距十里的鹤鸣洞,有位名叫郑文哉的人在教书,这位老师虽与我们同样是属于平民,可是以科儒(参加科举的文人)而言,在当时可算是第一流的,远近各处文人慕名而来,相聚吟诗作赋。

由于这位郑老师跟伯母有远亲的关系,所以经父亲向他恳求,慨允免费教授。我高兴之至,每天背饭兜走十余里崎岖山路去上学,在那里寄宿的学生还没有起床以前,我已经到达学校。

作文常是初步的科文“大古风十八句”,学科是汉唐诗和大学通鉴等,习字则写粉板。

这时公布了壬辰庆科(我国最后一次科试)在海州举行。一天郑老师告诉父亲说:

“这次科举,应带昌岩去应试。过去光写粉板,虽也能写明纸,但因是生手,怕写不好,必须在状纸上练习书法,以准备书写明纸。老兄家境贫寒,能否买纸?”

父亲说:“纸我买,能写字就行吧?”

“文章我给写。”

父亲很高兴,想方设法买来状纸五张。我高兴而又感激,按老师所教之笔法,勤练书法,把那五张纸写到乌黑为止。

科试的日子一天一天接近,由于我们父子没有钱,所以背着足够考试期间吃的小米,随着郑老师去了海州。没有钱住客栈,就在父亲以前认识的褰房家里暂时安身。



考试那一天,在宣化堂旁边的观风阁,四周用绳子围起来。据说要准时排队赴考场,考生们随着本院的学生队伍,各队拿着用白布做的旗帜,上面写着各书院名称“山洞接”、“石潭接”等字样,考生们头戴儒巾,身穿道袍,高举纸伞,随着接旗,以勇士为先导,争先恐后地抢占位子,拥了进去。科场中是不分老幼贵贱的,不讲秩序,当时称之为“遗风”。

还有许多老儒生头伸出围网,面向观风阁高声“乞科”<sup>①</sup>:考生某某,家住某乡,路途遥远,每次科举均都参加,现年七十余岁,当无法参加下次科举,此次纵为初试,若能及第,死而无憾!场中乱哄哄的,有的大声喧哗,有的放声痛哭,真是可怜又可笑!

本来我的文章决定由郑老师代作,只是由我誊写。我到了本接旗下一看,老师和接长们正在写作者、作书者。我向老师诉说了老儒生乞科的情景,说明我不愿以我的名义参加科试,想以父亲的名义报考,而我以后的机会还多。老师听了,高兴而又感动。有个接长也赞同我的话说:“好吧,你写的字不如我,由我来写你父亲的明纸。你再多读些书,日后科试由你自己作书誊写。”我低头致谢。那天就以我父亲的名义,写好卷子,穿过绳网呈递给试官。

此时我环顾四周,只见众人议论纷纷。有的不满试官,大发牢骚;有的说皂隶们不把试卷给试官批阅,偷走了一些试卷;有的说在科场作文时千万别让人看,因为有不通笔墨者偷看后,以自己的名义誊写了呈递上去。还有这样的怪话,说是只要有钱,就能科试当官,不通文墨的富豪出钱几百两、几千两买来大儒的文章,就能进士及第。岂止这些,还有人充满自信,说是汉城某大臣给试官写了书翰,这次必中无疑;还有人夸口说赠送给试官的守厅艺妓数匹绸缎,这次必然金榜题名。

我对科举产生了疑问。从上述几种现状来看,推行科举制度的

---

<sup>①</sup> 希望科举考试及格的祷告。——译注

国家(国即王、王即国的时代)举办这种科举,究竟有多大价值?我为开拓未来,倾注心血,用功读书,即使成为儒生,其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科举。现在科举是这种样子,国家大事又将如何?我就是能吟诗作赋,精通科文,也只能和某老师、某接长一样,作个科场的代书人。我必须转变方向,探索今后的道路。

我怀着不快的感觉和悲观的情绪,回到家中和父亲商议:

“这次在科场中见到种种怪事。我原想学有所成、立身扬名,以免再受姜、李两家的欺凌。现在作为我唯一出路的科场竟有如此弊端,我即便成为大儒,学力压倒姜、李,他们有孔方兄的魔力,又能奈何?况且要想读书、成为大儒,多少要有些钱财,现在家中一贫如洗,我是不再想读书了。”

父亲也认为我说得有理,便说:

“那么你试一试学习看风水,或看相吧!如果学而有成的话,便替自己祖先找一处风水好的祖坟,不愁子孙发达,享受富贵了。看相看得好,或许会遇到圣人君子也未可知。”

我认为这话很有道理,于是请父亲借来一本《麻衣相书》,独自在房里潜心研究。学习相书的捷径是对着镜子记下自己面孔各部位的名字,这样由己及人。

颇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比起看别人的面相,更有必要好好看看自己的面相。于是杜门不出三个月,根据相法、相论,观察自己的面相。看来看去也无富贵之相,倒是有些贫贱凶相而已。过去科场失败,原要想在相书上得到补偿,可是反而觉得更加颓丧。

人生是否也像禽兽一样,仅只为活命而生存,最后与草木同朽呢?《麻衣相书》中有一句话给陷于绝望中的我带来一线希望:

“相好不如身好;身好不如心好。”

看了这句话,我于是放心了,坚决抱定要做好人的信念。我决心不管相貌如何,首先致力于内心的修养,做一个真正的人。过去想靠科举当官,以摆脱贫贱,这是虚荣、是妄想,不为好人所取。可是心地

不好的人,有什么好方法会变成好心人呢?对此仍感茫然。因而合上相书,再稍浏览地家书,可是这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又转而开始研读兵书。读完《孙武子》、《吴起子》、《三略》、《六韬》等,不明白的地方很多,可是读到论将帅的才能时,“泰山覆于前,心不妄动”,“与士卒同甘苦”,“进退如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些章句,深深引起了我的兴趣。

此时我已十七岁,于是我一方面集合亲族子弟们自己做统领,一面研究不太了解的兵书,转瞬不觉又过了一年。

# 2

## 加入东学党

是时，各地谣言四起，说在某地出现真人，拦截海上的轮船，要缴出税捐后才放行啦；不久将来，李朝灭亡，郑道令将定都鸡龙山，因此必须赶快到那地方去，才能成为新国的两班；某人已变卖了财产举家迁往鸡龙山去啦等等，谣言不脛而走。

又听说距我们村子南面二十多里的浦洞，有个名叫吴膺善的，与他邻村有一位叫崔疏铉的人同在忠清道东学老师崔道明门下学道，能飞檐走壁，忽隐忽现，并且能御风而行；他们的老师崔道明先生去忠清道，能在一夜之间来回。因此我又对“东学”发生兴趣，决定去寻访此人。据别人说，必须斋戒沐浴，穿上新衣，才会被收录授业。

在十八岁那年正月初，我斋戒沐浴，头梳长辮，身穿青袍，腰系丝带，登程拜访浦洞吴宅。

至其门前，里面传出读书的声音，与一般读诵经典或吟诗声音全然不同，倒像是在合唱，也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我恭敬地来到门前，请求面见主人，屋内闻声出来一个面目清秀的青年接待了我，原知这家是两班，现在看来，果然不错。他束着发髻，头戴通天冠。我恭敬地行礼，他也恭敬地还礼，问道：“公子从哪儿来？”

通报姓名后，向他禀告说我不配受到两班主人家的答礼，何况我还梳着辫子，尚未成年，实在是受宠若惊。

那人很感动地说，“与常人不同，我是东学道人，遵照老师的训诫，对任何人皆一律平等，无贫富贵贱之分，所以不必客气。”又问了我的来意。

我听了此话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遂说明我是为了听道而来，不知能否收留我这尚未成年的孩子。他很高兴地向我说明了东学的由来和道理。

原来东学道是龙潭崔水云先生首创的，崔先生已殉教，现由他的侄子崔海月任大道主继续布道。这个道的宗旨，乃在使末世的子民改恶从善，成为新百姓，准备将来侍奉真主，在鸡龙山建立新国家。

听了这道理，使我欣喜若狂。我曾发誓要做好心人，听到侍奉真主，替天行道这话，不觉为之动心。而我又一向对阶级差别恨之入骨，东学的平等主义给我增添无比的力量，听到李朝运数已尽，要建新国之说，联想到在海州参加科举时所见的现实，我好像着魔似的，立即询问入道手续。遵照道规，须缴白米一斗，白纸三卷和黄烛一对，方能入道。我阅读了《圣经大全》，《八编歌词》和《弓乙歌》等东学典籍后，回到家中，禀告父亲此行经过，父亲立即答应了，给我准备了入道所需的礼物。从此我就成为东学的一员，用功学习东学。父亲也跟着我入了道。

就当时情况而言，两班加入东学的极少，而平民却甚为踊跃，不到数月，“连臂”（布道后发展的信徒，或称弟子）已达数百人。因此我的名声，遐迩咸知，很多人找我来求教入道途径，也有人造我的谣言。故而常常有人问我：

“你信仰东学，会有什么造化呢？”

我总是这样回答：

“不要作恶，多行善，便是造化。”

这是我的率直而正当的回答,可是往往不能使听者满意,他们还以为我把造化藏起来,不让他们看见。也有人说看见过金昌洙(此时我开始用这个名字)凌空一丈多高走路,这种毫无根据的谣言,散播到各地,使我名盛一时,不仅在黄海道一带,甚至远至平安南北道,只要提到我的名字,众人皆知。当年我手下的“连臂”多达数千之众。在黄海平安两西地方的东学当中,我是年纪最轻而拥有“连臂”最多的,因此大家别称我为“幼接主”<sup>①</sup>。

癸巳年秋天,海月大道主从忠清道报恩发给吴膺善、崔琉铉等《敬通》(公函),让他们上报各自“连臂”的名单,并在道内选拔十五名深孚众望的“道儒”直接去晋见大道主。我也当选。因梳着辫子不方便,故盛冠启程。

“连臂”们捐助我旅费并以特制的海州香墨作献给道主的礼物,一路水陆兼程,到达了海月先生居住的忠清道报恩郡长安。一进村子,但闻家家产户诵读咒文:

“侍天主造化定。

永世不忘万事知。

至气今至原为大降。”

其声不绝于耳。

来晋见海月大道主的以及回程中的徒众,络绎不绝,家家都挤满了人。我们向接待人呈上十五人的名单,拜托他报告大道主我们到达的消息。

不一会儿,通知要召见从黄海道来的道人。

我们十五人随着向导,晋见海月先生,向先生行礼,先生坐着,躬身答礼,并对远道跋涉的我们道劳。我们献上信徒名册,先生命文书接过去处理。我们不远千里而来,不仅想请先生传授一点神奇的造化,还想瞻仰先生的道骨仙风。先生看来年近六旬,长着美好的连

---

<sup>①</sup> “接主”是东学首领的意思,是从上面赐下的职衔。——译注

鬓胡子及少许黑毛，面貌清癯，头戴黑笠，穿着上袄，端坐视事。门前放着一只铁炉，炉上煎药罐正在滚着，参汤的香气四溢，据说是先生所服用的。房间内外由诸弟子们侍卫。其中先生最亲近的人是孙应九秉熙和金寅局，这两人是先生的女婿，此外还有有名的弟子朴寅浩等。

看起来，孙秉熙是个清秀的青年，金寅局年纪约有四十，好像是诚实的农夫。

孙先生曾在符书上写下“天乙天水”几个字，似乎是位书法家。

我们一行侍立在海月先生面前的时候，门徒传来消息，说全罗道各官府正在逮捕东学党，古阜的全琫准业已带兵起义。接着报告又说某郡的郡守逮捕了道儒的全家，又勒索钱财。先生听过报告，显出震怒之色，用庆尚道方言说：

“老虎扑过来了，怎么还坐着等死，手里就是只拿着一根木棒也得应战呀！”

先生的话就是动员令。来自各地待命的大接主们，顿时群情激愤，纷纷告退，潮水般地涌了出去。

我们来自黄海道的一行也分别接受了“接主”的牒纸，上面盖有篆字刻的圆印“海月印”三字。我们辞别了先生，游览了俗离山后踏上归途。

各地的人们成群聚集，平民穿着白衣，佩带着军刀。我们到达广惠院场时，数万东学军在各处布岗检查行人，他们把附近两班中平时虐待东学党的人抓来，迫使他们坐在路边编草鞋。

我们一行则拿出证件给他们检查后，很容易地通过了。

一路上看见很多人从附近村落背着饭菜到“都所”<sup>①</sup>去，人群望不到头。在水田间割稻的农民看到东学军像潮水般地涌来，相继丢弃镰刀逃走。我们到了汉城时，与开向三南的京军<sup>②</sup>相遇。九月才回

---

① 即司令部。——译注

② “三南”指忠清道、全罗道、庆尚道。“京军”即卫戍首都的军队。——译注

到海州。

黄海道的东学党们也正在跃跃欲动。由于平日受到两班与官吏的欺压太甚，民不聊生，立即响应三南东学的《敬通》（公函）。于是十五个“接主”与诸头领商议的结果决定举事，以海州竹川场浦洞附近的市场为总集合地，对各处道人发出“敬通”。

我住在八峰山下，就以八峰为名，在青纱上写了“八峰都所”四个大字，又高悬“斥洋斥倭”标语。为了准备与汉城来的京军和倭兵作战，召集“连臂”中备有枪械的壮丁们，编组军队。

由于我本是在山地生长，又是平民，所以我们这个接的同志中有很多打猎的“连臂”，除了将邻近富户家藏的若干自卫用武器搜集来以外，大部分都是猎户自己带来的猎枪，总计配有枪械武器的共有七百多人，声势浩大，举事之初比任何“接主”的实力都强。

讨伐行动按照先前最高会议中所拟定的战略，决定首先夺取黄海道首府海州城。打倒贪官污吏和日本鬼子，大家推选我八峰接主金昌洙为先锋将。因我虽年幼，平日阅读兵书，颇晓用兵之道，加之我部队中拥有很多射击精良的猎户，但实际上也有别的头领不愿打头阵首当其冲的缘故。我虽然知道他们的用意，但仍然乐于被选为先锋，请其他部队跟在我的部队后面前进。

我打着先锋司令旗，骑着马一路领先向海州城进发。抵达海州城西门外，在仙女山摆开阵势，等待总攻击命令。不久总指挥部下达了总攻命令，并且命我制定作战计划，全权指挥进攻。我的作战计划是想趁京军尚未来到之前，即开始作战。现在城内只有乌合之众的守军两百多人和日本兵七人，首先命令先遣队袭击南门，把守军军力诱引到那里，然后我将力攻西门，并请总部观测形势，支援薄弱的一方。

我把这一作战计划向总部报告，总部采纳了我的计划，派出一支部队进攻南门。不料正在这个时候，几名倭兵爬上城头放了五六枪，向南门进攻的先遣部队立即四散逃亡。



倭兵见了这般光景，出了南门，向逃亡的士兵开始猛烈地射击。我正在指挥全军向西门展开猛烈的攻击时，突然从总部下来了退却的命令，我先锋队尚未掉头退却前，只见前后左右的军士们纷纷向山野逃亡。

我问了退却令的原因，说是南门外有三四个道儒中弹阵亡，大军就因此溃散。

这样一来，先锋队无法单独固守，因此决定有秩序地退却到离海州以西八十多里的回鹤洞郭监役宅驻扎，并集合随后而来的退兵。所幸武装军士们没有失散，又都集合起来进行整顿。

这一次的失败使我很激愤，下决心要训练精良的军队。无论是不是东学道儒，只要是有经验的军官就聘请为训练部队的教官，开始操练步法做体操，射击术更不在话下。

有一天有两个人来要见我，是住在九月山下的郑德铉和禹钟瑞。他们比我大十多岁，是见多识广的名士。他们泰然地说东学军没有一兵一卒是可用的，只听说我比起其他东学军稍好一点，所以特来看看。

我的侍卫们见他们两人说话傲慢，大为愤怒，有的指责他们是毁道者，有的骂他们是无赖汉。我大怒，呵斥道：

“宾客和我面谈，你们如此无礼，这不是帮助我，而是蔑视我！”

喝令部下退出，只剩我们三人对坐着。我说：

“两位先生不辞辛苦，远道而来，必有指教。”

姓郑的说：

“和你谈计策，你也未必听从，更无实践的可能。”

“东学接主都是目空一切，盛气凌人，视先辈如草芥，你不也是那种人吗？”

我更恭顺地说：

“我这个接主是否跟其他接主一样，要待聆受先生们的教益后才知分晓。”这时候，郑先生才欣然握着我的手，献出统兵领军的大计：

一、整肃军纪：对兵卒不可对拜，不用敬语。

二、争取民心：必须严禁东学军携械私入民家强索钱财粮食等行为。

三、招贤纳士：四处张贴求贤文告，广纳贤士。

四、全军驻屯于九月山施以严格训练。

五、没收日本人储藏在载宁、信川两郡的大米数千石，运至九月山的贝叶寺以充军粮。

我听后大喜，立即决定实施这个计划，马上集合全军于大操场，宣布郑氏为“谋主”，禹氏为“从事”，且指挥全军向他们两位行最敬礼。我请从事宣布了几条简易的军令，申明对违令者将施以笞刑杖刑。正积极准备向九月山迁移时，一天夜晚从安进士处派来了一位密使。

安进士名泰勋，住在距回鹤洞以东二十四里千峰山那边的信川郡清溪洞，他以文章书法闻名于海西、汉城，智略兼备，颇具胆识，甚至当时朝廷的大官也对他优礼有加。

东学之乱一起，安进士就为了讨伐东学军，在他的故里清溪洞自宅设立“义旅所”，让他的子弟们都当了兵，又招募枪手三百人，在京城大官的援助和黄海监史的指导下，声讨信川境内的东学党颇有成绩，所以各接主对他都感到恐惧而保持戒备。我们也对清溪洞严加戒备，不敢稍有懈怠。

我派郑谋主与密使会晤，据他报告，安进士曾秘密调查，得知我年少胆大，颇器重我的人品，将不派兵讨伐。但我军基地回鹤洞，与安进士的清溪洞，两地相距仅二十里，且拥有重兵，万一我攻击清溪洞失败的话，那么我的声誉即将毁于一旦，甚至生命难保，也将丧失一个有才干的人，所以安进士是为我着想才派来密使。我立即召开参谋会议共商对策，决定与安进士订立密约，双方互不侵犯，如有任何一方陷于困境时，对方立即驰援。

按预定计划，我的军队向九月山贝叶寺集结，并以后寺为大本

营,村口设了门岗,严禁军人下山外出。还没收了倭寇堆存在信川的白米千余石,下令给山下各户,凡搬运白米一石至贝叶寺者,奖以白米三斗,于是白米在当天就搬运到寺内。我们每天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实弹演习,操练战术。又通告各村凡有自称为东学党人而有扰民行为、横征暴敛者,应立即告发,以便收缴其枪械,将其扣押,施以笞刑杖刑,严加惩罚。结果没有几天就很快地恢复了秩序,老百姓也安定下来。

又公布《招贤文告》,广征人才。我在向导指引下,查访九月山内外的有识之士,然后单身徒步去拜访。我师事月精洞之宋宗镐。他早年游历上海,精通海外之事,为人豪爽,颇具英雄气概。我派人把他请上山寺,委以顾问之职。丰川郡名士许坤也来投奔,他文笔流利,精于时务。

在贝叶寺有位闻名于京乡各地的高僧荷隐堂,他总管寺中事务,拥有数百名弟子和善男信女,我常听他说法。

我们有时召开最高会议,讨论将来的方针。这时消息传来京军和倭兵占领了海州,平定了雍津、康翎等地,大有越过鹤岭的企图,不用说他们的目标就是九月山了。

然而可虑的不在京军和倭兵,而是与我同为东学党的李东烨的势力。

李东烨是九月山一带最有势力的接主,他的部下常侵犯我的防地,恣意抢劫,被我军逮捕后加以严惩,以致彼此间结怨日深。再者在我军中,违反军律而被罚者也有很多人怀恨在心,投奔李东烨军的日益增多,因此李东烨的势力日见壮大而我军兵力则逐渐削弱。

因此我召开最高会议,见机行事,我放弃了接主的名义,并决定派许坤去平壤,通过张好民的介绍,以取得黄州兵使的谅解,将贝叶寺的军队移交给给他。

于是许坤拿着宋宗镐的介绍信,去了平壤。

甲午年十二月,我十九岁那年,一日忽然全身发烧,头痛欲裂,

卧倒病榻，住在一间静室里。荷隐大师来探病，经他仔细地诊断，才知是出疹子。荷隐堂笑着说：“是位连疹子还没有出过的大将呢！”于是通知头领李龙善，禁止人们出入我的房间，由荷隐大师给我治病，并从女僧堂找来一位治疹子有经验的老修士来护理我。

一日传来李东烨领军攻向贝叶寺的急报，立时听见一片骚乱的枪声。转瞬间，两军在寺庙附近短兵相接，原来就士气沮丧，再加上领军将帅不得其人的我军，不意中突遭袭击，遂一败涂地，本军防地亦为敌人所控制，我军犹如惊弓之鸟，四下散逃而去，接着又听见李东烨的号令：

“有敢冒犯金接主者，处死刑。赶快追杀头领李龙善！”

他所以不敢加害于我，是因为我乃海月先生盖章任命的接主，而他只不过是受林宗铉委任的第二代接主，怕杀害了我，以后难免杀身之祸。

我听了他这号令后，一跃而起，跑到廊下高声大呼：

“李龙善是按照我的命令行事的，有罪该由我来承担，要杀杀我好了！”

李东烨命令部下逮住我，使我动弹不得，眼看着李龙善被士兵们推出去，接着远远地从村口传来枪声，然后李东烨的部下就全部退走了。

听到杀死李龙善的枪声后，我快步跑到村口，只见他中弹倒地，他身上的衣服，仍然在燃烧着。我抱着他的头，不禁放声痛哭，随即脱下我的上衣，盖上他的头。这衣服是我当首领后，妈妈在近二十年里第一次亲自为我缝制的绸缎上衣。村民见我赤身哭倒在雪地里，赶紧拿来衣服给我披上，于是我含悲指挥村民埋葬了李龙善。

埋葬好后，我未回到贝叶寺，而直接去缶山洞见郑德铉，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报告一遍，他泰然地说道：

“李龙善之死，固然不幸，但吾兄现在是要做的都已做过了，何不暂时调理一下身子，休息几天后，脱离风尘，跟我去旅行一趟如何？”

我说要为李龙善报仇，郑德铨摇头说道：

“这当然合乎情理。现在扫荡九月山的京军倭兵所以还没有展开猛攻，是因为山外李东烨气势颇盛，而山寺内又有你凭借天险之精兵。他们只得刺探军情，待机而动。现在听到这一消息，必然立即兴兵歼灭李东烨，攻占贝叶，你谈何复仇？”

李龙善是咸镜道定平人，因经商而寄居黄海道，枪法很准，善于行猎，虽然没有什么的学问，可是却颇有领导才干，故而我委他为火炮头领。

他死以后，听说其子侄来到九月山，要把他迁葬回定平故里。那时，他们听了村民叙述龙善被害经过，知道了我用上衣盖住他的头部，所以回去时对我并无任何恶感。

我在郑家疗养了两三天后，便到长洞郡梦金浦附近避难，在那里隐居了三个月。这时从东边传来了风声，说是李东烨已被捕，处以死刑，而海州各郡的东学党终于全部瓦解。

此后，我偕同郑氏去探望在基洞的父母。当时倭兵已在竹川场布阵，到处搜捕附近的东学党，形势紧张，很不安全。双亲劝我远避他乡。依郑氏之见，要去投奔清溪洞的安进士，我以为自己乃是败军之将，去投靠以前的敌军安进士的话，那么所受的待遇一定不堪设想，但是郑氏强调安进士从前曾派过密使联络，这决非缓兵之计，而是看重我年少胆大，爱惜人才，现在不应有此顾虑。所以我就听从了他的话。

# 3

## 清溪洞时期

在故里探望父母亲后的次日，我和郑氏一起，越过千峰山抵达清溪洞。清溪洞四周围绕着险峻而灵秀的峰峦，在村里散住着四五十户人家，村口前有条清溪，岩壁上刻有安进士的手迹“清溪洞天”四个大字，这四个字就像随着流动的溪水似地翩翩起舞。有一座山峰好似村口的屏障，在上面筑有炮台，路口有卫兵，看到我们就前来查问，我们递上名片，等了片刻，得到许可，有一军士来引导我们去义旅所的安进士住宅。宅前有荷花池，池中有一草亭。据说这是安进士六个兄弟，平常饮酒吟诗的地方。在大厅墙壁上高悬安进士亲笔所书“义旅所”的横额。看了我们名片的安进士在正厅亲切地迎接我们，相互行礼后，第一句话便说：

“获悉金硕士在贝叶寺幸免于难，曾派专人去探听，却没有消息，非常焦虑，不意大驾今天亲临寒舍，深感荣幸。”

又说：

“庆幸令尊令堂俱皆健在，不知是否已经安置妥当？”

我回答尚无安居之处，现在暂住本乡。

安进士立即派吴日善率领荷枪兵士三十名，命令他说：

“限当日内去基洞迎接金硕士双亲来此，并征用附近村庄的牛

马,将全家所有家具什物全部搬来。”

又在近处购置一栋房屋,安顿我们全家寓居在清溪洞,此时是乙未二月,我正是二十岁的青年。

安进士还嘱咐我,请我每天去他家客舍,他不在时,也可和他的兄弟们游玩,或和他的亲友交谈,也可看书,让我随意,不必拘束。

安进士兄弟六人,老大名泰镇,老二泰铉,安进士泰勋行三,老四泰健,老五泰民,最小的弟弟名泰纯。他们都学识丰富,人品高尚,尤其是安进士,无论是学识,还是气量,均卓越非凡。

他为了考我,时常跟我海阔天空,高谈阔论,而我的举止却经常显得很幼稚。有一天,春风和煦,日暖融融,他率领炮军,摆设酒宴,一起玩耍取乐。他召集了擅长摔跤者进行摔跤比赛。在最后决胜时,两勇士扭打在一起,他们智勇相当,久战而难分胜负。安进士问我:

“依昌洙看来,何人取胜?”

“身高者看似力大,我看将输给身材较矮者。”

“何以见得?”

我答道:

“从刚才的摔跤来看,身高者裤子被撕破,臀部外露,他的力气似不能全部施展出来,我敢断定他必败无疑。”

言犹未了,那人果然被摔倒在地。从此安进士对我更加钟爱。

进士有三子,长子重根当年十六岁,梳着顶髻,以紫色绸巾束头,扛着一支东洋猎枪(非普通之长枪,携带极为方便),每天去老人堂和薪上洞打猎。他英姿勃勃,在军士中,他的射击技术首屈一指,无论飞禽走兽,他都百发百中,常跟他叔父泰健去打猎,有时一天能猎获狍子、马鹿多头,拿来犒赏军士们。

进士六兄弟均喜饮酒吟诗,捕猎到野兽,就相聚一堂,用作佐酒的佳肴,同席还有吴主簿、高山林、崔先达等人。我虽然不善于饮酒吟诗,也常应邀共尝山珍海味。

进士还为其子侄营建了书斋。定根、恭根当时是八岁、九岁,身

穿红色长袍，留着长辫，正在读书，进士对他们总是严加督促，可是似乎对重根不怎么管束。

进士六兄弟均体格强壮，无一人虚弱，而其中老三安进士更是目光如炬，有一种威慑的力量。当时朝廷大臣中有的遭到他口诛笔伐，他们虽然对他抱有恶感，但和他见面时也不由得肃然起敬。

依我看来，他为人洒脱，对于目不识丁的一般平民，从不骄傲，不要态度，和蔼亲切而彬彬有礼。因此，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的人们，都对他怀有好感。他面貌清秀，但由于饮酒过度，鼻端略呈红色，这可以说是他的瑕疵。

他精通律诗，我经常听到他的座上客传诵他的诗句，有时他也为我吟诵他得意之作，现在我记得住的只有《来》这一首。他亲书黄石公的《素书》贴在壁柜门上，酒兴大发时就高声朗诵。

进士的祖父仁寿历任镇海县监，后来将其大部分家产分给了众至亲，自己带着约可收成三百石的资金，迁移到清溪洞来隐居。此地山水秀丽，环境清幽，是个避乱的世外桃源。这时长孙重根才两岁。

进士还是举子时，曾在京城金宗汉家住过多年，并参加了科试。他小科及第时的试官就是金宗汉，因此当时曾风传安进士是金宗汉的门客，或是他的家属。

我天天去进士府中的客舍玩耍，常见到一位老人，年约五十多岁，身材高大，衣着朴素。他来客舍，安进士向他介绍了我的简历。他就是学者高能善，人们常称他为高山林先生。

高能善世居在海州西门外飞洞，是重庵柳仲教的门人，跟毅庵柳麟锡同门，在海西地方算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安进士举义之初，任他为谋师，遂举家迁居到清溪洞。

有一天，在安家客舍，我和高山林见面，一起玩了一整天。他邀我到他寓所去玩，因我对他非常钦佩，次日便去拜访。先生的面上显露着微笑，亲切地迎接我，并介绍他的长公子元明。元明的年纪看起来大约三十开外，禀质聪明，但不及他父亲雄伟宽厚。次子成年后死



去，儿媳寡居在家。元明的长女十五六岁，次女四五岁，膝下无子。

高先生寓所的客舍是一个小房间，房里堆满了书籍，在四面墙壁上贴着有古代名人的座右铭和自己平日所写的心得等。先生喜欢静静地跪坐着静心读书，也读《孙武子》、《三略》等一类的兵书。高先生跟我谈话时征求我的意见说：

“你每天到安进士客舍去玩，对精神修养可能没有多大帮助，不如每天来我的客舍，一起讨论讨论学问如何？”

这位鸿儒对我的关切，使我诚惶诚恐，感激不已。我说：

“先生如此厚爱，小生无才无德，愧不敢当。”

先生含笑不语，但可体会到他对我的一片钟爱之情。

我当时心里十分抑郁苦闷，意气颓丧。我先是科场失意，继而学习观相，算知自己命途多舛，决心想做个好人，但又不知从何着手，感到渺茫，遂入东学修道，梦想建设新国家，培育新国民，至今也不过是捕风捉影。现在又成了败军之将，幸蒙安进士不弃，留给我一条生路。一想到将来，我又立足于何处？哪儿是我的进身之路？就茫然不知所措。今蒙高先生错爱，我有何德能，怎敢接受？万一又像科试、观相、东学那样，一无所成，我自己堕落倒在其次，岂不连累了高先生这样高洁之士？

我向高先生吐露了真情：

“先生不弃，开导于我。但我年方二十，误入歧途，遭受了多次失败，至今心中仍感不安。先生如认为孺子可教，将来必有长进，那就请先生多加指教。但万一我成不了大器，岂不辱没了先生崇高的德行？这实非我之所愿。”

说罢，我不由热泪盈眶。

高先生非常理解我的心情，他同情地说：

“一个人要想知己亦非易事，何况知人！古来以圣贤为标准，在踏着圣贤的足迹前进的过程中，有到达圣贤的境界的，有达不到的，也有误入歧途，自暴自弃，自甘堕落而无异于禽兽的。虽然以往你抱

着做好人的宗旨，而几次误入歧途，经受了磨难和失败，但只要勿失初衷，过不惮改，日进再进的话，总有一天会达到目的的。失败乃成功之母，苦闷为快乐之本，所以不要难过，努力去做就行了！我虽老朽，能对你的前程有所补益，也很光荣啊。”

听了这些话后，我感到莫大的安慰，犹如饥饿的婴儿吸到了母亲的乳汁。我又跟高先生说：

“对我的前途，先生如不吝赐教，我将尽心奉行。”

“你既有如此决心，我定按你之力所能及，尽我所知，悉心助你。年轻人不必伤心，每天来我处玩耍，闲闷无聊时也可和元明一起游山观景。”

从这天起，我似乎忘记了饥渴，高先生若要我死，我也能以死相从。

我每天去高先生的客舍，先生为我评论分析古今的伟人，并将他自己研究学问的心得传授给我。他给我指出《华西雅言》、《朱子百选》中重要的章句，深入讲授义理。他教导说，一个人即便具有卓越的才能，如脱离了义理，就会变成祸害；又说人之处世，应以义理为基本；判断、实践、继续是成就事业的三段。这些都是金玉良言。先生总是把要讲的书中章节事先折叠好，好让我阅览，讲授时边翻边教，真是倾注了全部精力。

高先生不采取一般教经书的次序，而是斟酌我的精神与资质，采取了截长补短口传心授的捷径。先生可能看出了我缺乏决断力，便告诉我：尽管看得透彻而又判断正确，但若没有实行的果断力是没有用的。然后又仔细地为我解释“得树攀枝无足奇，悬崖撒手丈夫儿”的句子。

如此过了数月。偶尔安进士来访先生，在旁边倾听他们两位谈论古今，是非常有趣的事。

我移居清溪洞，最初人地生疏，去安进士家客舍时，安进士如不在座，炮军们就故意提高嗓门，说给我听：“那家伙如不是安进士，早

就尸骨已寒了。还想要人们称呼他接主呢！”“可不是，那家伙根本把我们炮军视同草芥。”

他们瞅着我的眼色，冷嘲热讽。有的人故意装作提醒似地说：“可别那么说，他听去了，日后东学重新得势，会报仇的。”他们在一旁煽风点火。

我听到这些冷言冷语，火冒三丈，真想立刻离开清溪洞。但转念一想，主将安进士对我不薄，现在和这些无知兵卒意气用事，反显得我气量太小，因此又忍下了。

进士每当在客舍宴请或兴致勃勃地游戏作乐时，必邀高先生同乐。我虽然在饮酒赋诗或年纪衣着方面，不能为座席增光添彩，但也从未忘记邀我同座，稍一迟到，即吩咐士卒或下人：“速去猪谷请昌洙金公子来。”这样，炮军们的态度自然也变得恭顺了。岂止如此，安进士兄弟们的态度也与初时大不相同，起初见面应酬时，比较冷淡，在客舍中士兵们对我出言不逊时，他们也冷眼旁观，不加拦阻，也曾把这些事向安进士诉说过，也许进士认为面责这些无知的士兵，反倒对我不利，所以才对我更加优礼相加，使士兵们逐渐改变了态度。而高先生对我亲切款待，村民们见到这种情景，态度也渐渐起了变化。

我从几年前害了疹子后，体质虚弱，此时又发了病，请教常来安进士客舍的吴主簿，他说常服沙参，能断病根。因此在安进士府上玩耍后，常扛起药锄，和元明一起上后山采药，也常和元明坐在岩石上亲切交谈。采来沙参，连服三个月，疾病果然得到根治。当时信川郡守闻知此事，曾请安进士转请我采药，我采了一网兜沙参送给了他。

我常常到高先生的府上去玩，跟高先生一同进餐，夜阑人寂时则谈论国事。

高先生曾说，自古以来，天下没有不曾兴旺过的国家，也没有不曾灭亡过的国家。但过去所谓亡国，只指夺得君位而言，今则不同，土地、人民、主权，俱皆并吞。我国也是要亡的，最终将亡于日本。朝

廷大臣都有媚外思想,有的亲俄,有的亲英、美、法、日,以保全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全然不顾国家之兴亡。拥有最高学识的山林学者,也只是发发感叹,提不出任何救国的纲领,实为最大的憾事。亡国,有的亡得伟大,有的亡得可耻,我国将是亡得最可耻的。

我大吃一惊,忙问道:

“怎么是亡得可耻?”

“所谓亡得伟大,是其国民为义而战,力尽而亡;所谓亡得可耻,乃是向敌人阿谀奉承,最终中了敌人圈套,投降而亡。

目前倭寇的势力遍布我国,甚至于宫中也不免,大臣任免也要受敌人的支配,我国岂不是成了倭寇的一部分了吗?天下哪里有万古不亡之国和不死之人乎?目前我们只有一死报国之一途罢了!”

说过这些话后,先生以沉重的表情看着我,我也无法克制悲愤而失声。

我问快要灭亡的我们国家还有没有恢复的办法。对我的问题,他认为救亡运动是每个臣民的义务。我们不应像当今朝廷大臣那样向外国摇尾乞怜,而应互助式地跟清国结盟,因为清国在去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必力图复仇,我国的重要人物都应该到清国去,除调查其国情实力外,并与该国人士建立友谊,徐图东山再起,互相策应支援,以俟复国之机,并问我是否愿往。

我问他:

“像我这样一个年少不懂事的人,去了能有什么作为呢?”

先生微笑着说:

“光你一人,自然不行,如果我们有很多同志前往清国,在政治界、学术界或商业界活动,这样的人就会日益增多,现在虽然只有你一人,但这样努力下去,往后必有裨益。你不妨一试。”

这段话,使我下定决心要到清国去,并向高先生说长期以来我的心情抑郁,不如去远处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先生听了大喜,并且说:

“你走后你双亲会感到孤独,令尊可到我客舍和我闲谈消遣。”

我无限感激。

照理说,这意思应该告诉安进士才对,可是高先生却嘱咐我不可让安进士知道此事。他说:“安进士似乎有意信奉天主教,万一他有依赖洋夷之心,这于大义有违,对安进士的态度日后再定,这件大事不能跟他商量,但安进士确是个人才,因此你游历清国之后,结果良好,再和他商量也不算迟,所以这一次就不辞而别吧!”

我认为他说得有理,于是便悄悄地准备启程远行。

我决定启程前往清国的前一天,晋见了安进士,在他的客舍,遇到了一个卖篦子的,他的谈吐怎么看也不像是个普通的人,于是和他寒暄,后来才知道他是住在全罗道南原耳洞的金亨镇,跟我是本家,年龄约比我大八九岁左右。

我借买篦子为名,带他到我家来过了一晚,想观察他是何等人物,果然他不是普通卖篦子的人。

据说他听说安进士是当代的大文豪,大英雄,特为见面而来的。

他人品虽不出众,学识也不渊博,但言谈间似乎对国家时局颇感不满,想要有所作为。

翌日陪同他去拜访高先生,请先生加以品评,先生所下的判断是,他虽然缺乏大人物的头脑,但有协助别人做事的才能。于是我决定和他作伴,卖了一匹家里喂养的马,准备了二百两盘缠,一同启程前往清国。

# 4

## 江界城之役

我们的计划是先游览白头山<sup>①</sup>，绕过东三省到北京。

一直到平壤都很顺利，从平壤开始，我也跟金亨镇一样化装成卖篋子和杂货的商人，买了可以在山城贩卖的毛笔、墨和其他必需品，两个人分别背着。

离开平壤一路观览乙密台和牡丹峰之后，再转江东、阳德、孟山，越过高原、定平，抵达咸兴监营。

在江东某市场歇夜时，曾经被七十多岁的老醉汉无缘无故地用鞭子抽了一顿，因为有要事在身，要走远路，不能因小失大，于是讲了韩信在淮阴受胯下之辱的故事，算是自我安慰。

路上还看了高原咸关岭上的李太祖<sup>②</sup>击退鞞鞞的战胜碑。观赏了洪原新浦的风景，参观了捕白腹鳕。有一个健壮的妇女篮子里装了一只花螃蟹费力地顶在头上走，螃蟹的一只脚比我的胳膊还粗，不禁惊奇不已。

咸镜道最值得称道的是当地教育比黄海道、平安道普及。即使在只有茅草房子的贫穷的村子里，书院及道厅都是瓦房。

---

① 长白山。——译注

② 李成桂。——译注

所谓“道厅”是村里公用的建筑，比一般的住房稍大而华丽些。人们平日在这里集会商讨村里公事，也在这里捻绳子，编草鞋，讲故事。又如某家有客人来，只须招待饮食，住宿却在“道厅”内，如果遇到了一文不名的过往旅客，规定由“道厅”供给膳宿，还备有鼓、长鼓、小锣、箫等乐器，村民们常集会娱乐，也以此酬劳来客。这些制度都颇值得借鉴。

在洪原境内的某一书院有三位老师，书院分为高、中、初三班。由这三位老师分别任教，这在旧书院里面是很稀罕的事。在书院两边挂有鼓和钟，鼓一响就开始上课，一敲钟就下课。

尤其是北青，这儿是咸镜道内最崇尚读书之地，当我经过此地时，现存的进士就有三十多人，大科及第的文官多达七人，真不愧为“文乡”，令人叹服。

在咸兴看到了我国最长的南大川木桥和四大物之一的长柱<sup>①</sup>，这长柱系大木材上面刻头像，头上戴了丝帽，脸上涂了红漆，瞪着眼，极其威严。四个这种木雕成双地分别矗立在南大川桥头。咸兴的长柱，大而有名，所以跟庆州的大钟和恩津的石佛以及连山的铁锅一起合称为“四大物”。

咸兴的“乐民楼”系李太祖所建造，仍然保存得很完整。

我们越过端川摩云岭，抵达甲山邑的时候，正当乙未年七月。此地令人惊奇的是除了官厅的屋顶是用瓦盖的以外，其他人家的屋顶上都长满了杂草，乍看像是无人居住的废墟，后来才知道屋顶是用桦树皮加土盖的，土上杂草丛生，因此下多大的雨，土也不会流失。桦树皮质料既白又平，坚硬耐用比瓦更好。还有一说，人死了用桦树皮包裹埋葬可历万年而骸骨不烂。

行经惠山镇，此地濒临鸭绿江，可以瞭望隔岸的东北，可听到彼岸的犬吠声，从这里可以赤足渡过。

---

<sup>①</sup> 路碑。——译注

惠山镇的“祭天堂”位于我国众山之祖的白头山麓，是古代皇帝派祭官祭山和祭天的地方，壁上悬有一副古联：

“六月雪色山，白头而云雾，  
万古流声水，鸭绿而汹涌。”

我们走上去白头山的路，越过西大岭、三水、长津、厚昌，渡过慈城的中江，抵达中国领土帽儿山。一路上所经过的山岭异常险峻，更有些地方是七八十里内渺无人烟，行路人必须携带干粮。山岭虽然险峻，可是野兽不多，森林密布，不能辨别方向。

据说砍伐后的树墩，可以作为七八个人的餐桌那么大的并不稀罕，我还看到有个壮士跳进挖空的树墩，用斧子砍斫当谷仓，还有的树在山巅上被砍倒后，倒在另一个山头，竟可以做为山峰之间的桥梁，我们也走过了这种天然木桥。

当地人心地淳朴，热情好客，出产丰富，招待旅客非常周到。农作物大部分是燕麦和马铃薯，山溪中盛产一种名叫“李延寿”的鱼，其味鲜美。他们以兽皮为衣，看起来非常原始。三水邑内的人家仅有三十户。

从帽儿山向西北越过老人峙，在去西大岭约一百里的旅途上，我们先后碰上了两三位采金矿的同胞。他们告诉我们说，过西大岭，路上就有响马贼，他们隐伏山林，杀人越货，我同胞已有被杀害的，因此最好不要去白头山，我们只好遗憾地取消了参拜白头山之旅，取道前往通化县城。

通化县城建设不久，官衙和城楼上的椽子尚呈白色。城内共有居民五百户，其中仅有一户是我国同胞。男的作中国人打扮，在县军队供职，而他的妻女都穿着我国服装。据说再过去十里有一位同胞叫沈生员，我们特地去拜访他，结果发现他虽粗通文字，却是个鸦片鬼，已经骨瘦如柴。

周游这一地区，遇到的人中最可恶的是一些“胡翻译”，学会了几句中国语，便专门欺凌可怜的同胞。许多同胞为了避甲午之乱，逃



难到人地生疏的中国境内,选择中国人不能居住的险峻山谷开垦山田,种植小米或玉米苟延残喘,而这些所谓“胡翻译”,专门勾结中国人滋生事端,抢夺钱粮,蹂躏妇女,无所不为。

我在一个中国人的家里发现了一个穿韩国衣服的年轻少女,据邻居说,她是中了“胡翻译”的奸计。她父母为她找婆家,被胡翻译看到,就为中国人做媒,以偿付债务为名,胁迫其父母,把她强行拉到中国人的家里来作抵押的。通化、宽甸、临江、桓仁、辑安等地也都有“胡翻译”横行无忌。

这地方虽无水田,但土壤肥沃,即使不施肥,一个人种地也可养活十个人。唯一缺乏的是食盐,必须从义州用船只逆水运来贩卖,因此价钱很贵。

所到之处,都有我国同胞,少的两三家,多的有十多户,他们自居斗室,开山耕作。他们心地非常淳朴,见有从本国来的人,一律称作“南方的客人”,跟亲戚一样亲热,每家都争着款待。男女老幼闻讯成群而来,要求来客谈一些故国的消息。他们大多数因生活困难,移居此地,也有不少是在中日战争时避难而来的,有的是在本国犯罪后逃出来的,其中也有在民变时当过“状头”的豪杰,也有亏空公款的平安、咸镜两道的官商。

从这一带的地势来看,婆猪江左右有薛仁贵、渊盖苏文的营垒遗址,到处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金、辽、高句丽发祥地宽甸有林庆业将军的碑阁,碑上刻有“三国忠臣林庆业之碑”据说住在此地的中国人,生了病有向此碑拜祭的风俗。

我们还得知在这地方,有位碧潼地方的人名叫金利彦,他勇力过人,学识丰富,沈阳刺史嘉许他的勇力,曾赠骏马一匹、《三国志》一套,还受到清朝高级将领隆重接待。获得清人之助,正图招募抗日义勇军。

我们打算去拜访这位志士,两人分道或同行,打听到金利彦的秘密住所。在江界郡西门仁风楼外八十余里处鸭绿江渡口有个叫皇

城的地方，由此再走十多里，便到三道沟。我们不知此人是否真正的义士，所以决定假装互不相识，让金亨镇打扮成游客，先我四五天去找他，一路上可探听他的为人。我则南行，一路上搜集见闻，随后抵达。

某日在离鸭绿江一百多里地方的路上，遇见了一位年轻清国军官骑着一匹盖有官印的马。他所戴的军帽(清军之军帽)上，玉鹭闪耀，红穗飘扬。我一把抓住他的马首，他便跳下马来。我因不会中国语，所以身上带有一张用中文写着旅行目的的文件，当时我便掏出来给那军官看，他未看一半便坐在地上放声大哭，我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哭，他指着篇文章里的“痛彼倭敌与我不共戴天之仇”等字，又抱住我痛哭。我请他和我笔谈，他抑制住悲痛，提起笔来先问我为什么与倭寇有仇？

我写到日本从壬辰开始，是我们世世代代的仇敌，而且在上个月还烧死了我国的国母。我反问他，我们是初次见面，为何放声痛哭？他回答说，他是去年在平壤战役中阵亡的清国将军徐玉生之子，曾托江界观察使寻找他父亲的遗体，江界观察使回信说遗体已找到，让他去运回灵柩。前往一看，并非其父，遂徒劳而归。

我便告诉他在平壤普通门之外，曾看见过写着“徐玉生战死之地”的木牌。

他详细地告诉我说：他的家是在锦州，家中养有一千五百名军士，他的父亲率领了一千名出征，已全军覆没，现在家中尚存五百名，家财富裕，他今年三十多岁，妻子××岁，已有几个子女。

当他问过我的年纪后，才知道我比他年轻，他要称我为弟，并要我称他为兄，彼此结为兄弟。

他说我们既然有共同的敌人，可以住在一起等待机会，并且邀请我跟他回锦州去，还没有等我回答，他很快地卸下我的行李，挂在马背上，并扶我上马，他一个人走在后面跟着。我请求下马同走，他说不必多虑，只走十里，就可找到官马乘骑。

在马上我沉思,这是多好的机会,我原来的目的就是要与中国人士结交,现在跟他结下缘分,亦算达成宿愿了,但顾虑的是无法跟金亨镇联络,加上金利彦举义,尚不知其内情,我无法跟他一起去锦州家。

于是我下马和他笔谈,告诉他我离家将近一年,不知父母的情形如何,又没有得到汉城来的消息,所以想回国探亲,并且了解国家的情势,以后再回来投奔兄长。他怅然说道,既如此,可回国探亲,从速返回,来我处相会。遂洒泪而别。

我仍是卖篦子的打扮,挨家打听金利彦的消息。与徐兄别后约五六天,才抵达金利彦的根据地“三道沟”。

我探听到金利彦当时有五十多岁,勇力过人,能双手举起五百斤的大炮,但好大喜功,无勇无谋,自大气量狭,据我的观察,他缺乏勇气。倒是他的同志中,曾在楚山做过“吏房”的金奎铉,为人颇有义气,且具谋略之才。

金利彦当了首领之后,秘密招募在楚山、江界、渭原、碧潼一带的猎户和移居到对岸的有猎枪的同胞,拥有大约三百名武装军士。他以国母被杀是国人必雪之大耻为号召,让写一手好文章的金奎铉作檄文散发各地,我跟金亨镇决定参加。我负责到楚山、渭原等地潜伏,招募猎手,又担任潜入江界城采购军火的任务。定于乙未年十一月初,趁鸭绿江结冰的时候起义,利用河冰调动军士占领江界城。

我完成了在渭原的工作后,在回到三道沟的途中,正渡过鸭绿江时,由于踏上薄冰失足陷入江中,全身都掉在水里,只剩两只手臂扒在冰窟窿边,我竭尽全力,好容易爬了上来,但被水浸透的湿衣立即冻成了冰块,寸步难移。虽幸免于淹死,却可能被冻死,我只有大声喊救命。后来被听到喊声的村民们救出抬到家里,这才保住一条命。

到了起义的那天,首先攻击高山里,夺取军械,分给没有武器的军士。但这确是失策,本来我的主张是不要先攻高山里,而直接奇袭

江界城。因为倘若先攻高山里，消息被传出，则江界城的守备必将更为严密，而且获得若干军火，反不如出其不意先攻江界城更为有利。金奎铉、白进士等参谋，也都赞成我的意见，可是金利彦始终固执己见，不予采纳。

在高山里之战中虏获了武器的我军，翌日向江界城进军，深夜里，全军经过秃鲁江，前锋部队离仁风楼大约十里处，忽见南岸松林中，出现闪闪火光。那时候用的都是火绳枪，所以士兵们手里都拿着点燃了的火绳。几个军官从松林中迎面出来找金利彦问道：“这次来的军士中有没有清兵？”

金利彦对他们说：“清兵没有来，等我们占领江界以后，就立刻来支援。”

不知道他说的是否实话，但决非战略性的回答，这亦是金利彦在作战计划上的失策。

当初我主张，我们之中找几个人打扮成清国军官在先头领导，而金利彦固执地说：

“在这次为国母复仇的圣战中何必假扮清兵呢！我们要堂堂正正地穿白衣去占领江界城，且江界城的军官，已经允许内应，因此用不着担心。”

我曾力陈所谓江界军队的军官并非受爱国心的驱使，而是慑于权势的一群，因此装着有清兵支援，在战略上实属必要。但金利彦始终一意孤行，不肯采纳我的建议。这时我见江界军队军官失望回去，顿感大势不妙。果然如此，当那些军官们快回到自己阵地之时，火绳枪一齐发动，弹如雨下。在冰上毫无防备的一千多军马，顿时秩序大乱，东逃西散，中弹的军士遍地皆是，只听得一片呼叫哀号。

至此，我明白事已失败，金利彦此役失利，必定无力再起，所以我与金亨镇决定脱身，朝着与军士们相反的方向往江界城暂时躲避。到了江界城附近的村子，发现家家无人。

我们走到一间大门和里屋的门都没上锁的屋子，在外面叫了半

天也没人应答,进去到里屋一看,只见屋角有一火盆(山里居民设在屋角的火炉,用以取暖),我们两人坐在火盆边烤火,忽然闻到房里散发出油香味和酒味,拿下搁板上的筐子一看,里面装满了各种肉食,我们掏出了鸡腿猪排,在火上烤了大嚼起来。这时有人开门往里窥视。我责问道:

“是谁半夜三更潜入别人家里?”

那人惊慌失措,嗫嚅地说:

“这是我的家。”

“不管主人是谁,你先进来暖暖身子。”

他进来后,我便问道:

“既然你是主人,为什么屋里空无一人,你跑到哪儿去了?我看你不像。外面冷,你先吃些肉。”

他失神地看了我们一会儿,才说当时正举行母亲的二周年祭祀,听到枪声,全家和来吊唁的客人都往山上逃难去了。

我向他道了失礼,并安慰他说:

“我们也是做生意来此,碰到这次骚乱,来此躲避,见大门开着,才进来的。见屋里有吃的,正好腹内饥饿,遂拿来充饥。兵荒马乱的,这也是常有的事,望你见谅。”

这时主人才放心。我劝他把躲到山里去的家人领回来,他还是不敢,说村口现在还有士兵涌向前去呢。问他士兵们为了何事出发,他说江那边(指清国)的义兵冲过来要打江界,被这边军队击退,战争结果谁胜谁负,就不得而知了,我又一次劝他说:

“不管是义兵来,还是军队来,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你妻儿孩子在雪地里过夜,有多危险,还是快把他们领回家来吧。”

“全村人都准备在那里过夜,岂止我家。客人但请放心,既然已来到我家,就请看一下家,我要上山去看看家里人。”

翌日,离开江界,越过狄踰岭,数日内即回到信川。

# 5

## 离开清溪洞

在往清溪洞的途中，听到高先生的长子元明夫妇由于霍乱而去世的消息，惊愕之下未及回家即前往拜谒高先生，我不知说什么好，先生却泰然自若。正要回家时，也不知何意，高先生忽道：

“立即就成婚吧！”

我回到了家，听父母说后才知道，我不在时，父母替我作主和高先生的孙女（元明之长女）订了婚，父亲告诉我订婚的经过是这样的：

有一天，高先生到我家里说：“最近令郎不在，一定很寂寞吧！先生不妨到寒舍来聊聊天。”于是有一天父亲到高先生府上去拜访，高先生详问我的幼年时代的事情。

父亲告诉他，我在小时候读书很用功，到海州去参加科举回来后非常悲观，研究相书，因自己的命相不好而伤心，为了当好心人，所以加入东学修道，住在邻村的姜姓和李姓，都是专啃祖宗骨头的两班。我儿则是以修身力行，立志想凭自身奋斗而成为两班的。

我母亲也告诉高先生，我在小时候很顽皮，在康翎时，曾经拿刀杀新丰李生员家的孩子，结果刀反被别人夺走，挨了一顿揍回来；有一次带了二十两铜钱正想去买米饼吃时，被父亲撞见打了一顿；曾把家里染料偷出去把河水染成各种颜色等往事；还说我哭起来能从早哭到晚。

父亲又告诉我，如此互相往来不久，有一天，高先生忽然提议把他的长孙女许配给我，父亲却不以为然，觉得无论从门第、品质、相貌哪一方面我们都不能高攀先生的家门！可是高先生对父亲说：“知子莫若父，而我又比你更了解他。不必为他的长相担忧，昌洙有虎相，人中短，额头突，走虎步，将来必定一吼而震天下。”我的订婚就这样决定了。

对于高先生寄予我那么大的期望，把孙女许配给我，总觉得很是惶恐，感到责任重大。尤其听先生讲过：

“我的长子夫妇都死了，将来是要靠昌洙了。”

又说：

“我来清溪洞，虽然见过许多的青年，可是没有一个像昌洙这样好的男孩子。”

听了更觉得无地自容。对于他的孙女儿，不论才貌、品德、家庭教育等，我都是心满意足的了。

虽然婚礼尚未举行，高先生家已把我当做女婿看待。偶而在先生家用餐时，由那位小姐端上饭桌，她的六七岁小妹妹亦高兴地称我姐夫。我的岳父母元明夫妇的丧事，就由我料理完毕。

我向高先生报告这次旅行的经过，并告诉他豆满江、鸭绿江对岸的土地肥沃，地势险要，可以移民养兵，是很好的用武之地，人性也极为淳厚，还讲了跟徐玉生的儿子结拜兄弟，以后又遇上金利彦，参加了义兵之战，惨遭失败等事情。

其时正在实施断发令，军队和警察已经强迫完成了剪发，各郡文官公吏也都正在实施之中。

我乃向高先生进言，跟安进士商议起兵发难。虽然举行了会谈，但安进士颇不以为然，认为轻举妄动，唯有失败之一途，应该先信仰天主教，然后待机举事。

他甚至还说：

“如被迫必须断发的话，剪发也无所谓。”

高先生不悦地说：

“进士,从今天起,跟你断绝关系。”

言罢,拂袖而去。所谓“断绝”是我国从古代开始,读书人宣布绝交的话。

看了这情形,我也对安进士产生了反感。不管他的为人如何,他对本国的东学加以讨伐,反而信仰洋夷的天主学,这就是非常怪异的事。而且现在深明大义之士,都主张“宁为地下无头鬼,不作人间断发人”,他却认为剪发也无所谓,这是违背大义。

我对安进士的态度非常失望,便和高先生商量,决定尽快地完成我的婚礼,然后离开清溪洞。

父母只有我这一个儿子,现在要娶媳妇,对方又是名门闺秀,真是乐不可支,把仅有的钱拿出来,忙着操办婚事。但是好事多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一天我到离此十多里的海州检丹亲友家中办事,天黑了,就睡在那家。早上起床的时候,高先生找我来了。他失望地对我说:

“昨天我正在客房的时候,来了一个姓金的人,问我你是高某人吗,我说是的。他即拿出一把刀指着我道:‘听说你把孙女许配给金昌洙是吗?那么只准许她为妾,不可配她为正室。因金昌洙跟我的女儿早就订婚了。你不答应,就用此刀拼个你死我活。’于是我告诉他:‘我以为金昌洙虽订过婚,但已解除婚约,才把孙女许他的。如果已经订婚的话,我是决不会那样做的。待我去问金昌洙后,再行解决,你先回去吧。’现在我家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我听了这话后,知道一切事情已经不大顺利。就向先生解释道:

“我所以尊敬先生,也是为了要接受高深的教导,原无意高攀为先生的孙婿,所以我与令孙女不结婚也没关系。我已对婚姻绝望,今后但愿以师生关系,一生侍奉老师就是了。”

高先生听了我的话,流着泪自叹着说:“为了要找可靠的继承人,我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找到适合做孙婿的你,却又发生了这种变异。那么,婚姻一事,姑且不提。目前官吏完成断发后,马上就要强迫老百姓断



发,你赶紧脱身,免遭断发之祸!我已年老,若遇到断发之难,唯有决心一死。”

我虽然下了决心,夸口不跟高先生的孙女结婚也不要紧,可是在我心里却觉得非常难过,因我已深深地坠入情网。

这里要提一下过去的事。那位姓金的,是原籍在咸镜道定平的金致景,以卖木瓢为生。我十五岁时,父亲在酒店碰见了,跟他一起喝酒。听说他有个八九岁的女儿,于是父亲在醉中开玩笑地为我向他求婚,就此一言约定,还送了帖子。

此后,父亲常将那小女孩带到我家来。当时我正在上学,村里的孩子们常戏弄我说:“你是卖木瓢的女婿吧?进你们家门的那个女孩好漂亮啊!”我听了十分不快。

有一次正在冰上打陀螺玩,那女孩也跟来,央求我替她也做一个陀螺,因为觉得她讨厌又可恶,回家缠着母亲把那孩子送走了,但并没有解除婚约。

其后经过了好几年,当甲午中日战争发生时,大家都赶紧替子女们完婚。当时,以东学接主的身份东奔西走的我有一天旅行回来,家人正准备着我与那女孩成亲,酒和米饼都一切齐备,只等着我回来。可是我却拼命反对,最后金致景也感到无可奈何,一桩婚事就此破裂了。金致景只得将女儿许给另一个人。可是,在信川水踰岭(离清溪洞约十多里)时,他听到我将要跟高府的孙女结婚的消息,为了要讨一点钱,就来高先生的府上吵闹。父亲大怒,去跟姓金的大闹了一场。可是覆水难收,已无法挽回,我的婚姻也就因此不幸地结束了。

高先生搬到海州飞洞,我们家也回到基洞。我打算去锦州的徐氏家,金亨镇因已回故乡,故未同行。

# 6

## 鸱河浦事件

我独自出发，抵达平壤时，观察使以下的官吏已全部断发，并且在街头巷尾，肆意逮捕行人强行剪发。人们不愿剪发，多偷偷地逃出平壤，去乡村或山里避难。老百姓怨声载道。看了这情景，我真是愤怒至极。

到达安州，见到布告板上贴着停止断发的命令。传闻京城钟路因居民反对断发，发生了骚乱，拆毁了日本人的住房，打死了无数日本人。当时政府当局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动。

我见此情势，改变了主意。何必要到国外去呢？在三南布满了义兵，何不观察国内时势，再拟定新的策略？于是决定从龙江郡转向安岳鸱河浦（在安岳邑东北四十四里处）。

丙申年二月下旬的时候，搭上了去鸱河浦的渡船，这时大同江下游的水路中，无数冰山随波飘浮，我们渡船上乘有男女十五六人，被冰山包围，漂流到镇南浦下游，船只随着潮水，忽而飘到上游，忽而飘到下游，危险万分。船客都陷于绝望之中，连船夫都惶惶不安，以为没有命了。每年结冰期和解冻期经常在渡口发生的惨剧，终于轮到我们头上来了。船上人都呼天抢地，号啕大哭。呆在船上即使不遭到覆船的惨祸，也难逃饿死的命运。幸好船上载有一头驴子，在万

不得已中，可以宰了充饥，虽然残忍，可是为了活命，别无他途可寻。哭喊是救不了命的，我发号施令，要船客们与船夫们通力合作，把冰山推开打出一条生路，即使不行，活动活动对身体也有益无害。船上人也都同意。

我首先轻快地跳到冰山上面探测形势，然后抵住大山推开了小山，反复应用这种方法，好容易打开了一条生路，在离鸥河浦大约五里地方的河边上岸。

这时西山的月亮逐渐隐去，仅留下惨淡的光辉。

一行人在寒风中赶着夜路，投宿在船东家里。船东兼营旅店，由于风浪杜绝了行船，住宿的客人，把三个房间挤得满满的，时过午夜，酣睡的鼾声此起彼落。

我们一行，也混进他们里面，刚要睡着时，原先睡觉的人已经起来了，喧闹着请求船家利用转好的天气，在黎明涨潮时载他们渡河。

不久，下房开始送进来饭桌，接着，中房、上房也摆开饭桌，准备吃早饭。我不得不起来，一面等着开饭，一面仔细打量房间里的人。

这时，在中间的房间，有个身穿韩服剪了发的人，正和同座人寒暄，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姓郑，住在长渊。在黄海道，长渊最先施行“断发令”，因此在民间已有人剪了发。可是他的语调不像长渊方言，而是汉城口音，在我听来，分明是个倭寇。再仔细观察，又发现他白衣底下露出一截军刀刀鞘。

我问他往哪里去，他说正在赶路上镇南浦去。

我默默沉思，他究竟是何等人？看来不像从事商业或工业的日本人，也许他是弑我国母的三浦梧楼，化了装企图逃走。否则，也定是他的党羽，即使两者都不是，这种佩刀潜逃的人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来说，总是一个毒瘤，对这种家伙，杀一个算一个，也就算是洗刷了一分耻辱。

当时我衡量了一下我的力量和环境。三间房旅客总共有四十多人，不知道那家伙的同党究竟有多少，在他身旁跟着一个看起来大

约十七八岁的少年，正在跟他说着什么话。

他们是两个人，又带有军刀，我一个人赤手空拳，如果贸然动手，岂不成了他人刀下之鬼？我尚未在人世一展鸿图，就留下尸体一具，永别人间，焉能瞑目？即便我徒手杀不死他也决心下手，房间里的人必定会出面劝阻，当他们拉住我的时候，那家伙的刀子一定会朝着我的脖子上砍下来。看来杀死他是不可能的。我犹豫不决，心剧烈地起伏跳动，思想混乱，竟无法镇定，感到极度的苦恼，忽然记起了高先生的教训：

“得树攀枝不足奇；悬崖撒手丈夫儿。”

由是我领悟到了其中的道理，心中闪过一线光明，我这样忖度着：

“杀死那个倭寇是对的吗？”

“对的。”

“我从小不是就想做一个好心人吗？”

“是的。”

“要杀死倭寇报仇，却害怕不能成功，反死于倭寇刀下，那么，要做好心人的想法，岂不是虚假的吗！我岂不成了贪生怕死，重视虚荣的人了吗！”

这样想过之后，我的心里反倒平静下来，计策也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于是我决定采取用无形的绳索束缚住四十名旅客和数百村民，使他们不能动弹，然后我单独一个人能够自由自在地用表演的办法。还要不露声色，使倭寇安心，以免他有所防备。于是我就设计演戏。

饭桌端进来了。下房的旅客在睡眼惺忪中接到饭桌后，吃得并不香，还没有吃到三分之一。我的饭桌虽然来得晚些，但我两三口就吃完了。吃完了后，我站起来叫店主人，一个将近三十七八岁身材匀称的主人来到门前问：“哪位客人叫我啊？”我说因为今天要赶七百里路，叫他再来七个人的饭，主人没有回答我的话，四下望着房间里

的客人说：

“可怜的小伙子啊！敢情是发了疯不成？”

就进里面去了。

房间里分成两派争论起来。我在一旁躺着，听房间里的议论，观察那倭寇的动静。一些好像颇有学问的青年，听了店主人的话后，也笑我是疯子，旁边嘴里咬着长烟管贪婪地吸着烟的老人们，骂那些年轻人道：

“喂！不要随便讲话，现在难道就不会出异人了吗？在这年头，是一定会出异人的啊！”

那些年轻人反驳说：

“也许会有异人出现，可是请瞧瞧那个人的德行吧！异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那倭寇并没有一点特别注意我的神色，吃完饭后便到外面去，身体倚着门柱，看着年轻人结算饭钱。

我认为时机已到，便慢慢站起来，大喊一声：

“好小子！”

一脚向那倭寇踢去，他滚到大约一丈远的台阶下面，我纵身跟着跳下，踩住他的脖子。

三间房门一齐开了，人们从里面涌了出来，我向涌出来的一群人宣布说：

“有谁敢为了这倭寇，出面和我作对的，定不饶他性命！听到了没有？”

这句话还未说完，被我踩在脚底下的日本人，抽出身来拔出刀子，向我扑过来，刀子在黎明的月色下闪烁着。我一面侧身躲开朝我脸上劈来的刀子，一面提高脚跟，一脚正踢在他的腰窝，把他踢倒在地，然后用力踩他抓着刀子的手腕，刀子锵然一声掉在地上。我顺手捡起那把刀把日本人从头到脚乱刺，血如喷泉似地涌了出来，流了一地。我张口喝着倭寇的鲜血，又把血涂在脸上。然后举起血淋淋的

刀子,走进房里,向着他们那些人喝道:

“刚才跟那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的人是谁?”

来不及逃走的行客,全部趴在地板上,有人说道:

“将军阁下,饶命吧!我不知道他是倭寇,以为他是个普通人,因此才出来劝阻的。”

又有人说:

“我是昨天在海上跟将军一道受累的人,是买卖人,不是和倭寇一起来的。”

所有的人都惶恐不迭,只有刚才责骂那些年轻人,为我辩护的老年人,挺身而出,为他人求情:

“将军阁下,原谅他们无知,请宽恕他们吧。”

这个时候,主人李和甫,不敢到房间里面来,在门外跪着说:

“小人有眼无珠,因此不认得您是谁,冒犯将军,罪该万死。

虽然如此,我跟那倭寇并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卖饭给他罢了。”

我让众人坐下,又问主人:

“你是怎么知道他是日本人的?”

“小人是在小港口驾客船的,来往于镇南浦的日本人常在我家留宿,但是穿上韩服来的这还是头一次见。”

“那家伙穿着韩服,韩国话讲得也流利,你怎么知道他是倭寇的?”

“几个钟头前,从黄州来了一艘木船,进了小港,听船夫们说,船上乘客中有一名日本军官,故而我才知道。”

“木船要是还停泊在小港,你别让走,把船员们给我叫来。”

主人李和甫按我的吩咐做完了这一切后,在一个饭桌上摆了七碗饭,在另外一个饭桌上摆好菜肴,抬进房里来。我洗了脸,把沾在脸上和手上的血渍洗净,开始吃饭。虽然吃一碗饭的时间,要不了十分钟,但是因为刚才做过激烈的动作,吃一两碗饭并不难,却无法把七碗饭全部吃完。可是刚才夸下海口,不吃完也不行,于是叫人端来

一个洋盆，把饭和菜一起倒在洋盆里，然后搅成烩饭，叫他们再拿一把勺子来，用两把勺子并起来吃，一匙子的饭就像一碗那么多，让看的人感到要不了几匙子，这饭全部能吃完。大概又吃了两碗左右，扔掉勺子，自言自语地装傻道：

“今天喝日本鬼子的血喝得真是痛快，连饭也不想吃了。”

然后我着手处理后事。载日本鬼子来的七个船员跪在门前，伏地请罪：

“小人们是黄州船工，我们只是赚他的船钱，求求您饶了我们吧。”

我命这些船员把日本人的行李全部取回，检查的结果，发现那倭寇是陆军中尉土田让亮，行李里有八百两铸钱，除付了船钱外，剩下的钱统统交给店主人，也就是村长，用来救助村里的贫民。至于尸体的处理，因为那倭寇不仅是我们国家和国民的仇敌，也是我们江河里鱼鳖的仇敌，遂命村长李和甫把尸体投入河里，让鱼鳖分享。

把日本人的尸体及钱处理完毕后，叫主人李和甫拿纸笔来，写了一张为国母复仇杀此倭寇的布告，在后面再签署上“海州白云坊基洞金昌洙”，贴在谁都能看得见的大马路墙壁上。又嘱咐村长李和甫把经过事实报告给安岳郡守，我将在家静候结果。至于倭寇的军刀，作为纪念，我要带走。这时再看自己的形状，简直不像样子，白衣也被血染得鲜红。所幸还有一件脱下来的长袍，遂腰佩军刀，披上长袍，大摇大摆地离开了那里。村民数百人云集围观，目送我离去。

这时我心里其实十分着急，万一村子里有人拦住我，说我报仇杀了人，我该怎么办？但这不过是我的想象，并无人出来拦阻。可是我仍焦躁不安，鬼子会立即出动，前来抓我的。我虽款步而行，但却心急如焚。就这样走上山坡俯视鸱河浦，人们还聚集在那里，没有散去。

早晨的太阳从山后冉冉升起，我越过溪涧，便加快了步伐。

来到信川邑，那一天恰巧是集市，赶集的人熙攘往来，到处听到

人们谈论鸭河浦事件。有人说一个壮士一拳打死了日本人；有人说自己和那壮士一起从龙江乘船来的，那壮士是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还有人说在冰山之间的渡船快要触礁时，那大力士跳进河里，用手推开冰山，救出了同船的人；甚至还说那壮士在刹那间一口气吃下七碗饭。

我边听边走，来到了信川西部柳海纯（以前东学的朋友）家，寒暄之后，他说我身上有血腥味，仔细一观察，吃惊地说：

“你衣服上怎么沾满了血迹？”

我毫不在意地说：

“我杀了一只鸟吃了，沾上了血迹。”

“那刀是怎么回事？”

“老兄当东学接主时抢了人家很多钱，现在我抢你的钱来了。”

“不是东学接主，会信你的话，我啊，才不信呢！你还是照直说吧。”

我无奈说了大致的经过，柳海珏、柳海纯兄弟大惊，夸我是快男儿之所为，并力劝我不要回家乡，躲到别处去。

我说决不能那样做，为人要光明正大，生或死才有价值，欺世骗人，苟且偷生，非大丈夫所为。

回到家，向父母详细地禀告了这次事件的经过，父母吩咐我逃往它处，但我觉得我此次杀倭寇并非出自个人感情，而是为国雪耻，是正正当当的事，所以不仅不愿意怯懦地逃避，而且万一被拘捕而遭斩首，也可以对万民立个教训和榜样，虽死犹荣，因此在家冷静地等待着拘捕。

这样过了三个月以后，丙申年五月十一日早晨，我在床上还未起来时，母亲一面打开客房门，一面说：

“孩子，我们家前后都已经被包围了。”

随后有十多个带着铁鞭铁槌的人冲了进来，问我：

“你是金昌洙吗？”



然后扑了上来。

我骂他们说：

“是，我就是金昌洙，你们是什么人，敢私人民宅？”

其中一个人拿出拘捕状给我看，上面写着“内务部训令等因”。他们要把我押送到海州。巡检和使令共达三十多人，我的身子被链子结结实实地捆绑着，链子的两端有两个人拉着，其余的人四面拥着我向海州进发。村里三十几户人家虽然都是亲属，却因为怕事没有一个敢打开门来看看的，只见邻村姜姓和李姓的人都在窃窃私议，说金昌洙是东学党，所以被抓走了。

过了两天，我被下在海州监狱。父母亲都来到海州，母亲以到处乞讨来的一些食物照顾狱中的我，父亲则像以前那样，奔走于营吏厅、使令厅、褻房，运用一切人情关系，希望我能被释放，可是因为案情重大，终究没有任何效果。

关了一个多月后，我脖子上戴着刑具被拉到了“宣化堂”院子里受审，由监使闵泳彻审判。闵泳彻问道：

“据说你在安岳鵑河浦杀害了日本人，并且抢了他的行李，是吗？”

我佯装不知说：

“没有那回事。”

监使大声说：

“你这家伙！罪证确凿，居然还敢赖，来人呀！把这家伙好好地给我打！”

号令一下，刑吏们跑过来，将我两脚、脖子和膝盖结实地绑住，再用两根漆成红色的棍子，插进两脚之间，每一个刑吏挟一根棍子，用力转动，胫部一下子便皮开肉绽，露出白色的胫骨，而今在我左胫部的伤口，就是当时受刑的伤痕。我缄口不答，终致昏厥。他们用冷水泼在我脸上，使我苏醒，监使又重复问同样的话，我也反问道：

“看拘捕状,明明是写着内务部训令等因,这不是观察部可以审理的案件,请求向内务部报告。”

闵监使哑口无言,只得再把我关进监牢。以后又过了两个月,在七月初,从仁川监理营来了四五十名巡检,将我从海州押送到仁川。

事情已到这个地步,我被释回家已是无望,于是父亲决定要变卖全部家产,随我去仁川或汉城,设法营救,为我脱罪,为此又回到家中,只有母亲随我而行。

离开海州的第一天,在延安邑过了一宿,次日去罗津浦途中,走过了延安邑约莫五里,在路边一个坟墓旁休息。这一天天气炎热,巡检们一面买香瓜吃,一面歇歇腿。在我们歇脚的坟前,竖立着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孝子李昌梅之墓”,碑后刻着他的事迹。据这碑铭所记,李昌梅原系延安府的通引,他父亲逝世以后,不论寒暑风雨,每天都来墓前拜祭,所以国王御赐“孝子旌门”。附近的人们传说,在李昌梅坟旁他父亲的墓前,他当年曾脱鞋走向台阶前的足印和膝盖跪着的地方及放过香炉和香盒之处,至今寸草不生。假如有人敢填平这些凹痕,立即会雷声大作风雨交加,洗去那填上的泥土。

听了附近的人和巡检们讲到这些事情,并亲眼看过石碑上所刻的事迹后,我背着巡检和母亲偷偷地落泪。那李昌梅对已去世的父母尚且如此恪尽孝道,父母在时更可想而知了。再看那失神落魄慌慌张张伴随我来的可怜的母亲,深感我是个何等不孝的儿子啊!这时,就像李昌梅从墓里走出来责备我似的:“你不知道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话吗?”离开时,我还连连回头看这孝子的坟墓,深深地心里对他再三致敬。

在罗津浦搭上开往仁川的船,正是丙申年七月二十五日,是夜没有月光,四周漆黑一片,只听得见汹涌的波涛声。船经过江华岛的时候,母亲见在炎热天气中长途跋涉的巡检们都已昏沉入睡,便以极其低微、连船工也听不到的声音在我耳边说:

“孩子!你此行一去,必死于倭寇之手无疑,你我母子不如就此

葬身在湛蓝清澈的海里,也比丧生于倭寇之毒手好,我们死后,母子仍在一起,做鬼也心甘了!”

说罢,拉着我的手走近船舷。我惶恐得手足无措,忙安慰母亲说:“您以为我这次去会死吗?决不会的!我一心为国,上苍可鉴,皇天会保佑我的!”

母亲以为我是在安慰她,仍坚持拉着我的手要投海自尽。于是我更充满信心地说:

“母亲,我绝对不会死的!为什么不相信儿子的话呢?”

母亲这才抛弃了寻死的念头,说道:

“我已跟你父亲约好了,假如你死的话,我们老俩口也一起死。”

说罢,仰视天空,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合掌祷告着,看来她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听信了我的话。

# 7

## 死刑面前争生存

我被拘押在仁川监狱。我所以转押在仁川监狱,是因为“甲午更张”<sup>①</sup>以后,审理与外国人有关的特别法院设在此处。我关进的监狱是在内里,在山顶上有监理署,左侧是警务厅,右边是巡检厅,监狱是在巡检厅的前面,前面有二层门楼。四周筑着高高的围墙,里面低矮的平房即是监房。

监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拘禁重犯和强盗、窃贼、杀人犯的牢房;一部分是收容一些杂囚。未决犯是普通服装,而服刑的罪犯则穿着蓝衣服,在上衣的背上用毛笔写上强盗、杀人、窃盗等罪名。

这些罪犯到外面去做工时,左右双肩绑上链子,每两个人系成一对,在背后上了锁,由看守押着前往。

刚进仁川监狱时,我被关在贼囚房,锁在一个可以锁九人的长足枷上,位于其他八个盗贼的中间。在一个月前被逮捕来的鵝河浦店主人李和甫见到了我非常高兴,他以为这一下他可以无罪释放了。据他说,那一天我杀死土田让亮后贴在墙上的布告,被去调查的日本人揭下后藏了起来,单纯指控我为杀人强盗。

---

<sup>①</sup> 甲午更张,亦称甲午改革,是李朝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革新派官僚为使国家昌盛,摆脱外来干涉,逐步走上近代化所进行的一次改革。——译注

母亲随着我来到了牢房外，流着眼泪目送我进了牢门。母亲虽生长在乡下，可是任何事都会干，尤其擅长于针线。她到监理署三门外开城人朴永文的家里哀求，愿当这一家的佣人，以便拯救儿子的生命。朴家在仁川是捐客生意做得最兴隆的一家，家中做饭、做针线的活儿很多。母亲就在他家干起活来。条件是供应我的三餐，每餐一碗饭。狱卒告诉我说：

“你母亲已找到了安身之所，赚的钱可以供应你一日三餐，你可以放心了。”

其他罪犯们非常羡慕我，我不禁想起古人所说：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父母生我养我，真是受尽了千辛万苦。佛经说父母与子女有千世之缘，确是言之不谬。

监狱里面又脏又热，实在无法忍受，我又患了伤寒病，真是痛苦到了极点。

有一次，我想到自杀，趁着其他罪犯们睡觉的机会，在额上用指甲刻了个“忠”字，然后用裤带自缢，当气绝的瞬息之间，我恍惚回到了故乡，跟我平时所喜欢的堂弟昌学（现名为泰运）一起在玩，真所谓：

“故园长在目，魂去不须招。”

当醒过来时，旁边的罪犯们在大吵大闹，他们并非是担心我的死而大声喧闹，大概是我在不省人事之中，摇动得太厉害，幌动了足枷，使他们的脚胫痛不可当。从此监方看管更严，不给犯人有自杀的机会。我也觉悟到了病死或被仇人杀死是无可奈何的，而自杀则不可取。

虽然发了汗，但半个月来食不下咽。这时又接到了审问的通知。想了一下，在海州曾受到骨折皮裂的酷刑也不曾招供，为的是想去内务部面对大官们慷慨陈词一番，可是目前病魔缠身，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死，不得不在此全盘托出打死倭寇的原因。我被狱卒背进了

警务厅,大厅上刑具罗列,气氛森严。

狱卒把我背到门前,扶我坐下。

看到我的惨状,警务官金润晶(尹致昊的丈人)问狱卒为什么我的形容如此枯槁,狱卒禀称是患上了热病,才变成这样子。

金润晶问我:

“你有精神回答我的问话吗?”

我说:

“精神虽有,但是口渴得说不出话来,请给我一杯水,喝了再讲。”

金警务官下令拿水来给我喝,他坐在庭上,按惯例问过姓名、住址、年龄后,问某月某日在安岳鵑河浦有没有杀害过一个日本人。我回答说:

“有。我是为了报复国母陛下被杀之仇,而杀死一个倭寇的。”

一听我这么说,警务官、总巡、权任<sup>①</sup>等,不禁面面相觑,庭内一片寂静。坐在我旁边椅子上旁听并监视的日本人渡边巡查见审问一开始,庭内就如此沉默,便向翻译员问是怎么回事。我看到这光景后,用尽平生力气破口大骂:

“你混蛋!所谓万国公法里,哪一条文规定签定通商亲善条约后,可以杀死一个国家的国王或王后?狗倭寇呀!你们究竟为了什么杀害我们的国母陛下?在我有生之年,誓报此仇,死则变成厉鬼也要杀你们国王,而且非把你们倭寇消灭得干干净净,来洗雪我国的耻辱不可。”

渡边可能听到我的骂声吓慌了神,连说“畜牲!”“畜牲!”急忙退避到大厅后面,庭内的气氛更趋紧张。

陪审的是总巡或是主事我不清楚,有一个官员向警务官金润晶进言,这案件非常重大,以请监理阁下亲自审问为宜,金润晶点头同

---

<sup>①</sup> 巡检的上司。——译注

意他的意见。

不久,进来了监理史李在正,坐在主位上。警务官向监理史报告了审问经过。

这时庭内的属员没有上司的吩咐,竟端来了水给我喝。李监理史还没有开始审问,我先向他开口了:

“我金昌洙虽然是一个乡下的平民,自国母陛下遭受倭贼杀害之后,国家的耻辱,连我在青天白日之下的影子也觉得可耻,因此便杀死了一个倭寇。可是我至今尚未听到要杀死倭王,以报君仇这句话。现在看你们虽然都穿戴上了‘蒙白’<sup>①</sup>,却似乎忘了春秋大义所载的君父之仇未报,不可以蒙白这句话,一意窃取富贵荣华与宠禄,怎能效忠君王呢?”

李在正、金润晶和其他法庭上的官员们闻言色变,一个个面红耳赤,垂首无语。

待我讲完之后,沉默已久的李在正,用很谦和的语气说道:

“刚才听昌洙所言,对您的忠义和勇敢非常敬佩,同时我也深感惶悚和惭愧,然而按照上级的命令,必须要有审讯报告,因此请把这件事的前后始末详细地供述出来吧!”

他讲话时用的是“敬语”。金润晶对李监理史耳语,好像说我的病还在危险状态中,于是令狱卒带我回狱。狱卒背我到中途,从人群里看见母亲的脸孔,看她面带喜色,我想可能是从官属或群众那里听到我做的事后,觉得很放心。

后来听母亲说:她那一天听到要审我的消息后,便来到狱门外等着,看见我被背着出来的惨状,很担心我在病中万一回答错了话会被当场打死,可是听说我责备监理史的时候,使得监理史哑口无言,大声申斥日本巡查,使他仓惶躲避。又听狱卒、巡检说金昌洙是海州少年,为替闵后复仇打死日本人等等,她才放下了心。

---

<sup>①</sup> 由于国丧,戴白笠、穿素衣。——译注

我还记得背着我的狱卒，走过母亲的前面时说：

“大娘，请不要担心，怎么生了个像老虎般的儿子啊。”

我一回到牢房，就发了一顿牢骚。对于把我跟从前一样和其他盗贼一起扣上足枷，大为愤慨。我雷鸣似地大吼，痛责狱吏：

“我不发表任何意见以前，不论把我看成强盗或什么都可以，可是今天我已经把我以往的事都说明了，怎么还是这样虐待我？画地为牢，我都不会越出线外。要是当初想逃的话，杀了倭贼，我就不会留下姓名、住址，回家坐等三个月。你们这些当官的，如此虐待我，是否想取悦于日本鬼子？”

也许我的身体因为激愤而抖动得太厉害，同锁在一个足枷上的八名囚犯，夸张地说因为我的脚乱动，害得他们的脚都被弄断了。听见这阵喧闹，金润晶进来责备不相干的狱卒说：

“这个人跟其他的囚犯不同，怎么跟盗贼关在一起？何况他还身患重病，快把他移到好一点的牢房去，不必上枷，你们要好生加以保护。”

从此我成了狱中王。

焦躁的母亲来探监时，脸上也露出了喜色。她说：

“刚才你受审出来，金警务官送来一百五十两（现在的三圆），说是给你买补药吃的呢！我的房东家夫妇自不必说待我更好，连他们家客舍的客人们也对我肃然起敬。东家对我说，你狱中的儿子想吃什么，只要说一声，就给做。还有一个保媒拉纤的老太婆跟我说她愿意做媒，给我找一个有钱有势的丈夫，比在人家当佣人好，嫁到他家，往牢里送饭不用发愁，还可设法救你儿子早日出狱。我说我已有丈夫，不日就要来到。”

我听了这话，天昏地转，只能说这都是我这做儿子的罪过。

我能以一只腿将扣上九个人的长足枷举起来，更使得李和甫高兴了。他被捕的罪名，就是放任杀人犯杀人逃逸。他在狱中或受审时曾经辩白说：一顿吃七碗饭，一日行七百里的大力士，我如何能绑得



住呢？这句话到了今天才得到证实。

从第二天起，开始有人来狱门前要会我。这是监理署、警务厅、巡检厅的几百名官属替我做了宣传。他们自豪地说济物浦开港九十年来，亦即自设立监理署那天起，这样的事还是头一次见到。据说仁川港，上自有势力的人物，下至工人，纷纷拜托认识的官属，让下次我受审时务必预先通知他们。当我第二次受审之日，仍由狱卒背着我，出狱门的时候，环顾四周，路上已经站满了人。警务厅内大概集合了各官衙的官吏和港内有势力的人，警务厅院子里，不论围墙或屋顶，只要能看见我受审的地方，到处都挤满了人。

进厅内坐下来，金润晶悄悄地经过我旁边说：

“今天倭寇又来了，请尽管大声骂好了！”

金润晶看来似乎还有点良心，但他现在当所谓京城府参与官，这可是日本大官，所以我想他也许是视公署为戏院，视我为演员。也可以这样认为，当时他虽多少有点出自义愤，但毕竟是无恒心之辈，时间一久，也就变心了——对他这样的看法，可能比较正确。

第二天的审问，我说了一句话就结束：

“上次要讲的都已经都讲完了，再也无话可说。”

并且把在后室窥察我的渡边又臭骂了一顿。

自第二天起慕名而来会见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大致都说是仰慕我的义气而来的，在审讯庭见了我的面，自己是住在本港的某某人。安慰我苦难不会长久，让我放心，总有一天会出狱跟他们见面的等等。

尤其是来找我的人，为表示他们的心意，几乎每人都准备一桌饭菜，送来劝我吃。而我总要在拿来的人面前尝尝，以示领情致谢，剩下的依次分给贼囚房的其他囚犯们。

由于当时的监狱制度还未步入正轨，并不是有规律地一天供给三餐，而是由囚犯们自己编草鞋，在狱卒的看押下拿到街上出售，买米回来煮稀饭吃。因此，我分给他们的饮食，使大家非常高兴。因为是大家轮流给我送饭菜，很多食物我还是初次尝到。

第三次审问不在警务厅而是在监理厅,由李在正亲自主持。监理以亲切的口吻审问我,审问完毕后,容许我看一遍口供,如有不适当的地方由我修改,修改完毕后,在空白处签了我的名字,到此审问完毕。这一天没有日本人出席。

几天后,日本人要拍我的照片,我又被背进了警务厅,这一天有许多得到消息的人拥来旁观,警务厅院子里里外外是人山人海。金润晶低声悄悄地告诉我说:

“今天,那些人是为了拍昌洙的照片而来的,因此就握拳怒目给他拍照好了。”

然而我国的官员和日本人之间,争论起是否可以拍照的事。互相争执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不准在厅舍内照相,于是改在马路上举行,我又被背到马路上坐下,日本人要求把我扣上手铐,或以绳索捆绑,以示我是一个罪犯。这要求被金润晶拒绝了,因为我是钦犯,未得大君主陛下的吩咐,不得加扣刑具。

可是日本人反驳说:

“刑法不就是大君主陛下的命令吗?”

金润晶又说:

“自从‘甲午更张’以来,我国已经废止了刑具。”

日寇提出质问道:

“我看到贵国监狱里的囚犯仍然是戴着长枷,套上链子。”

金润晶恼怒而大声责骂道:

“拍囚犯照片,并不是条约所规定的义务,仅仅是相互间的参考资料罢了,不能在这种细微末节的事上,由别人干涉我国内政。”

于是围观的群众交口赞誉,称金润晶是一位精明的长官。

由于日本人的一再要求,最后在我的身旁放一副绳索作为拍照的背景。

由于我的体力较几天以前有所恢复,于是便痛骂倭寇,向云集的观众发表了一场演说——我高声喊着,吼声震撼了警务厅。

“诸位！倭寇杀害了我国国母闵后，对我国而言，是一种无比的耻辱和仇恨，倭寇的危害绝不仅止于宫内，就是你们的儿女，最后都将被倭寇杀害；所以诸位！你们也要仿效我，遇到倭寇，就要见一个杀一个。”

渡边这家伙走到我身边，直接向我挑战道：

“你如此忠义，为什么当不了大官？”

我怒吼道：

“因为我是不会做官的小百姓，所以我不过杀了个小小的倭寇，做大官的将要砍下你们皇帝的脑袋来报仇雪恨。”

此时，金润晶向渡边说，你们日本人没有审问罪犯的权力，让日本人退场。他们走后，我请求金润晶释放李和甫：“李和甫和这次事件无关，今天放了他吧。”“我来处理，你不必担心。”我回牢房不久，李就获得释放。他在牢门外感谢我为他说情，和我告别。

我在等待判决的期间所做的工作，第一就是读书，我每天读父亲送来的《大学》。

仁川是最先开放的港口，欧美各国来此居住和游历的人相当多。监理署一位官员劝我阅读欧美新书。那官员认为我国若闭关自守，囿于旧知识、旧思想，则绝不能救国，要广泛地去研究世界的政治、文化、经济、伦理道德、教育、产业等，有些东西我们不如人家，就要吸收人家的精华，使之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有益于国计民生。这才是识时务的英雄。一味地排外，免不了要灭亡，并提醒我说：

“像昌洙一般大义凛然的男儿，应该探求新知识，以便将来为国家做大事。”

他给我看在中国刊行的或用韩文翻译的《世界历史》、《地志》等书籍。我虽明白随时都会被判处死刑，可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在死刑到来之前，我手不释卷地研读这些新书。监理署官员见我这么热心地读书也非常欢喜。

我读了这些书，不但了解了何谓“西洋”，今日世界局势如何，同

时也批判了自己和我的国家。我领悟到以前高先生在祭祖的祭文上所用的明朝年号永历几年,以我民族意识而言,是不合理的。因为安进士学习西洋学,高先生就与他绝交,我觉得也太没有气度。我在清溪洞之时,原封不动地接受高先生的思想,以“斥洋排倭”为我唯一的天职,并且深信唯有我国才是保存一脉正统的地方,而世界各国则均是披发左衽之夷狄。可是待读过了一卷《泰西新史》以后,才明白那凹目隆鼻的洋人,并不是像猴子般的野人,他们也有治国理民之道,那峨冠博带、仙风道骨似的我国的贪官污吏,才应该接受野人的尊号。

第二是教育。

当时和我同是囚犯的少说也有一百人,除少数民事纠纷者外,大部分是强盗、窃贼、杀人犯,这些人十分之九是文盲。我说要教他们念书,很多人都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并不认为学会识字以后有用,而是怕得罪我,再也吃不上珍馐美味。其中有一个叫曹德根的人,决定要研读文学,在大声朗读“人生八岁,皆入小学”一句的时候,将“皆入小学”读成“狗嘴里的小学”<sup>①</sup>,我不禁捧腹大笑。此人是花开洞一个妓女的丈夫,为了贩卖妓女给中国人,被判处十年苦役。当时正是建阳二年,《皇城新闻》于此时创刊,有人拿某天报纸给我看,报上刊载着我的案情大概,并且报道说:“由于金昌洙在仁川监狱给囚犯教书,监狱变成了学校”。

第三是当代书人。有被冤枉捕来的囚犯我便为他们写诉状,也有人因此获释的,因此我代写诉状开始有名了。尤其是被关在监狱里要想到外面找代书人写诉状是件费力的事,而且需要很多费用。现在在同一牢房里,面对面坐着谈话之后,便可以写好诉状,除了买诉状的印札纸外,不需要任何费用。由于我写诉状用心,大家传说由我写诉状,一定会胜诉,于是有些官吏也来请我写诉状。对那些贪污

---

<sup>①</sup> 韩语“皆”“狗”,“入”“口”谐音。——译注

的官员,我也写过控诉状,送达上司后,竟有人因此丢官,所以狱吏也不敢怠慢或随便虐待囚犯了。

第四是声乐。我虽然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可是除了作诗吟风弄月外,连那农夫除草歌、牧童歌等,一句也不会唱。

当时的狱规是只准白天睡觉,这是为了防止囚犯趁着夜阑人静越狱潜逃,所以准许囚犯们在夜里唱歌讲故事,一直到天亮。这个规定虽管不着我,但其他的人都必须遵守,我也自然而然玩得很晚才睡。因为听得多的缘故,也就自然懂得别人所吟的时调和所唱的小曲了。我从妓女的丈夫曹德根那里学会了“男唱女歌”、“女唱男歌”、“赤壁歌”、“鸟歌小调”、“青蛙歌小调”等后,当别人唱的时候,我也就随声附和。

这样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有一天,看到《皇城新闻》上登着京城、大邱、平壤、仁川将于某日(我记得是七月二十七日)对抢劫犯某某、杀人犯某某、杀人抢劫犯金昌洙处以绞刑的消息。人遇到这种事,也许值得故意去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心情的确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安。距离登上绞刑台只有几天的时间了,我和平常一样吃饭、读书、和别人说话。过去朴泰辅<sup>①</sup>在受犁头烤刑时要求道:“这铁还凉,再在火上烙红些。”还有三学士<sup>②</sup>被清政府抓去沈阳做人质,这些故事是平常和高先生谈话时听到的,我恐怕就是受了这些故事的影响。

看了我将处死的消息,陆续不断地有人来找我诀别,流着眼泪,可以说是吊丧吧!我反而安慰他们,把他们送走后,照常读《大学》。

某某大人,某某官员也来见我一面说:“金硕士,我还以为可以等你出狱后再见到你呢!这是怎么回事啊?”一面用双手擦着眼泪。

然而奇怪的是亲自送饭来的母亲却毫无异状,也许人们都不告

---

① 朴泰辅(一六五四—一六八九),朝鲜肃宗朝之谏官。——译注

② 一六三六年清太宗率兵进攻朝鲜,是为丙子胡乱。洪翼汉、尹集、吴达济三人坚决反对降清,终遭杀害,世称此三人为“三学士”。——译注

诉她我将被处死的消息也未可知。

仁川监狱死囚的执刑是在下午，地方是在牛角洞。吃饱了早饭和午饭，我本想准备准备将死时该怎么做，可是却不成，因为其他囚犯为我悲伤的情形，我实在看不过去。他们有的是曾向我要过东西吃的人，有的是跟我念过书的学生，有的是请我写过诉状，接受过我指导如何打官司的，他们那种哀伤的样子，如丧考妣。

被拖出去上绞架的时刻渐渐迫近了。我决定一直到我生命结束的刹那，依照圣贤的话做，镇定地与圣贤同行，于是就端坐着读《大学》。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晚餐送进来了。人们以为由于我是特别囚犯，所以要在晚间执行。

到了夜晚初更时分，外面人声嘈杂，忽然听见开启狱门的声音，我自言自语道：

“对了！现在时辰到了。”

静静等待着应该来临的时刻。跟我同一牢房的犯人们，个个都脸色大变，好像是自己将被处死一样，不停地哆嗦着。这时从外面传来声音道：

“昌洙在哪一个房间？”

“在这房间。”

似乎没有听见我的回答，又有人说：

“哎哟！现在昌洙有救了！哎哟！监理和所有署员以及各厅职员，从早上起一匙饭都吃不下，担心怎么能用我们的手去杀昌洙，结果大君主陛下在大厅召见监理，颁布停止执行金昌洙死刑的亲敕，并令听差连夜赶到监狱传旨给金昌洙。这一天好令人伤心啊！”官属们如同自己获得赦免一样那么欣慰，这时正是丙申年闰八月二十六日。

后来我打听所以赦免死刑的原因，才知道曾有这么一些惊险的过程，那是这样的：

法务大臣带我和几名死囚犯的供述进宫，请国王御裁，国王都核准判处死刑，当时有一个值班的承旨，看到我的罪名是“为国母报

仇”，觉得很奇怪，于是再呈到御前去请示，国王立刻召集御前会议，决定停止执行我的死刑，并马上通过电话颁布敕令。假如不是那承旨细心，没有发现为“国母报仇”四个字的话，我早已成为绞刑架上的冤魂了。这就是第一个奇妙的缘分。

第二，假如仁川、汉城间尚未架设电话的话，那我也可能没命了。据说两地通电话是在三天前才开始的。

后来据监理署主事告诉我说：“在决定我被处死刑的那一天，仁川港内三十二家捐客业者发出通告，每户至少须派出一人去牛角洞参观金昌洙执刑的场面，并且每人捐出一两铸钱，以作为赎出金昌洙的身价，万一这笔钱不够的话，不足金额由三十二家捐客业者负担。”并且还说：“无论如何，金硕士现在侥幸活命了，几天之内便会奉接宫内的恩命，请不要担心吧！”

现在大家都明白我是免了死刑。正如霜降雪飞，突然吹来了春风。被启开狱门声吓得直打哆嗦的囚犯们，听到了这消息后，高兴得要命，一面以鞋型槌子敲着足枷，一面唱各种歌曲。他们穿着蓝色囚衣高兴地跳舞、逗乐，就好像戏院里的蓝衣俳優在演戏。

还有一些囚犯胡乱解释说我在当天镇静得若无其事，是因为事先已经知道会这样平安无事的缘故，他们以为我是异人，可以预卜先知。官员中也有这么说的。尤其是母亲，她是在监理接到大君主的亲电向她传旨的那天夜里才知道这一消息的。她还记得在岬串她要和我一起投海自尽时我曾说过不会死的话，以为我真是能预见什么的人。父亲好像也有这种想法。

大君主敕令停止执行金昌洙死刑的消息一传开，前些日子来诀别的人们，又涌到狱门前向我道贺。由于来见面的客人过多，我在狱门内，席地而坐接待了好几天。以前是由于珍惜我这个青年人的义气而同情于我，现在看过敕令后，猜测不久上级的诏令将使我成为显贵之人，有些人就向我谄媚起来，这不仅是一般人，连一些官吏也是如此。

# 8

## 越 狱

有一天，监理署主事带来一套衣服递给监理使说道：“这是江华虞侯金周卿给的，让金昌洙穿上，他还传来话说，请金昌洙穿着这衣服跟他见一面。”

不多久，来了一个人，见了面没有说其他的话，只说：

“辛苦了，还好吧？我是金周卿。”说罢就回去了。

母亲送来晚饭时说道：

“刚才江华金虞侯来看你父亲和我，给了你一套衣服，还给我们老两口扯了衣料，送了二百两钱，走的时候说十天以后再回来。你看这位大官人怎么样？听别人说是个大好人呢。”

我说：

“只见过一次面，怎么知道呢？只是感谢他的好意而已。”

金周卿是从仁川狱使令班首崔德万那里得知我的事的。崔德万本来是金家一个婢女的丈夫，老婆死了后，来到仁川当了几年警务厅使令，现在已升任使令班首。我向崔德万打听，才知道了金周卿的来历和为人。金周卿字卿得，原为江华使属。丙寅洋扰<sup>①</sup>后，大院君在

---

<sup>①</sup> 1866年1月，大院君下令镇压天主教，处死了包括九名法国神甫在内的大批天主教徒，法国舰队遂入侵仁川和汉城近郊，是为丙寅洋扰。——译注



江华培养三千名武士，在岛的周围兴建炮垒，建立国防营。这时，金周卿当了炮粮库守。他自幼性情豪放，不爱读书，以赌博为业。有一次他的父母为了惩戒他，曾经把他关在仓库里，他进去时身上藏了一副斗牌，被囚禁的几天里，想出了许多斗牌的妙法来。他到了汉城，制作了几万副斗牌，每一张牌上都作了认得出的记号，又回到江华出售。江华是个岛，四周小港口都一字摆开渔船。金周卿把牌分给同伙，让上渔船去卖。然后自己面访每只渔船，在船上开赌，可是无论在哪一条船上所使用的斗牌，都是金周卿做的，由于他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牌，所以一下就赢了十万两银子。他把赢来的钱收买江华和仁川的各官厅的官属，让他们服从自己的指挥，又广招远近智勇之士，收为自己家的门客。不管哪个两班，若做下无理的事，那就一定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教训后才罢手。境内发生盗窃案子，官署派捕校来捉，也须先得金周卿的允许，他说可逮则逮，他说要交给他管束的话，捕校们就不敢拒绝。那时在江华有两个大人物：就是两班李健昌和庶民金周卿。这两个人是江华留守也不敢触犯。大院君听到了这些情况之后，才让金周卿担任军粮要职。

听使令班首崔德万告诉我说：“有一天金周卿来我家吃饭，他说起必须要搭救金昌洙。最近政府大官们眼珠上都长了铜绿，除了金钱外，什么都看不见。所以不花些钱，很难救出他来。这次回家去要变卖全部家产，陪同金昌洙的父母去汉城，不管要多久，一定要想方设法使金昌洙获释。”过了十天，金周卿真来仁川陪同我母亲去汉城了，父亲则留在仁川。

后来听说，金周卿首先去拜访法务大臣韩圭胤，谈论过有关我的事情，对他说救出这种人，才能多培养忠义之士，因此央他上奏陛下请求释放我。韩圭胤内心虽极赞成，却推说日本公使林权助把金昌洙事件看作国际问题，大臣中不管任何人有庇护金昌洙者，将用尽一切手段加害，所以无可奈何，拒绝启奏。金周卿遂正式向法部提交诉状，要求释放金昌洙，结果批示：“其义可尚，但事关重大，不可

擅作处理。”后来虽接着第二次、第三次向有关衙门呈递诉状,可是哪儿都同样地互相推诿不得要领。金周卿活动了七八个月之久,钱财已消耗殆尽。父亲和母亲虽也轮流到汉城来往了几次,终无任何效果,不得已金周卿也只好放弃了诉讼。他回到家后给我来信,说了些一般慰勉的话,并写了一首五言诗:

“脱笼真好鸟,跋扈岂常鳞,求忠必于孝,请看依闾人。”

这是劝我越狱的话。我立即给他写了回信,表示感谢他疏财仗义,为我耗尽心力。并告诉他我不能为了苟且偷生而抛弃光明正大,请他不必为我过虑。于是我仍然继续过我的牢狱生活,用心攻读新学书籍。

据说金周卿后来纠合了同伴,打算在官船青龙号、显益号、海龙号三艘中,夺取其中之一准备作海盗,这事被江华郡守获悉而失败,后来在逃亡途中遇到郡守,把他痛打了一顿,逃亡到海参崴去了。也有人说他就在附近某处藏匿下来。

其后,父亲曾经带着金周卿向汉城各衙门呈递的全部上诉文件,去拜访江华的李健昌,请教救我的方法,可是他也只能摇首叹息而已。

那时和我同牢房的长期徒刑囚犯有判了十年的曹德根、金白石,判了三年的梁凤求,还有人被判无期徒刑。他们常常趁着僻静的时候,暗示要越狱。他们认为我力气大,只要我肯帮忙,一手带几个人,飞向空中,就可以救出他们。

有一天,曹德根流着眼泪对我说:

“不知哪天上面对恩命,金公子您出去了,留下我们,定会受到狱吏们的百般虐待,我们又怎能活着坐满十年牢呢?金公子,您看我们有多可怜。我们跟您学会了国文、汉字,现在也粗通文字,能够写信了。万一我们能活着出去,则终身受用不尽,要是死在这儿,岂不是白学啦?”

我正色说道:

“我不也是囚犯吗？要是有一天不能同时出狱的话，我心里也难受啊。”

曹德根又说：

“金公子虽然现在还和我们在一起，但是若有一天能免除牢狱生活也把我救出去，我将结草报恩，永世不忘。”

话中之意，难以猜透。你可以理解为有一天我蒙受君恩，出狱有了权势，要把他救出牢狱；也可以理解为在我出狱之前，以我的勇力把他救出去。

我沉默无言。

从那时起，我也开始动摇了。我想，要是我获释无期，我是不是就应该死在狱中？杀死倭寇，我们的国法并没有认为是犯罪行为。我杀了倭寇死而无憾。要是因为我勇力不足，被日寇杀死，或是我朝廷官吏不知我之忠义，把我作为罪人处死，我都无怨恨。但今天国王并不视我为犯人，这一点由他亲敕赦我死刑即可作证。监理署及各衙门官吏也没有指我为罪人，从金周卿起，仁川的捐客们都捐款想赎我性命，岂不是都愿我活吗？只是倭寇愿我死在狱中。我如让倭寇如愿以偿，死于狱中，只有倭寇高兴，又有什么意义？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决心要越狱了。我向曹德根悄悄讲了要设法救他出狱，他就高兴得像重获新生，并发誓一切都听从我的指挥。我叫他通知他的家属送二百两钱来，经拜托送饭菜的人通知后，立刻就送来了，于是便开始作越狱的准备。

当时囚犯中有个有势力的人叫黄顺用的。是江华人，因盗窃罪判刑三年，已经快要全部服满，离出狱日子只有十来天，他受命监督其他囚犯，所以非拉拢这家伙不能成事。这姓黄的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他极爱金白石。金白石是个十七八岁的美少年，以重犯盗窃罪判了十年劳役，服刑才几个月。我便计划利用金白石拉拢黄实用。

我指使曹德根，让他说服金白石，使金白石去央求黄实用。黄实用因爱白石，必定会探询救助的办法，那时可让他来求我帮助越狱。

不出所料，黄顺用经不住金白石苦苦哀求，为了他的暧昧之情，果然来求我设法帮助金白石脱逃。我故意严厉地责备他说：“你快出狱了，到了社会上，应做个好人，不料你还没出狱，又想犯罪。金白石年幼被判重刑，我也很同情，但我也还是囚犯，能有什么办法？”他悚然而退。我让曹德根指使金白石再三央求黄顺用。第二天黄顺用哭着表示：

“我替他坐牢都可以，求求您，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只要能救金白石出狱我万死不辞。”

我假装不信，对黄顺用说：“你多么爱金白石，我不知道，如今你为此暧昧之情，想救白石出狱。我也不是不可怜他，年纪轻轻，成了狱中之鬼，岂不可惜？但我要是答应了，动手救他时，你却去向巡警厅告发，我岂不倒霉？你和我在一起也快两年了，那一次李顺甫越狱，全体囚犯都被抓去挨了打，却没有人敢说我一句话。现在我要是可怜白石而救他，万一出了差错，我的英名岂不付诸东流？白石也不但不能获救，反而因此受害。我不是不相信想要活命的白石，倒是对想救白石的你不太放心。”

黄顺用再三发誓，他以为我只是救他们出狱，而我自己并不和他们一起越狱。在他表示绝对听从我的指挥后，我才假装勉强接受了他的请求。

曹德根、梁凤求、黄顺用、金白石只知道我要救他们出狱，但从不敢问我采取什么方法。他们也都认为我是决不会越狱逃走的。

有一次，黄顺用跟我说：

“我们要出去，得有些活动费才行。”

他只是看见曹德根弄到些钱，却知道我是身五分文。

戊戌年三月初九日下午，我请求见我父亲，请他弄一把一尺长的三棱锉裹在新衣服里带进来给我。父亲很敏感地觉察到我的用意，当天就在新衣服里藏了一把三棱锉递给了我。我偷偷地藏进怀里，谁也没有察觉。晚上母亲给我送饭来时，我叮嘱她说：

“今天夜里我要出狱，你们老俩口连夜乘船回家乡等我。”

母亲欣然和我作别。

这天下午，我拿出一百五十两给值班狱卒，告诉他今晚我打算请客，请他买大米、肉和一桶浊酒回来。这种事情过去也有过，狱丁并不怀疑。另外五十两钱给他买鸦片吃。因为我知道今晚这狱丁值班。当时每晚有一名狱卒在牢房值班过夜。他是鸦片鬼，品性不端，囚犯们都讨厌他。

吃晚饭时，五十名劳役囚犯和三十名未决犯，在狼吞虎咽吃了一顿大酒大肉之后，个个都是醉醺醺的。我便请狱丁让囚犯们到贼囚房歌唱助兴，狱丁很高兴地卖个人情说：

“我说哥儿们，唱得要使金先生听得见才行啊！那么就尽量唱吧！”

交待之后，自己便回房间抽鸦片去了。囚犯们得到允许，顿时闹腾起来，唱起了歌。我在贼囚房与杂囚房之间踱来踱去，中途偷偷溜到地板下面去，用铁三棱锉铁尖挖出铺在底下的薄石板，然后掘洞，一直通到狱外，又爬上狱墙吊好了绳梯。这时突然想起，带曹德根等人一起出去，不知会不会发生不测的事，不如趁此时一个人溜走。他们既然不是好人，何必一定要救他们呢？继而一想，辜负了正人君子尚觉惭愧，何况对他们这种囚犯呢？将来何以立足于天地之间，不是会终身引为遗憾吗？于是我再由刚才出来的洞穴爬回去，若无其事地回到我的位置坐了下来。我对他们四个一个一个地使眼色，叫出曹德根他们一伙指出了出路，等他们都出去以后，我第五个钻出去一看，先出来的四个家伙，根本没有越墙的打算，正挤在墙下蹲在一起发抖哩。我把他们一个个推过墙去，最后当我刚要越墙时，因为出去的那些小子们，正在爬过通往龙洞的板墙，弄得喀喀作响，惊醒了警务厅和巡检厅的人，跟着响起了一阵紧急哨子的声音，夹杂着狱门外扑咚扑咚的脚步声。

我仍然站在墙下，既然已无法回到我的房间，只有赶快地想法

逃走。但帮助别人爬墙容易,要自己一人爬过丈余高的围墙就难得多。这时连爬绳梯的工夫也没有了。四面传来打开狱门的声音以及囚犯们震天价响的喧闹声,趁这时,我支撑着放在对面扛水桶用的一丈多的木扁担,纵身跳起,手撑在墙边一跃而过。这时如果有人阻挡我的出路,我只有和他拼个你死我活。主意既定,也不翻越板墙,手持三棱锉,大步走向三门。把守三门的守卫,好像都跑进去紧急集合了,门口竟空无一人。我就从坦坦大道上走了出来,过了两年的牢狱生活后,终于又从仁川的监狱里出来了。

暮春的夜雾迷蒙,仁川还是几年前到汉城观光时经过一次,人地生疏,我茫然不知身在何方?

在一片漆黑、莫辨东西的夜晚,我通宵在海边沙滩上徘徊,待到黎明,这才发觉自己不过是在监理署后面的龙洞山麓下,急忙屏息四望,忽然发觉在数十步之外,有一个巡检正向着我的方向跑过来,佩刀喀吧喀吧地响着。

我环顾四周,想找一个隐身之处,发现了路旁商店的灶孔。在汉城和仁川,路旁的商店,灶孔都设在门外,还用长板子盖住灶孔,出入店门时,鞋就脱在这板子上。我赶紧掀开板子躲了进去,巡检晃动着的刀鞘,刚刚擦着我的鼻尖过去。

从灶孔口爬出来,天色已经大亮,可以清晰地看到天主堂的尖顶。我向着东方一直走下去,到了一户人家叫门,主人问我是谁,我说:

“老伯,请出来看看便知。”

他开门出来,以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我向他说明我是金昌洙,昨天晚上,仁川监理署秘密地把我释放了,但像这个样子,在白天行路不太方便,所以想待天黑时再上路,但竟被主人一口拒绝了。我只得问了去花开洞的路,继续往前走去,没有走几步路,遇到一个梳发披大衣的工人,他好像是没吃早饭正要到酒铺去的模样,我又重述了一遍我的遭遇,请他指路,那个人非常亲切地领我钻进

狭窄的小巷，左转弯拐地避着人的耳目，走到花开洞入口处告诉我说：

“往这边走就是水原，往那边走就是始兴，可通往汉城。两条路可以任择一条。”

来不及道谢及请教姓名我就匆匆而别。

我打算往汉城去，便选定往始兴的那条路。我这副行色，很容易使别人怀疑我是一个真正的小偷。因为患过伤寒，头发秃光，刚开始长出来的头发就像松针似的，勉强编成短髻，用毛巾把头扎起来。没有穿大衣，只穿了一身短袄裤，因为是新做的，又不像贫穷人的服装，加以爬出灶孔时，衣服上沾了不少泥污，就是我自己看，也觉得不像是一般的人。

离开仁川市区后大约走了五里路，旭日东升，警哨声随风飘来，仁川近处的山上也有许多人往上爬，像我这种装扮在路上行走，很容易被抓住，在山里隐匿，也终难逃过搜索网。因此便以虚虚实实的手段，就在大路边上躲藏，走入路边的矮松林中，卧在一株松树底下蔽身。面部掩盖不了，折些松枝勉强地遮住。

不久，巡检和狱卒们边谈着边经过我匿身之处，从他们的谈话中，我获悉了曹德根逃向汉城，梁凤求是乘船逃走的，并且说：“金昌洙是力大无双的勇士，要捉他恐怕不容易吧！其实逃得好，折磨死在狱中，又有什么意思呢？”

在松树底下躺了一个整天，待到巡检及押牢金长后等那班人经过我的身旁回仁川去后，才从藏匿的地方爬出来，这时已是黄昏时分了。虽然爬出来，但是从昨天晚饭后，使尽全力破狱而出，在海滩边徘徊了一整夜，一直到现在滴水未进，也未曾合过眼，我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真是天旋地转，寸步难移。

我走到附近村庄的一户人家，不得不撒谎说：

“我是青坡人，到黄海道延安买米回去，昨夜在北城浦海上不幸翻了船。现在回汉城去，我肚子饿了，请给我一点吃的。”

主人便给我一碗稀饭。我从怀里掏出一件别人给我的纪念品镏花镜子送给那家的孩子,要求准我过一夜,可是被拒绝了。当时一面镜子值一两钱,可买到一斗大米,结果我只是喝了一碗稀饭。看来这家主人也是怀疑我,不敢留我住宿。他让我到另一家去求宿,说那家客房时而留些旅客过夜。

我去那家要求借宿,也被斥退,无可奈何地决定睡在磨房。我拿了一些旁边的稻草捆,把它铺平之后就躺了下来,盖的枕的也都是稻草。

仁川的两年牢狱生涯到此结束,戏剧的第一幕拉下了帷幕;而在磨房里过的这夜,又揭开了戏剧的第二幕。我躺着背诵起《孙武子》和《三略》来,村里人看见了都窃窃私语:

“他也会读书?”

“恐怕是叫花子吧!他刚才到客舍来求宿呢。”

听了这话,我感到无限惆怅,但一想我的处境可能比张良要好些,于是就像狂人似地叫骂了一番后也就入睡了。



# 9

## 三南行

天亮时一早起来，朝着山坡抄着小路走，前往京城。为了讨口饭吃，我来到一家的门前。以前在我的家乡有一些耍赖的乞丐，他们十几个人一伙，在人家门前厉声喊叫，吵闹着要饭。我却没有那般劲头，只是大声叫道：

“给点饭吃吧！”

主人似乎没有听见，狗却狂吠起来，这才把主人引了出来。

“你要饭，事先也得打个招呼啊，不打招呼，哪儿有饭呢？”

“那就给我一碗锅巴汤吧！”我喝了一碗锅巴汤，又重新上路。

我避开大路，只走村间小路，就像乡下人似的，走东村，串西村，经过了仁川、富平等郡。

由于这两三年住在窄小的世界里，出狱后能自由地来往于广阔的天地中，心中感到非常神奇与畅快。我一面哼着在监狱中所学的时调和民谣小曲，一面走路，当天抵达了杨花渡渡口，这时已经日落西山，我又饥又渴，也没有船资，便跑到附近村庄的书院去，要求面见老师。

老师看我的年纪不大，又衣冠不整，第一次见面就冷眼相待。

我忿然地责备道：

“老师这样傲慢无礼，怎么可以教人子弟？我目前虽然运气不佳，路上遇到强盗，丢掉了全部盘缠衣物，才弄得这样子和老师见面，可是我决不能被人欺侮，受人歧视。”

老师听后当场道歉，并问我的来历。我说我是京城某某，去仁川办事，回来的路上遇见了强盗，钱财衣物被抢，现在要回家去，见天色已晚，肚子又饿，就想寻访一位知书达礼的老师。

老师留我一起食宿。次日一早吃过早饭，老师写了封信叫两个学童交给渡船的主人，让我免费渡江，这才到了京城。

我去找在狱中结交的陈五卫将，这人在京城南永熙宫当管家，跟五六个梨岳的铜器匠合伙，乘船漂浮在仁川外海私铸白铜钱而遭逮捕，跟我一起坐过一年多牢，他们认为在狱中，受到我的照顾是终生难忘的，再三叮嘱我出狱时一定要告诉他们，他们会前来迎接。

现在我衣食无着，便想到去找他们，也可顺便看看曹德根。

黄昏时我找到了南大门南永熙宫。我在管家房门前喊了一声：“门上有人吗？”只见房门开了一半，有人说：“哪儿来信了？就放在那儿好啦。”一听声音便知是陈五卫将，我又说：“要亲自接信。”说着，跨进了院子。陈五卫将走到了屋廊上盯着我仔细地瞧了一阵子叫道：

“唉呀！我道是谁？”

他脚上穿着布袜套，纵身跃到院子里，拉住了我。他把我拉进房中，听我叙述出来的曲折经过。他又叫家里人出来给我行礼，又派人去请来以前的同伙难友。他们认为我的行装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互相争着替我更换行头，“我去买鬃帽”，“我买一顶网巾”，“我买大衣”，每人摊派买了一件，让我赶快换上。

这是三年来首次衣冠整齐，使我感动得几乎流泪。于是与陈五卫将等逍遥玩乐了几天。

在这期间我去访问青坡洞曹德根家，曹德根大老婆说在仁川时曾有信来，说是出了狱，现在不知是否在姨妈家，让我第二天再去看

看。第二天又去，仍借口避不见面。可能他认为我是重刑犯，何况已出了狱，跟我见面对他再也没有什么好处。我那时也太傻，一个人越狱本来会更容易些，可是想起他苦苦哀求的样子，又回去救了他们。现在我空手来访，竟拒绝见面，是不是怕我要钱？又一想，觉得这也没有必要去责备他，此后我再也没有找过他。

在陈五卫将等家舒适地吃喝游玩，休息了几天以后，便想周游八道江山，于是向他们告别。他们捐助我路费，行囊也装满了，当天我渡过铜赤江，去游览三南地方。

由于当时我的心情极为忧郁，自到僧房院地方开始，经常喝酒，每天醉眼惺忪，步履蹒跚，晃晃荡荡地经过果川，抵达水原乌山市场后，旅费已全用光，我决定去找乌山市场西边的金三陟。

主人曾任三陟营主将，有六个儿子，长子金东勋在仁川经商，由于经商失败，在仁川监狱坐牢一个月，那期间，跟我相处得很亲密；当他出狱时，不忍和我分手，约好日后一定相逢。我在金三陟家里受到热诚款待，跟他的六个孩子在一起，饮酒吟唱，这样过了几天，又得了些旅费，于是我重新登程，前往南方。

过了公州，访问了恩津江景浦的孔钟烈。他也是在仁川监狱时交的朋友，当时他父亲孔中军去世，正在服丧，年少伶俐，通晓文字。早年当过云岬宫管家，后来作为赵秉弼的庄头，在江景浦当客栈老板，也是因为金钱关系，卷进了诉讼，在仁川监狱关了几个月。他家十分宽敞，他拉着我的手进了第七道门，把我留宿在内室。他母亲跟我也是在仁川认得的，热情地款待了我。

孔君所以把我留宿在内室，热诚款待，不仅因为我们是狱中患难之交，还因为这一小港和仁川之间，昼夜不停地人来人往，各个客舍东南西北各地的客商太杂，怕暴露了我的秘密。

在他家休息了几天，一天夜晚，月光如洗，整个院子，月色溶溶。突然听到孔母房门的开闭声，我偷偷起床，透过窗户玻璃，往院子里张望，只见刀光闪闪。仔细一看，见孔钟烈手拿着刀，其母手中执枪。

我以为发生了什麼意外，赶紧披上了衣服。不久，孔君揪着一个青年的发髻，把他拽了进来，并命令手下架起吊梁，把那青年倒悬起来。随后叫进来两个十岁上下的孩童，每人给了一把大槌，叫他们亲手打死仇人。接着他走进我的屋里，说我受惊了，向我道歉，并讲述了事情的始末：

“你我之间，无话不谈。我有一个姐姐，寡居守节，不料和我家家奴通奸，产下一子而亡。我就让那小子带着他的孩子远走他乡，永远也不要再见我面。可是那家伙自以为信奉了天主教，倚仗神父的势力，紧挨着我家，雇了一个乳娘抚养孩子，使我家蒙受了耻辱，真是岂有此理。请老兄你出去训诫他一番，让他有所畏惧而逃往远方。”

我无法拒绝他的请求，就出去给那个家奴松了绑，数落他的不是：

“你想想这家供养你的恩情，也不该让你主人那样丢脸。”

那家伙偷偷地瞅了我一眼，磕头如捣蒜，胆怯地说：

“我一定照大人您吩咐的去做，请饶我一条性命。”

孔钟烈紧跟着说了一句：

“今晚马上带着你孩子滚蛋。”

那家伙连声答应，抱头鼠窜而去。

我问孔君：

“那家伙带着孩子有地方去吗？”

“过了河，在临陂有他的哥哥，去那儿是能养活他孩子的。”

“刚刚那两个孩子是谁？”

“是我的外甥。”

我知道了事情的大概后，便告诉孔君我想在第二天一早离开此地去往他乡。孔君考虑到自己家的情况，又怕我再潜伏下去，事情会暴露，也同意让我走，他还给我写了封信，介绍我去他姐夫陈宣传家。他说他姐夫家住在茂朱邑，村子幽深僻静，姐夫家又是富翁，不妨隐居在那儿等候时机。

翌日清晨，我辞别孔君，前往茂朱。还没有走出江景浦，只看见人们聚集街头，在嚷嚷着什么。一打听，都说是黎明时分，河边传来了一阵幼儿的哭声，现在哭声已停息了很久，大概孩子已经死去。我听了这话，顿觉天昏地暗：“今天我杀了人了，那家伙夜晚见我十分害怕，一定是把孔钟烈的话当作了我的命令，结果把孩子扔弃在江边逃往他乡。我心里正忧郁不已，现在又杀害了无辜的幼儿，这是多大的罪过啊！”

我来到了茂朱邑，本想去找陈宣传家，可是转念一想，一头扎在这种不显眼的地方，只会让我越来越抑郁，于是又改变了想法，重新登程上路。

我想我既已来到了三南，不妨去南原见一见金亨镇。于是便来到南原耳洞。但一打听，村里人说，金亨镇家世代确实住在这里，但在年前，金亨镇加入东学党，举家逃走之后，就没有消息了，我觉得十分扫兴。心想他和我一起去了清国，共过患难，情同手足，为什么要隐瞒加入东学之事？

我记得金亨镇曾说过在全州南门内经营药铺的崔君善是他的姐夫，便去拜访他，可是他只以埋怨的语气冷冰冰地说，他是我的妻弟不假，但他把重担子留给我而自己却死了。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悲伤，加上崔君善又十分冷淡，便告辞而出。正好那天是全州集市日，所以人很多。我就去逛集市，东转西转，来到一家棉布店前面，看见一位卖布的青年，他的面孔酷似金亨镇，只是看起来更年轻些，而金亨镇有文人气，他却更像个农民。他说话的神情，他的动作确实像金亨镇，于是等他做完生意出来时我便拦住问他：

“你是不是金先生？”

他说是的，我再问：

“老兄是不是金亨镇的令弟！”

不晓得他怀疑什么，踌躇不敢回答。我说：

“看你的长相，分明是金亨镇的弟弟。我是住在黄海道的金昌

洙，令兄在生前，是否谈起过有关我的话？”

只见他泪如雨下，泣不成声，过了一会儿，他才流着眼泪说，不但他的哥哥经常提起我，而且在临终时，也说过不能见我一面终身遗憾。

我随这位青年来到金沟院坪他的家中，他们仅是个小小的农家，他一告诉他母亲和嫂子说我来了的消息，家里立刻哭声震天。金亨镇去世已经十九天了。他老母年已六旬，日夜思念她死去的儿子；他妻子年方三十，青春守寡，也不免想念死去的丈夫。儿子名叫孟文，年仅八九岁，少不懂事。在集市上遇见的是他的二弟，他有个儿子名叫孟悦。他们以种地为生。

我在这一家住了几天后，又起程前往务安、木浦。

当时木浦还是一个新辟港口，官厅尚未建成，房屋疏疏落落，是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在这儿，偶然遇见了梁凤求，他是跟我一起越狱的四个人中之一。听他说，曹德根在汉城再次被捕后，瞎了一只眼，还折了腿，而当时那个姓金的值班狱卒，后来因为鸦片瘾发作，在狱中死了。他还说没有听说过有关我的风声。梁凤求给了我若干旅费，说仁川、木浦之间，巡检来来往往，此地非久留之处，劝我赶快离开。

我离开木浦，游历了海南、关头、康津、古今岛、莞岛等地，还周游长兴、宝城，在宝城郡得粮面得粮里的同宗金广彦等家里住了四十多天，离别时还接受了同里宣夫人亲手制作的笔囊。之后又游历和顺、同福、淳昌、大明，去了河东双溪寺，参观了七佛亚字房，再上去又回到了忠清道，抵达鸡龙山甲寺，已是柿子熟透，落叶飘零的晚秋。

我在寺中吃中饭的时候，遇见一位到东鹤寺来吃午饭的游客，互通姓名之后，才知他是住在公州的李君。年纪似已过四十，从他念给我听的自作游山诗或谈吐来看，是个抱着悲观思想的人。虽是初次相逢，谈得却很投机。他问我要往那里去，我告诉他我生长在开城，因经商失败，一气之下，出发游览河山，将近一年中遍游三南，现

在回故乡去。他说麻谷寺只距此四十里，可否一起去参观游览。一提起麻谷寺，我便联想到幼时读过的《东国名贤录》，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徐花潭敬德在宫中行冬至贺典的时候，哈哈大笑，皇上问他，“卿为何狂笑？”他禀奏道：“今夜麻谷寺住持和尚通宵煮粥，因困乏打盹，溺死于粥锅中，众僧全然不知，仍然是边嬉笑边吃粥，岂不可笑？”皇上不信，立即派人骑马一昼夜赶了三百余里，到麻谷寺一调查，果然如此。那时父亲还常讲这故事。

我随着李君同往麻谷寺。

我各地漫游到此结束，游历期间所见所闻确实不少。在牙山我瞻仰了忠武公李舜臣的纪念碑；在光州驴洞，我看到这个村也只是数百户人家，却有七名洞长视事，这在西北地方是未曾有过的。在光州、罗州、淳昌、大明等地，到处都是竹林，这也是西北地方所没有的特产。我十多岁时只听说竹子一年长一节，到了这些地方才初次见到。在长兴、宝城等郡，夏季摘下大豆叶烧汤喝，或把摘下的叶子晒干，到冬天吃，也有把干叶用牛马驮着上集市去卖的，这是那里的大宗买卖。

我曾在海南李进士家住过几天，和我一起留宿的客人有五六名，其中也有住了八九年的。由于过去迷信，认为客人干活，主人家就会贫穷，所以客人指头都不动弹，享受和主人一样的待遇。

只要不是两班，家里再有钱，也不敢把客舍房门朝外开。路过的客人向主人要求留宿，头一句话就是问他昨夜是在哪儿住宿的，如果是宿在两班家，则无二话可说，如果是宿在普通人家，两班不是劝诫过客，而是把留客住宿的平民抓去，施以私刑。这真是奇怪的坏习俗。

我虽非亲眼所见，但听说当地有两个著名的过客，一个叫洪草笠，一个叫朴道袍。姓洪的从戴草笠的少年时起就一直过着客舍生活；姓朴的则常穿道袍，专门旅居于客舍。他们不管住在谁家，只要主人稍一怠慢，就恶语相加。

海南有尹、李两家最大的两班，权势显赫。有一次，我留宿在尹

家。深夜，他家抓来一人捆绑在客舍门前的拴马桩上，施以酷刑。主人呵斥道：

“你这该死的混蛋，两班定下的工钱，你敢私自加价？”

受刑者连称死罪，哀求饶命。

我问主人道：

“您定的工钱是多少，他又加了多少钱？”

“村里的工钱我今年定的是女的两分，男的三分，他到哪家去干活都多要了一分钱，所以我要严加惩罚。”

“现在路上行人住店的饭钱，最少一顿也要五六分，而一天的工钱还不及一顿饭钱的一半，连自己都难养活，怎能供养家室？”

“这些人家里做工的至少有男女两人，每天都有一人去两班家干活，一千活，全家人都在那家吃饭，工钱给多了，就会讲究穿着，怎会对两班恭顺？所以工钱不能多给。”

我听了此话，大吃一惊。我常叹息我是海州西村的平民，现在看来，两班的乐园是三南，而西北则应是平民的天堂。我生为海西平民，应该说是很大的幸福，要是当了三南的平民，那该是多么不幸！

庆尚道地方的两班和平民又有若干不同。屠户在三南是不能戴网巾的，他们只能光头戴平凉笠<sup>①</sup>。在庆尚道，屠户所戴的平凉笠下还编有一圈竹丸，系上细绳索。走在路上，无论男女老少，遇见了人，都要退避到下方，说声“小人请安”，送走行人后，方能上路。这是庆尚道特有的习俗。

在三南，两班的尊严虽然凛然不可侵犯，但也有一些美风良俗。

我曾在插秧期经过金堤的万顷良田。那里的农民一大早就手举令旗，敲着长鼓，走向稻田。插好令旗，下田插秧时，五六个民歌手击鼓唱起农歌，于是男男女女，手舞足蹈，兴致勃勃地插起秧来。东家则在田埂上到处放上浊酒坛子，可以随意饮用，行人路过时，也争相

---

<sup>①</sup> 是一种用竹篾编制的斗笠，系地位卑微者所戴。——译注



劝酒。农民进餐时，即便是现任监使和守令，也要下马慰问。

一般农工都是有组织的，东家要雇工时，则跟其首领交涉，讲定有关衣服、佣金、休息、疾病等条件，由其首领（有司厅首）监督执行。雇工若有偷懒懈怠者，东家不能随意责罚，而要向其首领告发，由他施以惩戒。

两班平民等级虽然森严，但在正月初旬和八月中秋做拔河游戏时，则不分男女老少、两班平民，都汇聚一起，嬉戏娱乐。拔河时，在两个村子中央竖起木柱或石柱，系上粗绳缆，各自往自己村子的方向拉，看柱端倒向何方。

我看了古今岛忠武公<sup>①</sup>的战绩地、锦山赵重峰<sup>②</sup>的战败遗址，还在公州看了高僧灵奎<sup>③</sup>的墓碑，真是感慨万千。

从任实到全州的途中，在越过大山堂岬时，遇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看起来像是个富翁，他独自骑驴赶路，来到山脚下时，他从驴背上下来，和我结伴同行。相互寒暄后，才知道他住在任实邑，名叫文元来。我们边走边谈，不觉来到了山岭上。岭上有四五家酒店。那天全州正是赶集的日子，有四五十名货郎行商赶完集往回走，正在岭上歇脚。

我们爬上了山岭，文元来劝我歇息一阵再走。他要是没有熟人，我也可以陪他喝上一盅，可是他跟酒店老板很熟，倍受款待，因此我坚决辞谢了他，独自踽踽而行。下山岭时已是日薄西山。

我匆忙赶路，赶到了上关酒店。吃过晚饭，正坐下抽烟，传来了消息，说是太阳下山前，山岭上来了三十多个强盗，抢劫了行商的财物。文元来醉中大声呵斥，强盗们挥斧砍去，他的头骨被砍成两半，身首被截为三段。我想我要是被姓文的拉住，一起喝酒，我的性命又将如何？真是后怕。

---

① 李朝壬辰卫国战争时期著名爱国将领李舜臣的谥号。——译注

② 即赵宪，李朝文臣，壬辰倭乱时的义兵将领。——译注

③ 李朝壬辰倭乱时的僧兵首领。——译注

后来听说，文氏是任实的吏属，他的亲兄弟是闵泳骏的亲信管家，文氏遂仗势欺人，失去了人心，终遭杀身之祸。

在全州，官吏和使令是冤家对头。当时镇卫队正招募士兵，官吏们生怕使令入营，都把自己的子侄送去当兵，但他们的头上仍然束着发髻，再在上面高高地戴上军帽。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公州李君。

我从甲寺和李君结伴同行。路上李君介绍了他的来历。他说他仍是一个光棍儿，当过几年的书堂老师，现在准备进麻谷寺当和尚，以安静地了此一生，他劝我也一起去当和尚，当时我并不是没有当和尚的心思，可是由于事情来得突然，一时难作决断。

爬上麻谷寺前坡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候，满山遍野都是金黄色的丹枫，观此景色不无游子悲秋之感，麻谷寺为晚雾所笼罩着，好像是超然地避开了我们尘俗的目光。钟声当当地响着，似乎在劝告人们解脱一切烦恼，速速遁入空门。

李君又问道：

“金兄，怎么打算呢？忘却尘世，跟我一起做和尚吧！”

我跟他说：

“在这里谈有什么用处呢？要想当和尚，去和当家的和尚当面决定去吧！”

“那倒也是。”

我们冒着浓雾，下山向山门一步步地走去。每走一步都感受到逐渐从尘世步向净土，从地狱走向极乐世界，好像离尘世渐渐远去一般。

# 10

## 麻谷寺削发为僧

经过梅花堂，走过急流轰鸣的长木桥，进入寻剑堂，有一个光头老和尚正打开一幅画在欣赏着，见到我们打了招呼。李君跟这老和尚是旧交，他便是“抱凤堂”。李君把我留在寻剑堂，便到另外一间房里去了。不久为我拿了饭来。吃完晚饭休息时，来了一位白发老和尚向我恭敬地行礼。我向他撒谎说：“我是在松都出生，由于父母早亡，亦无近亲，孑然一身，游览河山至此。”

那老和尚说：

“俗姓苏，是益山人，削发当和尚已经有五十年了。”

他殷勤地劝我“上座”<sup>①</sup>。

我谦让说：

“我本是才质愚钝，学识浅薄，恐将来连累师父。”

他仍然坚持要我“上座”，说是在高明的老师之下学佛，将来何患不能成为大师。

翌日李君已经削发，头如鸡蛋。他向我问候后说，由于荷隐堂是此寺庙的财主宝镜大师的“上座”，我一成为荷隐堂“上座”的话，将

---

<sup>①</sup> 即出家修行当徒弟。——译注

不用负担学费，所以劝我赶快削发。我也由于一晚的清静生活，万念俱灰，于是便决定出家。

过一会儿我跟着拿着剃刀的师弟扈德三到溪边去蹲着。德三先念了削发真言，忽然觉得一阵冰冷，我的髻一下子掉落在砂地上。我固然已经决心削发为僧，但随着落下的头发，眼泪也忍不住掉落下来。

法堂的钟响了，是宣告我的“得道礼”的。从山内各庵堂聚集了几百名穿袈裟的僧侣，香积室里供养主正在煮着“佛供饭”。我也身披黑色长衫，红色袈裟，被引进大雄宝殿。在旁边的德三教我拜佛。由荷隐堂命名告于佛前，我法名为圆宗。受戒师龙潭庄重地朗读经文，令我五戒。结束拜佛程序之后，我又从宝镜大师开始，向山中年纪较大的诸大师按次序行礼。然后，学习行礼的功课，背真言集，读“初发心自警文”，学习简易的僧规，至于精神的修养有所谓“僧行以下心为第一”，尤以戒除骄慢之心为主，不仅要对人，连对禽兽、昆虫也要具有恭敬之心，否则，将受地狱之苦。昨晚劝我做和尚时那么谦恭的恩师荷隐堂，从今天开始，直呼我的名字：

“喂，圆宗。”

还随意使用卑语，说：“这家伙生来愚蠢，成不了高僧，难怪嘴脸也生得那么丑啊，赶快去砍柴，打水。”

这么任意使唤我，把我吓了一跳，不晓得当了和尚就会变成这种模样。我虽曾身为亡命客流离四方，但有雄心，也求过功名，而且胸怀壮志要在有生之年洗雪贱民之耻，成为贵人，而且要成为非凡的贵人，以偿我向两班复仇之宿愿。然而现在当了和尚，在佛门中，这些虚荣的野心，是丝毫不能容忍的恶魔，因此当这些恶念在心中萌生的时候，要借“护法善神”的力量，连根除掉。我独自想着我为什么跑来这种地方呢？有时我不免自怨自艾。但既然做了和尚，除了顺从之外，别无他法，于是我听从一切命令，劈柴打水。

一天打水的时候，因为不小心弄破了一个水桶，被荷隐大师大声叱斥。责备得那么厉害，连宝镜老大师也看不过去，叹息道：“上一

次也给他收了一个人人称赞的“上座”，被他管得吃不消，终于被赶走了，现在又是如此，这样圆宗能留得住吗？只要教导得好，怎么会做不好事情呢？”

听到这些，心里略感慰藉。

我白天干活，晚上就跟其他的沙弥们一样，学习礼佛程序，背诵《千手经》、《心经》之类，又从受戒师龙潭大师学了佛学经典《普觉书状》。龙潭当时在麻谷，不仅是佛学，且以儒学而闻名，他的为人深受人们的尊敬。

服侍龙潭的“上座”慧明是位年轻的佛门弟子，对我很同情，龙潭大师也常常担心荷隐堂的古怪家风，常常安慰我。他说古语有云：“见月忘指”，看了月亮就行了，又何必指着月亮做什么呢？又教我怀着利刃般的心，以断忿怒之念，这就是“忍”字的道理。

这样经过了半年的时光，到了己亥年正月。我虽辛苦，其他和尚们却都羡慕我，以为宝镜堂或荷隐堂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只要他们一去世，那么多的财产，就都变成我的了。我看了秋收册，仅仅白米收入就超过两百石，这还只是佃农所交，再算上现款和货物多达几十万两。可是我与尘世的缘分并未断绝，只是把这儿当作亡命客暂时的隐身之处，并没有要为“清净寂灭”的佛法牺牲一生的念头。我想知道从离开仁川监狱之后，断绝了音讯的父母的下落，又想去找寻为了拯救我而倾家荡产的金周卿的踪迹；又想去见见住在海州飞洞的高后凋；又想去访问我当时认为信仰天主教便是叛逆大义，因而心怀不满跟他分手的清溪洞的安进士，并向他道歉，这些事情经常萦绕胸怀，所以从未对宝镜堂财物动过什么念头。

有一天晋见宝镜堂时禀告他：

“贫僧既然当了和尚，必须学习和尚要学的学问，因此想到金刚山去学习佛经，成为一个忠实的佛门弟子。”

宝镜堂听了我的话后说：

“我早就知道了，既然这就是你的志愿，那也没有办法。”

立刻叫荷隐堂来，互相争论了一会，终于给些财物予我。我接受十斗白米与衣钵后，离开荷隐堂，移到大房，从这一天开始就自由了，我卖了那十斗白米做为旅费，离开麻谷启程前往汉城。

走了几天抵达汉城，这时在汉城城中仍有禁止僧尼进出的国禁。我在城门外遍访各寺刹，到西大门外的新寺去住了一天，遇见了师兄慧明。他说是正要到长湍华藏寺去访问恩师，我说我是准备到金刚山去读书。跟慧明道别后，又遇见庆尚道丰基的一个名叫慧定的和尚。他说要到山河壮丽的平壤去游览，于是我便与他结伴同行。

西渡临津江游览松都后，我打算去看海州监营，然后去平壤，于是便和慧定去海州。

在首阳山神光寺附近的北庵挂单时，我把我的身世透露了一些给慧定，并拜托他到基洞我家，跟我父母秘密见面传达我的消息，但只说我平安，不要说我在何处，这样托咐之后，送慧定上路。正在等待慧定的回报，就在四月二十九日黄昏，我的父母跟在慧定的后面走了进来。

从慧定那儿听到我的消息后，父母认为他一定知道儿子的住处，只要跟着他走，一定可以见到，因此跟着慧定出来了。一见到和尚儿子，不由互相抱头痛哭，悲喜交集。

在北庵住了五天，我仍然是和尚打扮陪同双亲，跟慧定一起启程到平壤。

路上父亲将他们的遭遇告诉了我：

“戊戌年三月初九，从仁川回到家里，仁川巡检立即跟踪而来，逮捕了我们老俩口，于三月十三日把我们关进仁川监狱，毒刑拷问。不久，你母亲获释，我却被关了三个月，才放了出来。这以后的两年里，也不知你的死活，一直苦苦等待，只要做了不祥之梦，就终日不思饮食，忧心如焚。正在此时，慧定和尚来到家中，却说只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就走，因此跟着他来到了这里。”

五月初四抵达平壤，在旅馆休息一天，第二天就是端午节，到牡

丹峰去看了荡秋千，回来的路上经过贯洞胡同，看见在一家客舍里盘腿端坐着一位学者模样的人，他头戴缙布帽，身穿宽袖衣。我走到阶台下，想跟他搭讪：

“贫僧向您问安。”

那位学者注视我良久，请我入座，我走进房间，开始叙谈。他是艮斋田愚的门人崔在学，号克庵。

我跟他说是麻谷寺和尚，这一次顺道曾去访问天安金谷田艮斋先生，但恰巧外出未遇，现在有幸能见到崔先生，真是非常高兴。于是跟他谈论了些理论性的问题，崔先生便把我介绍给坐在旁边的一位长须美髯、精神奕奕的老人，我向他合什行礼。他名叫全孝淳，曾做过平壤镇卫队参领，后又任价川郡守。介绍完后，崔克庵向全孝淳推荐说：

“这位大师学识渊博，如果聘为灵泉寺房主的话，对大人的子弟外孙们读书将有裨益，大人的意思如何？”

全孝淳说：

“真是求之不得，刚才我旁听您和崔先生的讨论就非常钦慕大师。大师的意思如何？小儿和外孙们现在正由崔先生管教，在灵泉寺读书，寺里的那位住持和尚品行不大好，只喝酒而不管事，真是糟糕得很。现在大师如能辅佐崔先生教导我的子孙，那将感恩非浅。”

我谦让地说：

“您不怕我比原来的那位和尚更糟糕吗？”

崔在学催促全孝淳去找平壤庶尹洪淳旭交涉，全孝淳当即去拜访了洪淳旭，领来了“聘僧圆宗为灵泉寺房主”的牒旨，促我即日赴任。

我心中颇感欣慰。我若陪同父母，以乞讨为生，那太不敬。现在能和学者同居，不仅有助于丰富学识，而且还解决了所面临的衣食住问题，也没有违背我亡命的本意。一想到这儿，我便欣然允诺，遂和慧定一起跟随崔在学来到平壤西部大宝山灵泉寺。我略整顿了一下寺务，安顿父母住在一间清静的房子里。学生是全孝淳的儿子炳

宪、锡万、他女婿金允文的两个儿子、长孙、仲孙，此外还有其他几个学生。全孝淳隔日从平壤送来食物，又叫山下新兴洞的肉铺供应灵泉寺的肉。我每天下山背上来一大块肉，把它煮烹烧烤后，就穿着僧衣，毫无忌惮地尽量享用，也不再念经而是经常吟诗。我时常随着崔在学到平壤去，在四崇斋跟诗人黄景焕等论律谈诗，晚上就去大同门边吃冷面。最初老板给我素面，后来便吃起带肉的荤面来，我竟变成佛家所谓的“手持猪头，口宣佛法”的和尚。

有一天，崔在学和学生去了平壤，我独自留在寺里。此时，大宝山前太平市内村的私塾老师带着数十名学童和数名诗友，抬着酒和菜肴到寺里举办灵寺诗会，一进门便呼住持僧出迎。我恭敬地合什行礼。一个诗客傲慢地站出来说：“你这个混和尚，前辈来此，你为何如此怠慢？”

我恭敬地回答道：

“贫僧不知前辈们来此，有失远迎，罪过罪过。”

“岂止这个，你是什么时候当上寺里住持的？”

“三四个个月前。”

“那么你为什么一直不去参见附近村子的两班？”

“贫僧刚到寺里，事务繁忙，还没来得及去拜访，甚是罪过，容乞海涵。”

师塾先生认为“降者不杀”，一面责备我，一面劝阻那个诗客，事态才平息下来。

我那天怕把事情弄糟，一直是小心翼翼。

酒兴正酣，师塾先生金愚石和几个能作诗的开始大声吟诵起诗来，我则在一旁不停地敬酒奉茶。

这中间我也偷暇看上一两眼，觉得他们的字就写得粗俗，可是就这样，他们还吵吵嚷嚷，说是绝唱，是得意之作，我不禁暗自冷笑。

我过去虽没有专门学诗，但自与崔在学相识后，常在山寺接待湖亭卢东桓，汪波黄景焕以及金醒后等平壤的一流名士，在接触的



过程中,对书法诗词的理解多少有点长进。因此,便向私塾老师提出:

“贫僧书法浅陋,如前辈们允许,愿不揣冒昧,为诸位助兴,在末尾和诗一首。”

师塾老师点头许诺,并问道:

“你也会写诗?”

“是的。贫僧今日对诸位前辈有失恭敬,多有得罪,愿和诸位之韵,以示谢罪。”

于是我献诗一首,首尾现已忘记,只依稀记得有这样的联句:

“儒传千岁佛千岁,  
我亦一般君一般”

师塾老师和诗客们见了面面相觑,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似乎认为我这和尚过于傲慢。正在这时,崔在学一行名流来到寺里。他们看了村客们的诗句,及至看到末尾奉砚僧圆宗的“儒传千岁”的联句,不禁手舞足蹈,犹如唱起了多重唱,交口称誉是杰作,是绝唱,赞美声几乎震塌了山寺。这样,那些村客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不敢盛气凌人了。

后来听说消息传到平壤,还被谱上曲子,供艺妓歌唱。从此“乞诗僧圆宗”的称号也在平壤流传开来。

有一天,我路过一家酒店,突然从里面传出来一阵吼声:

“这和尚!混蛋!”

我回头一看,只见十多个村里的青年,蓬头散发,正在喝着大碗酒,已经是醉醺醺的了。

我走到门前,合什行礼。一个青年跳了出来,怒冲冲地问:

“你这家伙,是哪儿的和尚?”

我恭敬地回答说:“贫僧是忠清道麻谷寺的和尚。”

“混蛋!忠清道麻谷寺的和尚就是这样的无礼?两班老爷们坐在这儿,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想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是贫僧不知,多有得罪。贫僧行路匆忙,未能行礼而过,望乞恕

罪。”

“你去哪儿？”

“我去芦苇洞。”

“去哪家？”

“去强斋金府。”

“你认识金先生？”

“我没见过面，不过我有城里全孝淳的信。”

一听到这里，他环顾四周，哑然无言。坐在屋里的人也面面相觑。接着，又有一人出来责备那个惹是生非者说：

“依我看，这位大师没有错，他正在走路，能到每家店铺去打招呼吗？这还走什么路？你是醉了。大师，你快走吧。”

我想这恐怕是知道全孝淳乃镇卫队参领，心中害怕的缘故。我指着那个寻衅者问：

“那位是谁？”

“他是里村李军奴家的公子。你别问了，快走吧！”

我暗自窃笑，离开了那儿。时已黄昏，农民们正赶着牛回家。我拉住一个人问李军奴家在哪儿，他用手指了指山脚下的一幢房子。

我又问：

“李军奴两班在家吗？”

“不，李军奴已经去世，现在他孙子当家。”

我感到又好笑，又寒心。在强斋先生家聊天休息，住了一天。以后我只是在官报上看到他迁任江东郡守，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和我同来的慧定很失望，慧定看我佛心已丧，俗心渐增，非常担心，但酒肉和尚的耳朵，是绝难听得进那种忠告的，他看我的佛心难以回复，有心要背着行李下山离开灵泉寺，又不忍跟我分手，去而复返，这样反复了一个月之久，最后因要去庆尚道故里终于走了。

由于父亲不愿意我再削发，我就带发修行，到那年的暮秋，我戴上假发编了髻，穿上文人衣冠，陪同父母回到海州故里。

# 11

## 转变为开化派

没有人欢迎我回到故乡，以为昌洙一回来，可能会再闹出什么事来，亲戚朋友都非常担心。其中俊永叔对我更是毫不同情。他现在已经悔改，对父亲也很恭顺，但认为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浪荡子：

“人生识字忧患始，还是干脆不要读书，如果勤快种地倒还可以替他成家，要不然我就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叔父劝父母让我做一个农民，然而父母理解我远大的志向，便说孩子已长大成人，一切由他自己去吧。四叔就跟我父母发牢骚：

“兄嫂让昌洙念书，结果连累你们受这么大的苦，还不醒悟。”

叔父的话也对，我真要是个文盲，也就当不了东学头领，也不会发生仁川事件，只能在基洞当个农夫，挖井饮水，种地吃饭，不可能扰乱人间。

庚子年春天开始农忙的时候，四叔似乎决心要把我教成像样的一个人，每天清早就来我家，把我叫醒，催我吃饭，带我上田里去平地，我头几天还听话，过了些日子，便悄悄地离开故乡，去了江华。虽然理应先去拜访高先生和安进士，但现在公开露面为时尚早，便改名为金斗来，抵达江华，先去拜访南门内金周卿家。但金周卿杳无音讯，他三弟金镇卿出来接待了我。

“先生来自何方？过去和家兄很熟吗？”

“我是住在延安的金斗来，跟令兄是很要好的同志，因为几年未通消息，特地专程前来拜访。”

镇卿很高兴地迎接我，谈了些往事。据他说周卿离家出走已将近三四年，没有音讯，因此只得搬到哥哥家一起住，由他侍奉嫂嫂，扶养侄子。房子虽是稻草屋，原来盖得很好，又大又宽，但好几年没有修理，已经相当破烂了。

客房内，仍摆着平时金周卿坐过的垫子，他亲自处罚违背信义的同志时所使用的木棍，还挂在墙上。镇卿指着这些，跟我谈起了一些往事。来客舍玩耍的一个七岁孩子，就是周卿的儿子，名字叫做润泰。

我告诉镇卿，我特地来访问他令兄，白白跑一趟回去觉得甚是遗憾，所以想暂时教润泰读书，顺便也等待消息，镇卿说润泰和他的二哥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到了读书的年龄，仍整天在外面戏耍，我要是能教他们，真是感谢不尽。遂立即去邻村他二哥武卿家，说明了情况，把两个侄子带来，即日起就开始了学习。我教给润泰《童蒙先习》，给武卿的儿子教《史略》初卷，另一个孩子则教《千字文》。武卿、镇卿的亲友见我热心从教，都向镇卿请求，把自己的孩子也送来上学，学童也就增多了，不到一个月，三大间客舍竟有三十多人就学。我也就安心尽力教书了。

这样经过了三个月，有一天镇卿接到一封从汉城来的信，喃喃自语地说：

“这人真是的，我又不认得他，还老来信，我已回信说没有此事，还要派人来。”

我在旁边听他这么说，便问是怎么回事，镇卿向我说明：

“原来有个叫柳仁茂的，又名完茂，是富平的两班。几年前为守丧而寓居于离镇约三十里的村子，大约住了三年才回去。当时跟家兄亲密无间，无贵贱之别，曾请家兄去文殊山城一起住了几天，以后

家兄又去拜访了柳家。前年海州金昌洙杀了倭贼，被囚禁在仁川监理厅。狱卒中有个叫崔德万的，曾是我家婢女之夫。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家兄，说是监理和警务官都不敢碰那姓金的，国王还下令免了他的死刑。家兄听说后变卖了家产，在汉城活动了将近一年，想要救出金昌洙，这哪能行呢？结果钱花完了也没能救出来，后来家兄又犯了别的事情，逃避他乡。听说金昌洙后来越狱逃跑了。现在柳完茂却给从未见过面的我来信，说是海州金昌洙若来到我家，请速通知他。我已回信告诉了他姓金的未曾来过，他还要派他和家兄的朋友李春伯来家，让我不必怀疑，如有金昌洙的消息便告诉他。”

我听了后毛骨悚然，又感到十分惊讶，便试探道：“那金昌洙一次也没有来过吗？”

镇卿毫不犹豫地说：“大哥你也想一想！从此地到仁川只不过咫尺之隔，如果家兄在的话，也许会偷偷地来看看，如果暗自打听，得知家兄并不在家，避难的金昌洙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我又说：

“那么柳仁茂大概是日本人或现任官吏的密探吧？”

镇卿说：

“不是，柳仁茂不是那种人，虽然没有直接见过面，可是据家兄说柳生员跟普通的两班不同，颇有学者的风度，他常称家兄是血性男儿，对家兄十分厚待，根本不分贵贱。”

仔细想来，我不知是否大祸临头，心里也想知道柳完茂的本意究竟如何，可是又不便多问，怕引起镇卿的怀疑。我表面上泰然自若，实际上心乱如麻。

第二天吃早饭后，有一个身材高大，脸上长着麻子，大约三十多岁的人，径直闯进客房来，看着在我面前念书的润泰说：

“最近长得好大了，进里边去告诉叔父我来了，请他出来。”

由他的举动我已经猜到他是李春伯。过了一会儿，镇卿出来向客人打招呼。

“有没有得到令兄的消息？”

“还没有什么消息。”

“哦，真是令人担心。柳仁茂的信看过没有？”

“是的，昨天已经接到了。”

主客之间交谈了一会之后，镇卿拉上房间的隔门，和我坐着的房间隔开，只留下他们两个人在房里交谈。我无心听学童们念书，只倾听他们两人的谈话。

“柳仁茂这位贵人一定是没有脑筋的，大哥也不在家，金昌洙怎么会来，他何必三番五次地写信呢？”

“你的话当然是对的，可是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了金昌洙，费了多大的力气啊！柳仁茂到南部来住了一个时期，有一次来汉城，偶然听到你大哥为了拯救金昌洙，荡尽家产，最后不得不逃到他乡。他很感佩你大哥仗义疏财，决定要想办法救出金昌洙，但靠法律或行贿是行不通的，你大哥不是失败了吗？因此，除了以暴力之外，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了，所以就召集十三名青年组织了劫狱队，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决定在仁川港七八个要害处，每个人背一桶煤油去放火，乘混乱之际破狱劫出金昌洙。因此柳仁茂叫我先带两个人去仁川观察一下实际情况，但是打听的结果得知金昌洙已经在三天前和其他四名囚犯一起越狱逃走了。我们和柳君研究了探听金昌洙行踪的办法。一个是去他海州老家打听。但金昌洙是决不会回他老家的，而且他的家人即便知道金昌洙的下落，也决不会透露的。弄得不好，还会吓坏他父母。另一条路就是你家。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柳仁茂想知道令兄和金昌洙的消息了。当然金昌洙自己来这儿是困难的，是不是会在别的地方给你家来信呢？”

“没有信，要写信的话，他本人早就来了。”

两个人的谈话到此结束，转向别的话题。镇卿问：

“李生员何时打算动身去汉城？”

“今天拜会几个朋友，明天就走，离开前我再来一趟好了。”

谈完,李春伯就走了。

柳仁茂为我这样费尽心机,我下了决心要去找他。因为我不能对如此关心我的朋友视若无睹。李春伯是把镇卿视为同志才坦诚相告的,他说柳君继金周卿失败后想冒险救我看来也是可信的。假使他是伪装来刺探我的,也可谓君子可欺以方,因义理而被骗的话,不是我的过错,若不肯信任忠诚的朋友,那就是我的不义。

这天夜晚,睡下不表。第二天一早,和镇卿同桌吃饭时,我问镇卿:

“昨天来的人是李春伯吗?”

“是的。”

“什么时候再来?”

“说是今天早晨要来告别去汉城,一会儿就会来的。”

“李春伯来了,请给我介绍一下。平素跟令兄要好的同志,我也想见一见啊!”

“好吧。”

我接着说:

“今天我要跟你告辞,也要和润泰兄弟们离别,我惜别之情是无法以语言形容的。”

说着,我热泪盈眶。镇卿听了我的话,大惊失色。

“兄长,这是哪里说起?我有什么不是之处?怎么突然会要告辞呢?我有不到之处,请看在家兄的面上,宽恕我也行,责骂我也行啊。”

“我就是金昌洙,柳仁茂是猜对了。你昨天和李春伯的谈话我都已听到。如果你认为他不是密探的话,就请准许我去见一见柳仁茂。”

镇卿听了此话,又吃了一惊:

“兄长既然要去,小弟怎么能挽留呢!崔德万虽于去年去世,但巡检中有些人以及监理署主事跟这儿还常有来往。有事定当相助。”

然后对孩子们说老师今天要走了，大家也都回家去吧。

不一会儿，李春伯来了，镇卿把我介绍给他，跟他说我也想去汉城，想和他同行，李春伯以为我是普通的路伴，所以很高兴，镇卿拉着春伯的袖子到后房去，跟他耳语了两三句话，出来后我们就离开了镇卿家。在南门街，三十名学童和他们的父兄挤满在道旁欢送我，大概因为我专心教他们的子弟又不收学费，所以感动了他们。我们当天抵达了孔德里朴进士台秉的家中，李春伯先进去，过了一会儿，一个中等身材，脸色黝黑，束发戴着鬃帽，穿着朴素的生员出来迎接我。

“我就是柳仁茂，路上辛苦了吧，俗话说得好：‘男儿何处不相逢’，终于能拜见到昌洙兄了！”

柳仁茂又满面春风地看看春伯说：

“不管做什么事，总有一两次失败的，但是不能灰心，只要尽力而为之，终究会成功的。”

由此可见他们渴望见到我的心情了。

我对柳仁茂说：

“在江华金周卿府上已经知道先生为了找我到处奔波，今天有幸能亲自承教，不胜欣慰。恐怕关于我的传闻名不副实，先生听了误传，今天看了我这副样子，一定会感到失望吧，我自己也检讨了一下，真可说是虎头蛇尾哩。惭愧惭愧！”

柳君莞尔而笑道：

“不过只要抓住了蛇尾，还是会找到虎头的啊！”

说完之后，大家都笑了。

主人朴台秉和柳仁茂是连襟，在朴进士家吃完晚饭，便到城内柳仁茂寓所，歇在他家。此后休息了几天，有时候也上上馆子，有时到各处游览一番。一天，柳仁茂交给我一封信和路费，告诉我到忠清南道连山桃林里李天敬处去。李天敬欣然地迎接我，每天杀鸡买肉，以佳肴款待，茶余饭后，闲谈聊天，过了一个月舒服的日子，又给我



一封信和路费，送我到全罗道茂朱邑经营参场的李时发家中，在李家住了一天，又拿了李时发的介绍信去找知礼郡川谷的成泰英。由于成泰英的祖父曾做过原州牧使，所以他们宅第称为“成原州宅”。进了大门，门房和下房里有几十个仆人，来的客人都有贵族的风度。成泰英看过信后，热诚地欢迎我，把我视为上宾。这样一来，仆人们也对我十分尊重。成泰英字能河，号一舟，在他家期间，常陪我去爬山、采野菜，有时候也到溪边观鱼，有时则在灯下高谈阔论，生活倒也逍遥自在，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个多月。

有一天柳仁茂来了，很高兴又见到他，跟他在成泰英家住宿一晚，翌日早晨一起到茂朱柳仁茂家，自此我就在这里长住下来。柳仁茂认为我用金昌洙的本名很不方便，由他和成泰英替我更改名号，名金龟，字莲上，号莲下。

柳仁茂的大女儿已经出嫁，是李忠求的侄媳。有汉卿等两个儿子。茂朱郡守李倬是他的远亲。

柳仁茂给我说明为什么要我各处走动的用意：李天敬也好，成泰英也好，都是柳仁茂的同志，要成为他们的同志，必须在各家住上一个月，他们好借此多多接触，观察此人的个性，如果适合作官，以后就多方周旋，让他作官，适合于经商或务农的话，就让他经商或务农。这是他们的规矩，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试验我的。因为我学识浅薄，还需进修，准备委托京城方面的同志，助我成才。为了提高我的庶民门第，还把连山李天敬的产业交给我父母，让他们住在那里，和邻居几家大姓交往，想办法使我家也跻入两班之列。他让我在回家省亲时，于二月把父母接到汉城，由汉城到连山的旅费行装，由他直接筹划。他又说我应去京城上学。

于是他和我同行，前往汉城。考虑到去金卿得家诸多不便，便秘密地拜访了江华长串朱进士家。

朱进士交给柳君白铜钱四千两，我把这些钱缠在腰间做旅费，来到汉城。

朱进士的住处靠近海边，虽然已是农历十一月了，但树上还是结满柿子，鱼产也丰富。在那里接受了好几天的款待，我便将旅费贴身藏妥，踏上回乡之路。

我走的是陆路，当时尚未铺设铁路。出发前一天，忽然得了一梦，梦见父亲叫我写“黄泉”两字，我就和柳仁茂谈起：去年春天，父亲患病，稍好转后，我便离家来汉城买了些汤药补剂邮寄回去，但一直放不下心，如今晚上竟做了这种恶梦，所以一天也不能迟延，次日一早就起程。时值阴历十一月，我很快到达松都，四天后经过海州邑飞洞，拜见了高先生。先生家在山中腰，房子不大。四五年不见，他虽未见苍老，但不戴老花镜也就不能看书了。

我见了高先生，刚坐下讲了两三句话，客舍的里门开了，进来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

“啊呀，这不是姐夫吗？”

一看原来是元明的小女儿。我住清溪洞时，每到高先生家的客舍，她总是缠着我，要我背她。开始高先生还骂她，及至元明的长女和我订了婚约后，高先生不但不再责骂，还让她叫我姐夫。小姑娘听了此话，更是肆无忌惮地缠住我，跟我撒娇耍赖。我心里是很喜欢她的，加上她没有父母，在叔母的抚养下长大，所以又有些可怜她。

但是现在我听到“姐夫”这个称呼，心里总感到很不自在。高先生看到这一光景，大概也是无限感慨，他默默无言，只是坐在那儿盯着墙看。我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是面带笑容，目不转睛地紧瞅着小姑娘。

自打他孙女跟我解除婚约后，高先生回到家中，寡居的二儿媳就总缠着他跟他吵，一会儿说跟某某家成婚吧；一会儿说某某家子弟很有学问，门第相当，家里又富裕，就嫁到他家去吧；又说金昌洙是个平民，家里一贫如洗，而且跟他以前有婚约的那家又是那样凶恶，要是真嫁给金昌洙，家门就会遭到不幸。一气之下，高先生当即就把长孙女许配给了清溪洞农家金士集的儿子为妻。此时高先生和

我相对而坐，沉默不语，各自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

过了一会，高先生又说：

“我听到了你的杀倭义举，十分敬佩，觉得你正是我所期望的男儿。我也把你的事告诉了柳毅庵<sup>①</sup>先生，先生在他所著的《昭义新编》续篇中，曾赞扬你为义勇男儿。你去仁川后，毅庵义兵失败，到了平山。我们相遇，一起商讨将来的大计。我把你从西间岛<sup>②</sup>考察回来的报告给他看了，并说从目前形势来看，我们在两西<sup>③</sup>已无立足之地，应迅速渡过鸭绿江，选择适当地区，以图将来大业，方为上策。毅庵也表示赞同。于是我们同去勘察你说过的地方，毅庵在那里供奉起孔子圣像，以激发众人的慕圣之心，又招募内地的从军武士，现正在训练之中。你速去先生那里，共谋未来大计，你意如何？”

我向高先生畅谈了这些年来我所醒悟到的一些事情，并坦率陈述我的新思想，指出他“尊中华、攘夷狄”的主张已经陈旧，也不应该把蓝眼睛高鼻子一律斥之为夷狄。我说：

“不管哪个国家，都要首先看其经国大纲，如其言行确似夷狄，则视之为夷狄之邦，反之，则应奉为正统。我国贪官污吏虽披着人皮，但其言行，如同禽兽，而今之国君，卖官鬻爵，这些才应视为夷狄。在自己的国家里都排斥不了夷狄，又怎能称大洋彼岸的国家为夷狄呢？那些国家，连孔孟的影子都未曾见过，可是他们的国家制度远在孔孟法度之上，文化也很发达，怎能一味地视为夷狄而加以排斥呢？”

我力陈反对意见后，最后说道：

“依我之愚见，该向夷狄学习的东西很多，而孔孟之道中该摒弃的也不少。”

---

① 柳麟锡，号毅庵，近代著名反日义兵将领。一九一〇年日本吞并朝鲜后，领导义兵继续从事反日斗争。一九一五年病逝于中国东北宽甸。——译注

② 指我国东北长白山一带。——译注

③ 指黄海道、平安道。——译注

高先生说：

“你是否和开化派过往甚密？我也见过几个开化派人士，他们的主张和你所说的完全一样。”

我又问先生的意见：

“那么依先生之见，将来之国家大计又应如何呢？望先生不吝赐教。”

“非先王之法勿言，非先王之道勿论，否则，皆将成为披发左衽之夷狄……”

“先生您说披发左衽，发是血之余，血是饮食消化后之精液，不进饮食，头发是长不出来的。即便是长发千丈，头上梳起又高又大的髻，倭寇和洋鬼子见了也不会害怕；我们峨冠博带，洋鬼子和倭寇也不会为之屈膝，顶礼膜拜。如今，专攻学问道德的上流人士欺凌人民，是最好的刀斧手，而无辜者则多为目不识丁之辈，人们趋利如鹜，冷酷无情，根本不懂自己的权利义务是什么，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欺凌，还以为理所当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如以同样手段来对待倭寇和洋鬼子，则倭、洋均皆灭种，自己则可号令天下。可是他们则不然，榨取了人民的膏血，献于倭、洋，竭尽阿谀之能事，却充当刀斧手，残害百姓，并为此而洋洋自得，长此以往，国家必亡。我们应学习世界上文化先进的国家，仿效其教育制度，开办学校，教育全体人民的子弟，培养健康的第二代。要召集爱国有识之士，向全国人民宣传，使之懂得亡国之苦、兴国之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才是救亡之道。”

“这是叛国逆臣朴泳孝、徐光范<sup>①</sup>之流的主张，你竟然也这么说！世上无永世长存之国，也无长生不老之人，天欲亡我，又将奈何？向倭贼洋人学习救亡之道，失节弃义，死后又有何脸面见我先王，对我祖宗？”

---

<sup>①</sup> 均为近代开化派重要人物，曾于一八八四年发动甲申政变，政变失败后，亡命日本，后沦为亲日派。——译注

我们话不投机，意见相左，高先生府上无一是舶来品，连洋火都不用一根，真是精神可嘉。

陪同高先生休息一晚，第二天告别后，不意竟成永诀。后来听说高先生逝世于忠清道堤川的某一亲戚之家。呜呼哀哉！回想起这件事已相隔三十多年了。我的为人处事，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取之处，也都是在清溪洞时受到先生教诲熏陶的结果，他对我一生影响极大，现在在这世界上永远不能再见到他可亲可敬、慈祥和蔼的音容笑貌，受到他圣洁亲切的抚爱了。呜呼痛哉！

# 12

## 入基督教

我向高先生辞别后,当天即抵达基洞家门,已是黄昏时分。进到里边院子的时候,母亲从厨房中出来说:

“唉呀!你可回来了,你父亲的病已经很重了,刚才你父亲还说,这孩子既然已经回来了为什么不进来,为什么站在院子里,我还以为是梦吃呢。啊!你真的回来了。”

我急忙进去请安,父亲虽然高兴,但病情危在旦夕。十四天来,他枕着我的膝盖,我虽尽力看护,侍奉汤药,但终因医药罔效,庚子年十二月九日,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渐渐松开了,离开我们去了遥远的天国。本来这次回家的目的,是承柳仁茂、成泰英等的好意,接父母到连山去,以略尽人子之道,奉养天年,免受姜、李二姓的欺侮,詎料竟遽尔撒手西归,实千古之遗恨。

由于我家居于穷乡僻壤的山村,加之家境贫寒,所以无力延请名医,我又想起祖母去世之时,父亲曾有断指之情,今我也想以断指来挽留父亲的生命,但又怕母亲看到断指而更为伤心,乘母亲不在身边之际,割了一块左腿上的肉,烤了给父亲吃,又把流出来的血滴入父亲的嘴里,但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大概分量太少之故。我想再割一块更大的肉,但引刀刺股痛极而罢。我想这种断指或割肉享

亲，只有孝子才能做到，而不孝如我却做不到，因而自叹自怨，唯有独自服丧，在院中孝堂接待宾客，终日忙碌，腿部剧痛，加上寒风刺骨，痛苦不堪，又不能和母亲言明，因此我甚至后悔割了腿肉。

给柳仁茂和成泰英寄出讣告，并禀告不再搬家，因柳仁茂不在汉城，成泰英独自骑马赶了五百里路程来吊丧。

送走人马后，成君在此休息了几天。为了送成君去游览九月山，我让他骑驴去拜访了故友月精洞宋钟瑞家，又请岳山郑德铉杀鸡为黍，款待于他。成君游览了白岳胜景后，踏上了归途。

父亲安葬在基洞右侧山麓。我在守丧期间，杜门不出，帮四叔俊永耕种，叔父甚为嘉许，他老人家筹措二百两钱，命我跟邻居某平民家的女儿结婚，我固辞不允，并说如果要花钱才结得了婚的话，别说平民家的女儿，即使是宰相的女儿我也不要。叔父本以为兄长已经去世，替侄儿作主完婚，是他的义务，是他的光荣。见我拒绝，遂勃然大怒，抓起一把镰刀向我扑来，母亲见势不妙，转身阻挡，我才得以从容躲避。

壬寅年正月，到长渊一位远亲家去拜年，我跟远房祖母说起，我已年近三十，不知是否还会有人肯把女儿嫁给我，即使有，也不知能否中我的意。我祖母笑着问我要娶什么样的姑娘，我说要符合三个条件，就是不谈金钱；新娘要有学问；要对面相谈，彼此中意。祖母说前两个条件没有问题，第三个条件有些困难。我问是哪家的姑娘，祖母说：

“是我娘家外侄女，今年十七岁，侍奉寡母在家，学过国文，也不计较钱财，听我姐姐说只要有合适的男人，便可许婚，但也不知要什么样的男人。我可先去谈谈，但你要直接见面，恐怕不成。”

我说：

“如果那样，就不配跟我成婚。”

祖母说：

“我也曾跟我姐姐谈起过你，她拜托我带你去她家看看，我带你

去如何？”

“您让我去，我今天就去。”

于是祖母带我去那位姑娘的家里。她家寡母年老，膝下无子，有四个姐妹，姐姐们都已出嫁，仅剩下最小女儿如玉，她已学过国文，也会女红，他们住的房子实在小得可怜。

我在里屋独坐，他们三个人在厨房密谈一阵后，祖母单刀直入地跟我说：

“按你的要求其他都可以，只是闺中少女怎能见陌生男子，我担保不是残废，就免了对面相谈吧。”

我坚决要见面，并说如有许婚之意，我还有一个条件。

祖母笑着说：

“还有什么条件？听听看。”

我说：“即使现在订婚，也要等我服丧一年后，才能成婚。在此期间，可拜我为师，我教她汉文。”

“成婚后，你教她读书，还是干什么，还不随你的便。”

“有什么必要要空守一年呢？”老寡母和祖母笑着说完后，把姑娘叫了出来。

见礼毕，她坐在母亲身后，仍然哑口无言，我问她愿不愿与我结婚，她没有回答，我又问：

“因为我现正在守丧期间，须待服丧一年后，才可举行婚礼，在这段期间，可否拜我为师教你读书？”

我还跟两位老人说现在世上女子无才，也不能为社会所容。女子学习，以二十岁以前最为合适，虚度一年时光，实在可惜。我仍没有听到小姐的声音，但据祖母和小姐的母亲说，如玉已答应过这么做的，这样我就和她订了婚。

回家后我把订婚的经过一一说出，俊永叔硬是不肯相信，要我母亲亲自去看了回来告诉他，他这才无话可说。

“世界上也真有这么认真的人呢？”叔父挖苦我，喃喃自语地说道。



我编了一卷女子读本,还准备了笔、墨、纸,一有空,我就去教我的未婚妻。

但是也不能只是在她家教书,还得照料家里的事情,我还决心在服丧期满后从事教育,为此到处奔波,寻访了文化的禹钟瑞牧师和宋钟镐,长连的张义泽、吴寅炯、郑昌极等人,同他们商议兴办新教育的事宜,一有空闲,则去未婚妻家教她念书。

我还拜访了金先生。他本名孙景夏,元山人,和朴泳孝是同志,去日本多年,回国后,政府下令逮捕他,他于是亡命到九月山,在禹钟瑞、宋钟镐的庇护下隐藏了下来。日后,朴泳孝回国,他又改名为孙泳坤,成了实力派人物。

张义泽是长连的士族,学识丰富,有志于新学,可谓海西第一。他把长子膺震送往汉城学习,后又送他到日本、美国留学。他觉悟到在国民中普及教育乃当务之急,遂致力于新教育,受到旧式两班的非难。

当时在平安道和黄海道新学主要通过耶稣教会来传播,一些致力于发展新文化的人都入了耶稣教,他们是从西方传教士的口里听到门外之事的。信奉耶稣教的人大部分是中流社会以下的人物,实际学问并没有学到多少,只是在传教士连说带比画的宣传下,才信仰了耶稣教,并有了一些爱国思想。当时怀着爱国心从事新教育的人大多数是耶稣教信徒,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禹钟瑞是传道助理,和我是多年的挚友,竭力劝我信奉耶稣教,我也决心在服丧期满后信奉耶稣,奖励新学。

转眼间过了一年,癸卯年二月,父亲的丧期完了,母亲赶紧为我准备婚事。那年正月初,我又去茂山远房祖母家拜年,突然传来消息说如玉病危,我急忙跑去看她,如玉知道是我,勉强打起精神招呼我,可是因为伤寒过重,加上缺医少药,第三天就去世了。我亲自殓葬于南山,并把岳母迁往金洞金允五家,劝她信仰耶稣以度残生。在回家路上,遇见了闻讯赶来的母亲,我们一起回到家中。

同年二月，迁居于长连邑社稷洞，吴进士寅炯为了使我能安心从事公共事业，分给我一部分家产，有大约一亩半的农田，还有山林和果树。我从海州请来堂兄泰洙夫妇，请他们管理，我则在吴进士家大客房设立学校，教授吴进士的女儿信爱及儿子基秀、吴凤炯的两个儿子、吴勉炯的儿子和女儿、吴舜炯的两个女儿和其他几个孩子。房子中央，放了座屏风，以别男女。舜炯系寅炯的三弟，为人忠厚勤勉，笃信耶稣，热心教育。于是我们两人同心协力，教书传教。一年之内，教会兴盛，学校也逐渐扩展。当时曾使沉湎酒色的白南薰也信仰耶稣，当了凤阳学校的教员，我则成为公立学校的教员。

当时黄海道的公立学校，仅在海州与长连各有一所，而且海州的只虚有其名，教的仍旧是四书五经，真正挂着黑板教算术、地理、历史等新学问的只有长连公校。该校建立之初，教员是许坤，此后张义泽、林国永和我也当了该校教员。

夏天，在平壤举办师范讲习班，各地教会学校的教职员都去进修，我也参加了，住在邦牧师基昌家中，遇见了崔光玉，他是崇实中学的学生，又以教育家、爱国家而闻名，跟我意气颇为相投。崔光玉知道我还是个单身汉，就劝我跟新女性安信浩结婚，崔光玉介绍她是安岛山安昌浩的妹妹，年纪二十多岁，性情极活泼，为当时新女性中之佼佼者。

我在安岛山的岳父李锡宽先生宅内，跟安信浩第一次见面，同座的有主人李锡宽和崔光玉，一起晤谈之后，我走向宿舍，崔光玉在后面赶来，告诉我安信浩已经答应了，并让我在明天订婚后回家乡。殊不料翌日一早，李锡宽、崔光玉亲自赶来通知，说是喜事已成泡影，原因是安岛山从前在渡美途中，遇到上海某中学肄业的梁柱三，曾经和他提起信浩的婚事，并商定待梁柱三毕业后再决定，他们互相也通过信，不料昨天和我订婚以后，忽然收到梁的来信说是已将学成返国，来信要求许婚，信浩接到信后整整烦恼了一夜，两者之间难作取舍，于是毅然一并拒绝，决定与同村青梅竹马的金圣泽结

婚。不久，信浩亲自登门道歉，并且表示愿意以兄妹相称，我却对她的果断至为佩服。事情既已过去，我又回到长连，继续致力于教育和传教。

有一次郡守尹龟荣给我发来请帖，说是当今政府奖励养蚕，为此已发公文，让去海州领取桑苗，在各郡种植，而我负责此事，最为合适，要我去海州领取桑苗。此乃荣誉职务，郡内土著两班，争相谋取此职。经首吏郑昌极推荐，郡守命我负责处理。此事有关国计民生，我便欣然允诺。我领了二百两旅费，步行前往海州。

在海州已特派来了农商工部主事，为各郡分配桑苗。可是我见苗树都已枯萎，不能种植，便不准备领取，主事因而大怒，斥责我故意违反上面命令，我也大为光火，说要追究树苗枯干的责任，向观察部报告。主事怕把事情闹大，于是恳求我自己任意挑选，我便挑选了几千株活苗，用马驮运回来。

旅费一共用去七十两，余下一百三十两悉数交还郑昌极，并仔细开列账目，如草鞋一双价多少，冷面一碗所费若干，连同余款交给郑昌极时，他看了大为惊叹道：

“政府官吏都像先生一样的话，将解民于倒悬，而国事必大有可为。此事若交给别人去办，至少也会要求再加几百两！”

郑昌极确实是一位廉吏，除了分内应得之外，分毫不取，因之郡守也不敢贪赃枉法。当时全州吏属，以贱役之名，行宰相之权，可谓全国第一，各道吏属，也都狐假虎威，依靠两班的支持，榨取百姓的膏血，像郑昌极这样廉洁的官吏，可谓凤毛麟角，实为可贵。

稍后，农部发下种桑委员的任命状，消息传开后，下司以及老百姓见我经过时都忙不迭藏起烟管，哈腰肃立一旁，以表敬意。

然而这时由于吴进士和堂兄之死，使我非离开住了两年的社稷洞不可了。吴进士经营渔船两年荡尽家产一病不起，我不得不将社稷洞的家产还给他的遗属；帮我管家的堂兄泰洙本来目不识丁，跟我来到此地后，也信奉了耶稣教，不仅能通国文，读宗教书籍，甚至

能站在讲台上讲道。不幸在上教堂作礼拜的路上,因脑溢血而突然去世,我把堂嫂送回娘家,许其改嫁,我则陪母亲迁往邑内。

在社稷洞期间,柳仁茂和朱润镐曾前来看我。他们跟以前北间岛<sup>①</sup>管理使徐相茂通力合作,这次回国是为了跟国内同志共商大计,然后再回北间岛。他们在我家住了几天,母亲为他们煮栗子、炖鸡汤,竭诚款待,我们三人连日来通宵达旦,一边吃一面谈论国家大事,共叙衷肠。

耕云(当时柳君所用之别名,在间岛则名白樵)说,金周卿自离开江华后,十余年来一直在做毛笔生意,积蓄了数万元,客死于延安<sup>②</sup>,遗产全被所寄宿的酒店店主吞没,其子去找店主打官司,也徒劳而返。我们认为,金周卿不给父母亲友知道,秘密行商,赚这么多钱,必定是想有什么作为的,现在人死财空,他是什么抱负,就不得而知了。周卿令弟镇卿也客死于全罗道,家境更惨,我听了唏嘘不已。

这时我的婚姻问题又被提了出来。信川谢平洞耶稣教会执事长梁圣则把教会的女生崔遵礼介绍给我。崔遵礼是谢平洞医生申昌熙的妻妹。遵礼之母金夫人系汉城出生,早年寡居,悉心养育两个女儿,他们都信奉耶稣教,母亲当年在临时设在铜岬的“济众院”内帮佣。长女嫁给当时院内的医生申昌熙,后来他在信川谢平开业,于是金夫人便带着八岁的遵礼移居到信川女婿家。后来遵礼的母亲把她许配给邻村青年姜圣谟,但是遵礼本人长大成人后并不愿意。

当时十八岁的遵礼是主张婚姻自由的,美国传教士韩卫廉、君芮彬两位出面斡旋,劝遵礼嫁给姜圣谟,遵礼坚决拒绝了。我也痛感当时早婚所产生的各种弊端,因此十分同情遵礼。去谢平洞面见了遵礼后,便决定与遵礼举行婚礼。姜圣谟向传教士告发了此事,教会劝我中止婚约,亲友中也有不少人劝我不要跟遵礼结婚,我并未同

---

① 指我国延边地区。——译注

② 在黄海道延白郡。——译注

意。申昌熙带领遵礼到社稷洞我的家中来定了婚约,然后,又送她到汉城敬信学校去读书,我和遵礼因反对教会受到严厉的处分,我不服而提出抗议,指责教会承认旧式早婚,无视个人自由,助长社会坏风气。结果,君芮彬牧师终于替我们证婚,也获得教会的谅解,取消了处分。至此,我才算是有了家室的人。

# 13

## 献身新教育事业

由于乙巳新约的缔结，韩国从此失去了独立主权，而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于是全国的志士和遁居四方的学者们，纷纷在京畿、忠清、庆尚、黄海、江原诸道掀起了义兵的斗争，前仆后继，此伏彼起。许芳、李康年、崔益铉、延康羽、洪范图、李范九、姜基同、闵肯镐、柳麟锡、李震龙、禹东善等皆为义兵大将，个个雄踞一方，他们怀着满腔的义愤，但是缺乏军事知识，终于各处都失败了。

这时我以镇南浦懿法青年会总务身份，作为该会代表，出席京城大会，大会在尚洞教会内召开，表面上虽然是讨论教会事业的发展，但实际上纯粹是爱国运动的会议。如果说以前起义的山林学者是旧思想的爱国运动者的话，那么我们耶稣教信徒可以说是新思想的爱国运动者。

那时聚集在尚洞的人物有全德基、郑淳万、李俊、李东宁、崔在学、桂明陆、金仁戢、玉观彬、李承吉、车炳修、申尚敏、金泰渊、表永珏、曹成焕、徐相八、李恒植、李喜侃、奇山涛、全炳宪（今名王三德）、柳斗焕、金基弘和我——金龟。

会议结果决定上疏，第一次疏文由李俊执笔，而由崔在学领衔，再加四人签名，共五名市民代表联名。如果失败，则再继续请愿。去

上疏之前,我们这一批人由郑淳万主持,聚集在尚洞教会,作宁死不屈的盟誓祈祷,然后全体赶到大汉门前,由在疏文上签名的五位,在宫阙门前开了形式上的会议,通过了上疏的决议,其实疏状早就通过别监(官名)呈递给皇上了。

这时忽然跑来了日本警察队,强迫我们解散,我们抗议说这是干涉我们的内政。霎时间刀光剑影,五位志士赤手空拳跟他们展开搏斗,我们护卫着他们,高声怒吼。我们一方面反抗,一方面以誓死抵抗的精神发表激烈的演说,谓日人侵犯了我国的主权,强迫缔结把我们人民视为奴隶的条约,此时群情激愤。结果日本警察队抓走了在疏状上签名的五位志士,把他们押往警务厅。

我们亲眼看到五位志士被抓走,因此我们聚集在钟路,开始作街头演说。在那里日本警察拔出了佩刀,想要驱散群众。当时恰巧有一家水产批发店遭了火灾,现场瓦砾成堆,我们就投掷碎瓦片和日本警察交战,日本警察寡不敌众,退到了一家中国人开设的店铺,作为掩护,向我们开枪射击,我们也向那个店铺雨点般地投掷瓦片。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开到,冲散了街头的群众,他们见人就捆,被抓去的约有几十名之多。

这天得到闵泳焕自杀的消息,我和几位同志到闵家去吊唁,归途中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约有四十岁左右,头上梳着发髻的男人,白绢上衣血迹斑斑,坐在人力车上大哭大叫,被几个人前呼后拥地拉走。我打听了一下是谁,人群中有人回答说是自杀未遂的参赞李相禹。他也是因见国势日衰,义愤填膺而萌发了自杀的念头。

当初,尚洞会议的想法是,请愿不论失败几次都要再接再厉继续下去,但如此做的话,崔在学等人就会被处死,如果现在停止,可能训诫一番便被释放,这样问题就不会变得更严重。而且不管形势怎么紧迫,如果民众不觉醒,认识不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么干什么事都不会收到实效。换句话说,如果不唤醒知识浅薄,爱国心淡薄的国民的爱国意识,使之认识到国家就是自己的家,日寇是要夺

取我们的生命财产,把我们的子孙变为他们的奴隶,那么任何力量也无法挽救这个国家。因此我们的同志分散到全国各地,鼓吹爱国思想,实施新教育。我也下到黄海道文化草里面当了钟山私立西明义塾的老师,教授农村儿童。

我是应禹钟瑞老师的邀请,从长连来到钟山的。翌年,我又迁到安岳。这是因为西明义塾设在山村,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加上安岳的金庸济等几位知己的邀请,所以就转到安岳任新设的私立杨山学校的教员。

在西明义塾任教时,义兵将领禹东善在相距约有十里的内洞布阵,遭到倭寇的夜袭,在达泉附近损失惨重,有十七名义兵陈尸于内洞村口的路上。听到这一消息时,恰有三名日兵携枪进了钟山洞。鬼子们把洞长叫了出来,让他去每家索取鸡和鸡蛋。洞长胆战心惊地跑来找我,问怎么办才好。我和洞长一起去了他家,鬼子们已在抓鸡抢蛋。我很平静地问鬼子:“这是你们军队征收,还是购买?”

他们说是购买。我又问道:

“要买的话,你们应该去达泉市场,何必骚扰百姓?”

鬼子不回答我的问话,反问我道:

“你是文化郡郡守吗?”

“我是西明义塾的教师。”

其他鬼子趁我和这个鬼子谈话的时机,窜到旁边人家的院子里去抓鸡,吓得妇女孩子们哭喊连天。

我呵斥洞长道:

“你是一洞之长,强盗到各家行劫,你却袖手旁观?”

这时,和我谈话的那个鬼子吹起了哨子,窜到别家的鬼子手提着两三只鸡跑了进来。他们嘀咕了一阵子,放下了抢来的鸡,向村外跑去。但是听说去到别的村子的鬼子都把鸡抢跑了。钟山洞的村民怕由此惹出祸端,我安慰他们说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从钟山搬到安岳是己酉年正月十八日,初生的大女儿,经不起



凛冽的北风吹袭，一到安岳就夭折了。

安岳郡当时有十余名同志。金庸济、金庸震、金鸿亮、李始馥、李相晋、崔在源、张允根、金钟元、崔明植、金亨钟、金基莹、表致贞、张明善、车承用、韩弼浩、廉道善、田承根、咸德熙、元仁常、元贞溥、宋永瑞、宋钟瑞、金庸升、金庸鼎、韩应祚等都是中青年，金孝英、李仁培、崔龙化、朴南秉、朴道秉、宋汉益等前辈则是郡内的中坚人物。他们痛感实施新教育的必要，金鸿亮、崔在源等几名青年到汉城、日本去上学，几位前辈则致力于发展教育，在村镇由耶稣教会首先设立了安新学校，继而又开办了私立杨山学校。此后又相继建立了公立普通学校、东仓培英学校、龙顺维新学校。但是这些新设的学校都缺乏具有新知识的教员，因此特地从平壤延聘当时知名教育家崔光玉先生到安岳杨山学校来，举行夏季示范讲习会。黄海、平安两道从事教育的人士，甚至农村的私塾老师们亦以讲习生的身份参加，就是远在京畿、忠清等地方的也有人到会，所以讲习生多达四百余名。讲师有金鸿亮、李始馥、李相晋、韩弼浩、李宝庆、金洛英、崔在源等人；女讲师有金乐姬、方信荣等人，在讲习生中亦有像姜九峰、朴慧明等出家的和尚。

朴慧明是以前提到过的在麻谷寺时之师兄，自从年前在汉城和他分手之后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在这次的讲习会中竟意外地重逢，倍觉心喜。当时他是九月山贝叶寺的住持，我请他到杨山学校的办公室，以我兄长的身份介绍和大家认识。

从慧明那里得到我的恩师宝镜堂、荷隐堂两位的噩耗。他们买了一小桶石油，为了检验其质量，把烧着的木棍放进石油桶里，引起了石油桶的爆炸，连带抱凤堂俱被炸死。慧明为了处理他们留下来的遗产，在金刚山四处寻找我的住所，然而却不见我的踪迹，最后将全部遗产托付给寺院保管。

在此我又不得不提一下载于后面年逾七旬的金孝英先生。先生是金鸿亮的祖父，据说他年轻时学习汉学，后因家境贫困而经商，买

了黄海道所产的棉布，跑单帮到平安道江界、楚山等乡镇去贩卖，因而赚了点钱，是个以节俭致富的人。他身材魁梧，容貌不俗，但是岁月的担子把他的腰杆压得弯成了一把镰刀，出入场院，总是拄着拐棍。虽然是旧式人物，但头脑清晰，能洞察时势，即使是当时的新进青年，也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提并论。先生很早就明白新教育的重要性，所以送他的长孙鸿亮渡海到日本求学。

有一次郡里新开办了安新学校，但经费困难，他悄然以无名氏的名义捐赠百石稻谷，后来才知道，就是他的亲子侄辈当时也不知道他的这种善举。先生好酒，爱下围棋，常在自家客舍饮酒弈棋，以享晚年。

先生的棋友中有一位名叫姜景熙的，是海州西村人，他的本家就是我家乡的砧山姜氏，世代巨富。他年轻时放荡不羁，败光了家产，有一天我去金家客舍向先生问安，因为想到他是看我长大的老人，虽然他家是两班，曾欺凌过我祖先，但念在他和我父亲是旧交，所以也向他请了安。此后又过了几天，侍奉他们的庸震君把姜老和他父亲下棋时吵架的事告诉我听：

“姜老跟父亲说：‘老兄八字真好，家产万贯，子孙满堂，而且都能恪尽孝道。’父亲一听此话，怒气冲天，把棋盘扔向门外，大声呵斥姜老说：‘你这话决不是对我的恭维。几天后，我这七十老人也将被编入倭寇的奴籍，真是时运不济，怎能说我的八字好呢？’

自此以后，作为子侄辈，总觉得愧对姜老，今早凑足了路费，给了姜老，让他回乡去了。”

先生如此忧虑国事，我听了不禁热泪盈眶。

我和他子侄是同辈，无论是学识人品，都没有资格受到先生敬重，然而他老人家却定期来到我门前问候：“老师好吗？”这当然是因为我身负教育第二代的重任，所以才如此尊敬我。不仅对我，他对所有爱国者都是如此。

我在长连时，曾去海州故里扫墓。那时我告诉俊永叔父，我们堂

兄弟在长连团聚一处，堂兄在家从事农业，照料家务，我则从事教育，一家人生活安定，和睦相处。叔父十分惊讶，他问：

“像你这样不务正业的人，谁会帮助你成家立业啊？”

我笑着回答说：

“我这样不务正业，在叔父看来是十分危险，可是也有人并不认为我是不务正业啊。”

叔父又问道：

“你是空手一人离家出走的，这以后，你堂兄、你堂姐夫一家子也都随你而去，你们还同居一处，究竟是靠什么生活啊？”

我把家人生活的状况一一向他作了介绍，并说：

“郡里有我几个朋友，是他们让我搬到那儿去住的。好友中有位吴进士，名叫寅炯，是当地首富吴景胜进士之长孙，他拥有一大笔遗产，生活还不错。他给了我价值千两的房屋、田地和园林，把我们安顿下来。寅炯君还给我们买了一头耕牛，家里所用的一应什物也都是向他家借的。”

叔父听了感叹不已：

“想不到世上还有如此厚道的人！”

叔父心里也可能怀疑我是否是靠诈骗过活。这也难怪，平常我们叔侄就不是亲密无间的。附近就有些富豪子弟向日本人借钱，借用百两，日本人却在借据上写了千两，索债时非要千两不可，要是举债人家产不够，就向他族人讨要。这类事叔父也见到不少。所以他以为我去汉城和三南也是借用了日本人的钱，只要我一说去哪儿，他总是大吵大闹。因此我外出时也就悄悄地离开，不辞而别。

那年秋天，叔父来到长连，他看到社稷洞不仅房子好，而且秋收的谷物也比自己家多，感到十分惊奇。他还去访问了吴进士。他把他在哪儿亲眼所见告诉了我母亲，并说：

“真想不到人家会如此敬重侄儿。”

此后叔父解开了心中的疙瘩，也钟爱起我来。

迁居到安岳后,在教学之余,休假时也回到家乡去扫墓。我已多年未回自幼在那儿学习玩耍的故乡了,这次回来一看,真是感慨无量。故乡已经有了巨大变迁,幼年时期爱抚过我的长辈们,大部分都已去世,昔日的童稚游伴如今俱已长大成人。我也曾冷眼观察在长成的青年中有无可可用之材,令人悲痛的是他们在外表上精神上都是十足的“平民”,他们根本不知民族为何物,纯粹是消耗粮食的蛀虫,和年轻人一谈起新教育,他们以为新学就是耶稣教或天主教。

我也去探访了邻村两班姜进士家。对这些两班我还是和过去一样,该行礼的行礼,该打招呼的打招呼。但这些过去曾骄横无礼的两班都嗫嚅不安,似乎不敢接受我的恭敬。想来可能是姜景熙老人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故乡的家人。去年姜景熙老人和安岳金孝英先生下棋时,看到他对我甚是器重,我去时他总是起立相迎,加上杨山学校教授四五百名师范生时也是由我出头周旋。家乡的两班们知道了这些情况,才表现出这样的态度。

但无论如何,两班的势力确实是衰退了。看到堂堂的两班们在我这一介草民面前如此拘谨局促,我也觉得他们实在可怜。

两班曾是国内的中坚势力,他们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国家一亡,现在成了这副模样。要是两班重新得势,能使国家获得独立,我宁愿忍气吞声,受两班的欺凌。我曾向姜成春询问救国之道,他谨慎地回答说亡国之责,在于当局,跟自己这样的村民毫无关系。他原本是两班,现在只能成为新的平民,和我们家这样的平民并无不同的气势,始终在浑浑噩噩中过活。我也劝导他让其子弟去接受新的教育,然而他怕子女剪短发而不愿送进学校。我力陈教育之目的不在于剪短发,而是要培养人才,使之成为健全的公民之一员,将来为国家的强盛而奋斗,使祖国屹立于世界之林;他以为新学就是天主教,说自己家门已有人入了耶稣教,回避进一步深谈。

可悲可叹啊,海州西村的两班们!你们素以忠臣的子孙、功臣的子孙自居,视平民为牛马、奴隶,这种气焰今又何在?

可悲可叹啊,海州西村的平民们!你们经历了漫长的五百年岁月,从不敢在两班面前舒坦地抽一口烟,大声地咳嗽一声,现在有了当新式两班的机会,而你们又在干什么呢?

旧两班只要忠于国君一人,其子子孙孙就可享受其恩泽,新两班则要忠于三千里江山、两千万人民,为自己的子孙和两千万民众的子孙造福千秋万代。这样的新两班是多么伟大!我回到故乡,曾邀集乡人,放映我带回来的幻灯片,当时我向他们大声疾呼:

“平民和两班都应该觉醒了!我们要为三千里锦绣江山和亲爱的两千万同胞竭尽忠诚!”

结束在安岳的夏季示范讲习会后,扩大了杨山学校,设立了中学部与小学部,由金鸿亮出任校长,我和崔光玉等教育家组织了海西教育总会,我担任该会的学务总监。我的任务是如何在黄海道内增建学校与如何经营管理。我负着这项使命出发,巡回视察道内各郡。有一次我接受白川郡守全凤薰的邀请去访问,还未到达白川镇外的五里亭时,全郡守已命各乡镇的绅士和头面人物等候路旁,当我到达时,郡守领头高呼:

“金龟先生万岁!”

居民们随即一齐高呼,弄得我惊慌失措,连忙以手堵住郡守的口,告诉他说,这是种造反行为,千万使不得。因为古法上明文记载“万岁”只有对皇帝才可以称呼,即使是太子也只不过称呼“千岁”而已,怎能对一介平民欢呼“万岁”?

但是郡守一面笑着,一面握着我的手说:“现在是开明时代,欢呼万岁已成通例,就是对朋友的迎送也可以欢呼万岁,请你不必担心,向出迎的各位答礼吧。”在白川郡里我下榻在郡守的私宅里,和各乡镇有志之士一起商讨教育设施的方针问题。

全凤薰本来作为载宁官衙的衙吏,在海州任总巡多年,对教育有不少贡献。据说他设立海州正内学校,命令各地方的童仆一律进夜校读书,否则主人要受处罚,因此该区域内教育发达,全总巡贡献

的力量最大。后来他迁任白川郡守，积极在郡内增设各种教育设施。他的独子早死，只有一个五六岁名叫武吉的孙儿。

全郡守是个很有骨气的人，别的郡县都将县府移交给日本守备队宪兵队，然而他却据理力争，强硬地拒绝，仍坚守着县府。因此，日本人把他看成眼中钉，经常给他出难题，找麻烦。尽管如此，全凤薰并不把郡守看作是虚职，而是利用其职权，致力于教育，他聘请崔光玉设立师范讲习所，在各地举办演讲会，向民众鼓吹爱国。崔光玉在白川邑演讲中，在讲台上吐血而亡。远近地方的人士敬佩他的热诚和苦心，哀悼这位青年志士中途夭亡，临时在白川邑南山上学校运动场侧举办了葬仪。黄海道、平安道两西地方人士，仰慕其功绩，惋惜其才华，为表示敬意，计划在沙里院车站附近建立墓地，在平壤车站附近树立一块比伊藤博文碑还大的纪念碑，因而邀请安泰国商讨立碑之事，然而不幸得很，由于韩日合并条约的关系此事未能实现。崔光玉的遗骨至今仍安葬在白川邑的南山上。

我离开白川，在载宁养元学校罗致隐居山林的饱学之士，告知以教育的重要性和我们的计划，又承长渊郡守的邀请，访问邑内和所属各面，他还给各面发布训令，指示他们要遵从我的教育方针。我在邑内举办了幻灯会，男女老少数千人与会，盛况空前。此后我又访问了荃泽、薪花等面。由于安岳学校有急事处理，遂踏上了归途。到达松禾水桥市时，应市内知名人士甘承武等几位志士的请求，在附近五六处召集各个小学，放映了幻灯。正打算离开时，由于松禾郡守成乐英的恳请，来到了好几年没来过的松禾邑，此地曾经是镇压海西义兵之要塞，因此邑内有日本守备队、宪兵队、警察署、邮政局等机关，官舍都被这些机关占领，郡守实际上只能借用私人住宅上班，我对此感到非常愤慨。

开幻灯会的时候，各面十多所学校、郡内有志之士，甚至妇女儿童都来参加，男女听众达数千名。郡守成乐英、税务署长具滋根等各官厅的官员、日本军官和警官多人均出席了此会。我先请了大皇帝

陛下的尊灵,安奉在讲台的正前方,要全体与会者一同起立鞠躬,当然与会的日本军官也不能例外,这样做了以后室内无形中增加了严肃的气氛。

我以《韩人为何排日》为题,作了一场演讲。我说,过去日清、日俄两次战事时,我们对日本是很信赖的,然而如今日本强迫我们缔结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激起了我们的愤慨。我又厉声斥责我年前在文化钟山亲眼所见的日军的掠夺行为,指出这就是我们排日的原因。我拍着桌子声色俱厉地演说,又环顾四周,只见成乐英、具滋根已吓得面如土色,日本人则怒气冲冲。他们召来警察命令解散幻灯会,我也被带到警察署去,此时群众敢怒而不敢言,个个神情激愤。我被抓去后,拘留在韩人监督警察值日室里。没有多久,学生慰问队川流不息地来看我,对我进行慰问。

翌日早上,从报纸上看到来自哈尔滨的消息说,伊藤博文被一个叫做安应七的韩人暗杀了。当日整天猜测,到底是谁?第二天又从新闻报道上看到,才知道他就是安重根,因此回忆起十几年前我在清溪洞见过射击术极高明的少年来。

开始我还奇怪,在幻灯会上责骂日寇,这种事情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松禾警察何必单单对我下手,现在我才明白,我被拘禁是由于安重根的关系。曾以为几天后就会释放,现在看来不可能很快被释放了。约莫过了一个月,日寇把我提去审问了几句后,就押送到海州地方法院,途经水桥市,在甘承武的家里吃午饭。这时候,市内学校的教职员们闻讯赶来,向押送的日警提出了请求,要求准许他们为身为教育界师表的我,举行一次慰劳宴,但是日警不准,只是说由海州归来时方可进行慰劳。

当日我被收押在海州监狱里,第二天被带到检查厅盘问我与安重根有无关系,我告诉了他们,我只和他父亲是世交,和安重根哈尔滨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检查官拿出了标有“金龟”名字的一百多页的行踪记录册,作为过去几年我在各地反对日本官宪的证据,这个那

个审问个不停,然而终因缺乏确凿的证据,判为不起诉,被释放了出来。

我带着行李,离开了监狱到朴昌镇的书店去,见到了朴君,在讲述事情经过时,一旁的柳熏永和我寒暄,并邀我参加了他父亲柳长湍的寿宴。宴会结束后,听说从松禾和日警一起护送我的韩人警察们,仍然留在海州,要知道我的结果方肯离去,因此我把他们全部请到酒店相聚,把经过讲了一遍,让他们回去。韩人警察只有乘着日警不注意时,才向我表示同情。

安岳的同志们挂念着我的事情,派了韩贞教到海州来,因此我访问了李承骏、金泳泽、梁洛畴等几位朋友后,就随韩贞教返回安岳。

当时杨山学校分中、小学两部,最初由李仁培当校长,以后由金鸿亮兼任校长。我回到安岳后,负责杨山学校小学部的幼年班,同时兼任载宁郡北栗面武尚洞保强学校的校长。此学校位于远离武尚洞的田野尽头,是一所由贫困的居民们合力建造的学校,后由附近各村有志之士出面维持。为了振兴学校,选我当了校长。主任教员是田承根。张德俊是一半当教员、一半当学生,和他的弟弟德秀同住在学校内,学监是许贞三。我们通力合作,管理学校。当时学校校舍是新建的,还未全部竣工,就开学了。

我做了保强学校的校长后,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学校里连续出现了三次鬼火,大家都说,由于建校舍时,砍倒学校旁边的古木来烧火,所以鬼才来放火,要防止这事的话,必须在府君堂上虔诚地设祭祷告才行。我命职员们夜晚守着,两天后终于逮住了放火的鬼。其实并非是鬼,而是村内一所书院的老师,他坦白说,由于学校建立了,书院渐渐被淘汰,他丢掉了饭碗,只能靠种地过活,因此很怨恨,才在学校里放火吓人。我并没有把他送到警察署,只是叫他离开了此镇。

从安岳到这个学校有二十里路,我一周到校一次。从安岳邑去



学校,必须在新换浦下游渡河。夏天,当我来到渡口时,学校的小学生都挤在对岸等候,教职员也跟在他们的身后。我一到渡口,对岸的小学生就脱光衣服,跳进河里。我大声惊呼,教职员们却站在岸边大笑,他们让我不必担心。我上了渡船,来到江心时,学生们一个个脑袋都露出水面,他们像蚂蚁般地攀附在船舷。我想将来招募海军,应到沿海村子来招。

此地虽然没有很富裕的人,但因都是宫田,土地肥沃,所以大家也都还过得去,并且乡民们都很开通,很会适应时代的变迁。他们一方面建立云水、进础、保强、基督等学校,教育子女,另一方面组织农务会,谋求农业的改良和发展,他们对于公益事业的眼光实在是很大的。

义士罗锡畴也是此地人,以弱冠之年,带领八九名少年,企图冲破倭寇的封锁线,乘船离开韩国,到中国去办教育事业,然而在长连梧里浦被日警逮捕,受了几个月的牢狱之苦,才被释放出来。表面上他是做生意或种田,其实暗地里却在青年中鼓吹独立思想,同时直接、间接地从事教育工作,所以成为当地青年们信赖与寄以厚望的中心人物,我也常常去和他会晤。

有一天在安岳遇见了卢伯麟,他那时放弃了军职,在丰川家里从事教育,这次去汉城经过安岳,我们得以相逢,于是结伴同行,到余物坪进础洞金正洪家里住了一夜。金君也是该乡镇的教育家。

晚上和进础学校教职员一起共进晚餐时,突然村内一阵骚乱,校长金正洪急匆匆地跑进来说,进础学校女教员吴仁星的丈夫李在明用手枪威胁吴仁星,不知要干什么,因此仁星无法到校上课,躲避在某一位朋友家里。李在明声言要杀死全部卖国贼,在村口疯狂地乱放枪,全村被他搅得惶惶不安。

我和卢伯麟商量后,就把李在明请了进来。他年约二十三岁,满面怒容,悻悻地走了进来。他跟我们打了招呼后,便自我介绍说他小时横越太平洋到过夏威夷,在那里读书时,就听到我国被倭寇侵

占,几个月前才回国,和平壤吴仁星女士结了婚。她母亲寡居,有三个女儿,家境富裕,三个女儿都上了学。但她们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只图眼前的安逸,一点都不了解他忧国忧民之心,因此夫妻间经常吵架,给学校事业造成了损失。现在他正准备杀死李完用<sup>①</sup>等卖国贼,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一支短枪和李完用等人的照片。

但是当时谁会想到,这人就是后来在汉城泥岬刺杀李完用,以身殉国的惊天动地的义士李在明呢?我们只以为他是个意气用事的青年罢了。卢伯麟也好像和我具有同感,所以紧握着他的双手说,做大事的人,应有做大事的风度,怎么可以用武器威胁自己的妻子,并且还开枪骚扰乡民,这是一种修养不够的无知行为。卢君还诚恳地要求他把手枪暂时保管在卢家,平时应该多增进自己的涵养,多结交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再来执行自己的计划。经过我们这样劝解后,李在明虽然不太甘心,但还是把手枪和短刀交给了卢伯麟。

我们和他告别,在沙里院车站乘上了火车。车正要开时,李义士赶来要求归还他的手枪。卢君笑着说道:“你来京城再还你。”

过后不到一个月,李义士和几位同志来到汉城,在泥岬伪装成卖烤栗子的小贩,用刀行刺从天主教堂回来的李完用,李完用的人力车夫当场毙命,但李完用却没有死。李义士和金正益、金龙文、田泰善、吴××诸君被捕入狱,报纸上报道了这一消息。这事卢伯麟和我不能辞其咎,因为我们盲目干涉,拿走了他的手枪。要是他有手枪,李完用也许不能活命,为此我后悔不已。

---

<sup>①</sup> 李完用(一八五八—一九二六),近代亲日派头目,赞成丧权辱国的乙巳保护条约,世称乙巳五贼之一。——译注

# 14

## 安岳事件

呜呼，历史的记录被颠倒了，国家被吞并了。蒙受这一国耻的当时，群情激愤。元老大臣和官员中不少人都自杀了。教育界排日思想发展到了顶点，只是在无知无识的农民中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合并是怎么回事，亡国是什么滋味。我深感亡国之痛，但认为只要国民一致奋发图强，国家主权是可以恢复的。我决心扩大杨山学校，多招中学生，竭尽校长之责。国内国外都在组织秘密的政治团体。新民会就是其中之一。安昌浩从美国回国后，在平壤创建了大成学校，表面上是推行青年教育事业，暗地里却以梁起铎、安泰国、李升薰、全德基、李东宁、朱镇洙、李甲、李钟浩、崔光玉、金鸿亮以及其他几位为中心，由四百余名优秀分子组织了新民会。在训练期间，安昌浩也曾被龙山宪兵队抓去过。

为了预防合并后主要人物被一网打尽，安昌浩从长渊郡松川秘密地到威海卫去了，李钟浩、李甲、柳东悦等同志，也随后分别渡过了鸭绿江。

从汉诚以梁起铎的名义，寄来了召开秘密会议的通知，我也去汉城参加，当时聚集在梁起铎家中的，除了我以外，还有梁起铎、李东宁、安泰国、朱镇洙、李升薰、金道熙。这次会议决议，日本既在汉

城成立了总督府,我们也要在汉城设立都督府,以治理全国。并决定往满洲移民,同时计划设立武备学校,以培养在光复战争中需要的军官。为此,先派李东宁去满洲负责购买土地,建筑房屋等事宜,又在剩下的人员里选出各道的代表,黄海道为金龟、平安南道为安泰国、平安北道为李升薰、江原道为朱镇洙、京畿道为梁起铎,让他们火速回到各自负责的地区筹募经费。十五天内,黄海、平南、平北各募得十五万元,江原十万元,京畿二十万元。募得经费,紧随李东宁之后,同志们立即出发,前往满洲。我于庚戌年十一月二十日早上离开汉城,梁起铎的胞弟寅铎前往载宁任法院书记官之职,所以我和他夫妇同车,但起铎告诉我,不要对寅铎说我们的事情,所以他并不知道我们的秘密。

在沙里院和寅铎夫妇分别后回到安岳,向金鸿亮报告了这次秘密会议中所议决的事项。金鸿亮为了顺利推行起见,准备变卖自己的家产,并把这消息偷偷地遍告信川的柳文馨等邻近乡镇的同志们。长渊的李明瑞首先送他的母亲及胞弟明善到西间岛,然后几天之内折返为同志们准备一切,随后也来到安岳,由我引导他们出发北上。

某日午夜,安明根到杨山学校办公室来看我,我去汉城时他曾经找过我好几次。他的目的是想要以手枪来威胁安岳一些曾经答应过他资助独立运动,而现在却不肯出钱的富豪,让他们见识一下。他请我给予声援和指导。我又问安明根将来具体的方针。

他说向黄海道一带的富豪募得经费后,聚集多数的同志,切断在黄海道内所有的电话线和电讯系统,阻止驻在各地的倭军互相联系,同时命令各地的志士起义,如果能杀死驻在自己地方上的倭军的话,相信是可以一举而成功的,如果倭军部队从别的地方增援过来,至少也要五天的时间,因此在这五天之内,是我们自由自在的天下,同时我们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报仇雪恨。

我握着明根的手,劝他放弃这个计划,同时告诉他,想到其堂兄

重根在旅顺的遭遇,他当然是不同于别人而义愤填膺的,但是一个国家之独立并不是靠那种一时的冲动而成功的,应该广招同志,教育同胞,尔后培养实力,要有充分的准备,才能一战决定胜负。同时也向他说明了应往西间岛移民,引导志同道合的青年们到那里去,培养人才,那才是目前当务之急。

听完我的话后,虽然他接受了我的见解,然而和他的想法仍有许多出入,因此带着不满的情绪和我分手了。此后不久,从报上传来安明根在沙里院被捕并被押往汉城的消息。信川载宁等地也有不少人受到连累相继被捕。

翌年辛亥年正月初五清晨,我睡意正浓,一个日本宪来到我杨山学校办公处的宿舍,说宪兵所长要见我,就把我带到宪兵分遣所。到后一看,金鸿亮、都寅权、李相晋、杨星镇、朴道秉、韩弼浩、张明善等教职员早已像我一样被唤来。宪兵所长宣称是警务总监部的命令,把我们全部拘留起来。过了二三天后,移送载宁。在此事发生之前,白川郡守全凤薰曾来我处商议,说国家大势已去,不愿再任郡守,想来安岳杨山学校附近买幢房子,一心专注于孙子武吉的学业。后来他就在习乐岬购得一幢瓦房,进行修葺,这时他任遂安郡守。房屋修缮完后,他举家迁来安岳。就在这天,我们又从载宁被送到沙里院,在那里被拉上开往汉城的火车。不知全凤薰听到我们的消息后,他迁往安岳时的心情又当如何。

当时被拉上火车移送汉城的还有松禾泮亭申锡忠进士,但他在火车渡越载宁江铁桥时,从车窗跳下去投江自杀了。

申进士在海西是知名的学者,也是慈善家。其弟锡悌也是进士,有一次我去拜访锡悌时,其公子济英和孙子相浩,到村口来迎接我,我脱帽打招呼,他们慌忙地除冠答礼。我连忙劝阻,济英等惶恐地说:“先生脱帽,我们怎能失礼呢?”我反倒感到不安,便跟他们说明我戴的是洋人的帽子,洋人的惯例要脱帽行礼,所以请他们原谅。

见到锡悌进士后,我们促膝长谈了一个晚上,都认为国家文明,教育乃当务之急。他还拜托我教育其孙相浩。

在火车上也遇见了李升薰,他虽然没有被捕,但看到我们被绑着的惨状,不由掉过脸对着窗外淌下了眼泪。火车到达龙山站的时候,跑上来一个刑警,对李升薰说:

“您是李升薰先生吗?”

当他答应后,那个狗刑警又说道:

“警务总监部请您老人家去一趟!”

从火车上一下来他就和我们一样,被绑起来带走了。以后才知道,黄海道一带,多数爱国志士都已被捕。这是日寇强行吞并韩国后,第一次用暴力压制韩人。他们抓了安明根后,继续大肆逮捕我国的爱国知识阶层和有产阶级人士,原先的监狱和本来有的拘留所已不够用,因此把仓库和办公室改成了牢房,如蜂巢似地隔了许许多多的小房间,作为临时拘留所。我也被监禁在这里,一个房间只能容纳二人。

黄海道此次被抓来的人有安明根,信川的除李源植、朴万俊已见机逃走外,还有申伯瑞、李学九、柳元凤、柳文馨、李承祚、朴济润、裴敬镇、崔重镐;载宁的有郑达河、闵泳龙、申孝范;安岳的有金鸿亮、金庸济、杨星镇、金龟、朴道秉、李相晋、张明善、韩弼浩、朴亨秉、高凤洙、韩贞教、崔益亨、高贞和、都寅权;长连的有张义泽、庄元容、崔商仑;殷律有金容远;松禾有吴德谦、张弘范、权泰善、李宗录、甘益龙;长渊有金在衡;海州有李承骏、李在林、金荣泽;凤山有李承吉、李孝健;白川有金秉玉;延安有片康烈等;平安南道有安泰国、玉观彬;平安北道有李升薰、柳东悦、金龙圭兄弟;京城有梁起铎、金道熙;江原道有朱镇洙;咸镜道有李东辉等。我和李东辉是素不相识的,但在拘留所看到他的名牌后,才知道他也是被抓来的。

我想,我们平时并没有为国家尽忠效命,因此才会受到这种惩罚,现在我想到了“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的古训,我如今唯一能做的事是决定实践高后凋先生的训诫,效法“六臣”<sup>①</sup>和“三学士”宁

---

<sup>①</sup> 朝鲜世祖(一四五六一—一四六八年在位)时为谋求端宗复位而被处死的六名忠臣,即:李垲、河纬地、柳诚源、俞应孚、成三问、朴彭年。——译注

死不屈的精神。

有一天我被带到了审讯室，审问我的倭寇问了我的年龄、住址和姓名后，又问我：“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么？”

我答道：

“因为是被抓来的，所以才到了这里，可是我并不知道原委。”

倭寇不再问我，他们把我的手脚捆绑起来，吊在天花板上，起初觉得很痛苦，后来渐渐失去知觉，等到醒来时，发觉我躺在审讯室的角落里。冬天冷寂的月光斜照着我，除了感觉到脸和身上像是被冷水泼过以外，一点儿也记不起其间发生过什么事情。

倭寇看我醒了过来，又问我和安明根的关系，我告诉他，和安明根只是认识而已，从来没有和他做过什么事情。倭寇听后大怒，重新把我绑了起来，吊在天花板上，有三个人围着我，用棍子和短杖一阵乱打，我又一次昏迷过去。等到那三个家伙把我拖回拘留所时，东方已经发白了。审问从白天傍晚开始继续到次日早上，看到从姓名开始对我进行审问的那个家伙秉烛达旦、通宵不眠、全神贯注、一丝不苟的神情，我觉得那些倭寇是多么忠于自己的国家。那个家伙是为了想消化已经吞下去的韩国而通宵不眠，然而我为了自己的国家又有过几个不眠之夜呢？这样反省一下，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自己徒具爱国分子的虚名，事实上是否也具有亡国奴的劣根性呢？想到这里不觉声泪俱下。

受到如此严刑拷打的并不只是我一个，隔壁金鸿亮、韩弼浩、安泰国、安明根等，在被带去接受审问后，都是在半死的状态下被送回拘留所的。每次我看到这种情况，就无法抑制涌上心头的满腔悲愤。

有一次，安明根大声嘶喊着说：

“狗东西！要杀便杀，你们就这样对待爱国义士吗？”

在他大声叱责中有一句话传到我们耳边：

“我只说我自己，和金龟、金鸿亮毫不相干。”

我们在牢房发明了一种无线通话办法，从梁起铎的房间开始，

传到安泰国的房间和我住的房间，再从我的房间传到李在林的房间，约有二十多个监房共四十多名囚犯用这种方法秘密地互通信息。由此得知鬼子们把参加这一事件者划分为违反保安法和谋杀抢劫犯两种。

我们谁受审回来，便立即把内容传达到各监房，商讨对策。鬼子们看到事情的范围逐渐缩小下去，大约也起了疑心，于是用甜言蜜语收买了韩淳稷，让他探知我们密语通信的内容，向他们告密。有一天梁起铎把手掌圈起紧贴在送饭口，给我们传话说韩淳稷已密告了我们秘密通话，今后废止暗语。

果然是疾风知劲草，当初安明根向我介绍韩淳稷时，还称他为勇敢的青年呢。危险时刻变节的岂止是韩淳稷一人，崔明植也经不起酷刑，作了虚假的伪供，但事后懊悔不已，所以最后起了一个兢虚的号，以示终身自责。当时我是下定了决心，因为我知道我的舌头关联着很多人的生命。

有一天，又传唤我出去，问我平生的知己是谁，我不加考虑地说：

“吴麟炯是我平生的知己。”因为从我口中始终无法问出别人的姓名来，所以当我说出了平生知己的姓名后，他们露出很高兴的脸色，继续问我那位现住哪里，在做什么？他们提起精神，等待我的回答，我泰然自若地答道：

“吴麟炯住在长渊，去年已经逝世了。”

听到我这句话，他们大怒，更以恶刑相加，直到我失去知觉为止。

他们又问我，学生当中哪一位最尊敬我，我当时近于昏迷，不由说出了常到我家里看书的崔重镐的名字，说出口后，真想咬掉自己的舌头。我以为这位青年人也要被捕了，偶然回头看窗外时，刚好看到早就被抓来已经奄奄一息的崔重镐被拉出去了。

泥岷山麓下的所谓警务总监部里，昼夜不停地传出哀嚎，就像



是屠宰场内的猪、牛被打得半死时的哀鸣。

有一天韩弼浩烈士受审后回来经过我的牢房，勉强地抬起头来，从送饭口对着我说：

“我否认了一切，他们施以酷刑，我怕是活不了啦。”

听起来好像是跟我诀别似的，于是我安慰他说：

“不要那样灰心，先喝一口水吧！”

然而韩义士说：

“如今连水也不必喝了。”

此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直到开庭公判时从同志们嘴里得知申锡忠投江自尽，韩弼浩惨遭杀害的消息。

有一天我被带到“最高讯问室”，谁会料到我又遇见了十七年前我在仁川警务厅被审问时坐在旁听席上的渡边巡警，那时他看到我大声叱责，一面嘴里用日语骂着：“畜生！畜生！”一面往后面躲避，现在居然坐在面前来审问我了。这个家伙，像从前一样留着长而黑的胡子，脸上看来多少有些衰老，他穿着警务总监部机关课长的制服，神气活现地坐在我的对面。

渡边这个家伙，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怀里藏有 X 光线，早就知道我生平的历史和我内心所藏的秘密，因此要我不必隐瞒，彻底坦白，如有半点隐瞒不实的话，就要当场打死我。

我不禁想起了年前因旅顺事件的嫌疑在海州检事局受审的事来，那时他们面前放着标有“金龟”名字的小册子。我想那本册子里一定收集了各地的报告，那里面可能记录有我大闹京乡，特别是在黄海道、平安道两地方发表排日演说和平时谈话里谈到的鸕河浦杀倭、仁川的赦免死刑、越狱逃走等事件。可是我决定在渡边主动问起十七年前在警务厅受到我斥责这一事情之前，决不松口，这样也可试验一下渡边的 X 光线准确与否。

“我一生从未在僻静之处过过隐士生活，而是献身于社会，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光明磊落，毫无隐私。”

渡边依次询问：

“你的出生地？”

“海州基洞。”

“学历？”

“在私塾里学过汉文。”

“职业”？

“我是农民出身，先是砍柴种地，到二十五六岁，移居长连，开始从事宗教和教育工作。现在新被任命为安岳杨山学校校长，没有多久，就遭到逮捕。”

渡边怒气冲冲地说：

“你表面上从事宗教和教育工作，暗地里却在策划阴谋，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你们在西间岛设立武官学校，准备进行独立战争，你又和安明根共谋杀害总督，抢夺有钱人家的钱财，这些你还不从实招来？”

这时我并不害怕，只是暗自好笑，觉得渡边怀里藏的 X 光线也并不怎么样。

这样看来，大概告发我的韩籍刑警和侦探们故意漏掉了那些而报告上去的吧！

我回答说，我和安明根一点关系也拉不上，往西间岛移民是事实，这不过是为了解决贫困农民的生活问题罢了。然后我转变话锋说：地方上的警察度量狭窄，且疑心很大，经常怀疑别人排日，这样下去，百姓任何事情都干不了，对于事业发展大有妨碍，希望以后多多督促地方上的警察，让像我们这样安分守己的人能安心地从事教育工作，现在学校开学时间已过，盼望能早日放我回校去教课。

渡边这家伙未动酷刑，把我送回拘留所。

我为国母报仇的事世人皆知，并非秘密。倭寇把我看作危险人物，已通令各地警察署调查我的行动，他们给我造了“金龟”的专册，上面必然记有土田让亮事情。这次总监部又专派一人去安岳调查，

万一事情暴露,我将在此了此一生。可是渡边并不知道这些事情,如此看来,国家虽亡,但我们民族未亡。我平素最恨韩籍刑警,对他们进行激烈的攻击。现在这些刑警虽然都很了解我的事情,却并未告密。别人不说,我的学生金弘植和我的同事元仁常也当了刑警,他们就为我保守了秘密。看来韩籍刑警和高级侦探良心并未泯灭,他们的心灵深处多少仍保留着一些爱国心。社会既如此同情我,我也更下定决心要为同志们奋斗到底,决不向敌人屈服。

再者我自忖金鸿亮的活动能力强,人品高尚,所以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将他救出来,我决心在审问中提出对他有利的答辩,想到这儿我不由喃喃自语道:“龟没泥中,鸿飞海外。”

我受审了七次,除了渡边的审问外,其他几次都被严刑拷打得死去活来,但受刑后每次回到拘留所时,我都大声疾呼:

“你们可以剥夺我的生命,但是无法夺去我的精神。”

这是为了鼓舞同志们的士气。倭寇听了我的呼喊,以威胁的口吻说:

“你再敢胡言乱语就打死你。”但我深信,同志们会从我的话中得到鼓励。

在第八次审问中有各科科长与主任警官七八人列席。这些家伙对我说:

“你的同伙都已经招供了,唯独你不肯认罪,你是何等的愚蠢和顽固啊!虽然你守口如瓶,但是别人吐了实话,你的罪状能够隐瞒得了吗?你再仔细想一想,一位新买进田地的地主,会将多余无用的石头子儿留在地里,而不捡出来吗?所以你要明白,只要坦白交待,就可以无罪开释。如果你还是这样固执,就当场打死你。”

听了这些话后,我说:

“好啊!如果你们真是把我当成新买来的田地里的石头子儿,那就说对了。我被你们当石头挖出来的痛苦岂是你们把我挖出来的辛苦所可比拟,既然如此,那么你们看着,不必借用你们的手,我自己

死给你们看吧！”

说完这话，我用头猛撞身旁的柱子，随即失去了知觉。

几个家伙连忙对我进行人工呼吸，再以冷水泼在我脸上，其中有一个家伙假惺惺地说：

“金龟在朝鲜是最受尊敬的人物，不能这样对付他，还是交给卑职来办好了。”

他得到允许，把我带到他的房间里，拿出香烟给我抽，讲话也比较客气，可以说给我以特殊的待遇；他还说他曾出差到黄海道，调查了有关我的资料，知道我对教育很热心，不管有没有薪俸，仍然对教育那么热心，真是可佩。同时一般的舆论，亦都称道我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是警务总监部却不太清楚我的身份，因此使我受了很多酷刑，感到非常遗憾；接着又说，其实对于审问的对象，也应该看清楚是怎样的人，进行适当的处理，因此像我这样的人士，那样对待是非常失礼的。他能讲出这样的话，其脸皮之厚可想而知。

倭寇逼供的手段有三种，第一种是酷刑，第二种是饥饿，最后是笼络。酷刑是用鞭子和棍子猛抽猛打犯人，或用绳索反绑双手，让他先站在凳子上，然后吊在天花板上，再把凳子抽走，人便凌空吊了起来。这样不久，犯人因受不了痛苦而失去知觉。另一种酷刑是拿在火炉上烧红的铁棍，任意烙赤裸的身体。还有一种拶刑，是在三个手指之间夹着手指般粗细的有棱角的木头，以绳索拉紧木头的两端，拶人手指。他们还把人倒过来悬吊，用水灌入鼻孔内。

然而比酷刑更难以忍受的是饥饿的惩罚。审讯时减少饭量到仅仅不致饿死的程度。

若亲属送饭，也要得到审讯主任的批准。他们可以不顾事实，只要你的供词中他们的意，哪怕是对他人不利的假供，他也可以批准送饭，如稍有反抗，则不批准。因此在拘留所里能吃到私送的饭食的人，其态度自然也不会强硬。

再有就是采取温和的手段。他们以佳肴款待，把你带到明石（当

时的总监部总长)的装饰豪华的房里,给予各种优待,有的人能经得住酷刑,但在这种场合下却招了供。

我经历过体刑。那些家伙发狂,我也冲动起来,产生了抵抗力,因此能经得住。但是第二种第三种手段却令人难以忍受。开始他们给你的饭食是混有一半麸皮的大麦饭和苦涩的咸菜疙瘩,简直难以下咽,有时吃不下就退回去了。过了几天如果没有再受酷刑,就有些食欲,哪怕还是那种饭食,也会吃得津津有味。这三个月仁儿的母亲每天一早一晚都来到拘留所送饭,她在门前高喊:

“给金龟送饭来了,请给递进去吧!”

可是日本鬼子却说:

“金龟大大的不好,这里不准送饭。”

每次都把她打发回去了。

我的身体已不像样子,每当被吊起挨打时,我就默念朴泰辅受烙刑时所说的话:“这铁还凉,再在火上烙红些。”时值寒冬,鬼子们只脱去我的外衣,捆起来要打,我就说穿着内衣挨打不痛,让他们剥掉我的内衣再打。于是我光着身子挨揍,被打得体无完肤。这时当别人在门前吃送来的饭菜时,一闻到肉汤和泡菜的味道,我就直咽口水,想吃得简直要发疯,我也动过念头,哪怕说些害人的话,能吃到送进来的饭就行;有时也产生过卑鄙龌龊的想法,竟想到老婆还年轻,能够卖身而经常送些饭食来那该多好呢!

这时我想起朴泳孝<sup>①</sup>的父亲,在狱中啃着草席而死;古时苏武,渴饮雪,饥吞毡,为汉朝守了十九年的节操,又回想起自己赤身挨揍的痛楚,为鼓舞同志们的士气而呼喊生命可夺而精神不可丢的气概。不禁自责人性由于饥饿而泯灭,剩下的只是兽性。

正在自我谴责良心时,他们把我叫到明石元二郎的房间里,尽量优待我,明石还劝诱我说,我只要当顺民,向日本表示忠诚,他们

---

<sup>①</sup> 朴泳孝(一八六一——一九三九),近代开化派重要人物,后沦为亲日派。——译注

立刻可以向总督请求释放我；还说日本统治朝鲜，并非只用日本人，同时也要用德高望重的朝鲜人士来治理国家，像我这样忠厚的长者，不应为时代潮流所吞没，而应以顺应为上，识时务者为俊杰。要把安明根事件和西间岛事件从实招来。

于是我对明石说：“如果你认为我是忠厚老实人，就应该相信我从头到尾的供述。”这个家伙听了表面上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但脸色确实很难看，他们终于又把我送回牢房。

过了几天，我又被叫出去了，开始说要打死我，后来又被拉到另外一个家伙的房间里。

这个家伙是叫做国友的警官，他说他在台湾时专门担任审问工作。曾经有一个台湾人犯跟我一样固执，但转移到检查局后，把一切都供了出来，他希望把我也转移到检查局去，相信我会坦白地说出一切，这样一定会得到同情。他特地打电话叫人送来了肉汤面，摆在我面前请我吃，我说如果认为我是无辜的话，我就吃，如果认定我有罪我就不吃。

这个家伙又说：

“金先生是汉文学者，你虽然不同情我，但我是自然而然地同情你，尽管这是家常便饭，也表示我的一番诚意，趁面还没凉，快请用吧！”

我仍固辞，于是国友带着笑容，用汉字写了“君疑置毒乎”五个字，又说现在审问也结束了，今天开始准许家人送饭。我说并非疑心有毒，于是吃完了那碗汤面，回到了我的房间。第二天开始就允许送饭。

和我同房间的是一个名叫李宗录的青年，他此地没有一个亲戚，自然也就无人送饭，如果能在房间里吃，也可以分一点给他，但是规定送来的饭必须在房外吃，我不忍看他贪馋的惨状，只好口里塞满了饭菜，回到房里，像母鸟喂雏鸟似的，从我口里喂到他的口里。

# 15

## 被判十七年徒刑

第二天我就被转移到钟路拘留监。这里的房间是单人一间，比起总监部要舒服多了，牢里的饭食，也比总监部多得多。

我的案件，照事实来处理的话，只是违反保安法而已，处重刑顶多也不过是两年有期徒刑，但他们总是硬要把我拉进安明根的强盗案件里去。

我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我与安明根案件无关：我在汉城梁起铎家里开会主张派李东宁移民到西间岛的当日，正是安明根到安岳和元行燮、朴亨秉、高凤洙、韩贞教等一起开会商量袭击富豪的日子。当时在安岳的金鸿亮、金庸济、都寅权、杨星镇、张允根等当然成了安明根的从犯，但我因在汉城，绝对无法参加安岳的会议。

虽则如此，他们胁迫安岳杨山学校某门卫的十四岁的儿子李元亨作伪证，说亲眼看到我曾参加安岳的会议，企图把我牵连到安明根的强盗事件里去。

我清清楚楚地听到我的证人李元亨在邻房受审的声音。

鬼子问李元亨：

“你看到安明根和金龟一起参加了那个会议吧！”

元亨回答说：

“我根本不认识安明根，金先生也不知去了哪儿，根本没有参加那个会。”

日本鬼子大声呵斥，威胁说要杀死他，一旁的韩籍警察则劝诱说：

“你这笨蛋，只要说你亲眼看见安明根和金龟在一起，马上就可以跟你父亲回家，你还是照我们的话回答的好。”

一听到这话，元亨说：

“那就按你们的意思说吧，别再打我了。”

在审问我时，检察官按铃叫李元亨进来作证，当这个少年刚回答一个是字，就马上被拖出门外去了。

检察官说：“现在证据确凿……”

我泰然地回答说：

“你们为了让金龟在同一天同一时间里参加相隔五百里的两个地方的两个会议，真是煞费苦心啊！”

检察官不理睬我的话，马上就宣布“预审结束”。

我被关在警务总监部的时候，义兵队长姜基东也在元山被捕关在此地，他受到拷问，被陆军法院判处了死刑。另有金佐镇等人也因开展爱国运动以强盗罪被判处劳役，和我们关在一起。姜基东当初当义兵，后来归顺当了日本宪兵补助员，在京畿地方服务。

有一次他值班看守几十位将被枪毙的义兵时，乘机打开牢门，放出他们，并带领他们抢了配备给事务所的武器，全副武装后，在夜里突破了警戒网，跑到京畿、忠清、江原道等地和日本人打了几年游击，最后终于在元山被捕。

有一天，安岳郡守李某，到监狱来看我，他准备把杨山学校的房产和家具，移交给公立普通学校，强行要我签名盖章。我说学校的房产是公家的，要交还给公家也可以，但家具教具是私人财产，愿意赠给私立安新学校，可是最终还是都归了公立普通学校。

当时杨山学校的小学生国家观念还不强，但中学生孙斗焕却与



一般孩子不同。我在长连邑凤阳学校(耶稣教会创立,后改名进明)时斗焕还是个戴草笠的孩童。他父亲昌廉因晚年得子,十分娇惯,所以他对父母尊长,固不用说,就是对郡守,也往往不用敬语。当时黄海、平安两道的地方习俗是孩子成年以前对父母也可不用敬语,这是一种陋习,正处于改良的过程中。我曾循循善诱,让斗焕上学。有一天在修身课上,我让跟父母尊长不用敬语的学生举手。在举手的孩子中就有斗焕。下课后我把斗焕叫到另一个房间,责备他说:

“吃奶的幼儿不懂得对父母尊长要用敬语,不能怪他们,你已经结发束髻,戴上了草笠,怎么还不懂得尊敬父母尊长,岂不害羞?”

斗焕问我:

“什么时候开始用敬语?”

“从你知错的那一刻起。”

第二天一大早,门口有人呼唤金龟先生。我外出一看,原来是议官<sup>①</sup>孙昌廉。他让下人扛来一背架白米放到我门里,喜形于色,却不知话该从哪儿说起。

“我家斗焕昨晚从学校回来后,对我用了敬语,对他母亲刚有不敬,随即醒悟,立即改用了敬语,说这是老师的教导。老师,请您多多进餐,有了精力好教训我家孩儿,我家刚收进了好大米,特意给老师您送来一些。”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十分欣慰。

那时学校刚建立不久,凡是家有学龄儿童的,我都得亲自拜访,奉劝他们送子弟入学,并允诺学生可以不剃发,这样,才能招收到学生。不少学生因父母没有时间经常给他们梳头,发丝里长满了虱子虱卵。我只得买来梳子篦子,每天要花上几小时给学生梳头。学生慢慢地多了起来,给学生梳头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增加得还快,我不得不在征得家长的同意后,今天一个,明天两个,逐渐地给学生们剃

---

<sup>①</sup> 朝鲜高宗三十二年(一八九五年)设立的中枢院的官职之一,后改称“赞议”。——译注

了头。给斗焕剃头是先找了斗焕商量的，因为怕先跟他父母说了，会让他退学。斗焕十分讨厌结髻，草笠戴起来又沉，便欣然同意剃发。我立即给他剃了头，让他回家，我则悄悄跟在后面，探听情况。孙议官见状泪如雨下，怒火中烧，又舍不得痛责爱子，就打算把忿怒发泄在我身上。然而斗焕见我跟踪而来，欢欣雀跃。孙议官见此情形，也只得作罢，他脸上还带着泪水，却露出了笑容。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您等我死后再给他剃发啊！”

我感到内疚，遂婉言相劝：

“您不是很爱斗焕吗？我喜爱他也不下于您，我见斗焕身体虚弱脖子细，梳上这么大的发髻，再束上网巾，戴上沉重的草笠，实在不堪重负，生活上也诸多不便，出于爱护他的心情，把他的头发剃了，斗焕日后身体健壮了，一定会感谢您这当父亲的。”

此后斗焕跟我到安岳上学，孙议官也跟到安岳，住进旅店，随时了解斗焕念书的情况。斗焕不仅头脑聪明，胸中也怀有亡国之恨。

中学生中还有一个名叫禹基范的，是我在文化钟山西明义塾时的学生。有一天我对他寡居的母亲说：

“你把基范交给我带往安岳，他可以住在我家继续学习。”

他母亲十分感谢，说道：

“如蒙先生不弃，我也跟去卖糖饼，天天看着我儿子读书学习。”

这样，基范九岁时就住在我家，进了安新学校学习，小学毕业后，又进了杨山学校中学部。

但是日本鬼子勒令解散杨山学校，夺走了校舍和全部教具，教育事业也变成一场春梦。看到我的学生如同失去放牧人的羔羊，在敌人的铁蹄下呻吟，我心中悲痛不已。

我曾费尽心机，想救金鸿亮，让他摆脱厄运，远走高飞，到海外去活动。可是他终于招供说出了他是受安明根之托，劝告信川李源植的；这样一来想要出狱就更加困难了。

母亲为了照顾监狱中的我，拿着变卖安岳全部家产得到的款

子,千里迢迢来到汉城。她每天给我送饭,还常给我写信。她在信中告诉我,我的妻子和两岁的女儿化敬,先到平山岳母和姐姐家里看看,等到开庭之日再来汉城。

打开母亲亲手盛的饭碗,一面吃着,一面想,此饭内不知掉下了母亲多少眼泪。十八年前关在海州和仁川的监狱时,照顾我的是双亲,因此他们可以互相分担辛劳,有事相互商量,相互安慰,然而现在只有母亲一个人,还有谁能帮助母亲呢?就是连安慰他的人恐怕也没有了。

俊永叔虽有堂兄弟,但都是乡下人,他们也说不上什么话,弱妻幼儿也安慰不了母亲。得悉妻子带着化敬暂住在她母亲临时栖身的姐姐家,不禁百感交集。她姐姐和申昌熙结婚后,举家迁居到黄海道。我和其妹遵礼结了婚,申君便想进世富兰医学院就读到医科毕业,于是他带着妻子和岳母又搬到京城。不久,我到了长连邑,她们母女二人经过平壤也来到长连我家探望女儿、妹妹,因为她们和申昌熙之间不知为了何事发生了龃龉,而她姐姐也露出了行为不端的迹象。作为基督教徒,我们夫妇见到这种情况,自不能置之不理,遂劝说她们母女回到申君身边。此后我来到了安岳,岳母和她姐姐又来到我家,说是她姐已和申昌熙解除了夫妻关系。我和母亲都不想接纳她姐这样的人,但是我妻子对其母亲和姐姐却下不了狠心,因此弄得我们也是阖家不安。后来我和妻子秘密商量以后,便跟岳母说要是她不把大女儿带走的话,那就让她连小女儿也一齐带走。岳母说行,三人一起离家去了京城。我随后也到了京城探听动静,得知妻子正准备离开她母亲和姐姐想去某学校存身。我偷偷地给了妻子一些旅费后,便去载宁找美国传教士君芮彬,把妻子的事托付给他,他当即一口答应。把遵礼安顿在自己家,让我等事态平息后再把她带走。我立即写信让遵礼来,我在沙里院车站等候。在车站,我见遵礼一个人下了车,便把她带到载宁君牧师家安顿下来。

我回到安岳,跟母亲解释说:

“岳母和她姐虽然不守妇道，但终不能把我的妻子也赶走，还是请母亲多多原谅。”

母亲痛快地答应说：

“好吧，你去接还不如我直接去接她回来。”

当天母亲就去载宁把我妻子接了回来。

家庭的波折至此结束，妻子终于抛弃了亲生母、亲姐妹的亲族观念。她姐姐后来在平山又找了一个宪兵补助员，不知是嫁给他做妻还是做妾，岳母也就跟他们住在一起。

这次我们全部被捕，要进行公审，母亲信中告诉我说妻子为了来此亲眼看一看公审，竟带着化敬暂住在她姐姐家，由母亲先来汉城，有了消息再通知她来看公审。

我所主张的和我所追求的现在已全部化为泡影。我在学校教书时曾对学生们说，你们崇拜我，我们对你们也寄予千百倍的希望，尊重和推崇你们，我早年不能充分受教育，当了亡国奴，你们以后一定要多学知识，成为建国的英雄。我为这一希望所费的苦心现在已成徒劳，而妻子听说她姐嫁给宪兵为妾这一消息后，曾决心永远和她断绝来往，现在我到了这步田地，无奈又去了她姐家，先前的决心化为乌有。

公审的日子终于定下来了。母亲请了日本人永井给我当辩护律师。预审时，永井这家伙问我说：

“在总监部拘留所时你和梁起铎敲墙通过什么话？”

我瞪了他一眼说：

“你是代法官审问我吗？我的一切已详细地记在审问记录里了，你用不着再多问。”

这家伙向检察官眨了眨眼，示意完全失败。

日子总算打发过去了，到了开庭的那天，我乘着马拉囚车来到京城地方法院的门口，只见母亲背着化敬带着我的妻子站在门里等着。我们被带到第二号法庭，在法庭被告席中所坐的顺序，为首是安

明根,再次金鸿亮,第三是我,然后是李承吉、裴敬镇、韩淳稷、都寅权、杨星镇、崔益馨、金庸济、崔明植、张润根、高凤洙、韩贞教、朴亨秉等四十人,再环顾一下,旁听席上有被告的亲戚朋友、男女学生、辩护律师,新闻记者也列席了。我是在这里才听到韩弼浩先生在警务总监部里被打死和申锡忠进士在押往沙里院途中过载宁江铁桥时投江自杀的消息的。

所谓公审,结果是安明根判处无期徒刑,金鸿亮、金龟、李承吉、裴敬镇、韩淳稷、元行燮、朴万俊等七人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元行燮、朴万俊缺席),都寅权、杨星镇二人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崔益馨、金庸济、张允根、高凤洙、韩贞教、朴亨秉等各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或五年不等,这是属于强盗案件的部分;以保安法案件起诉的是梁起铎为主犯,其余是安泰国、金龟、金鸿亮、朱镇洙、玉观彬、金都熙、金用圭、高贞和、郑达河、甘益龙和金用圭的一个族侄,判决结果是梁起铎、安泰国、金龟、金鸿亮、朱镇洙、玉观彬等各处二年有期徒刑,其余的各处一年或六个月的徒刑不等。

此外,李东辉、李升薰、朴道秉、崔宗浩、郑文源、全秉玉等十九个人,被流放到舞衣岛、济州岛、古今岛、郁陵岛,为期一年。几天后,我们被转移到西大门监狱。

这样看来,金鸿亮和我等几人,以强盗罪判刑十五年有期徒刑,再加上违反保安法被判二年有期徒刑,加起来要坐十七年牢。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每天可以遇见同志们,同时偶尔也可以谈几句话,这可以说是苦中之乐吧。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还有出去的机会,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恐怕连活着出去的希望也没有了。因此我内心暗自决定,尽管我的身体沦为倭寇的俘虏而坐牢,但在精神上却把倭寇看作是禽兽,直到死去的那天,我们应该以愉快的心情过着乐天的生活,别的同志的想法也都跟我一样。因此我们在狱中的行动几乎都是不谋而合,真所谓风雨同舟,古言不虚啊。

在狱中的同志们几乎都有儿子,唯独我一个人只有独生女儿化敬,金庸济有四儿一女,长子善亮、次子勤亮、三子文亮、四子顺亮,因此他把老三文亮过继给我,继承我的一脉香火。

我觉得我的心理状态和被捕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被捕以前十余年间,我总是手持《圣经》在教堂里说教,或是在学校里教课,对人对事,我都是本着自己的良心去做,一有邪念,总是先自责,不敢埋怨他人。这已成为习惯,因此深得学生和挚友的信任,凡事我也都推己及人。可是为时不到半年,我的这种宽厚的态度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回想起在警务总监部受审时,相隔十七年重又会面的渡边竟不知道我金龟就是十七年前的金昌洙,还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怀里藏有 X 光线,能透视我的内心和经历,正是从这时起,我开始了转变,我曾把日本视如泰山,可是就在渡边作威作福,大施淫威时,我就觉得日本鬼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把他们视同草芥。我经历了七次拷打,昏厥后又被冷水泼醒,而我也由此变得坚强起来。我认清了日本虽然剥夺了我国的主权,但这只是一时的国运衰退,日本绝不能永久统治朝鲜,这是洞若观火的事。

帽子上镶有两三道金线的高等官曾向我喋喋不休地大放厥词,说什么日本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裁可的法令,行政官员不能有丝毫违反,必须忠实执行。朝鲜人民也是天皇之赤子,天皇必将一视同仁,有功者奖,有过者罚。官员定会依法处理,公平对待,决不会像旧韩国的官吏那样,对亲者有罪不罚,对仇者轻罪重罚,现在和以前的时代真是有天壤之别。

我反问说:

“你那时不是说去安岳调查,都说金龟为学校工作不问薪俸多寡,一心一意要办好学校,是地方上的有功之臣,深受群众的敬重吗?今天我又没有犯罪事实,不授奖给我,也就罢了,还要受罚,真是岂有此理!快放我出去。让我回学校教课。”

“你虽然这么想,可是作为买地的地主,都会把田地里的瓦砾碎

石捡走。你最终也没有坦白你的罪行,但是你的同伙都说你是罪魁祸首,有证有据,免不了要判罪。”

我又反问道:

“你是官员,这样做不是完全不顾法律吗?”

那家伙像疯狗似的暴跳如雷,说我戏弄官吏,把我狠揍了一顿。

日本鬼子把我看作是瓦砾碎石,我太高兴了。是的,我应该成为日本鬼子的硬石头,死也要抱着这种硬石头精神死去,活着就要真正尽到我这块石头的责任,只要我一天不死,我就要跟日本鬼子捣乱,破坏他们的法律,并以此为乐。我决心要体验一下常人所难以体会到的另一种生活的真谛。

转移到西大门监狱时,狱官跟我说:

“金龟,现在要脱下你的衣服,封存在杂物仓库里,你的自由也一样,交到了我们的手里,你要穿着囚衣进监,俯首听命于我们当官的。”

我点头答应。看守说第二天就要去干苦役,但又不给解下手铐,而且铐得更紧,一夜之间,我的手腕肿得跟腿一样粗。第二天一大早来查监时,看守们见了吓了一跳,就问是怎么搞的,我说:

“当官的晓得,我囚犯怎会知道?”

看守长过来一看,责骂道:

“手腕肿成这样,你不会跟看守说松松手铐?”

“典狱官昨天不是教训说一切由当官的安排,我只有服从吗?”

医生马上来给我治疗,疮口太大,手铐都陷进到骨头里。二十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手腕上还留有瘢痕。

看守长又说:

“不管怎样,犯人如有什么事,可以向看守提出要求面见典狱官。”

根据狱规,囚犯不得互相谈话,互通消息。但是我们的同志近四十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交谈起来,互相传递讯息,遇事一起商量,交

换意见，我了解，同志们现在也是跟我一样的心情。

其中高贞和长得一脸凶相，心态也极不平衡，找狱官的麻烦都出了名。有一次吃着饭，发现饭里夹有砂子，他立即从地上抓起一把土，塞进嘴里，又洒在饭里，包起后要求面见典狱官，提出把他的一年劳役改为终身劳役。他说：

“人怎能靠吃砂土过活？我吃的这碗饭里，砂子几乎占了一半，吃了这种饭还能不死？既然是死，倒不如干重活儿，死了也光荣，反正不就是终身吗？”

典狱官脸涨得通红，大声斥责食堂的看守，让他们以后做饭多留些神，不准混进砂子。

几天后，高君又看到囚犯们在抓虱子，他偷偷地让人们把虱子集中起来，用手纸包好，又跟看守说要面见典狱官。他把脏兮兮的一包东西放在典狱官面前，抗议说：

“上次多蒙典狱长关照，饭里再也没有吃到砂子，这次衣服上又长了这么多虱子，睡觉也睡不好，就是醒着浑身也痒得难受。旧韩国时代囚犯还可以穿自家的衣服，现在按大日本的文明法律已不许可，而穿这样不干净的衣服容易得病，请马上给各监房的犯人换上新囚衣，把旧衣服用蒸气机洗净消毒。”

这以后再也看不到有人抓虱子了。

其时西大门监狱挂着“京城监狱”的牌子，囚犯总数近千名，大部分是义兵，其余就是所谓的杂囚。我一听说囚犯多数是义兵，甚为高兴，认为义兵都是为国事而奋斗的义勇男儿，无论其气节或是斗争经验，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很多。可是和他们交往后，发现他们有的是江原道义兵参谋长，有的是京畿道义兵中队长，总之都是义兵头领，看不到一个士兵。起初我很尊敬他们，后来从他们的为人处事来看，纯粹都是些强盗土匪。当参谋长的那个人根本不懂得军事战略，很多人也不知道起义的目的是什么，国家为何物。他们常常沾沾自喜地谈起自己过去如何携带枪支武器，横行乡里，并以此为荣，洋洋



自得。我刚转移到此地时，他们晚饭后从工地回来，一拥而进，换好了衣服后，有一人问我说你这个新囚犯家住哪儿，犯了何罪，我一一作了回答。于是又有人叫喊说，你这新囚犯，快快向头领参拜，还有人说你当强盗时害怕不害怕，把你当强盗的事说给大家听听。一时间，各种各样的问题像连珠炮似地提了出来，你一言我一语，乱哄哄的真不知该回答谁是好。我索性坐在一旁，一言不发。“瞧这家伙，怎么不回答问题啊？”于是又引起一阵嘲笑。我想这些没有见识的家伙看来更像是杂囚，只得仍坐在一旁，默默不语。不一会儿，一个韩籍看守走来跟我说：“五十六号，你是从拘留所来的吧？”“是的。”我回答说。他接着又用同情的语调说：“公审时我也去旁听了，真可惜啊！看来命该如此，有什么办法呢？你还是放宽心吧。”说完离我而去。随后，日本看守们又拥了过来，看看我的名牌，看看我的脸，叽叽咕咕地说了一阵子。那些囚犯刚刚还乱吵乱闹，现在目睹此状，又窃窃私语起来。有的说朴看守如此尊敬这个新囚犯，他是当官的，对一个囚犯这么恭敬，还是头一次见到；有的说看来他是朴看守的亲戚。还有人正色地问我和朴看守是什么关系，我回答说：“什么朴看守李看守，我不知道。”又有人问我以前是不是做过什么大官，我说没当过。其中有一个人问我认不认识梁起铎，说是看我像一个国事犯，他说听某看守说三天前来了个新囚犯是大韩每日申报社长梁起铎，他的同犯都是些有名的绅士，看来我也是个绅士，所以不肯回答他们的问题。又说别看不起人，他也是许旺山手下堂堂的参谋长，来这儿想摆架子是不行的。我起初以为他们都是些下等的杂囚，听说是许芳的部下，不禁叹息不已。这种人当了参谋长，许芳先生的失败也就不言自明了。

狱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李康年和许芳两先生，被日寇逮捕后，不接受审讯判决，痛骂日寇，遂被处死殉国。西大门监狱原有一口自来井，从许芳先生服刑之日起，井水变红，浑浊不堪，变成一口废井。

听到他们两位保持着这样冰清玉洁的气节,我自愧不如。我虽然仍保持着原来的精神,没有变节,但倭寇把我视为牛马,我受到了野蛮的对待,哪里还有资格来评论当时的义兵呢?我轻视义兵囚犯,现在就好像受到了他们的领袖许、李两先生灵魂的严厉斥责。

“旧时义兵目不识丁,无知无识,这是事实,但是你不也是受教于高先生后才深明大义的吗?在他的金玉良言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即使是三尺童子,使之向犬羊顶礼膜拜,也必大怒而不允。你曾以此在讲台上教导神圣的下一代国民,而现在你能向日本看守俯首行礼吗?你总是读诵古人之诗句:‘食人之食衣人衣,所志平生莫有违’,现在你难道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吗?你自幼至今不耕而食,不织而衣,都是大韩社会供养了你,如今倭寇供你粗茶淡饭,给你穿红色囚衣,他们是要你顺从,难道你就不知道吗?不管名义上是叫义兵还是贼兵,但他们都宁愿受十年甚至终身的监禁,也不当倭寇的顺民,仅此一点,也足以承认他们的义兵价值。男儿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你平时这样教导你的学生,那么你今天是求生还是求死?你今天忍受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十七年后你就自信能将功赎罪?”

一想到这儿,我心神不宁,极端苦恼。

恰在此时,安明根跟我悄悄地说道:

“我自入狱以来,总是认为一日不死,即受一日之辱,两天不死,即受两天之辱,我想绝食而死。”

我毫不考虑地回答说:

“办得到就那么办。”

从那一天开始,安明根就以肚子痛为由,把他的每顿饭都分给别的囚犯,这样继续了四五天没吃东西,因此他虚脱得只剩下奄奄一息。眼快的日本鬼子自然不会信他的话,把他转到医院看病,诊断结果知道没病,便把安明根反绑起来,强行打开他的嘴,灌进了鸡蛋等一类流质食物,因此挽回了一条垂死的生命。在这里连死的自由都没有。

安明根又通知我说：

“我又开始吃饭了。”

“连操生杀大权的菩萨一进此门也得和解，你要自重啊！”

在狱中遇到了故友李在明义士的同志们，他们是金正益、金龙文、朴泰殷、李应三、田泰善、吴复元等，也有安重根义士的同志禹德顺等。我们真是一见如故，互相敬重。他们的为人处事，与那些义兵囚犯相比，犹如鹤立鸡群。

金佐镇是个刚强勇敢的青年，为国事展开活动，不幸被捕入狱，我们彼此建立了感情，逐渐对狱中生活也感到了一些乐趣。

我们转移到西大门监狱后，过了不久，又发生了一桩重大的事情，这是日寇清除砂砾石子的第二次事件。

第一次事件是以黄海道安岳为中心逮捕了四十多名同志，处以刑罚，这一次倭寇以所谓暗杀寺内总督阴谋的莫须有罪名，在全国逮捕了七百余名爱国者，在警务总监部内施以我们曾经受过的酷刑，然后把其中的一百零五人移送法院，这就是所谓一百零五人事件，或称新民会事件。被判二年有期徒刑的梁起铎、安泰国、玉观彬也受到牵连，放逐到济洲岛的李升薰也被抓了进来，看样子倭寇是打算要从新买来的田里，把所有的石头都清出来。

我服刑刚满八九个月后，母亲到西大门监狱来看我，我听到了开牢门的声音，不久打开了仅有拳头般大小的洞来，向外一看，母亲站在那里，她旁边站着一个日本看守。母亲泰然地对我说：

“我认为这样比你做了京畿监史还值得高兴。因为规定一次只准一个人会面，所以你的妻子和女儿化敬都在外面等着哩，我们三个人过得很好，你不必挂念，希望在牢中好好保重身体；如果饭不够吃的话，我们每天送两次来给你好吗？”

母亲其实是很悲痛，会见了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的儿子，怎么还能够那样泰然自若呢？我相信在回去的路上，她老人家一定是泪流满面。

狱中的生活不可能一一叙述,只能就衣食住行等方面把我亲身体会或亲眼见到的说一说,也谈谈我的生活真相。

囚犯们在判决前都穿着自己的衣服,如自己没有,则发给你青色囚衣。判刑后的服役期间则发给朝鲜式红色囚衣。从立冬到春分穿棉衣,春分以后穿单衣,病号则穿白色囚衣。

伙食是一天三顿,由他们配给,因为是各个道自选粮食,所以各个道吃的都不相同。当时西大门监狱是五分豆子,三分米,二分糙米。饭的量也分为八等,逐等增加。如由亲属送饭,则先经看守检查后再行分给各人,这些囚犯要集合在一处吃饭。如是吃狱中伙食,则除了饭的量按等级有所不同外,其他都是一样。这些囚犯可以在自己的工地或牢房内吃饭,开饭时各人分配到饭食后,看守让大家叩头,囚犯们随着口令跪了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低下了脑袋。随后看守又用日语呼口令:“还原!”大家一齐抬起头来,“吃饭!”大家开始吃饭。喊口令的看守还向囚犯训话:“天皇可怜你们这些罪犯,才给你们饭食,快向天皇叩头,表示感谢!”

但是每当喊“敬礼”时,我看到囚犯们在喃喃自语,嘴里在默祷着什么。我很奇怪,以为是在向天皇表示良好的祝愿,事后跟熟识的囚犯一问,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你没看到日本法典吗?那上面不是说天皇或皇后死亡,要下大赦令释放罪囚?所以我们这些罪囚都低头向上帝祷告,盼天皇快死。”

我听了十分高兴,决定也跟着学。此后每当吃饭时,我就跟念经似的,向上帝祷告:

“上帝啊,请赐给我全能,让我手刃东洋罪魁倭皇。”

囚犯中常有人受到减食处罚,谁要是把饭分给别人,或是吃了别人的饭食,被看守发觉,重则减去三分之二的量,轻则减少一半,要执行三天乃至七天,而且还要受到看守的毒打。日寇订有监规,减食则是处罚之一。

我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表面上是穿着红色囚衣的囚犯，但在精神上决不认为自己是犯人。从精神上来说，死活都是大韩的爱国者，而不是日寇所谓的“新顺民”。我要尽可能以实际行动来反抗日寇的法律，而这才是我活着的本意。我每天总是有一顿或两顿吃送进来的饭食，吃了一顿有营养的饭食后，就让出一顿给吃不饱饭的罪犯，这样对我的健康也不会有太大损害。

因此我每天都要把饭分给身旁的罪犯吃。刚一开饭，我就暗地捅一下身旁的罪犯，他也明白是什么意思，就赶紧吃完自己的一份，把空碗放到我的面前，我就赶忙把我的饭碗偷偷递给了他，这样看守看起来好像我已经吃完了饭的样子。

可是问题常出在囚犯自己身上。他们分到饭食时，好像是一生都不会忘记你的恩惠似的，可是下次没有分给他，而分给别人时就不高兴了，骂骂咧咧地说：“他是你干爸吗？你想立孝子牌坊啊！”当时被分到的人，为我不平，立刻与骂我的人发生口角，终于被看守发觉，双方都挨罚。因此我认为做了好事，反而收到了恶果。

我刚进入西大门监狱的时候，受到先进来的一批人的轻视，但是等到他们知道我是所谓的“国事强盗犯”之后，开始改变了态度。尤其是李在明烈士的同志们都很有学问，同时通晓日语，因此当囚犯和看守之间有什么问题发生时，都由他们来做翻译，所以深受日本鬼子的信任，性情不好的罪犯有时一天要被叫去好几次，他们怕得罪翻译，于己不利，又看到李在明烈士的同志们对我都很尊敬，也就不敢再轻视我。加上看到我分饭食给别人吃，不管怎样，自己往后也总会轮到的，所以他们就不敢把我怎么样。

总的说来，我们五六十名同志人格高尚，才能超群，又互相精诚团结，不容欺侮。因其他事件而被关进来的囚犯中，有头脑的人也跟我们有了情义，我们俨然变成了囚犯们的领导核心。

表面上囚犯的监督是日本鬼子，但在精神上起指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同志。牢房是杂居，房间面积约相当于三张半日本草席，住着十

多个人，人多时有时也住上二十多人，都按编号分一、二、三、四列依次坐着。晚饭后有几个钟头的自由时间，可以看书，文盲则可以耳语交谈，但严禁高声朗读或讲话。一出声音，看守就过来问谁说话，谁要是承认了，就得把手伸出铁栅外挨手掌心。这时各个房里就传出了“唉呀唉呀”的呼痛声和责打人的声音。最初看到日本鬼子这些蛮行，真是惨不忍睹，后来看多了，神经也就变得麻木起来，不再把它当回事。

独立运动开始后，张德俊义士作为东亚报的随军记者，出差到北间岛，见到日本鬼子不管是独立军还是平民百姓，见人就抓，不禁义愤填膺，向鬼子队长提出了严正抗议。鬼子队长表示歉意，把他们送出门外，后来暗地里逮捕了他，将他秘密处死。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到处流传。我入狱后经过自身的感受，对这一消息也深信不疑了。

我和崔明植已久不见面，有一天忽然想见见他，以舒我胸中的郁闷。崔君生了疥疮，因此被隔离开来，住在疥癬房内，我想如果我生了疥疮，便可跟他住在一起，所以在狱医巡视前三十分钟左右，我用铁丝尖端刺破了指缝，伤口顿时肿胀起来，起了水泡，流出水来，看起来跟天然疥疮一样，这个障眼法成功了，我被送到疥疮房跟崔君住在一起。因为过分激动，我们俩人谈得很晚，被一个叫佐藤的狱卒发觉，问是谁先讲的话，我说是我先讲的，就把我叫出铁窗，用棍棒乱打，我什么话也没说，任他殴打。就在这一次挨打时，我左耳上的软骨被打伤，现在还留着疤痕。很侥幸，他放过了崔君，又用日语说道：

“再讲话还要打！”说完扬长而去。

我装作得疥疮要求转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牢房人数太多，人们挤坐在一起，就像发豆芽似的。睡觉时一人头朝东，一人头朝西，一个挨一个地躺着，再睡不下时，就在左右两端各站一名力气大的人，脊背顶着板壁，用脚蹬躺下来的人的胸脯，蹬得人直叫唤：“哎

啃,肋骨都蹬断了!”好容易挤出一条缝隙,让站着的人躺下。若要翻身,则须一致行动,面向南者则朝北,面向北者则朝南,大家一齐转身。就是这样,由于白天劳累,人们还是脸挨着脸地睡着了,力气小的则被挤得擦了起来,躺在别人的身上,被压在身底下的人推来推去,到处翻滚。囚犯们就这样渡过狱中的一夜,直到天明。

夏冬两季,牢狱生活就更为痛苦,夏天,牢房里由于人的呼吸和汗气,整个房间像蒸笼似的,有的罪犯窒息昏倒,就用冰块冷敷,使之苏醒。也有人就此死去,死人多的就是夏季。

冬季每间牢房住二十人,只给四床棉被,而且只能盖到膝盖,耳朵鼻子,小腿双脚全都冻伤,惨不忍睹。也有被冻掉手指脚趾,成了残废的。

看守心肠十分狠毒,听到谈话声就问谁在讲话,这时如果没有人坦白或无人告发,他们夏天就把房门紧闭,冬天则把房门敞开,这是他们惩罚犯人的妙方。

在牢里最苦的是身材高大的人,我身高五尺六,是中等身材,比我个子还高的人睡觉时则常常把脚趾伸到别人的嘴里,冬天挨冻也最厉害。衰老的囚犯也有胸部被挤伤,因此而死亡的。

那些家伙对我还算客气,让干活时只是嘴里嚷嚷,并不真的让我干。我到西大门监狱头一百天还戴着手铐,在这狭窄拥挤的牢房里戴着手铐睡觉真是件痛苦的事,手铐挤压在别人身上,人家都喊受不了。因此我才想方设法要转监,不料因谈话而受到这一顿毒打。

监狱里行动处处受制。清晨一觉醒来,也不能起身,一定要遵守时间并听从口令。看守们把犯人叫起来,有一个鬼子面向牢房用日语呼喊“立正!”犯人们就一齐低下脑袋。此时有一名看守手拿名牌,从第一号起直呼到最后一号。囚犯们胸前都贴有番号,叫到自己的番号时,则应声抬头,回答一声“有”。

点名完毕,脱去睡觉时穿的衣服,把它叠好,用块毛巾遮住下身,裸体前往工地。工地远者百步,近者约五十步,一路上都铺着砖

头，路只有一砖宽，我们赤身光脚，又甩不开胳膊，只好缓慢地行进。到了工地，穿上自己的工作服，然后列队蹲下。清点人员，洗完脸，吃了早饭，便开始做工。工种有简单的铁工、木工、织工、被服工等，也纺织草袋、制做卷烟、搓草绳、锄地、洗衣、做饭。罪犯中被他们认为品行端正者则被选作内监外役所的清洁工、监狱医院的护工和伙房的伙夫，从事这类劳役的人都心满意足，他们所受的待遇较好，痛苦也少。

上工地或回牢房时，夏季尚可，其他季节，浑身都呈青紫。冬天到了工地，衣服的缝隙都沾满雪花，但是一穿上身，全身还是能感到有些暖气。

一天的劳役结束后，在工地吃了晚饭回牢房时，又要脱掉工作服，和早晨一样，赤身裹着一条毛巾，到了牢房，又清点一遍人员，然后坐下，直到规定时间才让睡觉。

在监狱里这样残酷地对待囚犯，使囚犯的性情更坏，更加自暴自弃，所以因欺诈或贪污罪名入狱的人最后都变成了窃贼或强盗，许多人刑满出狱后又被送进监狱。

日本人虽想以其狭隘的心胸来感化充满着民族反抗意识的我们，但这是不可能的。即便是由本民族来管理监狱，但照这样的方式办下去，也不会有任何好处。日后我国取得独立，狱卒也必须具有大学教授的资格，而对待犯人，与其把他们当作罪人来看管，不如把他们看做国民中不幸的一员而教之向善。同时社会也应该摒弃对坐过牢的人的蔑视，而以大学生的身份待之，那样就一定会收到好的效果。



# 16

## 西大门监狱的铁窗生活

我在前面讲了一些义兵的缺点，这里我再说一说一般囚犯的品性以及我的见闻。

我在监狱里看到了一些千奇百怪的事情，这在普通社会上未见，闻所未闻的。举例说吧，犯人们毫无忌惮地谈论着自己在什么地方偷了什么，杀死了某某，不但不感到羞耻，反而津津乐道，他们跟熟悉的人谈还情有可原，可是竟然在初次谋面的陌生人面前也厚着脸皮讲这些隐私，这在普通社会是不会有这么做的。

我跟崔明植君在编织草袋的第三工场担任清扫工作，我们把工具材料分发给犯人后，就在院子里打扫。打扫完毕，就到处走走，看看犯人们编织草袋。在日本看守监工的一个钟头里是没有自由的，但是在韩籍看守监工的半个钟头里，却是比较自由，也较为清闲。这时囚犯们就像开茶话会似的，一个个都在窃窃私语。韩籍看守也和日本看守一样，会大声呵斥：“不准讲话”，实际上这是通风报信，告诉犯人日本看守长或是什么部长来了。

后来我和崔君决定，利用到处转悠的机会，在囚犯中挑选优秀的人材。我们到处转来转去，看到有突出的囚犯就各自记下他们的号码，然后我俩碰面后再互相核对，如果遇有两人同时记下的号码，

就开始调查他的来历和为人。

用这种方法我们找到了一个人，他跟别人穿的一样，也做一样的工作，但他的眼神却流露出凛然的正气，动作也与他人不同，年龄大约四十岁左右。我去请教他，他说他是忠清北道槐山人，因强盗罪被判了五年徒刑，已经服刑两年，还剩下三年，大家都称他为金进士。他问我是谁，是什么缘故入狱的，我回答说是黄海道安岳人，因强盗罪被判十五年徒刑，去年刚入狱。

金进士说：

“那可是不轻啊！”

他又问我是不是初犯，我说是的。正在这时，一个日本看守来了，我们中断了谈话，就分开了。

一个囚犯看到我跟他谈话，因此问我是否认识他，我说只是初次见面，他说：

“一提到他，南道的盗贼没有一个不认识的，他是三南有名的不汗党<sup>①</sup>首领金进士，这个监狱里就有不少他的部下，有的已经病死，有的被判死刑，也有的被释放了。”

那天晚上，我们赤裸着自工场回到牢房时，他也裸着跟在我们后面走进我住的房间来说：

“从今天起要来这房间打扰了。”我很高兴地问他：

“你也转到这个房里吗？”

“是啊！原来老兄住在这个房间。”他也以高兴的口吻说。

穿上衣服后，我请同屋的囚犯站在铁窗下给我们望风，便跟金进士谈了起来。

我首先表示刚才在工场里没谈完感到遗憾，现在又在此相会真是幸运，他也表示同感，接着他就像耶稣教牧师对新人教者进行洗礼问答一样，频频地问：

---

<sup>①</sup> 明火执仗的强盗团伙。——译注

“老兄，你不是因强盗被处刑十五年吗？”

“是的。”

“那么你是属于那个系统呢？是‘秋雪’还是‘牡丹雪’？‘行乐’多久了？”

我对他的话一概不懂，‘秋雪’、‘牡丹雪’是什么呢？‘行乐’指的又是什么呢？看到我狼狈的样子，金进士笑了：

“老兄像是‘北大’。”

这样说着，他脸上显出有点轻视的样子。

在一旁听我们说话的一个罪犯，指着我对金进士说我是国事犯，替我说明了为什么听不懂他的话的原因，看来这个罪犯倒是属于某个系统的真强盗。金进士听了点点头说：

“我就感到奇怪，刚才在工场里老兄说是因为强盗罪被判十五年，我怎么看也看不出强盗的味道来，所以才说你像‘北大’。”

我想起年前在杨山学校跟教员们谈起的话，江湖上有所谓活贫党<sup>①</sup>与不汗党的团伙，他们侵袭村庄城镇，杀死官员，夺走钱财，他们勇敢而又团结，机动灵活，神出鬼没，捕快和军队也无法把他们斩草除根。我们如果要实行独立运动，就必须有坚强的组织与机敏的训练，因此有必要研究他们结社和训练的方法，可是和教员们一起研究数月，也无结果，就此不了了之。

一个人如果饿上三天，就会起当盗贼的念头，但只光想就成得了吗？一两个越墙钻洞的小偷也许容易，要说几十名、几百名的盗贼团伙，就要有组织、有训练、有条规，更需要有头目的领导才行，能成为几十、几百名强盗团伙的首领，那么他必具有统治一个国家的智慧、勇气与威严。

因此我向金进士问了有关团伙组织的事，原以为我不是他们的同伙，他不会告诉我内幕，所以向他说明了动机，问他的目的不是为

---

<sup>①</sup> 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译注

了消灭盗贼，而是供今后爱国运动参考。出乎意料之外，他竟然毫无保留地回答：

“迄今为止，我们国家的精神全被瓦解，只剩下刑罚和盗贼而已。”

金进士以此为开场白，接着又举例说明其组织、训练和实践。据他说，高丽以前已无从查考，但李朝时代盗贼团伙的起源则是志士们对李成桂以臣弑君之悖义行为感到气愤，遂成群结党，他们杀戮追随李成桂贪图荣华富贵的两班，抢劫其财物，破坏篡国者建立的秩序，这是一种对不义的报复心理，其精神可与杜门洞七十二贤<sup>①</sup>相媲美，因此他们虽名为强盗，却不扰民，只是劫富济贫，他们这样敢与国家对立，自然法规必须森严，而且团结力很强，故此能够以小团体的力量与延续五百多年的国家力量相抗衡。这个盗贼团伙中以江原道为根据地的一派称为“牡丹雪”，在三南的一派称为“秋雪”。两派的人相见以同志相称，非常亲切。还有未加入这两派的临时盗党称为“北大”，这些人专门打家劫舍，抢劫百姓，为“牡丹雪”和“秋雪”两派共同的敌人，因比一遇到了“北大”就定杀不赦。

牡丹雪和秋雪的最高首领称“老师丈”，老师丈之下有“有司”，掌管总的事务，同时各地方的头目也叫“有司”。一年之内招集一次“大将”，这是“牡丹雪”和“秋雪”两派的大会，一派的大会随时可以召集，称之为“将”。大会要全体人员全部出席是不可能的，所以只从各道各郡派遣几名代表参加，其代表各地的“有司”指派，一经指派后就要绝对服从。

开会的地方时常在大庙或市场。大多是讨论或指示大小公事，会后依例以占领某村庄或市场来示威。

他们去参加大会时，各自假装成两班、生意人、赶集人、和尚或丧仪队等等各式各样的人，任何举动都躲开官民的耳目。袭击某地

---

<sup>①</sup> 杜门洞位于京畿道开丰郡光德面光德山西面，高丽时忠臣集居之处。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时杀害了申珪等七十二贤士。——译注

时也是一样。当时轰动一时的袭击河东赶集场就是假装成丧仪队，棺材里藏的是武器，其他人假装成抬棺人、送葬人和丧家，他们都是一色素服，光天化日下进入河东邑内举事。丧仪队进入市场后，先在一家大酒店的院子里放下棺材，丧主们拄着竹杖，围棺痛哭，抬棺人则喝起酒来。这时有一个送葬人买了一碗狗肉汤请丧主喝。丧主说：“别开玩笑，丧家哪能喝狗肉汤？”这个送葬人仍硬逼着丧主吃，丧主们大怒，开始发生了争吵，其他送葬人就过来劝架，你一言我一语地乱成一片。赶集的人们也都拥过来围观。这时丧家三兄弟举起竹杖，打开了棺材，丧主、抬棺人、送葬人都各自从棺材里拿出了枪，跑去守住了四方的路口，禁止人们出入，他们把市场里的钱财、富商的钱财洗劫一空，在双溪寺分了赃，一哄而散。

金进士滔滔不绝地说完后问我。

“老兄来自黄海道吗？那么可晓得年前侵袭青丹赶集场，杀死谷山郡守的事吧！”

我说是的，金进士像是回想着过去的事，而感觉到很愉快似地笑着说：

“那时候指挥党徒的就是我，我穿着两班的服饰，乘着四人轿由家丁们前呼后拥着，浩浩荡荡地进入青丹赶集场，在赶集场办完事后像疾风迅雷般地进入谷山邑杀死了郡守；那个家伙虐待百姓，鱼肉乡里，我们是替天行道，他罪有应得。”我问他：

“那么你是因此事入狱的吧！”

“不，如果是为了那事件入狱，五年会够吗？我总觉得这次不会轻易脱身，所以只供出一件不太重要的事件，才判五年徒刑的。”

金进士又继续说：

“因为是秘密结社，所以在组织上是十分严密的，要充分说明这一点很难，老兄不是研究多时也不得要领吗？我先从这里说起吧，党徒的数量不必太多，一定要少而精。老师丈让各地有司每年要精细地调查一名合格者向他报告。所谓合格者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要

眼光锐利；第二下面的关系要清楚；第三要有胆识；第四性格要沉着。把合乎这些条件者秘密地上报后，由上一级组织再进行秘密调查，然后再委托当地有司把合格者吸收为同党。

合格者当然先要介绍自己，但是他完全不知道对自己进行的秘密调查。有司接受了老师丈的指示后首先了解合格者的喜好。好色者投以美色，嗜酒者赐之以酒，爱财者则赠以财物，总之是投其所好，这样一来，日益情深义厚，亲如手足，于是便开始训练。方法之一是由负责人伴同合格者外出游玩，夜深方归，行至某家门前，便让合格者在门外稍候，自己进门去会见主人，突然内院高喊抓贼，于是捕快自房屋四周扑了过来，先将站在门外的合格者捕获，又冲进内院抓住负责人，一齐押到深山幽谷，开始审讯，主要是对合格者施以七十多种酷刑，进行拷问，如果合格者受不了酷刑，招供自己是贼，就当场杀死，毁尸灭迹，如能坚持不招，否认是贼，则立即松绑，请至幽僻之处，以酒肉款待数日，再举行入伙仪式。

在入伙仪式上，责任有司坐在正席，命合格者跪于座前，张大了嘴，然后拔出剑来，将剑头塞入其口，并令他用上下齿紧紧咬住剑头，喝令他抬头望天，俯首看地，再看有司，最后从他嘴里拔出剑头，插入剑鞘，并向合格者宣布：“你已认识天、地、人，可以确认你是我们的同志。”至此仪式结束。有司还要带领新入伙者和众党徒一起按预定计划正式抢劫一次，所得赃物，平均分摊，这样经过数次，新入伙者也就成了地道的强盗了。

我又问金进士：

“你们的党徒四散活动，彼此又不认识，相遇时难以避免冲突，有很多不便，是不是有什么暗号标识？”

“是啊，我们的暗号标识经常变化，没有永久固定的，但暗号总是有的。举例说，年前有几个大商贾住进了旅店，我们得悉后，半夜里带领同党冲了进去，搜劫财物，他们都匍匐在地，不敢动弹，其中有一人结结巴巴地说：‘哎，做酱时我也出了三两份子钱的。’‘放肆，

给我绑了，把他拉出去！’拉到面前问清后，确实是我们的同志，这样我们分赃时也有他一份。”

“我听说强盗分赃有时分得不均，常引起争斗，往往把事情暴露了，遭到逮捕，这不能不是个缺点。”

“这是北大他们干的。凡属于我们系统的决不会有此丑事。首先我们决不经常外出抢劫，一年最多也不过两三次，分赃也都按老规矩分配，百分之几归老师丈，百分之几是各地方的公积金，遇难的遗族救济费也占去若干，除去这些外，还要划出一部分奖金给最担风险的人，剩下的平均分配，决无分赃不公的现象。”

“我们的帮规有四大死罪：第一是和自己同志的妻妾通奸者；第二是被捕后出卖同党者；第三是抢劫时隐藏赃物者；第四是抢夺同党财物者。捕快追捕，也许可以远逃保命，但被我们宣判了死刑的，决难逃生。此外，想要洗手不干者，或因年老申请脱离帮派者，则必须答应一个条件，即当同党危急时，允许他躲藏在自己家，这样方可免除‘行乐’。”

“什么叫‘行乐’？”

“我们把抢劫称为‘行乐’。”

我又问道：

“假如行乐被捕，有无使之生还的方法？”

“嘿，要是我们被捕一个死一个，几百年后岂不是绝种断根了？其实我们不光是在民间，就是在官府，尤其是在捕盗厅和军队里，都有身居要职者，某道抓到盗贼，上报到京城，自然能分清是‘雪’还是‘北大’。如是‘北大’就让地方处决，如是属于‘雪’系统的盗贼，就让押到京城审问，要是他供出同伙，就处以死刑，只招认自己的事而不牵连他人，那就要供之以衣食，千方百计地救他出狱。”

我听了金进士的话后，想到我们谋求国家独立而秘密结成新民会，我就是该会会员之一，但就组织和训练来说，连那些盗贼团伙都不如，真使我感到万分惭愧。

当时在监狱里这一类强盗是最有权威的，投靠倭寇当上了巡查或宪兵补助员的，一旦入了狱，在囚犯们面前就抬不起头，诈骗、偷窃、贪污等罪犯在强盗犯面前也是不敢动弹的。但是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则比“牡丹雪”强盗更有威势。高贞和为衣食而抗争就是一例。高凤洙也是这样。有一次他把值班看守绊了一个跟头，看守爬起来，不但不处罚他，还发给他奖牌。这看来奇怪，但也事出有因。如果这个日本看守把他受辱之事报告给上司，那他自己也丢尽了脸面，所以他反而向上司报告说高凤洙品行端正，堪称模范。金鸿亮也买通了看守，给他秘密地送补药，还带进报纸给他看。

在这里使我联想到同志都寅权，他本是龙冈人，从卢伯麟、金义善、李甲等将领习武，他的军职升到正校，后来军队被日寇解散后返回乡里，受聘为杨山学校的体育教员，于是我们成为同志。他为人机灵刚毅，在这次事件中被判了十年徒刑，由此他开始笃信基督教。有一次星期天狱中集合囚犯，让大家在佛像前膜拜，罪犯们都低下头，心里在默祷天皇快死，都寅权则自称是基督徒，坚拒跪拜，不管狱卒如何搥他的脑袋，他还是直着脖子，不肯低头，他说日本国法规定信教自由，监狱法也没有哪一条规定犯人必须信仰佛教，为什么要强迫信佛。怕把事情闹大，后来狱中终于决定不强迫人家拜佛。

他在狱中也不接受发给他的奖状，他认为奖状是发给改过自新的人的，自己没有犯罪，也没有悔改的必要，所以没有理由要接受那捞什子奖状。

后来他被假释出狱，都寅权认为自己本来就没有犯罪，现在平反的话，应该取消判决，无罪释放，那假释出狱的“假”字，实在令人不快，因此拒绝出狱，监狱当局没办法又把他关了起来，等刑期满后释放。都寅权这种行为，恐怕强盗也做不出，他真有“满山枯木一叶青”的气概啊！

为了都君我一再吟咏着佛家的句子：

“崑崙落落赤裸裸，独步乾坤谁伴我。”



囚犯中有一个名叫李钟根的二十岁青年,他是义兵将领李震龙的族弟,自幼就会日语,日俄战争时当了倭寇将领明石的翻译,此后又当了宪兵补助员。李震龙起义之初,要将钟根处死。钟根向李义士求饶说:

“族弟年少,不明大义,当了日寇的走卒,现在愿随哥哥一起举义,消灭倭寇,将功赎罪,望哥哥饶恕小弟。”

李义士随即撤销了死刑命令。

钟根从此拿着宪兵补助员的枪支,当了义兵。李义士战败,钟根被日寇生俘,判了死刑,钟根请求面见明石,于是看在过去的情分,减为五年有期徒刑。入狱后,钟根向看守提出要求,说自己目不识丁,愿和五十六号住一室,同在一个工场干活,顺便也可以学习认字,他的要求获得了批准。此后两年间,我教他识字,他也给了我很多照顾,后来他被假释出狱。我从家信里得知他出狱后还带着妻子去安岳探望了我的母亲。

有一天正在做工时,忽然命令终止工作,把囚犯们集合在一起,宣布明治死了,因此下了大赦令,违反保安法的犯人被判二年的当天就可出狱。犯于强盗罪的,明根兄未被减刑,被判十五年的,只有我一人被减刑八年,还剩下七年,金鸿亮等均被减至八年,被判十年、七年、五年的也按比例减刑。又过了几个月,明治的妻子也死了,因此又在剩下的刑期中减去三分之一,我的刑期只剩下五年左右的轻刑。

此时被判终身监禁的安明根也减刑至二十年,他虽然抗拒着宁愿加刑求死而不愿减刑,但是对囚犯一切都是强制执行,所以囚犯们连不减刑的自由都没有,终于改为二十年了。后来安明根移监到新建的孔德里京城监狱,因此我们再也没有谋面的机会。安明根前后在监狱里过了十七年之后,年前才获释放,在信川青溪洞与他的夫人安度劫后余生,过了一年多,由于怀念在中俄领域的父亲和弟弟,因而率家前往,由于长期受牢狱之苦,身体虚弱途中得病,怀着

千古遗恨在中国东北和龙县与世长辞。

经过这样好几次的减刑，我在西大门监狱过了三年多，就剩下两年了，从此开始萌发再次到社会上去活动的希望，我到社会上去首先要做些什么呢？志士们都来过监狱，受过非人的待遇，出去之后，有人反而对倭寇变得顺从了，苟且偷生地过日子，我禁不住感到寒心。我想我要是出去也变节，倒不如怀着圣洁的精神死在狱中。为表示我的决心，我决定把我登在日本户籍的名字“金龟”改为“金九”；把我的号“莲下”改为“白凡”，并且通知狱中的同志们，改名字是脱离日本国籍的意思，白凡是表示我国最低贱的屠夫和无知的凡夫，希望他们最低限度都有和我一样的爱国心的意思。这也正表明了我的心愿，因为我们同胞的爱国心及知识程度不提高的话，就不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独立国家。每次在监狱里清扫庭院，擦着玻璃时，我都向上帝祈求，如果我们国家独立的话，我愿意替政府清扫房屋和擦玻璃窗以终老。

我剩下不到二年的刑期时就转移到仁川监狱去了，我知道我为什么移监的原因，我跟西大门监狱第二科日本科长争吵过，他为了报复，就把我送到仁川去干筑港这个重活儿；我就此告别了许多同志和“愉快地”生活了三年的西大门监狱。

我被编入四十名穿红衣的囚犯中，腰间锁着铁链被拉到了仁川，谁会料想得到戊戌年三月十日晚上越狱逃亡的我，在十七年后的今天，又被缚着铁链再回到这个监牢里来。进门后环顾四周，牢房增多了，但我曾经在里面看书的牢房，仍保存在那儿，曾经散步过的庭院也没有多大的改变，我曾像老虎似地大声责骂渡边那家伙的警务厅，现在成了妓女检查所，监理史所使用的来远堂现在变成了堆放监狱杂物的仓库，以前主事与巡捕玩乐喧闹的场所，现在是倭寇的天下了，这就好像死了几十年的人再复活，重又回到故乡一样。我好像又看见了先父的慈颜，他站在监狱后墙外龙洞山坡上默默向下眺望，正想看一眼被关在牢房里的不孝儿子似的。然而世事变迁，

相信不会有人说今天的金九就是过去的金昌洙吧！

我进入牢房，看到有几个先从西大门监房转移过来的面熟的人，因此非常高兴。有一个人坐近我的身旁，望着我说：

“这位非常面善，你不会是金昌洙吧！”

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使我大吃一惊，仔细一看，原来是十七年前与我同监房的文种七，他因盗窃罪被判刑十年。虽已年老，但面目仍与年轻时一样，并无多大改变，不同的是额前多了一个疤痕。他看我惊讶迟疑的样子，就伸过头来望着我说：

“昌洙！老金！不会不认识我吧！现在如果没有这个疤，你就不会不认识我了，我是你逃走后被打了半死的文种七啊！”

“你这一说，我就知道了。”

他这样说，我不能硬说不认识，对他实在又讨厌又害怕，因此连忙跟他打招呼，姓文的又问我：

“当时轰动仁川港口的忠臣，现在又因何罪坐牢呢？”我觉得很讨厌，因此就简单地回答说：

“十五年强盗罪。”

姓文的噘着嘴挖苦说：

“忠臣与强盗的距离是多么远啊，那时因为让你跟我们盗贼住在一起，你痛骂警务官，现在判强盗十五年是你的。”

我虽很，并他，是的口对他说：

“忠臣与强盗不是人的？此一时，一时，那么你到是为了么来这苦呢？”

我这样子转。

“我！到现在已是七入了，这一在监过了。”

“刑是多久呢？”

“强盗罪判七年，已过了五年，再过二年又可以出去闯一闯再回来。”

“你说得太过份了吧！难道真会再回来不成？”

“乞丐跟盗贼做的是没本钱的生意！尤其是做贼做上了瘾，老手痒痒，想改也没法改了，你也别在这里净做美梦，到社会上去看看吧？谁肯要做过强盗又坐过牢的人呢？自然没法接触农工商任何一行，就像狗眼里看到的全是粪一样，做盗贼的人眼里见到的也只有做贼这条路，别无它路可走。所以谁能担保我不会再进来呢？”

姓文的这样感慨着，我又问：

“你是屡犯怎么还会减刑呢？”

“每次都说是初犯啊！如果把过去的一切事情都泄露出来的话，我恐怕再也呼吸不到外面的空气了？不是吗？”

他很坦诚地这样说。

我在西大门监狱时曾看到过某一个被处重刑的强盗，当他看到自己过去的同犯后来以欺诈罪被捕和处了轻刑，就去告密，使那个同犯改判重刑，而他却因功而减了刑，因此其他囚犯都看不起他。想到这里就想到千万不能得罪姓文的，否则他去告密，揭发我是十七年前的金昌洙时，我再过一年多就要出狱的希望又要破灭，因此我对待姓文的是亲切又亲切。给我送来的饭食一有机会就分给他吃，监狱里给的饭食如果他在我旁边，我就忍着饿全部给他吃。等到姓文的刑满出狱时，我高兴得差不多等于自己也出狱了。

我每天早上跟一位囚犯一起，腰间互相用铁链锁着到筑港工地去干活，肩挑泥担子登上十余尺高的梯子，人都快累死了，回想西大门监狱的生活比起这里真是一种享受。这里做不到半天，肩疼背酸双脚无力，全身动弹不得，但是仍不能不做，我好几次想挑着担子从梯子上跳下去，但是跟我绑在一起的人只不过是偷鞋子和香烟而被判三四个月而已，我不能连累他，所以我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只有拼死命地干活。

这样干了几个月，给我发了所谓的奖状，我没像都寅权那样拒绝，反而觉得很幸运。

每天到筑港工地去的路上，我总要经过十七年前待我父母很

好,而现在做经纪人的朴永文的家门,他的家就是牢门出来左边第一家。他是很厚道的人,过去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据说他与先父同庚,所以往来很密。我们经过他家门口时,朴老先生总是站在家门口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虽然是如此的近,但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向他问安,真是难过。

朴先生家的对面是安浩然先生,安先生也是经纪人,对家父母及我都非常好。我每次出入牢门,经过他家门前时,心中总是默默地向他两人问安。

七月间一个炎热的日子,突然召集全体囚犯到教堂去,因此我也去了。过了一会儿,日本分监长向座席叫着:

“五十五号!”

我立刻回答,他要我站到讲台上,宣布我假释出狱,我向座席上的囚犯们点头行礼后,在看守者的引导下到了办公室,他们给了我一套白衣服,因此由穿红衣的囚犯变为白衣人。寄存在狱中的钱、物品以及工资都照数给了我。

出了牢门,想的就是去看朴永文及安浩然两先生,是想  
的给人后对我很不,是他们的  
,要是十来不生的我突然出现,会出去,所以  
就着头经过他们家门不入,去在狱中的一中  
人,在他的家过了一。第到给安,要我  
子来,安  
的雇员刚好是我的学生,他一我的  
,我已出狱要乘车回家,就很高兴地答应去我家转告。

# 17

## 三·一万岁事件

当天我抵达汉城，改乘京义线的火车到新幕住了一晚，翌日在沙里院下车，搭渡船渡过船踰津，到了馊物坪，在新建的街道上，出现了几十个人，为首是母亲，她看见我，便来到面前抱着我流着泪说：

“你倒是活着回来了，可你的女儿化敬老是说想见你，可惜在三四个月前死了，你的朋友们说还是不要告诉你的好，因此没有向你提起这消息。化敬这孩子才只七岁，临死时还说不要告诉狱中的爸爸，怕你知道了伤心！”

我听到这个消息，便立刻去安岳邑东山腰的公墓，看望我的女儿化敬的坟墓。

母亲后面跟着金庸济等数十名亲友，他们跑过来跟我寒暄，一个个都非常高兴，感慨万千。

我的妻子当时在安新学校当教员，借住在教室里，因此我们就去了学校，妻在妇女群中望见我，一会儿就不见她消瘦的身影。她和母亲已商量好，要让我 and 亲友们一起吃顿饭叙谈叙谈，她忙着去为我准备饭菜。

几天后镇里的朋友在李仁培家为我设宴洗尘。来聚会的人中，

一边是老人，一边是我的中年朋友，还有一群青年人，都是我的学生。宴会开始，突然进来一群艺妓，还带着各种乐器。我大吃一惊。崔昌林等几个青年跟我说：

“我们好久不见先生了，今天十分高兴，想一起玩个痛快。老师，您什么话也甭说，就请您和各位用餐吧！”

老人中也有人跟我说：

“金老师，别管那些年轻人，我们在一起聊聊天吧！”

青年们指定某个艺妓给我敬酒，那艺妓斟了一杯酒给我，还唱起了劝酒歌。青年们一同起立劝酒：

“这杯寿酒是我们的心意，请先生一定要喝下去。”

我笑着推辞说：

“你们什么时候见我喝过酒来？我不会喝酒啊！”

有个青年从艺妓手中夺过酒杯，举到我的嘴边，强行劝酒：

“老师，您就像喝水一样，把它喝下去吧！”

我不愿扫年轻人的兴，勉强喝下了一杯。这时艺妓们开始歌舞。

李仁培家的前面，就是安新学校，乐器声和艺妓们的歌声可能传到了母亲和妻子的耳朵里，母亲当即派人来叫我。青年们看出了神色不对，立即跑去找母亲说：

“老师没有喝酒，正在和老人们谈心呢！”

母亲又亲自过来找我。我随母亲回到家中，她老人家面色微愠地说：

“我吃了那么多年的苦，就是为了要看你今天带着艺妓喝酒吗？”

母亲固然听到了歌舞声，但肯定是妻子向母亲告发，要让我中途退席的。

母亲与妻子之间以前并不是没有过冲突，可是我入狱后，她们辗转于城市和乡间受苦时，婆媳就情投意合，从没有发生过矛盾，这是妻子后来对我说的。我们夫妻间如有了争吵，妻就频频提起她们

在京城时，曾得到莲洞安德恩女士和郭贵孟女士很多帮助，生活困难时便把化敬交给母亲，她去日本人的土地局书籍装订工厂做事，当时曾有某一位西洋传教士的夫人对她说：“我可以供给你学费，让你去读书。”但是她不忍让母亲和化敬受苦，因而放弃了这个好机会。别的家庭，夫妻发生争吵时，母亲总是站在儿子一边，我们家则相反，如果我们夫妇间发生争吵，母亲一定支持我的妻子而责备我，依我的经验，他们婆媳间如有耳语，那一定是在说我什么了。如果我对妻子不满意而现出不高兴的脸色时，母亲一定怒气冲冲地对我说：

“不准亏待她，你在牢里时她是那样的守节与受苦；你狱中同志们的妻子中有不少年轻的不管丈夫的死活，或是离婚，或是干出了丑事，只有你妻子的贞节是得到大家公认的。”

这样，我在家中没有一件事是完全按照我的意思做的，我们夫妻间的争吵也从没有一次是我赢的。

我出狱后还有一件令我高兴的事是俊永叔对我家的厚待。母亲带着妻子与化敬到汉城探监途中，曾到过海州本乡俊永叔家中歇脚，他对母亲说：

“带着年轻的媳妇怎么可以到举目无亲的汉城去啊！我给您盖一间房子好了，不会让您和侄媳妇受苦的，还是打消去汉城的念头吧！”他再三挽留，然而母亲婉言谢绝了，她说：

“媳妇有玉石般的节操，到哪里去都不会有麻烦的。”终于往汉城去了。

我判了长期徒刑后，妻子说不管怎样受苦，也要住在附近好照看我，但未能如愿，只好又回家乡，靠了禹宗瑞牧师的帮助，住在钟山，叔叔还常常用牛驮着粮食送给母亲。母亲面露喜色对我说了又说：

“你的叔叔对你的情分跟以前不同，真令人感动，他如果知道你出狱了，一定会来看你的，你快写封信告诉他吧！”

母亲还提到岳母，她也和以往不同，现在很看重我了，因此要我



也告诉她出狱的事。我在西大门监狱时,母亲和妻子各自来看过我一次,此后每当到了探监时间,经常是岳母来看我,我很感谢她,她也十分后悔过去因大女儿的关系而亏待了我们。

听了母亲的话,立刻写了信告诉俊永叔和岳母。但现在仍在假释中,要想到哪里去都要得到日本宪兵队的许可才行,我非常讨厌向日寇低声下气地请求,所以在此期间,我连邻近的郡邑都未曾去过。

我曾到安岳宪兵队去谈过我的就业问题,我说我什么技术都没有,过去只是在学校教过书,现在我妻子又在安新学校执教,因此我愿在学校当助手教书。日本鬼子说要当正式教员不行,但非正式地当当助手,警察可以不管。

于是我每天就在安新学校教书度日。

岳母收到了我的信,十分高兴。她大女儿失节当了日本补助员的小妾,后来得了重病,回家和岳母住在一起,她们的生活正处于困境。接到我的信,岳母也顾不得脸面,带了病重的女儿,来到了我家。她大女儿要是还跟先前一样做日本补助员的小妾,我根本就不会让她们进门,现在看到她身染重病,来投奔自己的妹妹家,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就收留了她们。

我的居留限制解除了,金庸震君委托我去做几天的稻子收割监理,我去了文化弓弓农场,恰好叔叔来过了。母亲说叔父为了来看我这了不起的侄儿,特地借了人家的马骑来的,过了两天仍不见我回来,怏怏不乐地回去了。我也感到遗憾,好在快到年终,准备在正月初去给叔父拜年,顺便也去先父坟前省墓。

正月到了,我拜谒了我想要见的尊长,也接待了来给母亲拜年的人,决定初五到海州去,正巧初四晚上我的远房堂弟泰云带来了俊永叔叔去世的噩耗,真是令人惊愕的消息,我再也不能看到俊永叔了。父亲四兄弟中只有我一个子嗣,俊永叔也只有一个女儿,连唯一的侄儿的面都未见到,就离开了人世,他的心情该是多么悲哀啊!

伯永叔父虽然生过两个儿子观洙和泰洙，但他们早就夭折了，两个女儿出嫁不久也死了，因此绝了后，弼永、俊永两叔父各自都只有一个女儿而已。

天一亮，我就跟泰云奔丧前往海州，主持俊永叔父的葬礼，他葬在基洞小山东边的山脚下。我料理完俊永叔父的后事，又去父亲的墓前为我亲手种植的两棵柏树培土，然后回到了家。从此我再也没有回过亲爱而又可恨的家乡，虽然明知堂叔母及远祖仍健在，但也无法去拜访她们。

这一年女儿恩敬出生，我在安新学校教书，秋收时则到金庸震的农场当收割监理。

我虽然帮妻子在安新学校做了一些事，但一个所谓登记在案的前科犯，又加上世局之变迁，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光明正大地去从事教育工作，尤其像新民会一样从事政治运动的爱国志士，如今大都亡命国外或闭门养性，日寇也千方百计地不准我们这些指导者进入青少年的队伍里。

我不愿意就这样闲散下来，因此打算去从事农村事业。我自愿当金鸿亮的东山坪农庄的农监。东山坪几百年来一直是个宫庄，税吏土豪的欺榨压迫使农民逐渐堕落，几乎家家赌博，人人欺骗，无所不为，民风坏到极点，而且越来越穷，再加上这地方水土不好，土质之差是出了名的。

金家最早是由进士庸升擅自买进这一农场的，结果吃了大亏，陷于破产。各个兄弟见此情景，便分担了损失，于是东山坪便成了金家共有的田地。从前卢亨极当监官时，曾把佃农等召到自己家里赌博，一到秋收，就把佃农们收上来的谷物抢来抵债，不去赌者则根本租不到耕地。于是佃农家父亲赌博，孩子们就望风，看到警察来到，立即通风报信，这已成为这里普遍的习俗。

金先生他们不愿意我去这种地方，劝我到风景好、水土好的农场去。我也知道那里的佃农染有恶习，去那儿就是想搞些农村改良，

所以我仍是不变初衷，决定到东山坪农庄去。

丁巳年二月，我举家搬到东山坪。我事先就提醒母亲：

“佃农中有人来行贿送礼，就是我不在，也都一概拒绝。”

果不出所料，有人送来了烟、鸡、鱼、果品，他们是想要我答应给他们耕地。于是我就跟他们说：

“你要是空手来，我还可以考虑，送来礼物求情，我连听都不想听，你把东西拿回去，过些日子空手再来谈。”

“这可不是行贿。先生您初来乍到，我们不好意思空手前来，所以就带来这么一点东西，表表心意。”

“你家东西这么多，何必还要租别人的地？倒不如把你的地收回来租给别人呢。”

他们头一次听到这种话，茫然不知所措。

“这是以前监管通常的惯例。”

“我不管他们怎样，对本监官决不能使用这样的手段。”

我颁布了佃农守则：

1. 佃户不得赌博，凡赌博者不得租种土地；
2. 凡家有学龄儿童者，送去入学可多租一等地四五百坪；<sup>①</sup>
3. 家有学龄儿童而不让其入学者收回所租上等地四五百坪；
4. 凡勤于耕作、卓有成绩者，秋收时奖以谷物。

颁布了上述条文后，又建立了小学校，招聘教师一名，招收学生二十多名，随即开学上课。教师不够，我也抽时间到校兼课。想要租地耕种者不是学生家长，就难以启齿。

前监官卢亨极六兄弟不服从我的方针，反对农村改革，他们耕种的都是坪内上等好地，我就下通知收回他们的全部租种权，我想把这些土地分配给学生家长，但没有一人敢接受，一了解，原来是害怕卢家。

---

<sup>①</sup> 每坪合三点三〇五七平方米。——译者

于是我决定由我家来耕种从卢家收回的土地。

有一天黑夜，门外有人叫我，我出门一看，只见暗处有一个汉子大叫：

“金九，给你点颜色看看！”

我听他的声音，猜出是卢亨极。

“夜里到此干什么？”

姓卢的突然扑了过来，咬住了我的左臂，使劲把我拖向水库边，邻居们都出来围观，但无一人敢站出来劝阻。我想如此不可理喻的家伙，只能以力服之。卢亨极虽比我年富力强，但我也只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于是我拼命咬住他的右臂，像鸱河浦时那样，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与之对抗。这时姓卢的才松了口，向后退去。

我一眼看出，卢氏兄弟及其同伙已聚集在一起，藏匿在我邻居家，他们先派了卢亨极前来打先锋，我便高声喊叫：

“卢亨极一人不是我的对手，你们卢家兄弟不要再躲躲闪闪了，要抢要杀，随你们的便！”

躲在一旁窥测情势的卢氏兄弟吵吵嚷嚷，但没有一个敢站出来的。

卢亨极又大声嚷道：

“金九，你这小子，你知不知道以前的京监有多少人尝到水库里水的滋味后，后来夹起尾巴溜走了？”

隐藏的人中有一人跳了出来，边向另一处跑去，边大声喊：“等刮风那天给你厉害看！”

我朝着围观的群众说：

“诸位听到那家伙说的话了吧，请记住，有一天我家失火的话，就是他们干的，请大家到时候为我作证。”

卢家兄弟退走后，很多人都劝我不要和卢家结仇。

我严厉地斥责了这种论调。就这样一夜过去了，母亲连夜把这件事通报给安岳。翌日，庸震、鸿亮叔侄请了医生宋永瑞一起急速来

到东山坪,在宋医师看了我的伤口后,着手准备诉讼。

不久,卢氏兄弟来我处叩头谢罪,我劝阻了庸震、鸿亮叔侄,让卢家签约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行为,这一事件遂告一段落。

此后我执行了颁布的农规。每天早上一早起床就巡视各家佃户,有睡懒觉的我便把他叫醒,责备并督促他,劝他好好干活。家中脏乱的就让他们打扫干净,劝他们要注意清洁卫生,还督促他们砍柴草,鼓励他们编织草鞋、草席,搞好副业。

平时我还准备了出勤簿,对积极耕种者秋收时给以重奖,对懈怠者则警告他们如再不改正,要收回他们的耕地。

以往秋收时,债主们聚集在打谷场上,打场一完,谷物全被债主抢走,佃农们只是扛着打场农具,空手回家。我监督以后,如今是佃户家院子里堆满稻谷。农妇们见到这种光景,喜笑颜开,都把我看成是他们家的长者,对我既亲切又尊重。东山坪赌博之风也完全根绝了。

这时张德俊先生在载宁管理明信女校所属的庄园。他和我经常通信,交流平时的研究心得,介绍他在日本留学时考察的农村开发方案,我们决定互相协作。

池一清先生也在东山坪和我一起搞农村开发工作。他是我们的同志,也是我昔日开展教育工作时的知己。由于我们同心协力,工作效果更为显著。

这时,女儿恩敬夭折,妻子的姐姐也已亡故,葬在此地的公墓里。

戊午年十一月,仁儿出生。怀上仁儿时,母亲固不用说,就是亲友们也盼我们生个儿子,因为我已年过四十,又无兄弟姐妹,是个独子。仁儿出生后,金庸济向母亲祝贺说:

“婶子以后娶孙媳妇时,我也去帮着操办喜事。”

金庸升进士给孩子起名为金麟,因为要登记在日本户口簿上,以后又改名为金仁。

仁儿出生三个月后，正是己未年二月，冷云笼罩天空的寒冬已过，风和日丽的阳春降临人间。这时，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在京城塔洞公园“独立万岁”的声音响彻云霄，独立宣言书像雪片似地飞向各地，平壤、镇南浦、信川、安岳、温井、文化各地的人民群众风起云涌，振臂高呼万岁。

安岳早就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张德俊君一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派人骑自行车来我处送信：

“国家发生了大事，请速来载宁共商国事。”

我复信说伺机待动，便悄悄地去了镇南浦，又准备渡过镇南浦去平壤，那儿的朋友告诉我说去平壤很难，劝我还是回故乡去。听了这话，我又即日返回。回到了家，青年们来找我，说是安岳已经一切准备就绪，让我一起去高呼万岁。我告诉他们说我无意参加。他们反问道：

“老师不参加，谁来领头呢？”

“独立不是高呼万岁便能争取到的。要计划进行很多未来的工作。我参加不参加都不是问题，你们快去高呼万岁吧！”

他们当天就去安岳邑呼喊了“万岁”。我于次日清晨让坪内佃农们带着农具集合，照样去修筑堤坝，把守我家的日寇宪兵见我忙于农事准备工作，便放心地回去了。

我于中午时分告诉佃农们，让他们修筑完堤坝，我去去邻洞就回，便悄悄来到安岳邑。金庸震君跟我说：

“我让鸿亮去上海，他要十万元才去。我看还是您先去，让鸿亮秋后赶到。”

刻不容缓，我立即出发，到了沙里院，在金禹范家住了一宿，于次日清晨搭上了去新义州的火车。

# 18

## 流亡上海

整个车厢都沸腾起来了，话题都是关于“三·一万岁”的事件。都说是平安道金川某日喊了“万岁”，延白在某日、黄海道凤山在某日也呼喊了“万岁”。过了平壤，谈的还是在哪儿喊了万岁，伤了多少人等等，还有人兴奋地说我们可以不作牺牲而争取到独立了。他们说：

“我们已经独立了，只不过日本人还没撤走而已。只要全国人民一致奋起，高呼万岁，日本鬼子自然会被赶出国门。”

人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都忘记了腹中饥饿，就这样不知不觉到了新义州。听说这儿也呼喊了万岁，有二十一人被捕。

日本鬼子把守着剪票口，严格地搜索着旅客。我没带任何行李，只是在腰带上系着一条毛巾，毛巾里裹着旅费。鬼子问这是什么，我说是钱，鬼子又问是干什么的，我回答说是木材商，这就平安地通过了。

在新义州吃了饭，看到那儿也是人心惶惶的，到处流传说今晚还要再呼“万岁”。我乘坐中国人的人力车，越过大桥，来到安东县，住在一家旅馆里，改换了姓名，伪称是做小米买卖的。

在安东县停留了七天，就跟十五名同志一齐搭乘怡隆洋行的轮船，前往上海。途经黄海沿岸，日本警备艇鸣笛尾随于后，要求停船。

英籍船长根本不理，全速开过警备区域。经过四天，平安抵达上海黄浦码头。离开安东县时仍是冰天雪地，到黄浦江畔却是草木茂盛，最初一夜住在公升西里十五号。

这时，到上海来的人物中，有以前我认识的李东宁、李光洙等四位，此外从日本、俄国、欧美等地为此事而来的人和早在中国留学或经商的人一共有五百余名。

翌日，找到早就举家迁来上海的金甫渊，就住在他的家里。金君是长渊邑金斗元的长子，敬信学校出身。我在长渊担任教育总监时，金君是真心拥护我的青年，在金君的引导下拜见了李东宁、李光洙、金弘叙、徐炳浩等同志。

此时组织了临时政府，这些事日后国史上会有详细记载，故在此不多赘述。我当时当选为内务委员之一。其后，安昌浩同志从美洲来就任内务总长，制度上采用次长制。我向安内务总长请求当临时政府的门卫。理由是当年在祖国时为了测验自己的程度，我暗自一人做了警察考试科目的答案，但没有及格，我怕自己没有真才实学徒具虚名。安内务总长慨然应允，他说美国就专设有看守白宫的官员，由白凡君护卫政府大厅也好，他将向国务会议提出，作出决定。次日，岛山却给了我警务局长的任命书，力劝我就任此职。当时总长尚未就任，而以尹铉振、李春塾、申翼熙等次长们代理总长职务，据说这些年轻人认为派年龄大的前辈充当门卫，他们出入甚为不便，故推任我当警务局长；我竭力反对说，连当警察的资格都没有，怎么有资格当警务局长，但安岛山强劝我说：“如果白凡辞让不就，他们会误会说你不愿意屈居他们年轻人手下，所以你还是上任吧！”我拗不过，只好就任。

大韩民国二年，妻带大儿子仁来到上海。母亲和岳母仍留在东山坪。不久，岳母去世，安葬于当地的公墓。民国四年母亲也来到上海，长久离散的家，现在又团聚了。当年八月生了信。

据警务局所收到的国内消息，我为国母报仇的事件，过了二十



四年后才传到日寇的耳朵里。我离开本国后，韩人刑警们也安心了，这才把金九就是当年的金昌洙这一事实报告给日寇警察局。多么强烈的民族意识啊！虽然做了日寇的侦探，但内心里却隐藏着爱国心、同胞爱，我不得不相信，这种精神是能给我们民族独立带来光明的前途的。

民国五年我任内务部长。

其间妻因生信儿后跌伤而转罹肺病，经过了几年的苦痛，由上海宝隆医院诊断，决定进入西洋人设立的虹口肺病医院隔离，因此在宝隆医院的一别竟成永诀，妻于民国六年一月一日逝世，葬于法租界嵩山路巡捕房后面的公墓。我本来认为在独立运动机关内不论婚丧，都不可举行大的仪式，所以想简单地举行妻的葬礼，可是许多同志都认为妻为了我，一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这也都是为了国家，所以他们筹集了一笔款子，举行了盛大的葬仪，并且立了墓碑。其中柳世观寅旭君为了联系医院和墓地，颇费心力。

妻入院时，仁儿也患重病，直到妻子安葬后才痊愈。信儿当时才学步，尚未断奶，只能给他喂牛奶，但晚上睡觉时都要吸吮着母亲的奶头才能入睡，因此信儿学说话时只会叫奶奶而不知叫妈妈。

民国八年，母亲携信儿返国，第二年即民国九年，因母命，也送仁儿返国，所以我就孑然一身孤寂地留在上海，为独立运动而奋斗。

民国九年十一月，我当选为国务领，国务领就是临时政府的最高领袖。我向临时议政院议长李东宁先生说，虽然现在国家尚未独立，但像我这样出身微贱的人来当一国的元首，对国家的威信影响至巨，我坚持不任。但他却力主革命时期这一点毫无关系，我不得已而就任国务领。

我同尹琦燮、吴永善、金甲、金澈、李圭洪等组成内阁，向议政院提出宪法修正案，修改独裁的国务领制度为平等的委员制。当然我也是国务委员的一员。

回顾我生平近六十年，违背常理的事不一而足，大凡贵人就不

穷,穷后不会有贵,然而我贵亦穷,不贵亦穷,一生都在穷中度过。不知我们国家独立后三千里河山会不会变成为我所有,可是现在在这宽广的地球上,我却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呀!我过去曾梦想避穷得富,享受荣华富贵,并为此而奔波过。但现在却认为,古代的韩愈作“送穷文”,而我却宁愿作“友穷文”。可我并非文人,作不了文。我对孩子没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因此我也没有期望他们应尽做儿子的义务。但是孩子们啊,你们都是受社会的福泽,才有吃的、穿的、学的,我希望你们都做社会的儿子,把社会当做父亲,而尽儿子的孝道,能做到这一点,我就感到很满足了。

搁笔之前再记两件事。

那是我在东山坪农场时的事。

己未年二月二十六日是母亲的六十华诞,我们夫妇商议好了,要弄些美酒佳肴,请来亲戚朋友举行寿宴。正在准备宴会,母亲好像已经猜到,极力劝阻说:

“现在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办花甲宴不妥,将来生活富裕时再说吧!”这样就中止了。

过后没几天我就离开了祖国。母亲来到上海后,无论是公是私,经济上都无力为母亲作寿,即使有能力,我每天都听到几十件、几百件同胞们丧失生命财产的惨讯,也无心思为母亲做寿。我的生日后来也从没提起过。

民国八年,有一天罗锡畴君在早饭前提着肉类等食物来到我家,看到母亲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所以典当了衣物来为我祝寿,这是第一次为我的生日摆宴,而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吃了这一顿美餐。

后来罗锡畴君为了国家,向东洋拓殖会社投掷炸弹,并自杀成仁,为了永久纪念他为我准备的生日宴,也为没能为母亲设花甲宴而心中甚感内疚,所以我再也不为自己的生日举行任何仪式,同时在此文中,我也不记下我出生的日子。

据仁川来的消息,朴永文先生已去世了;安浩然仍活着,我买了

一只怀表,托信得过的人带去送给他,并特地说明送的人就是金昌洙,但迄今没有回音。

据说成泰英住在吉林,因此与他通信。

还有柳仁茂在北间岛被人暗杀,其子汉卿仍住在那儿。曾在西大门监狱与我同住两年并跟我学习的李钟根,与一个俄罗斯女子结婚,后来住在上海,因此我们见过面,金亨镇的遗族仍没有消息。金周卿的遗族仍在寻访中。

过去的年月我记不清的都是寄信去请教母亲再记入的。

我一生中感到最幸运的是身体健康。五年的监狱劳役生活没有一天因生病而休息过,只有在仁川因疟疾休息了半天。提到医院只为了割瘤手术而在济众医院住了一个月;在上海因西班牙感冒而住了二十天医院。

己未年离开祖国迄今已十余年了,其间发生了许多重要的、稀奇的事情,但有些事情在独立实现以前要绝对保密,故不记述,为此深感遗憾,希望能予理解。

写此文花了一年多时间,大韩民国十一年五月三日于临时政府厅舍搁笔。

白



凡



逸



志

백범일지

下篇



# 绪 言

我今年 67 岁，在重庆和平路吴师爷巷 1 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厅舍中提笔续写《白凡逸志》。此书上篇则是我 53 岁时，在上海法租界马浪路普庆里 4 号临时政府厅舍中，花了一年多时间完成的。

我为什么写《白凡逸志》呢？

我于弱冠之年，胸怀大志，投笔弃学，不顾自己力量微薄，才疏学浅，也不计成败荣辱，为了国家和民族，奋斗了三十余年。如今年逾花甲，仍一事无成。虽然固守临时政府十多年，但自己未年以来，独立运动转入低潮，连政府的名义也难以保持。为了打开沉闷的局面，也为了唤起即将消失的“三·一运动”精神，自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用书信向美洲、夏威夷的同胞们诉说独立运动的危机，争取经济上的支援，同时物色热血男儿，计划以暴力手段进行暗杀与破坏活动。如果东京事件与上海虹口事件终能成功的话，那时我想我亦只不过是剩下一副臭皮囊了。等到在祖国的两个儿子长成后到海外来时，能够传给他们的东西恐怕只有这卷《白凡逸志》罢了。于是我把已完成的上篇抄印了几份，寄给美洲、夏威夷的几位同志，拜托他们一定要转交给我的儿子。

但是贱躯尚未入土，因此又续写《白凡逸志》下篇。这时两个儿

子都已长大成人,所以就不必为将来写这篇东西了;现在我写的目的是,让海外同志看看我的五十年奋斗历程,以我的许多错误作为殷鉴,不要再重蹈覆辙,这也许是我过分的期望吧!

现在写下篇的形势,比在上海写上篇时真是好得多了。当时的临时政府不用说外国人,就以我们韩人来说,除了国务委员与十几个议政院的议员外,连看都没有人来看看,可以说有名无实。而以写下篇的今天来说,不但在议员、委员们之间已经一扫沉闷的气氛,而且内、外、军、财四部行政也取得了飞跃的发展。以内政而言,不仅中国关内的韩人各党各派都一致拥护、支持临时政府,就是在美洲、墨西哥、古巴各国的万余名侨胞也都拥戴这个政府,并且提供独立运动的资金。我们再看看外交吧!自大韩民国元年以来,我们在国际外交方面也作了努力,但是从前中国、苏联、美国政府当局,虽然暗地里给予我们支持,但却没有正式的往来;而今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广播中说:“将来韩国将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华民国立法院长孙科也在公开场合上说:“要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良策首先是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我们自己也在华盛顿设立了外交委员部,任命李承晚博士为委员长,致力于外交宣传。在军政方面,正式组织了韩国光复军,以李青天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安,现正在计划召募军士进行作战训练。财政方面,从前因为独立运动转入低潮,日寇实施高压政策,临时政府的收入一年不如一年。由于经济困难,政府难尽其责,总长、次长中投降归国者亦非一二人,其他就更不用说了。然自上海虹口炸弹事件发生以来,国内外人士对临时政府的观感一新,收入逐渐增加,民国二十三年度的收入达到53万元以上,是临时政府成立以来的最高记录,此后将会几百几千倍地增长。从这种情况来看,现在的状况比起在上海写本书上篇时有如天壤之别。但以我本身来说,只是日复一日地等待着衰老病死之到来而已。如果说上海时代是想死的时代,那么重庆时代可以说是半死的时代了。如果有人问我愿意以哪种方式死去,我最大的希望是等

到完全独立那天,回到祖国举行入城仪式后死去。达不到这一点,起码也得去拜见美洲、夏威夷的同胞们,在回程中死在飞机上,然后把我的尸骸从空中抛下,如果掉在山上就让野兽吃了,如果掉在水中,就给鱼虾果腹好了。

人生在世都说是一件苦事,生固不易,死亦更难。我在西大门监狱里,在仁川的筑港工地上,好几次都起了自杀的念头,但都没有死成。安明根兄也一度决心想死,所以绝食四天,可是西大门监狱的狱卒强行把鸡蛋塞进他的口里,因此没有死成。死也必须是自由人才行,否则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回顾我近七十年生涯,并非是为了活下去而活,而是死不成才活着的,但此身终有一天会化为尘土的。

# 1

## 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

己未年三月，我自安东县搭乘英国怡隆洋行的轮船抵达上海。同行者十五人，共航行了四天，到黄浦码头时，扑入眼帘的是不穿裙子的妇女们正在小舢板上划桨渡客。在安东上船时，冰天雪地，现在在法租界上了岸，只见街道两旁的树木枝叶茂盛。在船上时穿着衣服还冷，下了船却是汗流浹背。当天我们一行在公升西里十五号某同胞的家里，在地板上铺上毯子睡了一晚，第二天一打听，知道在上海的有李东宁、李光洙、金弘叙、徐丙浩、金甫渊。金甫渊是金斗元的长子，早在几年前就率妻来到了上海。他请我住在他家，自此就开始了我在上海的旅居生活。我在他的向导下，先去拜访了十多年来日夜思念的李东宁先生。从前在梁起铎先生家的客舍里曾委以重任，让他建立西间岛武官学校，并招募志士，准备光复事业。经过十余年艰辛岁月，他风采已非当年，脸上增添了许多皱纹。我们相互紧握着手，似有无限的感慨。

当时在上海的韩人有五百多名，除商人、留学生和十多名电车公司的查票员外，都是为进行独立运动，从祖国、从日本、美洲、中国、俄国赶来汇合的志士。那时十三道各大城市自不待言，就是穷乡陋巷，也都喊起了“独立万岁”，旅居海外各国的韩人也都采取了一致行动，开展了独立运动。分析起来，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开始大家



还不明白韩日合并的真正意义。自檀祖<sup>①</sup>开国以来,有时在名义上也是他国的属国,所以大部分人以为合并也就和唐、元、明、清等时代一样成为属国而已,而能识破日寇的阴谋,看穿他是想把我国也变成像印度、安南那样的英、法殖民地的人士最多不过是百分之二三。但自合并以后,看到了日寇惨无人道,先后制造了安岳事件和宣川一百零五人事件,全国民众痛感再也不能坐以待毙。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倡民族自决。由此爆发了我们民族的万岁运动。

我来到上海时,先来的人士已组织了新韩青年党,并已派遣金奎植出席巴黎和会,派金澈为代表去国内进行活动。此时在青年中要求组织政府的声浪日高,都认为这对运动的发展是绝对必要的。

于是来自各地的人士选出代表四月初旬组织临时议政府,并向中外宣布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李承晚为总理,其下设内务、外务、法务、交通等机构,推举光复运动之各前辈首领为总长。安昌浩自美来沪就任了内务总长,其他各部总长皆在他处,未能及时就任,乃任命青年同志为次长,代理其职务。也就在这个时候,李东辉、文昌范自俄国来此汇合,政府事务才开始有了头绪。

此时各道代表秘密在汉城集会,也组织了政府,由李承晚任执政官总裁,但由于在国内活动困难,遂转到上海,这样竟意外地出现了两个政府。于是进行改组,把两个政府合二为一,由李承晚任总统,并于4月11日公布了宪法。这些在临时政府会议录里有详细记载,这里不再赘述,只谈谈我个人的事情。

我提出当门卫的请求,却被任命为警务局长,此后五年当中一身兼任审讯官、判事检察,掌管刑罚。当时对于犯罪者的处分不是劝诫释放,就是死刑而已。举个例说:17岁少年金道淳随本国临时政府特派员到上海来,被日本领事馆所收买,收了十元的贿金,充当诱

---

① 传说中的朝鲜始祖。——译注

捕这位特派员的耳目,尽管该犯尚未成年,仍处以极刑,这是正式国家中未曾见过的特殊事件。

我所担任的警务局任务与正式国家之普通警察行政不同,既要防止日本侦探的活动,又要侦察独立运动者中的投降者,严防倭寇的魔爪乘隙而入。因此我用了二十余名警察和便衣警卫员,为的是与虹口的日本领事馆明争暗斗。

当时法租界当局对我国深表同情,因而凡是日本领事馆向法租界要求逮捕我们同胞时,都预先通知我们躲避,再会同日本警官来搜查,那时已是人去楼空了。

倭寇田中义一到上海之际,吴成伦在黄浦码头向他投掷炸弹,但没有爆炸,再用手枪也没有射中,却打死了一名美国女子。此事件发生后,日、英、法三国联合对法租界的韩人大肆搜查。那时候正值母亲自我国来到上海我的住处。一天清晨,法国警官西大纳带着七名日本警官冲进我的房间。西大纳跟我是熟人,但由于日语法语不同,他不知逮捕状上写的名字是金九,以为是抓韩籍强盗。进来后看到我,就要我穿上衣服去法国警务局,并不准日警官用手铐铐我。到了警务厅,看到了先我被捕的元世勋等五人。法当局既没有允许日本警官审问我们,也没答应引渡给日本领事馆,却由我担保后,把他们五人一起释放。对我国同胞有关系的事都由我本人代表临时政府,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租界的法庭,如非现行犯,由我担保就可以释放。日本警官知道我与法当局的特殊关系后,再也不请求法当局逮捕我了,而是设法用计引诱我走出法租界以外,以便在英租界或中国地界绑架我,只要通报一下中、英当局,就可把我逮捕。但我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法租界。

我任警务局长五年期间,发生的离奇事情无法一一予以记载,也不能一一回想起来,只能略述一二于后。

我们曾逮捕审问了高等侦探鲜于甲,他自觉难逃一死,请求判处死刑,但结果是命其将功赎罪,免其一死。他被释放后,不久便来

通知,愿意交出在上海探悉的文件。我跟他约好时间,派金甫渊、孙斗焕到日本胜田旅馆去取。如果他告发,我们的同志将被逮捕,但并未发生此事;我用电话约见,他也总是如期来到。四天后他逃回本国去了。

姜麟佑是日寇警部派到上海来执行秘密使命的。他请求面见我本人,向我报告来上海的任务。我们约定在英租界新世界饮食店见面。那时完全可以逮捕我,但去到那里只有姜麟佑一人。他向我吐露总督府给他的任务,同时要求供应他假情报资料,他回到本国后因为这件功劳当上了丰山郡守。

旧韩国内务大臣东农金嘉镇先生,在三·一宣言后放弃倭寇所给的男爵头衔而组织大同党,带着公子毅汉君到了上海,愿在独立运动的策源地度此余生,认为这是他最大的光荣、最大的目的。我侦察到,由于男爵参加独立运动使日本人感到非常尴尬,乃利用毅汉妻子的堂兄郑弼和诱劝东农归国。我们秘密逮捕了姓郑的进行审问,他一一招供后被处绞刑。

青年黄鹤善是海州人,在三·一运动前就来到了上海。他似乎对我们的独立运动很热心,所以我们让来自各地的志士都留宿在他家里。他利用此机会,一面与日本领事馆勾结得点赏钱,一面向爱国青年恶意地批评临时政府,因此罗昌宪、金毅汉等十几名青年中了他的奸计,结党袭击临时政府内务部。但此事立即被镇压,犯人全部被警务局逮捕。他们很明显是受了黄鹤善的欺骗,所以都在告诫之后释放,受重伤的罗昌宪、金基济则送医院治疗。此一事件的调查结果,判明黄鹤善自日本领事馆接受金钱及指令,计划杀害我政府要员与警务局长,利用罗昌宪是京城医专的学生,租了一幢三层洋房,挂上民生医院的招牌,阴谋引诱我政府要人,到医院时加以杀害。

我把这些供述记录给罗昌宪过目,他连连大呼受骗了,主张判处恶魔黄鹤善以极刑,其实黄鹤善早已受了绞刑。罗、金等青年的行为则在继续调查之中。

有一次,一个名叫朴某的青年要求与警务局长会面,他一见到我就泪如雨下,同时又拿出一支手枪、一本记事簿,放到我面前。他是数日前自本国到上海来谋生的。日本领事馆看到他体格魁梧,教唆他杀死金九,如果成功的话就会给他许多钱,并让国内家属耕种国家土地;假使不答应,将以不法鲜人的罪名给予严惩。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答应了,拿了武器进入法租界,虽然在远处看到了我,但是见我为了独立而奋斗,自己也是大韩民国的国民,怎能下此毒手?不由悔恨交加,交出了手枪和记事本,他自己要到中国的远方去当商人。我相信了他的话,对他表示感谢,放他走了。

我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信条,屡屡为此受害,但也许这是我的天性,一直未能改变。

我的警卫员韩泰奎是平壤人,非常勤劳朴实,跟随我七、八年,深得国内外人士的信任,在我辞去警务局长后,他仍在警务局工作。

有一天,桂园卢伯麟兄大清早跑到我家来,告诉我说屋后路旁躺着一具韩国女青年的尸体,出去仔细一看,原来是明珠。

明珠是下等女子,不知她怎么来到了上海,给郑仁果、黄镇南当女佣,也和年轻的小伙子间有过丑闻。我记得不久之前的一天晚上还看到韩泰奎与此女同行,我想韩泰奎也是年轻人,可能他们的关系比较亲近,所以也未在意。

验尸的结果分明是他杀,头上出血,像是被殴打过的样子,脖子上还有被勒过的痕迹,勒死的手法和我教给警卫员的方法相似。我在西大门监狱时,曾向不汗党的首领金进士学了勒死人的方法,后来就教给警卫员。

我去法国警务局向西大纳告发了此事,于是着手联合调查。我们去了韩泰奎和明珠夜里经常出入的那家,问他们租房子的男女是什么模样,证实了一个月前韩和明珠确实在此同居,但和明珠尸体所在的地方距离很远。我们又在其近处租房子的房东处查看了租房人名册,发现十多天前有一个姓韩的曾租过房间,于是去那间房

间察看，见地板上有血迹，嫌疑遂集中在韩的身上。我叫来韩泰奎，问他近日在何处食宿，他说租不到房子，到处食宿。这时法国巡捕进来逮捕了他。

我以陪审官的身份，听取他们的审讯。原来他在我辞去警务局长后，由于各种关系，被日本人所收买，做了他们的密探。在与明珠暗地里交往中，明珠获悉了韩的秘密。明珠行为虽然不检，但爱国心却很强烈，也崇拜我金九。韩惧怕明珠向我告发，对他不利，因而蓄意致她于死地，杀人灭口。

韩受到终身苦役的处罚。后来我的同事罗愚对我提起这件事，他早就怀疑韩泰奎怎么会有那么多钱挥霍，行动也极诡秘，然而却苦无证据，如果向我提起的话，他又怕我责备他怎么可以疑心同志们呢，所以一直没有向我提起。

后来听说韩泰奎煽动其他重犯，决定在阳历1月1日破狱逃亡，自己却向监狱当局告密，于是看守者都全副武装地防备着，约定好的时间一到，牢门一齐被打开，囚犯们带着刀、木棒、石灰蜂拥而出，看守们一齐开枪，打死了八名囚犯，其他囚犯再也不敢乱动，这场越狱暴动终于被平息了。审判时韩泰奎出庭作证。后来我收到韩的信，说他因向法国狱官告密，害死八名越狱犯的大功获得特赦，又说对以前的过错表示悔改，请求我再录用他。据说他见我并没有回答，感到不安，终于逃回本国，在平壤做什么小生意。这家伙如此凶狠，而我过去却对他那么信任，为此我感到非常后悔，觉得无法抬起头来面对世人。

# 2

## 李奉昌义士谋杀日皇未遂事件

己未年，即大韩民国元年，不论国内或海外的人士，都一致为民族的独立而奋斗着，但当时受到世界思潮的影响，我们之中渐渐也有了主张封建或无产革命的，因而单纯的独立运动战线内也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临时政府职员中也开始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明争暗斗（这里的民族主义不是世界上所说的加强本民族、压迫他民族的主义，而是指我们韩民族取得独立自由，享有和其他民族同等的完全幸福），甚至于国务总理李东辉鼓吹共产革命，而总统李承晚却主张民主政治，在国务会议上因意见不合，对立与冲突的奇怪现象层出不穷。举个例来说吧，国务会议已决定任命吕运亨、安恭根、韩亨权三人为赴俄代表，但等到拨旅差费时，李东辉却早已秘密地派遣其心腹韩亨权一人赴俄，等到他差不多过了西伯利亚时才公开此事，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非议。李东辉，号诚斋，本是江华镇卫队参领，军队解散后，曾到过海参崴，那时他改名“大自由”进行活动。

有一天，李东辉请我跟他到公园去散步，他低声跟我谈话，要求我帮忙。我听了有些不快，问他我警务局长作为国务总理的护卫，是否有什么不尽职的地方。李摇头说不是那回事，他说，大凡革命是一种流血的事业，现在我们的独立运动是民主主义革命，取得独立之

后再转变为共产主义革命,这样又要再度流血,这岂不是我们民族的大不幸?所以要求我与他共同努力,进行共产革命。他征询我的意见,我反问道:

“我们如果实行共产革命,那么是否可以不听第三国际的指挥和命令呢?”

李摇头说:

“不可以。”

因此我以强硬的语气说:

“我们独立运动是我们大韩民国的事,接受第三者的指导或命令等于依赖别人,那是违反我们临时政府宪章的,总理决不可说这种话,我不能接受先生的指示,我劝先生要自重。”

他听了我这番话后,面露不悦之色就回去了。

李总理秘密派遣的韩亨权进入俄国境内后,向边境官吏说明他是我政府任命、代表政府而来的。莫斯科政府接到了这个报告,动员了铁路沿线的韩人,因此在各站停留时,在俄国的男女同胞手摇“太极旗”,表示热烈的欢迎。抵莫斯科后,受到俄国最高领袖列宁的亲自接见,列宁问他独立运动需要多少资金,韩随口答道:

“要二百万卢布。”

列宁笑着反问韩说:

“对抗日本只要二百万卢布就够了吗?”

韩后悔说得太少了,但他却辩明说在祖国与在美洲的同胞已筹集了一笔钱,所以只要那些就够了。列宁说:

“自己民族的事,自己解决是应该的。”

说后立即命令外交部拨款二百万卢布给韩国的临时政府。韩亨权先取了其中的四十万卢布,离开了莫斯科返回上海。

李东辉得到韩亨权离开莫斯科的消息,秘密派遣秘书长金立到西伯利亚去迎接,但并不把那些钱送交临时政府,而是从中抽走了这笔钱。金立先为自己家人在北间岛买了土地,又支付若干给从事

所谓共产运动的韩人、中国人、印度人，然后回到上海秘密地躲藏起来，娶了一个广东女人为妾，开始过豪华的享乐生活。临时政府向李东辉问罪，他就辞去了国务总理的职务，逃亡到西伯利亚去了。

韩亨权再去莫斯科，取得了二十万卢布的所谓统一运动的资金，然后秘密回到上海，把钱散给共产党，并召集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然而共产党也没有团结起来，却分为三派，其一是以李东辉为首的上海派，其次是以安秉赞、吕运亨为首的“伊尔库次克派”，其三是由留学日本的学生所组成，并以日人福本和夫和金俊渊为首的 M.L 派，共产党虽然在上海势力不大，但在东北却活动频繁。

真是应有尽有，除了共产党外，连无政府主义者也出现了。李乙奎、李丁奎两兄弟与柳子明等是在上海、天津等地活动的“无政府主义派”猛将。

在上海举行的国民代表大会，真可说是大杂烩，自日本、朝鲜、中国、苏联各地来的什么什么团体，在形形色色的名目之下，总共有二百余名代表出席，其中伊尔库次克派、上海派两个共产集团竞相拉拢民族主义者及其他各派代表们。

对上海临时政府，伊尔库次克派主张创造论；上海派却主张改造论。所谓创造论是解散现有的临时政府而另组新政府，所谓改造论是保持现有的政府而改造其内部。此两派不管如何争论始终不能达成协议，所谓国民代表大会因此而分裂。创造派依着自己的主张，“创造”了所谓“韩国政府”，外务总长金奎植把这“韩国政府”迁到了海参崴，向俄国大送秋波，但莫斯科连看都不看一眼，最后终于宣告垮台。

这两派共产党之争，也影响到纯真的独立运动者，他们也分化为创造和改造两派，整个国民代表大会处于混乱的状态。我行使内务总长的职权，命令国民大会解散，于是局势渐趋安定。

继之是侵吞临时政府公款的金立，被吴冕植、卢宗均两青年所枪杀，人心大快。



临时政府罢免了驻俄代表韩亨权，另派安恭根为代表赴俄，但也没有什么效果，因此临时政府与俄国之外交关系就此中断。

留在上海的共产党员在国民代表大会失败后，以统一的美名，不断影响民族主义运动者，想使他们转向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青年仍分成两派，各自组织了目的相同、名称相同的“在中国青年同盟”和“驻中国青年同盟”，他们互相争夺我在上海之青年，提倡最初所主张的独立运动共产运动化。后来列宁提出“殖民地运动应在社会主义运动之前先实行民族独立运动”，因此直至昨天还在批评嘲笑民族运动、复国运动的共产党员，顷刻间猝然变成了民族独立运动者，疾呼民族独立就是共产党的党训。共产党这样一来，民族主义者也没有理由排斥他们了，因而组成了“唯一独立党促成会”。

但在内部两派共产党仍在争权夺利，明争暗斗，难以前进一步，而民族主义者也逐渐明白了他们的谋略和战术，他们的阴谋无法得逞，终于解散了“唯一独立党促成会”。

继之而起的是韩国独立党，这是纯粹民族主义者的团体，以李东宁、安昌浩、赵琬九、李裕弼、车利锡、金朋浚、宋秉祚与金九等为首而组成。从此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各有自己的组织。共产党见上海的民族主义者不为自己所笼络，遂转向南北满洲<sup>①</sup>，展开了更为频繁的活动。

李尚龙的子孙甚至还组织了“弑父会”，为了照顾自己的体面，他们并不是自己杀死自己的父亲，而是由会员互杀对方的父亲。南北满洲的独立运动团体还有正义部、新民部、参议部、南军政署、北军政署等，共产党也渗透到这些团体内，破坏组织，杀害人命，致使我们的运动失去了白狂云、金佐镇、金奎植<sup>②</sup>等健将，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在国内国外同胞中，民族独立思想渐趋式微。

---

① 指我国东北。——译注

② 并非后来的金奎植博士。——译注

不料祸不单行，当时东北的土皇帝张作霖和日本达成协议，大肆搜捕韩国独立运动者，解送日本。甚至中国人也为了几十元乃至三四元的赏格而割下韩人的首级送到日本领事馆去。最后连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同胞也有人告密，暴露我们独立军之所在地。他们最初也曾向独立运动的机关正义部或新民部纳税，但由于受不了我们武装部队的淫威和掠夺而逐渐起了反心。我们独立运动者中也有人投降日寇，于是东三省的运动根据地变得十分脆弱。后来在日寇的羽翼下又建立了满洲国，满洲成了第二个朝鲜，这是何等悲痛之事！

最初，满洲的独立运动团体都拥护上海的临时政府，但渐渐地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无论在军政或民政方面，东三省正义、新民、参议三部都不合作，他们互相争夺地盘，发动战争，所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一格言就是指此而言。

从形势来看，东三省方面，我们的独立军已销声匿迹，而到三十多年（独立宣言以前约十年，新兴学校时期起就有武装队）后的今天却是金一静等武装部队仍在山区活动，由于是和中国义勇军联合作战，又得到俄国的支援，他们能越过鸭绿江、图们江和日寇作战。当时的形势是大体维持现状，但和关内临时政府的联系则极为困难。正义部与新民部首先不接受临时政府的约束，只有参议部始终保持对临时政府的忠诚。这三个部后来合并成为新正义部之后，就与临时政府完全断绝了关系，最后自己人之间也四分五裂，互相倾轧，终于演出了共党、民党互相冲突的悲剧，而共也好，民也好，他们最终都逃不脱同样的命运。

上海的情势也是两败俱伤，二者皆亡。最后仅仅剩下临时政府和韩国独立党来维持民族阵营的门面而已。

临时政府人财两空，总统李承晚引退之后，由朴殷植就任，但也只把总统制改为国务领制后就引退了，李尚龙被选出当第一任国务领，他从西间岛到上海来组织内阁，但无人支持，遂又返回西间岛去了。其次选出的是洪冕熙，他自镇江来上海就职，但也是组阁失败。

于是在这一段时期内，临时政府竟成无政府状态，在议政院里成了大问题。

有一天，议政院议长李东宁先生来找我，并劝我出任国务领，但我以两个理由婉拒。第一，我是海州西村金淳永的儿子，虽然我们政府只是在草创时代略具雏形，但像我这样微贱的人，当一国的元首，实在有损国家、民族的体面。第二，李尚龙、洪冕熙两位尚且组阁失败，像我这样的人更不用说了。然而李东宁先生却说：

“第一个说法不成理由，所以不必谈；第二如果由我出面的话一定有人支持，还是赶快通过议政院的程序，着手组阁，以避免无政府状态。”

他如此坚持，我无奈只好答应，于是经过议政院的正式程序后，我就任了国务领。

我起用尹琦燮、吴永善、金甲、金澈、李圭洪等人组阁。但觉得以现在这种制度组阁，困难重重，故废止了国务领制，改为国务委员制，由议政院通过施行，我则当了国务会议的主席，但也只是会议上的“主席”而已，任何国务委员的权利和责任都是平等的，并且主席可以由国务委员们轮流担任，从前的纷争也就可以偃旗息鼓了。

如此虽然摆脱了无政府状态，但因经济上的困难，维持政府名义的希望仍很渺茫，虽然政府的房租是 30 元，工友月薪不足 20 元，但也无力拿出这笔钱，因此曾因房租问题与房东发生过几次诉讼。

其他委员差不多都有家眷，而我于民国六年丧妻，两个儿子也都先后送回国由祖母领养，所以我过着独身生活。我睡在临时政府的办公室，饭就轮换着在有职业的同胞家中吃（电车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查票员六七十名），可算是乞丐中的高级乞丐。他们都了解我的处境，所以并无一家讨厌我。尤其像曹奉吉、李春泰、罗愚、秦熙昌、金毅汉等都是我亲近的朋友，待我更是无比亲切，别的同胞也都对我寄予真正的同情。

严桓燮君是一位有志青年，他从之江大学附中毕业后，就职于

法国工部局,以其薪水供食物给像石吾(李东宁的号)或我一样穷的独立运动者。他的前室林氏是位旧式妇女,在我每次从他家出来时,就跟到门外,往我手中塞几枚银币说:

“买糖给孩子(指我家仁儿)吃吧!”

她就是这样亲切地对待自己丈夫所尊敬的老前辈。她初产一女后,就不幸去世,葬在卢家湾公墓。我每次去看她的墓时,就想要是严君不行,我以后有了能力就替她立一个墓碑,但后来因逃离上海,所以没能做到,真是遗憾。直到今天卢家湾公墓中林氏的墓仍浮现在我眼前。

我最初自愿当临时政府的门卫,可是后来却历任警务局长、劳动局总办、内务总长、国务领,最后任国务委员而兼主席,这并非是有看门资格的我有何进步,而是实在没有人。打个譬喻的话,这个没落的大家庭跟乞丐窟毫无二致。

先前李承晚任总统时,不但中国人,连碧眼隆鼻的英美法等外国人,都时常出入政府办公厅之门;但现在除了法国巡捕陪同日人来捕人或为了索取久欠未还的房租而来人外,就没有人来了。尽管如此,十四年来,每年圣诞节我们至少要花数百元购买礼品送给法国领事、警务局和以前的老朋友,这是为了显示我们临时政府的存在。更令人心寒的是本来有千余名的独立运动者,现在连几十名都不到。

为什么独立运动者会如此零落呢?第一就是像临时政府的军务次长金义善、独立新闻社主笔李光洙、议政院副议长郑仁果等一些人向日寇投降后回国去了,此后这一类人不断增加。第二就是国内各郡、各面所组织的联通制被日寇发现,许多同志都被捕了。原来政府派人回国秘密组织实施联通制,在京城设立总务部,在十三个道设督办,各郡有郡监,各面有面监,以上各主务长官均由临时政府任命,暗地里统治全国,人民也诚心诚意地秘密纳税,上海临时政府的威信由此而得到提高。但是不幸咸南的日寇发觉了联通制,自此各道组织相继破坏,派去的同志被捕者不计其数。第三是为了生活而

各奔前程之故。

由此便足以估计得到临时政府的现状如何了。为了摆脱困境，我实施了书信政策。因为临时政府既在海外，就只能依靠海外侨胞。

东三省是第一位的，有二百五十多万人，但他们的情况和国内相似。俄国是第二位，有一百五十多万人，但那是共产国家，禁上民族运动，因此也难以依靠。第三位是日本，有四五十万人居住在那里，但也不能依赖。美国、夏威夷、墨西哥、古巴处于第四位，有一万多名同胞，大部分是工人，有强烈的爱国心。那是因为受到徐在弼、李承晚、安昌浩、朴容万等人的熏陶之故。因此我就想给那里的同胞写信，诉说临时政府的苦衷，请求支援。

我是英文文盲，连信封都不知道如何写，所以请了严恒燮、安恭根等人协助才得完成。当时我的事务就是请严、安两人写信封，然后邮寄。虽然有的信因找不到收信人而被退回，但大多数都有了回音。在芝加哥的金庆先生通过报道得知临时政府付不起房租而要关门，立即以该地共同会之名义筹得美金 200 元，作为捐款寄到了上海。我与金庆先生从未谋面，他完全是出于爱国心。美国、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的同胞既有如此强烈的爱国心，为什么不积极支援临时政府呢？这是因为一年里数次更换内阁成员，宪法条文也老是改变，政府丧失了威信，而且政府也没有经常向他们通报情况，因此同胞们对政府怀有一种不信任感。收到了我的信后，他们了解了真实情况，逐渐对政府有了信心。夏威夷的安昌浩、加哇伊的玄楯、金商镐、李鸿基、林成雨、朴钟秀、文寅华、赵炳尧、金铉九、安源奎、黄仁焕、金润培、朴信爱、沈永信等人开始忠于临时政府。旧金山新韩民报也对政府产生好感，所以金乎、李钟昭、洪焉、韩始大、宋钟翊、崔镇河、宋宪树、白一圭等继起支持政府。在墨西哥有金基昶、李钟昨，在古巴有林千泽、朴昌云等愿意支援政府。同志会方面以李承晚博士为首，李元淳、孙德仁、安贤卿等先生参加了维持临时政府的运动。美国、墨西哥、古巴全体侨胞表示要共同负责维持和发展政府。夏威夷的

安昌浩<sup>①</sup>、林成雨、玄楯等答应我，只要我做出对民族有益的事，那么他们愿意负责筹措款项。从此我开始研究我能做些什么事来为民族争光。

在我任财务部长兼民团长的时候，有一天，一位中年同胞到民团来找我。他曾住在京城龙山，名叫李奉昌。他说：

“我在日本当劳工，一直想搞独立运动，听说上海有假政府（日本人称我们临时政府），便于日前来到上海，问了电车查票员，他让我来普庆里4号，所以我就找来了。”

“上海虽有独立政府，但无力供应衣食，你有钱吗？”

“我的钱连旅费在内，所剩不过十多元。”

“那你怎么解决生活问题呢？”

“这不必担心，我可以在铁工厂干活，能不能边劳动边搞独立运动？”

“你太累了，先去附近旅馆休息，明天再说！”

我让民团事务员金东宇带他去旅馆住宿。他说话夹杂着韩语日语，并且以日寇方式口口声声称临时政府为假政府，所以我想有必要对他进行特别调查。

几天后，他买了酒和面，在民团厨房里和民团职员一起用餐，酒至半酣，他和职员们说起了酒话。说话声传到门外，我在一旁细听，只听他说：

“你们实行独立运动，为什么不杀死日本天皇？”

某一民团职员回答说：

“杀死区区文武官员都很难，何况天皇？”

他又说：

“我去年在东京时，碰到天皇去扫墓，他们让行人跪伏在地。我伏在路边就想，这时候如果我有一颗炸弹，一定可以杀死他。”

---

<sup>①</sup> 并非岛山。——译注

当天晚上,我到某旅馆找李奉昌。他跟我披肝沥胆,坦率地吐露了他的心迹。他确实是个血性男儿,来上海时胸怀杀身成仁的非凡决心。他说明了为何到上海来的理由——

“我现在已 31 岁了,再活 31 年,也不会过上比现在更有意义的生活,因为已经老了!如果说人生的目的是享乐,那么过去的 31 个年头中,相信多少已经尝过了人生的快乐滋味,现在是为了追求永远的快乐,想献身于独立事业,所以才到上海来的。”

我听了他的一席话,不由热泪盈眶。

李奉昌先生恭恭敬敬地向我请教献身国家之途,我答应一年内为他要做的事做好准备工作。但以当时临时政府的情况来看,实在没有能力负担他的生活费,而且为了他将来的行动,也不能和我们政府机关太接近。这一段期间该怎么办呢?我这样反问他。

他说,他曾学过铁工方面的技术,而且日语也讲得很好,在日本都照日本人方式生活,又做了日本人的养子,取有日本人的名字——木下昌藏,这次到上海来,在船上也是以日本名字登记的。在准备工作期间,他自己可以伪装是日本人,进日本人的铁工厂干活,能挣到高工资。

我很赞成他的意见,因此向他说,跟我们往来不要太频繁,每个月一次晚上来这里就可以了,这样提醒他注意后,就把他送到日本人最多的虹口去了。

数日后,他来我处,说已经在日本工厂找到了工作,月薪 80 元。

自此以后,他常买来酒、肉和面在民团办公室与职员们共饮,醉了就唱日本歌,唱得非常流利,因此得了“日本老头儿”的绰号。

有一天,他穿着日式外褂,拖着木屐正要进入政府大门时,被中国籍的工友赶了出去。我为此受到李东宁先生以及其他委员们的指责,说这人分不清是韩人还是日人,而我竟容许这样的可疑人物进出政府的大门,有疏于职守。我跟他们解释说正在调查之中,他们虽未进一步责怪,但脸上仍有不悦之色。

与李先生约好的一年期限快满，那时和美国、夏威夷之间还不能投递航空邮件，等了将近两个月，才从夏威夷寄来数百美元。我穿着乞丐似的破衣服，口袋里藏着钱，仍然跟从前一样，轮换着在别人家吃饭，谁也看不出我身上揣着一笔千余元的巨款。

12月中旬的某日，我秘密地请李奉昌到法租界的中兴旅社来，在那里我跟他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并与他商讨有关赴日的事。我除了准备好钱外，现在炸药也准备好了，一个炸弹是托王雄自上海兵工厂得来的，另一个是令金铉去河南从刘峙处得来的，都是手榴弹，其中一个杀日本天皇用的，另一个是李先生自杀用的。我们也谈到万一自杀不成被捕受审时如何回答的问题。

翌日，我掏出破衣口袋里的钱给李奉昌先生，并且要他把赴日的事情都准备好了之后再来进行一趟，交代完毕我们就互相分手了。

两天后，他来找我，我又与他同到中兴旅社去度过最后一个晚上。当时他说：

“大前天您给我那些钱时我哭了。日前我在民团办公室看到职员们连饭都吃不上，还是我掏钱买了面条请大家吃的。先生是这样地信任我，给我这么多钱，我若私自留下这些钱的话，您一步也不能离开法租界，怎会找得到我呢？先生您到底是有英雄的度量啊！我一生从没有受过这样的信任，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我就带他到安恭根家去，举行了简单的宣誓仪式后给了他两颗炸弹，又给他三百元，并说如果这些钱到东京时用完了，只要来电报，就立刻再寄去。

随后去照相馆拍纪念照，那时我的神情有些凄然，李先生望着我说：

“我正要赴永远快乐之路，让我们俩高高兴兴地拍照吧！”

说着面呈喜色。我也只好强作欢笑同他合影。

他坐上汽车，向我点头致意，作最后的告别。无情的汽车响了一声喇叭，就往虹口方向疾驰而去。



十余日后他从东京打来电报，说将在1月8日把东西拍卖出去，我立即汇去二百块钱。后来他又来信说，他像疯子一样，把钱都花光了，旅馆住宿费饭钱都一拖再拖，直到接到二百元后才还了债，还剩下了一些钱。

一年多来，独立运动的空气十分沉闷，临时政府认为，不能展开军事袭击，搞暗杀刺激一下也好。当时日寇破坏中韩两个民族间的感情，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于是在朝鲜发生了屠杀中国人的事件，仁川、平壤、汉城、元山等地，一些无赖韩人受日本人唆使，见中国人就杀。日寇又在满洲制造了九·一八事件。在此事件中，一些韩籍浪人仗日寇之势，无恶不作，欺压中国人。就连中国的知识阶层，也对我们民族抱有恶感。我们政府对此深感忧虑。

在上海的街道上，中、韩工人之间也时有冲突。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我们临时政府开会决定成立韩人爱国团，做些暗杀与破坏工作，同时委托我全权处理经费与人选问题，待事后将全部经过及结果报告临时政府。

我第一着就是筹办东京事件。由于1月8日近在眼前，所以我仅向国务委员报告了其间经过，并指出时间紧迫，我们还存在一些困难。

期待着的1月8日终于来到，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消息——  
“韩人李奉昌狙击日天皇不中”

我极为悲痛，许多同志前来安慰我，都说虽然没能炸死日皇，但是我们韩国人却在精神上杀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同时这也向世界各国证明了我们民族并没有归化日本，仅此就足可算是成功。同志们都嘱咐我要注意安全，以免受日寇报复。

不出所料，翌日清晨，自法国警务局来了一纸秘密通知，说是过去十年间法国官员一直袒护金九，但今天金九的部下向天皇投掷炸弹，日本定会发来照会，要求逮捕金九予以引渡，法国尚未决心向日本开战，因此很难再加以保护。

中国国民党机关报《青岛民国日报》以头号标题刊登：

“韩人李奉昌狙击日皇不幸不中”

驻屯当地的日本军警马上袭击并破坏了该报社。福州、长沙等许多地方的报纸也使用了“不幸不中”的文句，因此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中国政府无奈，查封了这些报社。

然而日本随即以上海的一个日本和尚被中国人打死为借口，发动了一·二八上海事变。但是事实上，李奉昌勇士的狙击日皇，与中国人对此事“不幸不中”之评述，也是发生此次战争的原因之一（参照日本《新语辞典》）。

我遵照同志们的劝告，白天停止一切活动，晚上住在同志家里或妓寮中，三餐就在同胞家轮流吃，同胞们都箪食壶浆，十分亲切地招待我。日寇也许在忙于开战，并没有交涉要逮捕我。

中日战争开始后，十九路军的蔡廷锴与中央军第五军长张治中参战，使上海抗日战争进入最激烈的阶段。日本兵在上海闸北到处放火，他们不分男女老幼，把人扔进火里活活烧死，真是惨不忍睹。他们又一次犯下了滔天罪行。在法租界也到处设立了后方医院，我看到中国军人来来去去地搬运尸体和伤兵，用作担架的木板从缝里流淌下滴滴鲜血，我不由满腔热情地向他们致敬。想到我们不知何日才能与倭寇作战而血染祖国的河山，不禁黯然落泪，怕旁人感到奇怪，所以我就低头避开了。

东京事件一传开，美洲、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的同胞精神为之一振，支持、激励的书信越过太平洋，像雪片似地飞来。一些过去反对临时政府的同胞也改变了态度，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同胞们广为集资，汇到上海，要求我们参加中日战争，多做为国争光的工作。但这次中日战争，我们连临渴掘井的机会都没有，如何参战呢？我们青年中，有我的学生罗锡畴、李承春，他们胸怀壮志，来到上海。罗烈士年前身携手枪弹药，潜回汉城，杀死七名日寇，然后自杀身亡；李承春在天津被捕处死。淞沪战争时，我们居住在上海的青年中有不

少志士要求做一些为我们民族争光的事,恰好日军中有我们韩籍工人,我就动员一些青年扮成工人,潜入虹口,出入日本军中,计划在其飞机库与军需品仓库放置燃烧弹,并通过王雄与上海兵工厂联系制造燃烧弹。此时淞沪协定签订,中国方面郭泰祺签字,战争结束,这一计划又成泡影。

此后热血青年不断秘密来访,要求为国献身,给他们一些合适的工作。他们看到东京事件,总以为我有不少主意。我就派遣李德柱、俞镇植回国暗杀日本总督,又命柳相根、崔兴植前往满洲暗杀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 3

## 尹奉吉义士的上海义举

此时尹奉吉君来找我。尹君曾在同胞朴震经营的做马鬃帽子和  
其他日用品的工厂做工,最近在虹口菜市场卖菜。

尹奉吉最初是为了做大事而来上海的,所以挑着菜担子在虹口  
方面来来去去等着机会到来,现在淞沪战争也结束了,嗟叹求一死  
之地之难,因此来找我,问有没有像东京事件一样的计划,如果有的  
话,希望我能用他。通过推心置腹的谈话,我了解了尹君是一位深明  
大义、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十分钦佩。因此我回答他说:

“有志者事竟成,你放心吧,我正为找寻像你这样的人而苦闷呢!”

我又说,日寇在这次上海事件中获胜,正趾高气扬、耀武扬威  
呢!4月29日他们将在虹口公园内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天长节,你这  
次去完成一个大任务如何?听了我的话,尹君欣然回答:

“我完全听您的吩咐,现在已下定决心,请赶快准备吧!”

不久,日人报纸上海日日新闻上刊布,凡是参加天长节庆祝会  
的人都要携带午餐饭盒一个、水壶一个、太阳旗一面。看了这新闻,  
我马上到西门路拜访王雄(本名金弘逸)<sup>①</sup>,要他向上海兵工厂厂长

---

<sup>①</sup> 即光复返国后任陆军少将、国会议员的金弘一。——译注

宋式焜联系，制造像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型的炸弹，并请在三天内送来。王雄回来说要我亲自到兵工厂去一趟。第二天我去了设在江南造船厂里的分兵工厂，厂的规模不大，主要是修理大炮、步枪。他们让我看在王伯修技师指导下造成的水壶与饭盒型炸弹的性能，试验方法是在院子里挖个坑，坑口四周放置铁板，把炸弹放在当中，雷管上引出一条长线，一人躺在数十步外拉动引线，土坑里传出爆炸声，随即破铁片四处飞溅，场面非常壮观。

王技师说，雷管要这样试验二十几次，若没有一次失败，才能装在实物里面，此次试验，效果良好。兵工厂这么细心，是因为对上次东京事件所用的炸弹性能不好，未能炸死日皇感到遗憾，所以才这么小心。

翌日，他们用兵工厂汽车载水壶与饭盒型的炸弹送到西门路王雄家，这是他们考虑到我们自己搬运这些禁物的困难，真令人感激不已。

我脱下破旧的中式服装，换上一套在估衣店新买的西装，俨然是一位绅士，我把这些炸弹一个两个地带到法租界里亲近的同胞家，但却跟主人保密，只说是贵重的药，要小心火烛，便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好了炸弹。

我因为久住上海，所以和同胞们非常熟悉，到任何人家去都没有宾主之分，尤其是东京事变后，连讲究内外有别的妇人们也不再与我客套了。

“先生，请替我看看孩子吧！我去替你做好吃的。”

说着就把哭着的孩子送过来让我抱，都说是小孩哭了，一旦到我的手里就能被哄睡着。

4月29日就要到了，尹奉吉穿上了很整齐的日本式西装，每天到虹口公园去详细察看会场的布置，同时预先选择好行事的适当地点，并搜集白川大将的照片，购买日本国旗。

有一天，尹君从虹口回来说：

“今天白川这家伙也去看会场的设施,就站在我的身边,我想今天我身边有炸弹的话,当场就可把他解决。”

我正色说:

“这是什么话呢?猎人打猎不射栖鸟及睡兽,一定要使之飞、使之奔而后才射,这才感到痛快。现在尹君你说这话,看来你对明天的事信心还不足。”

尹君辩明说:

“不是的,那家伙一站到我身边,我心中马上就起了这个念头。”

我笑着说:

“我也是确信尹君你会成功的,最初我说此事的计划时,你不是说心里很镇定吗?我相信那就是成功的证据。”

并告诉他一定要镇定,内心不安情绪就不稳,当年我在鸱河浦手刃土田让亮时心情不安,想起高能善先生“得树攀枝不足奇,悬崖撒手丈夫儿”的诗句,内心才平静下来,终于事成。

尹君颇以为是。送尹君回旅馆后,我带了两颗炸弹到金海山君家里去,告诉他尹奉吉君明天有重要任务将远赴东三省,请他买些牛肉,明天早上做早餐。

翌日是4月29日,我在金海山家中与尹奉吉君共进了最后的一餐,我静静地观察尹君的神色,他像农夫准备下田去干活似的,神情泰然自若。

金海山君看到尹君那样沉着而又勇敢,就小声地对我说:

“现在上海有许多为民族争光的事要做,像尹君这样的人物,为什么要派他到别处去呢?”

“工作让能干的人去做不好吗?我们等一会看尹君在什么地方做了些什么吧。”

我含含糊糊地这样回答着。

吃完饭时钟敲了七下,尹君解下自己的表给我说:

“这块表是昨天宣誓后,照着先生的话花六块钱买来的,而先生

的表只值两元,我们换换吧!再过一小时,这块表对我也没用了!”

为了留作纪念,于是就互换了。在乘汽车去会场时,尹君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给我,我问他:

“为什么不带点钱呢?”

尹君说:

“给过车钱还可以剩下五六元。”

此时汽车发动了,我喉咙一哽,说道:

“日后黄泉之下再见吧!”

尹君把头伸出车外,向我点头告别。汽车发出巨响,载着顶天立地的英雄尹奉吉君向虹口公园奔驰而去。

我同时也到赵尚燮的店里去写一封信,交给店员金永麟,要他急速转交给安昌浩先生,信的内容是“从上午十点左右起请不要在家里,会有重大事件发生。”我又到石吾(李东宁)先生家去,向他报告进行中的事。吃过午饭后,焦急地在等候着消息。

下午一时左右,开始在中国人之间流传说有人在虹口公园投掷炸弹,炸死了许多日本人,有的说是中国人干的,有的说是高丽人干的。昨天是菜贩子的尹奉吉今天做了惊天动地的事,这一事件除我金九外,恐怕也只有李东宁、李始荣、赵琬九等几个人能猜测得到。

今天的事完全是我独自进行的,我向李东宁先生报告详细的经过后,等候着进一步的消息。

直到下午两三点钟才见到号外:

“虹口公园内日本天长节庆祝会场上,炸弹猛烈爆炸,民团长河端当场死亡,白川大将、重光大使、植田中将、野村中将等文武官员均受重伤。”

当天日本的报纸说,投炸弹是中国人所为;隔天一致以大字标题印着尹奉吉的名字,同时法租界也开始了大搜查。

我秘密地唤来安恭根、严恒燮,告诉他们从今以后他们家中的生活由我负责,让他们专心工作,并同美国人费吾生(Dr. Fitch)先

生联系藏身的地方。费先生很快答应了,把他家的二楼全部提供给我们。我就与金澈、安恭根、严恒燮等四人住在他家里,费夫人亲自照料我们的饮食。费先生是已故费牧师的公子,费牧师生前曾给我们上海独立运动以极大的支持和同情。

我们利用费家的电话跟法租界我们的同胞家联系,得知谁被逮捕,遂聘请洋人律师从法律上营救被捕同志,但效果甚微,我们只得从经济上帮助他们的家属维持生计,或供应要逃亡的同志的旅费。

被捕的人中除安昌浩、张宪根、金德根外,还有几名学生。日本鬼子像疯狗似地到处抓人。不但政府和民团的职员,就连爱国妇女会也全然不能开展活动。我曾派人传信给安昌浩先生,他认为去李裕弼家无妨,但不幸被捕,这不能不说是他自己不慎。这在一部分同志中引起了非难,李裕弼等人就说:

“这次虹口事件另有主谋策划者,他自己躲了起来,却让无辜者被捕,这就不对。”

因此我要马上向外界公布我金九是东京事件及此次虹口炸弹事件的负责人,但安恭根竭力劝阻。认为我就住在法租界,这样做太危险,我仍坚持,最后由严恒燮起草文告,请费夫人翻译后送到路透社发表,这样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两件事的主谋人是金九,执行者是李奉昌和尹奉吉。

知道上海发生了重大事件,南京的南坡朴赞翊兄立即来到上海,他会见了中国人士,活动的结果,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其他各个方面提供了很多方便。

此事发表后,殷铸夫、朱庆澜、查良钊等中国名士都要求会晤我,我就应邀在夜里驱车前往虹口和静安寺路。在此以前,我从未离开法租界一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里我先说说中国人对我们的态度,然后再谈美国、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的韩侨对我的态度和关内我们同胞的态度。

第一,以万宝山事件为起因,日寇采取离间中韩两民族的政策。



朝鲜各地动员了一些无赖杀害中国商人和工人。中层以上人士尚可明白这是日寇的奸计,但社会下层即使在东京事件以后也仍然认为“高丽人打死中国人”,对我们民族怀有恶感。一·二八淞沪战争时日兵恣意放火焚烧民房,还唆使崔英泽一类的流氓侵入中国人的家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抢劫财物。因此汽车和电车上的韩籍查票员成了替罪羊,经常遭到中国工人的殴打。但自四·二九事件以来,对韩人的感情迅速好转。

第二,这一事件以后,美国、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的韩侨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东京事件虽未取得完全的成功,但却是民族的光荣,而虹口事件则获得了绝对的成功。自此以后,对我的支援和向临时政府纳税急剧增加,我们的事业进入了发展的阶段。

以前关内的独立运动者对我并不乐观,他们都抱有悲观的想法。四·二九以后,由于身处险境,平时和挚友们会面晤谈的机会减少,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但他们也都知道我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有一次我接到电车查票员绰号叫朴大将(沙里院人)的结婚请帖,去他家表示祝贺。我一进门,就跟厨房里的妇女们说:“我马上要走,快给我一碗面条!”我赶紧吃了一碗冷面后,点燃一支卷烟衔在口里,走出他家门。他家旁边有一家我们同胞开的店铺,我想既已来到这里,顺便就去拜访一下。进了门还没来得及坐下,店主就捅了我一下,用手指向霞飞路。我往外一看,只见路边站着十多个日本警察,在等候电车开过。我没有别的藏身之处,只能透过玻璃窗观察日寇的动静。他们飞快地冲进朴大将的家,我赶紧出了店门,沿着电车线路,跑到金毅汉家。我让他夫人去朴大将家探听消息,得知刚才日寇进了朴大将家后就问金九在哪儿,他们把朴家都搜遍了,连灶孔也没放过。这一事情是尽人皆知的。

这次四·二九事件以后,日寇第一次悬赏 20 万元,第二次由日本外务省、朝鲜总督府、上海驻军司令部联合悬赏 60 万元捉拿金九。

南京(中央)政府告诉我,如果我在上海危险的话,将派飞机来接我。又有人非难我说:

“不管怎么危险,也得冒险进行工作,光图安全,能行吗?”

实际上他们是要我和他们一起行动,一起工作,但我又怎能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呢!?我不能厚此薄彼,遂一律婉言谢绝,只是躲在费家秘密活动。

这样过了二十余天,有一天费夫人对我说,我住在费家的事情被侦探知道了,正悄悄包围屋子,让我赶紧离开。我跟费夫人装成夫妇的样子,同乘费家的汽车,由费先生驾驶,出了大门一看,果然密布着中国、俄国、法国(不见日本人)的侦探。但因为是美国人的家,不敢动手。费先生加速开着汽车,经过法租界到了中国地界,下了车和恭根一起去了火车站,转乘火车避身到嘉兴秀纶纱厂去。这是朴南坡先生向殷铸夫、褚补成诸先生商量觅得的地方,李东宁先生和严恒燮君的家属、金毅汉全家在数日前就已搬来此地了。

上海的费夫人后来向我诉说了以下的经过:

费夫人在楼下透过玻璃窗向门外一看,只见有一个工人打扮的中国人走进了自己家的厨房,于是走上前去问道:

“你是谁?”

“我是西服店的,想来问一问府上有没有要做西服的。”

“你是问我厨房里的下人做不做西服?真奇怪!”

那人从口袋里掏出法国巡捕房侦探的证明。夫人大声呵斥道:

“你怎么随意侵入外国人的住房?”

“对不起!”

说完,他退了出去。这才得知,我们因乱用费家的电话,才被他们发现了我们的住处。

我因此暂时就住在嘉兴,跟着我祖母的姓改姓为张,名字改为震球或震。嘉兴是褚补成(号慧僧)先生的故乡,褚先生曾任浙江省长,是位德高望重的绅士,他的大公子凤章是留美的学生,在东门外

的民丰纸厂任技师长。褚先生的家在嘉兴南门外,是老式房屋,并不太壮观,但看起来也是一个士大夫的宅第。褚先生把他的养子陈桐荪君的亭子暂充我的宿舍,这是建在湖边的半洋式房子,构造非常精巧,由窗外可望见秀纶纱厂,风景极为优美。

晓得我的底细的人只有褚家父子婆媳和他的养子陈桐荪夫妇而已。最感困难的是语言问题,虽然我冒充广东人,但不会说中国话,完全成了个哑吧。

嘉兴没有山,但湖与运河像鲑鱼须似地四通八达,因此连七八岁的小孩子都会撑船。由于土地非常肥沃,所以物产丰富,人心淳厚,与上海迥然不同。商店不二价,顾客如遗忘了东西在店里,就暂时代为保管,俟日后客人来找时再原物奉还。

我与陈先生夫妇一起到南湖烟雨楼和西门外的三塔去游览,这里有明代倭寇入侵的遗迹。壬辰乱时,入侵的倭兵把妇女抓来关在寺院里,命一个和尚看守,夜里和尚把妇女们全都放走,倭寇就打死了那个和尚,据说至今石柱上仍留有血迹,时隐时现。出东门约十里路,就有汉朝朱买臣的墓,北门外有落帆亭,听说朱买臣专心念书时,一阵暴雨把晒在场院的稻谷冲走,其妻崔氏讨厌他是个书呆子,改嫁给木匠,后来朱买臣做了会稽太守回来时,崔氏因为覆水难收,就在落帆亭投水自尽了。

在嘉兴寄寓没多久,从上海日本领事馆内一个被我们收买的日本官吏那儿秘密传来了报告,说日寇在上海严密搜索后,不见金九的踪影,便怀疑躲至沪杭线或京沪线一带,遂派了密探到两条铁路沿线进行侦察,要我谨慎小心,还说今晨搜查队已出发到沪杭线,如我隐藏在那儿,就应派人去车站监视日警的行动。

派人到嘉兴车站去打听,果然有日本便衣警察曾来此地巡视的消息,因此决定到褚凤章夫人的娘家暂避。他夫人的娘家在海盐县城,他们家的避暑别墅朱氏山庄则在县城西南方四十余里处。朱氏是褚凤章继室,刚生第一个婴儿,是位年轻美丽的夫人。褚先生只请

他太太一人陪我，乘了一整天轮船送我到了海盐县城朱家。

朱家是城内首富，住宅非常宽敞。我住宿的洋房在后院，而大门外是石子铺成的路，路外是船舶往来的湖，大门里面是正院，从边门进来有一个办公室，那是管家每天处理事务的地方。以前有四百余名家口聚在一间餐厅吃饭，但现在则大部分因为各自从事士农工商不同的职业而分散各处，剩下的各房家口也都愿意自己开伙，自炊自食。整个院落的屋宇像是蜂巢，每一家住三四间房间，前面都有一间大客厅。老式房屋后面有两层楼的洋房和花园，再后面有运动场。听说海盐有三家大花园，钱家花园第一，朱家花园第二，我也去参观了钱家花园，其设施果然比朱家的好，但朱家的房子及设备则胜钱家一筹。

在海盐朱宅过了一夜，第二天再和褚夫人一同乘汽车到卢里堰，从那里向西南爬五六里的山路。褚夫人穿着高跟鞋，在七八月炎日之下，频频用手帕拭着汗，爬山过岭。夫人娘家的女婢带着我的食物和其他日用品跟随着我们。我看到这光景真想把这场面摄成影片传给万代子孙，但这又怎能办得到呢！？

若国家独立的话，我的子孙或我的同胞，谁能不感谢褚夫人这样的诚意和亲切呢？虽然不能摄成影片，但还可以用文字传下去，所以记下这一段往事以资纪念。

爬到坡顶，有一座朱家建造的亭子，在那里休息片刻后再往下走数百步，山腰里有一栋幽雅的洋房，看守房子的仆婢们恭顺地接待我和褚夫人。

夫人把女婢带来的所有鱼肉和水果拿出来给仆婢们，并对他们说明我的口味，应如何地料理等事情，又指示他们，如果我要登山，应看多久多远来决定要多少向导费，绝对不可多要。把这一切安排妥当后，当日就告别回海盐娘家去了。

从此，我每天的生活就是游山玩水。我在上海十四年，别说人家都游览过的苏州、杭州或南京，就是上海城廓之外都没跨出过一步，

现在每天都能尽兴地徜徉于山水之间,感到无限喜悦。

这房子本来是褚夫人娘家叔父的夏天别墅,他去世后葬在这房子附近,这房子就兼为照管其坟墓的墓庐和祭厅。这所在真是名家建山庄的好地方,风景优美。爬上山峰,可以眺望大海,左右两边是青松和红叶,此情此景,使游客不禁有一种游子悲秋风之感。

有一天爬鹰窠顶,那里有一座尼姑庵,一个老尼姑出来相迎,看墓人和她很熟,把我介绍给她:

“这位贵宾是海盐朱家大姑娘请来的客人,广东人,现因眼疾住在山庄,今天到此游览。”

老尼向我点头致意。她每说完一句话都念一句阿弥陀佛:“施主是远道而来的吧!阿弥陀佛!请进佛堂里来吧!阿弥陀佛!”我随着她进入庵堂,看到每个房间里都有面孔白皙、嘴唇红润的年轻尼姑,穿着庄重的僧服,颈上挂着长串念珠,手里拿着拂尘,向我合什行礼。

庵堂后面有一块岩石,据说上面若放一座指南针的话针倒指北,我便解下挂在我表上的罗盘试验一下,果然如此,大概是磁铁矿的关系。

有一天,去参观海边某个镇上的市集,地名我已忘记,但决不是普通的乡镇,而是海边要塞,那儿有炮台,还有古代的城墙,都说是壬辰之乱时所建。城里房屋鳞次栉比,还有几座官衙。我们在城里环游一周,见赶集的人不多,也许是地方偏僻的缘故吧。

我们进了一家面馆吃午饭,只见一些工人、警察和一般老百姓都窃窃私语,在注视着我。不大一会儿,他们就把看墓人叫去询问,也有直接走过来问我的。我用生硬的中国话回答说我是广东人。这时听到身旁看墓人跟他们介绍,说我是海盐朱家大姑娘请到山庄来的客人。

回到山庄后,我又问了看墓人。他说:

“这些警察真讨厌!不知为什么,他们说您张先生不是广东人,是日本人,我说朱家大姑娘会跟日本人来往吗?他们这才无话可说。”

数日后,安恭根、严恒燮、陈桐荪等人来此游览胜景鹰窠顶,我也就和他们一起回到了嘉兴。因为我已被警察察觉,我的事情此地的警察也

都知道了,感到不安全,于是又回到嘉兴。路上我们还去了海宁县城,参观了清朝乾隆皇帝南巡时在此进餐的楼房。

来嘉兴后,几乎每天都驾一叶扁舟,游览南湖,还从村里买来活鸡,在船上烹煮,边赏景边吃鸡,真是其味无穷。

嘉兴南门外,沿运河而下,走十余里,有个村子叫严家浜,陈桐荪君在那里有田产,跟村里的农民孙用宝相交甚厚。我去那儿,就住在孙用宝家。那时我完全成了一个乡下老头儿。他们家全家都下地干活时,家里只留下个吃奶的婴儿。孩子一哭,我就抱着他去地里找他的妈妈。那时他妈就十分惶恐不安,感到难为情。

五六月是蚕桑季节,家家都养蚕。我参观了那里的妇女们缂丝。

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也不闲着,在纺车边安上一口锅,左手烧火煮茧,右手缠丝纺线。纺车下部悬有一踏板,右脚一蹬踏板,纺车就转动起来。我幼小时曾看到过我国妇女纺纱织布,和这里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我问老太:

“老太今年高寿?”

“过了六十了。”

“什么时候起开始纺纱啦?”

“从七岁起。”

“六十年前用的就是这种纺车吗?”

“是啊,就是这种纺车。”

我也亲眼见到七八岁的孩童抽丝纺纱,所以对她的话并不感到奇怪。

我既然住在农家,也就注意看了看他们使用的农具,虽然是旧式的,但比我国先进。我也参观了他们引水灌溉,他们用的是木制水车,男女多人踩动水车,就能把湖水抽引上来灌溉田地,十分方便。插秧都事先算好日子,早稻八十天,中稻一百天,晚稻一百二十天。我国只以为成行插秧是日本人的发明,其实中国从古代起就是成行插秧,看了他们的锄草机就可知道这一点。

参观了农村,感到他们不论养蚕缫丝,或耕田种稻都比我国发达。我想我们的先人,自汉、唐、宋、元、明、清以来从没断过邦交,互有使节来往,为什么没学到中国的优点,只学到缺点呢?虽然衣冠文物遵守中华制度是所谓李朝五百年来的政策,然而保存下来的只是令人头痛的旧冠帽和其他易于散亡的东西,却没有学到有关国计民生的东西,脑子里深深地烙印着可恨的事大思想,把朱子学用得比朱子更彻底,其结果是徒尚空言不务实际,因此耗尽了民族的元气,剩下来的只是偏狭的党派之争和依赖性而已。

以今日的情势来看,一部分青年轻视传统,说这些已老朽,是封建残余,而一些社会主义者昨天还在拼命地吵着说革命是流血的事业,只能进行一次,坚决反对先搞民族运动,再进行社会革命,他们认为应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可是一听到俄国国父列宁说殖民地民族应先搞民族运动,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便突然改口说民族革命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他们嘲笑腐儒们说连朱子放的屁也觉得是香的,可是他们却跟在列宁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我实在为他们感到可悲。我绝不信奉程朱学说,也不排斥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只是希望青年诸君不要忘记自己,应该开动脑筋,研究、实行切合我国国情、符合我们民族性的主义和制度,如果这一点都办不到,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呢?

# 4

## 遭到同胞的狙击

我又从严家浜到砂灰桥严恒燮和五龙桥陈桐荪家，轮换着在他们两家住宿，白天则乘坐朱爱宝的船，来往于运河中，欣赏农村风光，这成了我每天的课程。

嘉兴城内的镇明寺是古代有名的富翁陶朱公的故居。那里面养着五头母牛，又有养鱼池，寺门外有一块刻着“陶朱公遗址”的石碑。

有一天，我感到寂寞无聊，便信步来到东门，见大路边有一军警操练的广场，人们正在围观士兵练操，我也挤进去看，有一个军官仔细打量我，走到我面前来问我是谁，我和以往一样回答说是广东人，哪晓得这个军官才是真正的广东人，我立刻被抓到保安队本部受到审讯。我说我不是中国人，要求面见团长，通过笔谈来说明我本来的身份。但是团长没有出来，却由副团长露面。我跟他说是韩人，上海虹口炸弹事件以后，在上海难以存身，就由这儿的褚凤章先生介绍，暂住在五龙桥陈桐荪家，名字叫张震球。他们便到南门查问褚家和陈家，四个小时后陈兄来此作保，我才获释。褚凤章君责备我说我不知道避身之计，又劝我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位中学女教员，是个寡妇，年 30 岁，可以和她见面协商，如能结婚住在一起，可以掩藏身份。我认为和知识女性一起生活更容易暴露，不如托身于没有知识



的划船妇朱爱宝，所以决定常住在船里，今天睡在南门外的湖水边，明天睡在北门外的运河岸，白天再上岸活动。

在这期间，始终由朴赞翊、严恒燮、安信庵等三人从事外交及情报的搜集工作。由于中国朋友的同情和美洲同胞的支援，在活动经费上并无困难。

朴赞翊以中国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就职于中央党部，他认识很多中央要人，通过他的联系，由党的组织部长、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先生介绍，我接到了蒋介石将军邀请会见的通知，遂和安恭根、严恒燮两人一同赴南京。贡沛诚、肖铮等要人，代表陈果夫先生迎接我，招待我们住在中央饭店。

第二天晚上乘陈果夫先生的汽车，带着权充翻译的朴赞翊，前往中央军校内蒋介石将军的官邸。穿着中式服装的蒋先生亲切地接待了我，寒暄过后，蒋主席用简明的语调说：

“东方各民族实行符合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民主政治是比较好的。”

我表示同感，并说：

“日本侵略大陆的魔爪，时时刻刻侵袭着中国，如果方便的话，单独笔谈几句如何？”

“好，好。”

因此陈果夫及朴赞翊退出门外，蒋先生亲自拿来笔砚，我举笔写道：

“先生若资助百万元，两年之内可在日本、朝鲜、满洲方面掀起暴动，切断日本侵略大陆之后路，先生以为如何？”

蒋先生看了以后提笔写道：

“请以计划书详示。”

我答应照办，退了出来。

第二天，写了一份简单的计划呈给蒋主席后，陈果夫先生在他的自己的别墅中招待我，在宴会中将蒋主席的意思转告给我：

“若靠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则会另有天皇，杀死大将，也会另有大将，为将来的独立战争着想，须先训练一批武官。”

我立刻说：

“此乃我之所愿而不敢请者，问题在于训练场所和经费。”

于是我们达成了协议，决定以河南省洛阳军官学校分校为训练基地，经费随发展情况而定，第一期培养军官 100 名。我派人去东三省召来李青天、李范奭、吴光善、金昌焕等前独立军将领及其部下数十名青年，并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召集了一些青年，共授予 100 名学籍，请李青天和李范奭担任教官和校官。

这时社会上掀起了统一之风，纷纷议论要组成对日统一战线同盟。一天，义烈团长金元凤特地向我求见，于是我们便在南京秦淮河边秘密见面。他告诉我他将参加统一运动，问我是否也参加。他参加此运动的动机是为了向中国人表明金元凤并非共产党，而我却认为这种同床异梦的统一运动不可参加，因此拒绝了。

不久以后，召开了所谓五党统一会议，由义烈团、新韩独立党、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美洲大韩人独立团等团体统一组成了朝鲜民族革命党。这次统一合并的主动者金若山、金科奉等义烈团员，视临时政府为眼中钉，所以极力主张解散临时政府。当时临时政府的国务委员金奎植、赵素昂、崔东晔、宋秉祚、车利锡、梁起铎、柳东悦等七人中，除了车利锡、宋秉祚两人之外，其他五人的态度显而易见醉心于统一合并，而不关心临时政府，因此金科奉乘此机会赶到临时政府的所在地——杭州，向车利锡、宋秉祚两人强硬地提出，在五党合并的今日，必须解散有名无实的临时政府。但宋秉祚、车利锡两人坚决反对。然而七人之中有五人弃职，召开不了国务会议，实际上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赵琬九兄写信告诉我这件事情，我非常生气，立刻起程赴杭州。这时候金澈已经病故，参加五党合并的赵素昂已经退出了民族革命党。

我和住在杭州的李始荣、赵琬九、金朋浚、杨少碧、宋秉祚、车利

锡等议员商议是否仍维持临时政府的问题,结果意见一致,于是一同到嘉兴,加上原已在那里的李东宁、安恭根、安敬根、严恒燮等人一同乘上一艘南湖的游艇,在船上开会,增补了三名国务委员,这就是李东宁、赵琬九和金九。再加上宋秉祚、车利锡两位国务委员,一共五人,这样也就可以召开国务会议了。

当五党统一论兴起的时候,有些同志主张另外组织一个团体,我则始终反对,因为再增加一个团体将又延长派争。现在若要维持临时政府,就必须要有有一个拥护政府的团体作为其背景,加之赵素昂已经再建韩国独立党,所以我建立新团体也就不会负破坏统一的责任,经同志们同意,便组织了韩国国民党。

此时因洛阳军校韩籍学生的问题,日本驻南京领事须麻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又向警备司令谷正伦交涉说,叛逆金九是逮捕的对象,到时将其逮捕时,务必不要提出在籍等等问题。谷正伦便当面嘱咐我:

“日本悬重赏捉拿你,我说你们自己逮捕金九去领赏吧。你在南京务必小心谨慎!”

于是洛阳军校第一期韩籍学生毕业后就再也没有招收学生,在中国培养韩籍军官至此便告结束。

我在南京越来越危险,倭寇好像闻到我在南京的气味一样,一边请求中国警宪逮捕我,一边派暗杀队来南京暗杀我。我听到这个消息便派人去夫子庙巡视,果然见到有七个穿便衣的日本警察正在夫子庙附近徘徊。

我不得不在淮清桥找一栋房子,每月付给在嘉兴撑船的朱爱宝家十五元,请她来和我同居,假装我的职业是古玩商,原籍广东省海南岛。若是警察来查户口,由朱爱宝出面说明一切,我就可以不露面。

卢沟桥事变一发生,中国开始了对日抗战。这时在华韩人的心中都非常不安,由五党统一而成的民族革命党逐渐分裂,又新产生

了朝鲜革命党。美洲大韩人独立团也退出了民族革命党,只有义烈团分子在支撑着该党。分裂的原因是义烈团分子表面上标榜民族主义,内里是想实行共产主义。

随着时局日益危急,我们韩国国民党和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美洲夏威夷各爱国团体联合结成民族阵营,支持临时政府,因此临时政府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中日战争蔓延到江南,上海的战况渐对中国不利,日本空军对南京的空袭也愈来愈甚,我住的淮清桥的房子也在轰炸中被毁,我和朱爱宝幸得免于死,邻居则尸体遍横。只见南京各处火焰冲天,夜晚的天空被染得通红。等到天亮后,经过倒坍的房屋和遍布尸体的街道,去马路街母亲的住处,母亲亲自开门,我安慰她老人家说:

“母亲,你受惊了吧?”

可是她却笑着说:

“受惊?有什么可紧张的,只不过床有些晃动而已。”

又问死的人多不多,我说来这儿看到附近不少人受了伤。母亲又问我们的人受伤了没有,我说我正想去看看。

于是立刻到同胞的住处去查看,虽然受了惊,但都无大碍,住在蓝旗街的许多学生也都平安无事。

南京的情势危险,中国政府迁都重庆,各机关都纷纷转移。我们光复战线三党的人员及其家属共百余名,决定逃难到物价便宜的长沙,并给在上海、杭州的同志和在溧阳古堂庵修道的梁起铎以及各地眷属寄去旅费,让他们到南京汇合。又派安恭根到上海去带回他的家眷,并再三叮咛他请他的大嫂已故安重根烈士的夫人一起来,但等安恭根回来时,只见到他的家眷而不见其大嫂,因此我严厉地责备他说:“两班家失火时,先要抢救出神主牌位。哪里有革命家逃难却把为国牺牲的烈士之眷属扔在敌占区而弃之不顾的道理?这不仅是背弃了你的家族,也违背了革命家的道德,实在难以容忍。”安恭根不愿加入逃难同胞的行列,想把家属转到重庆,我就随他的意

思不再去管他了。

我唤回了在安徽屯溪中学求学的信儿，扶持母亲乘英国轮船去汉口，而百余名大家族则乘中国木船，装满了行李离开南京。

我陪着母亲，带着信儿经过汉口，平安地到达长沙。携带临时政府的公文包离开镇江而先行出发的曹成焕、赵琬九等人，作为先遣队比从南京出发的一行人早到了几天。乘木船的大家族也在风浪中平安到达。在蓝旗街办公室被雇来打水的杂役中国人蔡某为人忠厚，奉母亲之命，也把他编在队里同行，在船到芜湖附近时，因在风浪中汲水，不幸失足，溺水而死。我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离开南京时，我把朱爱宝遣返回她老家嘉兴去了，深感后悔的是，那时只给了她旅费一百元。她只知道我是广东人，服侍我将近五年的时间，我和她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类似夫妇的感情，她照顾我实在功劳不小，当时我认为一定会后会有期，所以除了车资外，没有给她足够的钱，真是遗憾之至。

安恭根的家眷和我们同船到汉口后去了重庆，而在长沙的百余名家口也不习惯集体生活，他们各自租房，各自开伙。我侍奉母亲，又开始过天伦之乐的生活，吃到了母亲亲手做的饮食。但是在写这篇文章的今天，母亲已经去世了。她若在世，像我在一年两个月里写上篇的时候一样，可以请教许多值得说起的事情和日期，可惜她已不在人世。

借此机会，我将母亲在我丧妻后回到本国去，又再返回上海的事追记如下。

我妻子是大韩民国6年1月1日在上海去世的。当时妻子刚生下信儿不久，住在永庆坊十号，她产后身体虚弱，因为不好意思让母亲倒洗脸水，就自己拿着脸盆从二楼下去，不意失足从楼梯上滚下，就此得了肋膜炎，后来转成肺病，死在洋人经营的肺病医院里。我是在宝隆医院和她见了最后一面。妻临终时是金毅汉夫妇帮着照料的，回来后才告诉我这一消息。为了妻子住院和安葬的事，从美洲来

到上海的柳世观君竭尽了心力。

信儿是由母亲喂牛奶长大的，那时睡觉还要衔着他祖母干瘪的奶头才能睡着。

当时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极端困难，我们从事独立运动的同志中，除了有职业的或经商的以外，数十名青年和老年都过着清苦的生活。母亲看到他们忍饥挨饿，十分痛惜，但也束手无策。那时我家后面有个垃圾筒，菜贩经常往里面丢弃一些白菜帮子。于是母亲就在半夜里去挑拣一些还可以吃的菜帮子，腌上几缸以供佐餐。

母亲看到上海生活如此贫困，难以抚养两个孙子长大成人，便萌发了回国的念头，带着不到四岁的信儿踏上了归国之路。我则带着仁儿，在吕班路租借一栋平房，和石吾先生及尹琦燮、赵琬九等几个同志住在一起，以母亲腌的几缸泡菜佐餐度日。

母亲在仁川上岸后，盘缠不够，我并未告诉她，可她也知道去找东亚日报分社，分社的人说看了报纸上登的上海消息，已知母亲要来，便交给母亲去京城的路费，买了车票，送她上路。到了京城，东亚日报社又把她送到沙里院。

离开上海时，我曾告诉母亲到沙里院后可通知安岳金鸿亮，如来迎接，便跟他去，如无回音，就去松禾得圣里（水桥东十余里）姨母家（张云龙姨表弟）。母亲给金家发去通知，但无回音，便去了松禾。

两三个月后，也就是阴历正月初，安岳金善亮（庸济的长子）来访母亲，想把她接到安岳去。他说：

“奶奶不来安岳，日本警察署屡屡派人来我家闹事，说是我家让您转送给上海金先生以独立运动的经费，所以我家大人命我来此陪奶奶回去。”

母亲大怒说道：

“我上次通知你们，说我已到了沙里院，你们不给回音，现在却奉日本巡警的差遣来接我了！”

“这不是我们不够情义，实乃环境使然，请您原谅，跟我一起去

吧！”

“知道了，等天气暖和后，我回海州老家，再去安岳吧。”

于是把善亮打发了回去。

到了春天，母亲离开了得圣里，看望了陶古路林善在（三叔之婿）家和白石洞孙镇铉（姑母之子）家，又去了海州基洞金泰运（远房堂弟）和几个亲族家，并最后一次省视了父亲的墓，之后便去了安岳。母亲先进了善亮家，金家得知后，庸震、鸿亮等人都前来拜谒。他们说母亲来之前就已经腾出了住房，准备了粮食、衣服和其他什物，让母亲安心住下。

母亲一直挂念着上海的子孙，还从自己的生活费里节约了一些钱寄给我们，但这都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又吩咐我把仁儿送回国。我奉母命，拜托了金铁男（永斗）君的叔父带仁儿回国，从此我便孑然一身，毫无家室之累了。

岁月如流水一样逝去，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回想过去，瞻望未来，觉得自己的身世，甚是可怜。在西大门监狱曾发过誓言，祈祷上苍保佑，有朝一日，独立政府得以成立，我当上政府的门卫，死而无怨，不想后来竟担任了最高职务，我将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呢？出于这种想法，我决心从事冒险事业。

由于发生了李奉昌、尹奉吉两义士的事件，听说警察经常找母亲的麻烦，因此我通知了母亲，请他带孩子们到上海来。

当时我奉告母亲，我有奉养母亲的能力，所以母亲决定到中国来。母亲十分勇敢，不同于一般女流之辈。她老人家亲自到安岳警察局去申请出国许可，理由是年纪已老，行将就木，必须在生前把孙子送到他父亲身边。出乎意外，他们竟同意了，于是作动身的准备。

然而，汉城警务局又特地派了一名专员到安岳来，威胁并劝告母亲说，日本军警要逮捕你儿子，尚且找不到他的下落，何况你一位老人家怎么找得到呢？上级有令，不许你出国，你还是回家安心过日子吧！因此就取消了出国许可。

母亲大怒说：

“我找儿子比你们强，何况已经得到许可，我把家产全都变卖了，怎么现在又说不能去，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这些家伙，抢夺了人家的国家，政治又是这样，难道还会长久吗？”

说完，母亲就昏倒了。警察把母亲托给金家照顾，又问母亲的话。出国的意念毫不动摇的母亲总说：“出国那么费事，我不去了。”于是又请来木匠修理房子，同时购买家具，装出要长住的样子。如此过了几个月后，母亲伪称到松禾去看弟弟的病，带着信儿前往信川，又到载宁，再到沙里院，这样一程一程地转移，终于来到了平壤，叫出了在平壤崇实中学读书的仁儿，搭上开往安东的快车。后来在大连受到日本警察的盘问，仁儿随机应变，说带着年幼的弟弟，陪伴老祖母到威海卫去看亲戚，也就平安地通过了。我从南京得到母亲经过安恭根家，来到严恒燮家的消息后，立刻赶往嘉兴，我们母子分别了九年后又重逢了。

母亲一看到我，就说出这样意料不到的话：

“我从此不再用卑语来称呼你了，也绝对不再用鞭子来打你，最多只是骂你几句。听说你设立了武官学校教育青年，已经是为人师表，不能不给面子啊！”

我听到母亲这一番话后深感惭愧，并且把它当做很大的恩典。

我请母亲到南京来，另外租房居住，不到一年，南京危急，就迁移到长沙了。

我们百余名大家族迁居到长沙，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照顾和在美同胞的援助，可谓无微不至，是难民中的高等难民，尤其是长沙物产丰富，物价便宜，新到任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与我很是熟稔，所以更给了我们许多便利。

我在上海、杭州、南京时，除了特别的情况之外都使用假名，但在长沙就光明正大地用金九的名字了。

在来长沙的途中所讨论的三党合一运动，到了长沙进展更为迅



速,要合一的三党阵容是这样的:

第一是朝鲜革命党,以李青天、柳东悦、崔东晔、金学奎、黄学秀、李复源、安一清、玄益哲等为中心;

第二是韩国独立党,干部是赵素昂、洪震、赵始元等;

第三是我创立的韩国国民党,干部是李东宁、李始荣、赵琬九、车利锡、宋秉祚、金朋浚、严恒燮、安恭根、杨墨、闵丙吉、孙逸民、曹成焕等。

以上三党为了讨论合一问题,5月6日在朝鲜革命党的本部南木厅集会聚餐,我也出席了。

可是当我恢复意识时发觉我在医院里,我问我来到哪儿了,回答说,我因醉倒而住了院。医师诊治时我才发觉胸口受伤了,我又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回答说是我因醉倒时碰到了桌角,我信以为真。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后,严恒燮君才说明事实的真相——

当我在南京时,以朝鲜革命党员身份到上海作特务工作并曾受到我资助的李云汉,那天晚上突然潜入会场,用手枪乱射,第一发射中我,第二发射中玄益哲,第三发射中柳东悦,都是受了重伤,第四发射中李青天,但只是轻伤。玄益哲一进医院即不治而死;我和柳东悦经过治疗,已经痊愈,即将同时出院。

后来又听说省政府下了紧急命令,逮捕了李云汉,嫌疑共犯姜昌济、朴昌世、宋郁东、韩成道等也被拘捕。最大的疑点在姜昌济、朴昌世两人身上。他们两人从前在上海受李秘弼的指挥,参加了丙寅义勇队,这是一个特务组织,是革命的败类,他们抢夺同胞的钱财,枪杀日本侦探,也有成了他们的走狗的。因此虽然得不到社会的信任,但也很难定成反革命。

数十天前,姜昌济向我请求说,朴昌世想从上海来长沙,没有路费,让我给以帮助。我说应委托上海的机关处理,因为我知道他的长子朴济道是日本领事馆的侦探。

后来在长沙我也碰到过一次说是没有路费来长沙的朴昌世。李云汉一定是中了姜、朴两人的离间计，一时感情冲动，成了南木厅事件的主犯。

据警备司令部调查的结果，得知朴昌世到了长沙后立即往上海汇了二百元，收款人仍是朴昌世。而李云汉在数十里外一个小车站上被捕时身上仅有一角八分钱，他在犯罪后曾以手枪威胁柳东悦的义婿崔德新（东旸之子），抢走了十元钱逃离长沙。从这些情况来看，他很可能是被姜、朴利用了。

后来战事波及长沙，情势十分危急，中国法庭不能依法惩处主从犯，姜、朴两人获释，李云汉也越狱逃到贵州，沦为乞丐，还与欧阳群相遇谈过话，这是我到重庆后才听说的。

由于这一事件，长沙闹翻了天。警备司令部曾命令从长沙开往武昌的火车退回到长沙，搜索罪犯。我们政府也派人到广东，中韩合作逮捕罪犯。

省主席张治中将军还亲自到我住的湘雅医院来慰问我，并向院方表示不管医药费用多少都由省政府负担。当时在汉口的蒋介石将军，一天一连发了两三通电报询问我的病情，等到知道我出院的事后，派罗霞天为代表，送来三千元表示慰问。

据说最初我是重伤，所以医师看了之后说不必办住院手续，把我放在急诊室外，只等着咽气。然而过了四小时之后，我还活着，所以就移到病房开始治疗。当时安恭根正在香港准备把移居重庆的家眷和他仲兄定根的家属搬到香港，仁儿也在去上海工作的途中滞留在香港，而我在送进医院之初被医生诊断为抢救无望，于是就向他们发出了我中弹死亡的电报，所以安恭根和仁儿一起赶来要参加我的葬礼。

出院后我步行去见母亲，我受伤这件事一直没有告诉母亲，直到快出院时，信儿才告诉她。她见了我就说：

“我知道上帝会保佑你的，邪不犯正嘛！遗憾的是李云汉也是韩

人,倒不如被日本人枪杀了的好。”

出院后就在严恒燮君家里静养。有一天忽然觉得身体不舒服,想作呕,右大腿突然麻痹,所以又到湘雅医院去检查。洋人外科主任使用 X 光检查后,判断是留在我心脏旁的子弹通过血管,转移到右边的肋骨旁,如不舒服的话动手术也不困难,但留着对生命也无影响,还有右腿的麻痹是子弹压迫大血管所致,待小血管扩大,代替被压迫的血管的机能后,腿的麻痹就会渐渐好起来。我根本不想动手术,所以离开了医院。

这时长沙也遭到了敌机的空袭,中国政府的机关正忙于避难。我们三党干部讨论的结果,决定迁往广东,同时也订出计划,打通进出南宁、云南的道路,加强和海外的联系。当时难民人山人海,我们百余口人,再带上堆积如山的行李,不要说远行,就是去近郊农村也很困难。

我拖着病腿,拜访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商讨迁往广东的事宜,蒙他慨然允诺,下了命令拨出一个火车车厢,供我们一行免费乘坐,还亲笔给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 5

## 创建光复军

到了广州，在中国军队服务的同胞李俊植、蔡元凯两位帮助我们，把临时政府办公厅设在东山柏园，家属全部安顿在亚细亚旅馆。安置好后，我便去了香港，计划从上海接出安义士的未亡人及遗族。我见到安定根、安恭根两兄弟，向他们提出了强硬的主张，让他们办这件事，但他们以交通困难为由，不听从我的意见。事实上从当时的情势来讲也确实困难，我让安义士的遗族困在敌占区，也未能救出在溧阳古堂庵跟中国道士任汉延修道的梁起铎，感到非常遗憾。

在香港住了两天后就回到广州，可是那里也受到倭寇的袭击，所以我又接母亲与大家族移往佛山，这又是吴铁城主席好意安排的结果。

就这样在广州呆了两个月，我们向蒋介石主席请求赴重庆。得到了准许的复电后，我带曹成焕、罗泰燮两位同志再到长沙，跟张治中主席联系，得到三张去贵阳的车票及给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的介绍信。

我把介绍信和三张去贵阳的车票交给了罗泰燮、曹成焕两同志，遂一起搭乘西南汽车公司的车，越过崇山峻岭，走了十多天，才到达贵阳。

多年来,我总以为华南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是到贵阳一看,来往行人中除极少数人外,大多数人都是衣衫褴褛,面带菜色。

这里多山,山上石多土少,农家必须挑土铺在岩石上才能播种,可见土壤是非常珍贵的,而苗族的生活比汉族似乎更穷、更不开化。

我不懂中国话,不能从语言上来分辨汉族苗族,但是从服饰上可以分清苗族妇女,而苗族、汉族的男子则有文野之分。当然,苗族化的汉人也是很多的。

苗族是尧舜时代三苗氏的子孙,四千年来过着这种原始的生活,这是前生的什么孽报阿!尧舜以后历史上就不曾出现过有关苗族名人的记载,故我一直认为三苗是古代种族的名称,近代已经消亡了。苗族在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地分为几十个种族,现在不少人已经汉化,其中还有一些杰出人物,据说广西的白崇禧将军<sup>①</sup>与云南的主席龙云<sup>②</sup>都是苗族的后裔,但我身边没有资料,不能断定此事的真伪。

在贵阳停留8天后,我平安地抵达重庆。那时广州已经沦陷,我正打听我们大家族的消息时,就接到了电报,说他们已平安地逃离广州,经过高要、桂平到了柳州,这才放心了。他们都希望能到重庆来,但当时车辆严重不足,运送军需品需要千辆以上的车,而实际上只有一百辆,因此中国当局也爱莫能助。我向交通部与中央党部交涉,好容易才借到六辆汽车,还发给旅费,这才把我们大家族接来安置在綦江,又派晴莱兄前去购置房屋家具,把他们安顿下来。

我把我们迁到重庆的消息通知了美国、夏威夷的侨胞,为了看有无回信,我每天都要去邮政总局。有一天我到了邮政局,仁儿来了,说住在柳州的母亲患了重病,想来重庆,所以仁、信兄弟俩陪伴她老人家来了,我就急忙跟仁儿赶去,原来就在我住的储奇门鸿宾旅馆的对面,我们立刻接母亲到鸿宾旅馆住一天后,应金弘叙君的

---

① 系广西桂林人,回族。——译注

② 系云南昭通人,彝族。——译注

盛情邀请,又搬到住在江南岸鹅宫堡孙家花园的金君家里。

医师说母亲的病是咽喉症,这是在广西因水土不服而引起的,年轻人可以动手术,像母亲这样八十高龄的老人家则不行,如果是早期的话,尚可设法治疗,现在为时已晚。

这时刘振东君和其夫人姜暎波女士举家来到重庆,诚心诚意地想要侍奉年老体衰的母亲。这对夫妇从学生时代起就对我爱护备至。刘君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后来当上了牯岭肺病疗养院的院长,因为看到牯岭将成为战争的据点,又得知母亲已到了重庆,便经由宜昌、万县来到此地。他们夫妇见我难以侍奉母亲,便自愿负起护理的责任,以便让我放心地专门从事独立事业。遗憾的是当他们来到江南时,仁济医院已经不肯收我母亲,母亲遂不得不出院,在家静候时日了。

我到重庆有三件事要做:第一是借车运载大家族的事;第二是与美洲、夏威夷各团体联系,通知他们临时政府的职员及其眷属已迁到重庆,争取经济上的支援;第三是提出各团体统一的问题。现在大家族已得到安置,跟美洲也取得了联系,于是便着手团体统一的工作。

我为此拜访了鹅宫堡的朝鲜义勇队与民族革命党本部,他们的党魁金若山正在桂林,由尹琦燮、成俊甲、金弘叙、石丁、崔锡淳、金尚德等干部为我举行了欢迎会,在那个宴会上我提议所有的团体统一成为一个民族主义的单一党,大家一致赞成,于是又进一步决议邀请柳州与美洲、夏威夷的各个团体一并参加。

美国与夏威夷立刻来了回信,他们赞成统一,但是说金若山是共产主义者,如果我与他合作,他们就要与我断绝关系。我就与金君商议,结果由我与他联名发表宣言,题为“民族运动才是祖国光复所必需的”。柳州的国民党则回信说在重庆讨论决定。

先遣队抵达綦江不久,百余名家属也都安全到达,只有母亲病情日益危笃,她意识到了自己康复无望,便说:

“你快努力使独立早日实现，等你功成回国时，把我和孩子妈的尸骨也运回去埋葬在故乡。”

大韩民国二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母亲在孙家花园和我们永别了。她受苦受累五十多年，终未能见到自由独立，含恨而去。我们在相距五里左右的和尚山公墓建立一石室，把母亲安葬在那里。母亲生前是大家族中年事最高的，大家都把她看成是尊长。她去世后，葬在她附近的有玄正卿、韩一来等数十名韩人，都比她年纪小，她将成为“地下会长”。

从前使用奴仆的时代且不去说它，自从国家被吞并以后，不论京乡，国人都良心发现，不约而同地认为“我成了日本人的奴隶，怎忍心再把同胞当作奴仆使唤呢？”因此废止了奴仆制，改为雇佣制。母亲一生都十分尊重奴仆的人格，八十年里从未说过“雇佣”二字，直至去世前，她都是亲手缝补衣服，亲自下厨做饭，从不假借他人之手，真是不易啊！

把綦江大家族安顿好后，我便召集了赵琬九、严恒燮等国民党的干部开会，讨论统一问题。我认为各党派如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即使联合在一个统一机构里，仍是图谋自己小团体的发展，反而会增加摩擦，既然社会主义者不再反对民族运动，而目前海外的运动应致力于恢复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从而竭力主张统而为一，为什么就不能合并为一个组织呢？可是和我的意见相反，不仅国民党的干部，就是党内全体党员，还有朝革、韩独两党却都主张联合论，他们认为主义不同的各团体不可能合并为单一的组织。

我在这次干部会上论述了我的观点，大家只好说：

“既然理事长这样主张，就赶快一起去綦江说服我们国民党全体党员和两个友党的同志，不然就难以成功，因为我党党员和两个友党的党员全都强烈主张联合论。”

我自办了母亲丧事后，身体一直不好，正在休养，现在情况既然如此，不得不勉强去綦江一趟。

我抱病到綦江去开了八天国民党干部和全体党员会议，又向两个友党做了一个月的工作，才一致同意合并为单一组织。于是在綦江召开了七党统一会议，属于光复阵线远东三党的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与属于民族阵线的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同盟、朝鲜民族前卫同盟、朝鲜革命者联盟等四党参加了会议。

会议进行中大势倾向于合并为单一组织，解放同盟与前卫同盟则不愿解散其组织，因而退席，他们是共产主义团体，从来就不愿为民族运动而牺牲其组织，因此他们的退席并不奇怪。这样七党变为五党，于是组成了纯民族运动的新党，五党首席代表在八条协定上署名。

休息几天时，应该解散的民族革命党代表金若山突然宣布退出，他的理由是党的干部们与他所统率的义勇队是信奉共产主义的，如果八条协定不修改，他们都要退出。

如此五党统一遂告失败，我向光复阵线的三党同志与美洲、夏威夷的各团体表示歉意，并继续召开远东三党统一会议，遂组成一个新的韩国独立党。夏威夷爱国团与夏威夷团结会也都解散，另组成为韩国独立党夏威夷支部，这样也算是五党统一。

新的韩国独立党的干部，执行委员长为金九，执行委员为洪震、赵素昂、赵时元、李青天、金学奎、柳东悦、安勋、宋秉祚、赵琬九、严恒燮、金朋浚、杨墨、曹成焕、朴赞翊、车利锡、李复原，监察委员长为李东宁，委员为李始荣、公镇远、金毅汉等。

临时议政院改选了国务委员，选我担任国务会议的主席，修改本来主席由国务委员轮流担任的制度，由主席负对内对外的责任。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设立外交委员部，任命李承晚博士为委员长。

我到重庆后，和中国当局交涉，结果在交通工具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免费借给了五六辆汽车，运载大家族和行李，长途跋涉数千里，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又和赈济委员会联系，在土桥东坎瀑布买地



建了三栋瓦屋,还在市内买了一栋二层楼房子,安置了百余名家属。我们还请求给予独立运动以其他援助,但他们的态度却很冷淡。我想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困难时期,我们向中国作过分的希求甚感内疚,美国是富国,并正在准备对日宣战,那里又有一万多名同胞,因此我有意到美国去争取美国援助,故向中国政府请求发给护照。中央政府的徐恩曾先生对我说,我久住中国,在中国留下一件事业岂不更好?于是要我提出事业的计划,由他上报给上级。我提出了一份组织韩国光复军的计划书,说明如蒙协助,准许组织这样一支韩国国军,则将起到动员三千万韩国同胞的作用。这份计划书呈递给了蒋介石将军,他立即批复照办。

因此临时政府任命李青天为光复军总司令,竭尽全力(美洲,夏威夷同胞捐助四万元)在重庆嘉陵宾馆邀请了中外人士,并动员所有同胞举行韩国光复军成立典礼。我们首先选送了三十余名干部到西安去,与原先的曹成焕等人汇合在一起,成立了韩国光复军司令部,以李俊植为第一支队长,派遣到山西方面;以高云起(公镇远)为第二支队长,派遣到绥远方面;以金学奎为第三支队长,派遣到山东,并改编罗月焕等的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为光复军的第五支队。自此开始着手进行招兵、宣传、情报等工作。

这时黄海道海州人金文镐在江西上饶中国第三战区司令部政治部服务。他胸怀大志,曾留学日本,后来到中国,在各地流浪时,被浙江金华方面以侦探嫌疑逮捕,幸遇同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同学,遂跟他一起在第三战区司令部工作。他通过报纸知道了金九的名字,便先以书信联系,后又来到重庆,向我报告了有关他的一切情形。我在上饶设置了韩国光复军征募处第三分处,任命他为主任,并任命申贞淑(凤彬)为会计组长,李志一为情报组长,韩道明为训练组长,宣传组组长由金文镐兼任,派到了上饶。

党政军的一切费用都是美洲、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的侨胞以满腔热情捐助的。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为代表的妇女慰劳总会也捐来

中国国币十万元。

下面介绍几位特殊人物。

第三征募处申凤彬女士的经历是很有传奇色彩的。

还是年前我在长沙湘雅医院治疗胸部枪伤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坐在病床上向外瞭望，突然房门一开，有一女子往房里扔进一封信来，便消失了踪影。

我的专任护士唐华英正在房中，便请她把信拣起给我，打开一看，真是一件没头没脑的事。

这信不是通过邮局寄而是托人捎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名叫申凤彬的女子写的陈情书，她当时正被关在常德俘虏收容所里。她说她原住在上海（与丈夫同居），四·二九虹口事件后被捕过，是李根永的妻妹。她丈夫宋镇杓（真名张铨根）当大韩民国事务员时被捕送回国内。她是从她姐姐和丈夫那里听说起我的，说我到她姐姐家里，姐姐常以冷面招待，听说后便非常仰慕我。她因经商在山东平原被中国游击队拘捕，在去常德的路上经过长沙。但由于不知道我的住所，无法联系，以后被押送到常德……，信中大致是这些内容，她请我救她脱身。

我真不知道这封信的来历。看样子这女子确是李根永的妻妹，早在国内就听说过我的名字也不假，但是我在长沙湘雅医院住院治疗，她远在数百里外的常德收容所是怎么会知道的？这封信既未贴邮票，也没有盖邮戳，显然是托人送来的。刚才在房门外只见人影一晃便不见踪影的那女子难道是天使？

确实有必要进行一番调查。我出院后便请求正在汉口的蒋委员长特许我去调查俘虏，获准后就派遣卢泰俊、宋冕秀两人去常德调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常德俘虏收容所有韩籍俘虏三十余名，日本俘虏数百名，每个房间都是混杂居住，而且韩人要听日本人的指挥，甚至连运动体操也由日本人喊口令，日本人的权利也更多些。申凤彬拒绝接受日本

人的指挥,她用流利的日语向日本人进行激烈的抗辩。见此情景,中国官员知道她是有人格的,于是进行了秘密审问,调查凤彬反日思想的来由。他问凤彬在中国活动的韩国独立运动者中有没有认识的人,凤彬说认识金九。

“金九现在何处?”

“不知道。”

“你认为你给金九写信,请他救你,他会答应吗?”

“金九先生知道的话,一定会救我的。”

调查此事的官员正好是长沙人。由于5月6日狙击事件,长沙引起了很大的骚动,金九受伤住进湘雅医院,长沙是无人不晓。恰逢这位官员回家探亲,便带来凤彬的书信,他到湘雅医院询问我住在哪间病房,得知我房门外有宪兵派出所的人在监护,不能由自己直接送信,就找了一位认识的护士,请她把信投进我的房中。这位官员确信我收到信后便急速地离开了医院。

从此收容所便给凤彬以特殊的待遇。长沙危急,撤到广州后,我因有事要去重庆,便乘火车重又返回长沙,从长沙转乘汽车经过常德,但因时间关系,未能去收容所,只是给申凤彬写了一封信。我想到重庆后再设法救她脱身。哪知到了重庆就听说义勇队已经进行了交涉,要求释放俘虏。于是一部分俘虏和申凤彬获释。凤彬曾数次提出要求想来我处,于是我便写信给金若山,请他从桂林来重庆时把凤彬带来。我见到她后便把她安置在土桥,后来又送回上海。凤彬虽是女性,但是聪明果断,她的战时工作效率,连中国方面也广为人知,凤彬自己也下决心要作出突出的贡献。我对她寄予厚望。

令人悲痛的是还有一些同胞散失了,未能编入我们的大家族。上海的吴泳善、李义樾(李东辉之女)夫妇及其子女便是一例。

他们之中吴泳善因身有残疾,行动不便,不可能编入我们大家族中来。年前他已作古,但上海已沦陷,我们已无法救助其家属。

李溟玉君一家也是这样。溟玉君本是金川人。他参加了三·一运

动,暗杀了日本侦探,潜来上海,当了大韩民国的事务员。妻子找来后,为了生计,他又当上了英商电车公司的查票员。我迁到南京后,因为秘密工作的关系,他还和我有来往,不幸被日寇逮捕,送回本国,被判二十年劳役。他的夫人李贞淑女士带着子女留在上海生活。我住在南京时还常补助他们生活费,并通知他们编入了我们的大家族。可是他夫人却因关在本国监狱里的丈夫每两个月有封信来,故不忍离开上海。

后来其长子好相参加了朝鲜义勇队,在浙东一带工作一段时间,因怀念母亲和姐弟,同两三个同志一起,潜回上海从事秘密活动,时而和自己家人暗地里往来,不料被日寇察觉,逮捕了他的母亲严刑拷问,让她供出爱子好相的住处,母亲缄口不言,被拷打致死。好相与三个同志坐火车逃走,在车上全部被捕,被押送内地,途中在船上遇见了小姐姐,听说母亲和幼弟遇害,他小姐姐也正被押送去内地,好相当场气绝身亡……。

痛哉哀哉!苍天无眼,竟连幼小儿女也难逃日寇的魔掌,命赴黄泉。这种世道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吗?

亡国以来,全家被日寇杀害的何止千百户,而自己未年在上海开展活动以后李溟玉君一家的遭遇是最悲惨的。我要给我们的子孙留言,光复祖国后你们一定要在其故乡遂安为他们一家建座忠烈门,以资永久纪念。

从一开始就和我们大家族一起活动、后来在长沙遭到日寇走狗李云汉的狙击而饮弹殉国的玄益哲(默观)君虽然年纪未满五十,但为人却足智多谋,性格慷慨豪爽。这位同志在满洲时曾作为正义部的首脑,在日寇、共产党和张作霖部下的亲日派三面包围下,为独立运动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不幸被日寇逮捕,关进了新义州的监狱,经受了痛苦的重劳役的熬煎。出狱后因满洲已变成日本人的世界,便来到关内和李青天、金学奎等老朋友们一起组织了朝鲜革命党,又在南京和大家一起组织了义烈团主持的民族革命党,在五党统一

时,他退出此党,参加了远东的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韩国国民党、美洲国民会、夏威夷国民会、爱国团、妇女救济会、团结会、同志会等九个团体组成的光复阵线。在由南京赴长沙时,他也被编入大家族内,率其夫人方顺熙和幼子钟华到了长沙。默观提议实现各党派统一,大家都同意召开会议,在我也出席的宴会上遭到袭击,但只有他一人不幸伤势过重而身亡。

此后我和曹成煥、罗泰燮两同志一起要从黄州去重庆,在长沙等待开往贵阳的汽车时,正是中秋节,我提出要去省视默观的陵墓,但是曹、罗两同志考虑到我身体尚未完全复原,又要远行,再去默观坟前哭祭亡灵,怕我身心难以承受,故竭力劝阻我,只由他两位带着酒菜前去祭奠。在长沙搭乘去贵阳的汽车,途中两同志指着竖在路旁山中腰上的一块墓碑,告诉我那就是玄默观的坟墓,于是我便在车上行注目礼,在心中默祷。默观不幸去世,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默观君,安息吧!我一定全力照料您的夫人和公子,保证他们的安全。

无情的汽车疾驰而过,我再也看不见默观的墓碑了。

母亲在重庆去世,大家族安顿在綦江一年后,石吾李东宁先生作古,安葬在当地,享年七十一岁。

三十多年前签订了乙巳新条约之后,我在京城尚洞耶稣教堂里以进者李石的名义进行活动,初次与东宁先生晤面,我们一起参加了上疏运动。以后在京城梁起铎的客舍又再次相逢,决定在西间岛设立武官学校,为将来的独立战争培训武官,先生负责掌管业务。己未年我们又在上海会晤,二十多年来,我们同心同德,同甘共苦,专心致志地一起工作。

先生德才出众,一生乐于助人,有事让人出头露面,自己则退居于后,进行辅助开导,这是先生终生不渝的美德,至弥留之际,先生仍对我爱护备至。石吾先生去世后,遇事我总是想起先生,因为再也没有先生当顾问了。有此想法的决非我一人,失去了先生不能不是

我们运动的一大损失。

我还要谈一谈孙逸民同志的去世。他年过六十，经常抱病在身，最后终于化作綦江的一撮黄土。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胸怀复国大志，多年在满洲进行活动，以后又辗转于上海、南京、长沙、广州、柳州之间，最后也在綦江编入我们的大家族。他无子女，只留下一位年近六十的寡妻。

大家族生活在綦江的两年多时间，发生了一桩奇怪的丧事。赵素昂的父母都已是七十多岁高龄，他高堂老母去世以后，父亲也投江自尽，不知是情死还是厌世，总之是一件罕见的事情。

大家族迁到土桥以后近两年，于二十四年二月，在金光耀的慈母因肺病逝世后，宋新岩秉祚同志也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他是临时议政院的议长、韩国独立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临时政府顾问，同时还兼任会计检察院院长。昔日当同人七人弃职而倒向南京义烈团所倡导的五党统一时，他作为国务委员，和车利锡两人坚守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正当国际上承认临时政府的问题提上日程时，不幸抱恨辞世，在土桥留下了一抔黄土，这只能是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临时政府、独立党、光复军三位一体，而韩独党员是其中的核心。聚集于此的人物多为韩国革命的老一辈，自然是死亡率超过了新生率。

我现在制订大家族的名册，传给后世。因己未运动而来上海的五百余名同胞可以说都是家族成员，但记在我这本《逸志》里的则大部分都是虹口事件以后从上海逃出来的同志及其家属。其中孙逸民、李光等同志多年居住在北京，卢沟桥战事爆发以后，偕同家属一起南下，和我们在南京汇合。

名册中的大部分人是从上海逃脱出来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从南京逃出来的，如金元凤君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系统的人。我们这一边是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三党。逃出南京的金元凤率领同志们和眷属经过汉口，迁到重庆，我则率领同志们和眷属经过

汉口去了长沙,在长沙呆了八个月又去广州三个月,前往柳州,几个月后又到了綦江。在綦江将近一年,来到了土桥东坎,在此建了三栋房子供大家族居住,而在党政军机关服务的同志及其家属则住在重庆。大家族的名册另纸作成。

# 6

## 此后之事

独立军创建后,人员不多,所以有名无实,过了几个月,忽然发生一件事。有五十余名青年,胸前贴着太极旗<sup>①</sup>,唱着爱国歌<sup>②</sup>,来到重庆的临时政府,他们是被编入日本军队的韩国大学生,在中国战线作战时逃脱,找到在安徽省阜阳的光复军第三支队,于是支队长金学奎把他们送到临时政府来。这件事大大地感动了中国人,由中韩文化协会举行了欢迎会,欧美各国通讯社记者以及大使馆官员都来参加。他们向我们的学生兵询问了各方面的问题。这些学生兵自小受日本教育,连国语也不太懂。他们说,为了祖国的独立,甘愿冒生命的危险,来找临时政府。他们的这番话不要说我们韩国人,连外国人听了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由于此事的关系,我们的光复军引起了联合国的注意,美国主管战略事务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nice)的萨森特博士在西安与第二支队长李范奭合作,威姆斯中尉在阜阳与第三支队长金学奎合作,秘密训练我们的光复军。按照预定的计划,受完三个月的训练后,便授以侦察及破坏的任务,准备秘密遣回祖国工作。我为了与美国作

---

① 韩国国旗。——译注

② 韩国国歌。——译注



战部长陀诺裴将军讨论军事协议,搭乘美国飞机到西安。

会议在光复军第二支队本部办公室举行,开会时,正右边的太极旗下坐着我和第二支队的干部,左边美国国旗下坐着陀诺裴将军与美国教官。

陀诺裴将军站起来宣布说:

“自今日起,美利坚合众国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共同抵抗敌人日本,开展秘密工作。”

陀诺裴将军与我走出正门时,拍摄了影片,会议就此结束。第二天举行受训学生实地演习。我们应美国军官的邀请,乘汽车前往杜曲东南四十里古汉诗上有名的终南山去参观。我们在洞口下车,约步行五里许到了一座古寺,这是我国青年秘密接受训练的地方,在这里吃过美国军队式的午餐后,又吃了香瓜和西瓜。

这次实地演习,第一是以心理学的方法选拔敢于和善于冒险的人、能随机应变而精于侦察的人和耳聪目明、熟练掌握无线电的人,主持这项考试的心理学家的结论是,韩国青年不论是勇气或是技能都是很优秀的,将来前途无量。

其次是把麻绳连结起来,一头系在岩石上,然后挑出七名青年,命他们攀绳下到悬崖下,摘一片树叶衔在口里,再攀援而上。考官看了七人的表演,大为赞赏,他说:

“我考过四百名中国青年,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让七名韩国青年出色地解决了。韩国人真是一个前途光明的民族啊!”

这七名青年受到如此的称赞,我真是无比高兴。

再其次是试验爆破、射击、秘密渡河等,他们都有很好的成绩,我非常满意。当天我们就回到了杜曲。

翌日到西安去拜访中国朋友,从杜曲到西安有四十里路。

因胡宗南将军外出,只见到参谋长,省主席祝绍周先生与我是莫逆之交,邀我第二天在他私宅共进晚餐。据说省党部还要为我举行欢迎会,西安妇女会也为了欢迎我而特别准备晚会,各报社也要

举行欢迎会，并送来了请帖。

我那天晚上就在我们同胞金钟万家度过，翌日我参观了西安的名胜古迹，晚上就依约到祝主席家去共进晚餐。吃过饭后在客室里一面吃西瓜一面闲谈时，忽然电话铃响了，祝主席吃惊地站起来说，不知道重庆有什么消息来，就到电话室去，过了一会儿回来喊着：

“倭寇投降了！”

这真是个令人兴奋快乐的消息，但是对我来说，却好像天坍了一般，几年间千辛万苦地准备参战竟成徒劳，已与美国陆军部协商好在西安阜阳训练我们的青年，授以秘密武器，从山东乘美军潜水艇返国，去破坏或占领要塞以后再由美机运送武器的计划，一次也未能实行，倭寇就投降了，真是前功尽弃，实在可惜。比这更难堪的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有做过一件事，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

我再没有心情呆下去，就告辞而出。我的车开到大街时，已经到处是人山人海，高呼万岁的声音直冲霄汉。

我辞谢了西安各界为我准备的欢迎会，立刻回到杜曲去。我们光复军因为还没有履行自己的任务而战争就告结束，感到非常失望，全都沉浸在抑郁的气氛中，而美军教官及大兵却都忘形地雀跃欢呼。

美国为了建造能住数千名光复军的营舍，自终南山搬运木材，从砖石工厂搬运砖头，现在也就停止了。我这一次来的目的是要派遣第一批在西安训练的我国军人回国，再到阜阳派遣在该地接受训练的第二批回国，然后再回重庆，可是这个计划却成了泡影，我自重庆来时搭的是军用飞机，回去时就只能搭客机了。

到达重庆时，中国人战时的紧张状态已经松懈，陷入了一片混乱，我们的同胞也茫然不知所措。我还没有回来的期间，临时政府召集临时议政院开会，有的主张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总辞职，有的主张解散后回国，意见纷纭，得不到结果，听到我这个主席回来的消息

后,休会三天。

我到议政院去郑重地宣布,解散或总辞职都不妥,我主张回到汉城在国民面前移交政府之前,仍然保持现状。这一意见得到了全体议员的同意。但是美国却说,汉城已经成立了美国军政府,不允许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归国,只能以个人的名义,我们无可奈何,遂决定各人以个人资格回国。

如此就结束了七年的重庆生活,真是感慨万千,不堪回首。

我乘轿子过江到和尚山母亲及仁儿的墓地去,献上鲜花,祝祷而别,同时给守墓人以重金,请他好好看管墓地。然后买了八只皮箱,装入政府所有的文件,并处理了留居在重庆的五百余名同胞的善后事宜。临时政府为了回国后跟中国政府联系,成立于驻中华代表团,并任命朴赞翊为团长,以闵弼镐、李光、李象万、金恩忠等为团员。

我们将要离开重庆,所以中央政府与国民党,以蒋介石伉俪为首,邀集了政府、党部、各界要人二百余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里,宴请我们临时政府国务委员与韩国独立党干部。礼堂内交叉悬挂着中国国旗与太极旗,非常隆重感人地举行了欢送宴会,蒋介石主席与宋美龄女士首先站起来致辞,祝中韩两国国运昌隆,我方也致了答辞。中国共产党本部的周恩来、董必武也为临时政府国务院全体委员举行了欢送宴会。

在记述离开重庆情况之前,先追记七年重庆生活中所不能忘怀的几件事。

第一是关于在重庆的我国同胞的生活。

重庆本来是一个人口只有几万的小城市,但自中央政府迁来此地后,沦陷区的官吏与难民群集于此,因此一跃而成为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不管怎样兴建房屋,还是不能完全满足需要,所以在夏天,露天居住者达几十万人之多。

粮食实行配给制,所以在配给所前面总是排着长蛇阵,经常发

生打架吵骂的纠纷。可是因为我们同胞另外呈报人口的名单,所以一次可以领到全体的粮食,再雇人载着粮食挨家挨户地分送,因此非常方便,甚至连扫院子汲水也请佣人来做,不仅重庆市内的同胞如此,住在郊外土桥的同胞也另立韩人村,维持着中国人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虽然偶尔也有不满意的时候,但一般都能维持有秩序而且很安全的集体生活。

我自己在重庆可以说是背着临时政府过逃难的生活,只能抽空吃饭睡觉。日机轰炸重庆渐渐加剧,临时政府也搬了四次家,第一次在杨柳街的办公室经不起轰炸,因而搬到石板街去,但因轰炸时引起大火,连衣服也全烧光了,所以再迁到吴师爷巷,这房子本是被炸坍后再修建的,但不能做为办公室,就改成职员宿舍,第四次迁到莲花池,有房屋七十多间,房租一年四十万元(法币),全由蒋主席补助,所以临时政府直到离开重庆,用的还是这些房子。

重庆连续遭到轰炸,生命与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我们死难的同胞有申翼熙的侄儿和金荣麟的夫人两人。

这两位同胞死在轰炸最激烈的时候,当时曾发生过一个防空洞里四百名或八百名窒息而死的惊人事件。就在这一次,我曾目击搬运尸体的情形,就像装运货物一样把尸体扔到车上,开车后车子晃动时尸体坠落下来,开车的不愿再麻烦,就勒住尸体的脖子绑在车后拖着走。尸体不分男女,都是衣服破碎,连肉都裸露出来了,这是他们生前在洞中争先恐后互相挣扎的痕迹。失去亲人的人家,人们在痛苦悲泣,而去防空壕收尸的工人却搜走了尸体身上的金钱饰物,立成暴富。发生这一惨事的地方就在神女最多的较场口,所以死者大多是私娼。

重庆古名为巴,与现称成都的蜀合称巴蜀之地。市街左临嘉陵江,右边与扬子江之会合处可停泊千吨级的汽船,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地名之所以为巴,是古时有位巴将军以此为都,在莲花池还有故巴将军之墓。

重庆的气候对健康非常不利,极易引起呼吸道疾病。七年期间,我们的同胞死于肺病者有八十名之多。从9月初开始至翌年4月止云雾弥漫,难得看见太阳,而且又是气压很低的洼地,因此地面上的恶臭不散,空气十分污浊。我的长子仁儿也成为这种气候的牺牲者,葬在重庆。

11月5日,我们临时政府的国务委员和其他职员,分乘两架飞机,离开重庆,经过五小时,踏上了阔别十三年的上海土地。我们飞机着陆的机场,据说是以前的虹口新公园,机场内挤满了欢迎我们的男女同胞。我虽然曾在上海住了十四年,但从没有来过虹口公园。出了新公园正要去市内时,见到有六千名同胞从早上六点钟起就开始在此等候。我跨上一个一丈多高的讲台,向同胞们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后来才知道,那个讲台就是十三年前尹奉吉义士向倭寇白川大将等投弹之地,倭寇为了纪念死者,才造了这个讲台作为阅兵台。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偶然的事情。

我住在扬子饭店。十三年对人生来说是段很长的岁月。我离开上海时,一些人还是小孩子,现在皆已长大成人,原是壮年人现在都已衰老。我和在这漫长时间内毫不动摇、大义凛然的一些同志如鲜于懋、张德櫓、徐丙浩、韩镇教、曹奉吉、李龙焕、河相麟、元宇观等,在徐丙浩家里共进晚餐,并且摄影留念。

我也听说留在上海的同胞中,有不少从事不正当的职业,我听了很难过。我盼望的是,我们同胞每到一处,都要老实地从事正当职业,要有提高我们民族信誉和威信的爱国的责任心。

我又到法租界公墓去看了妻的坟墓。我在上海住了十几天之后,乘美国飞机离开上海飞向祖国。想到李东宁先生、玄益哲等同志,其忠骸长埋异域而不能一起返国,感到非常遗憾。



백범일지

## 踏上祖国的大地

离开上海三个小时以后，飞机飞抵金浦机场。我怀着悲喜交集的心情，呼吸着离开了二十七年的祖国的新鲜空气，踏上了日夜怀念的土地。

我一踏上祖国的土地，看到学生们背着书包去上学，他们朝气蓬勃，活泼开朗，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和这相反的是，同胞住的房子，又低又矮，看起来非常贫寒，这又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

据说同胞们为了欢迎我们，好几天聚集在机场，但不知道飞机到达的准确时间，所以今天来迎接我们的同胞并不很多。我这老迈之躯，靠在汽车的后座上，进入汉城时，只见故国山川如旧，好像正在欢迎远方归来的游子。

欢迎我们的人士预先给我们准备好了宿舍，我住在新门外的崔昌学先生家里，公务员一行则住在韩美旅社。

我通过报纸，表示很想会见尹奉吉、李奉昌两位义士和江华金周卿先生的遗族。不久，尹义士的公子从德山来看我，李义士的侄女也从汉城来看我，金周卿先生的公子润泰，由于留在三八线以北，未能碰面，但他的女公子和亲戚们，有的从江华，有的从金浦来看我，我既感到高兴，又感到难过。我所怀念的祖坟和亲戚故旧所在的故

乡,由于横亘着一条所谓的三八线而不能去探访,可是表兄弟和表妹们来京探望我,我们又很高兴地重逢了。

军政厅所属的各机关和政党、社会团体、教育界、工厂等各界联合组织了欢迎会,我们虽然是以个人的身份回来的,但是几十万同胞同时高举着国旗和欢迎临时政府的旗子,在汉城的大街上游行,最后在德寿宫的庭院里,举行了四百余桌的欢迎宴,哈奇中将以下美国军政首长们都出席参加,那么大的德寿宫庭院,几乎到了水泄不通的程度,真是热烈而盛大的欢迎会。

我并没有什么功劳,受到如此盛大的欢迎,我既感到惭愧,又感到内疚,但同胞们是想慰劳在海外长期辛劳的我们,因此只好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

不知不觉地过了一年,我决定环游巡视一番,哪怕只是在三八线以南,所以头一站便去了仁川。仁川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地方,二十二岁时在仁川监狱被判死刑,二十三岁时越狱逃走,到了四十一岁,被判十七年有期徒刑又移送到此地的监狱来,那个港口渗透着我当年的血与汗。为了探望狱中的不孝儿子,先父母曾从这条路上走过,我觉得现在地上还遗留着他们的泪痕似的。四十年前的往事,好像昨天才发生似地清楚地浮现在眼前。在仁川也受到市民的盛大欢迎。

旅程的第二站是去公州麻谷寺。到了公州之后,忠清南北道十一郡的十余万同胞聚集在那里,为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

我离开公州前往麻谷寺的途中,到金福汉、崔益铉两位先生的灵前去拜祭,并慰问遗族,也受到了村民们热情的欢迎。政党和社会团体的代表们,跟随我到麻谷寺去的有三百五十多人,麻谷寺的僧侣代表也跑到公州来迎接。到了麻谷寺的村口,男女僧尼列队热诚地欢迎我,大概他们认为以前此寺的一个和尚现在以一国主席的身份回来是莫大的光荣吧,这就是我四十八年前头戴笠帽、颈挂念珠进出之地。山川未变,庭院如故,大雄宝殿上挂着的对联也与从前无

异——

“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

那时不曾注意过的文句，今天仔细一看，好像是为我所书似的。在从龙潭居士学习普觉书状的拈花室住了富有意义的一宵，僧侣们在这天晚上为我念了经，然而其中没有一位是我认识的人。第二天早上，我种了一株木槿花和一棵香木留念，然后离开了麻谷寺。

第三站是到尹奉吉烈士的家乡去，正碰上4月29日，因此参加了纪念祭。然后我请在日本东京的朴烈同志，奉送尹奉吉、李奉昌、白贞基三位烈士的遗骨返国，其遗骸到达釜山时，我乘坐专列前去迎接。釜山自不待言，载着三位烈士遗骸的火车每到一站，都有社会、教育各团体以及一般人士聚集在火车站举行追悼大会。

为了便于同胞瞻仰，到了汉城就决定把装忠骸的灵柩先安置在太古寺内，然后在孝昌公园我亲自看好的地方下葬。最上面留下了要安置安重根烈士遗骸的地方，接下来依次把三位的忠骸一一安葬。

这一天，美国军政首长也全部到场，并预备出动美军部队，但被劝阻了，只动员了韩国警察、陆海军警备队、政党、团体、教育机关、工厂的职工。一时同胞们蜂拥云集，从太古寺到孝昌公园的路上，到处是人山人海，电车、汽车、行人的交通为之中断。

葬仪队的先头是奏着哀乐的乐队，跟随其后的是花环队、挽章队，三位烈士的灵舆由女学生队挽着，葬礼较之古代君王的国葬更为盛大庄严。

我巡回三南地方的途中，顺道去看宝城郡得粮面得粮里的金氏村庄。我在四十八年前曾经在这地方匿居了三个月，加以金氏和我是同宗，听到我要来的消息，便在村口搭起松枝牌楼，路也都扫得干干净净，男女村民们在村口排着长队迎接我。

我拜访当年曾容我留宿的金广彦先生，房子仍然和以前一样，可是主人早已仙逝了。他的遗族出来欢迎我，为了招待我，在当时我



常吃饭的地方，围着屏风，铺着清洁的垫子让我坐，聚集的人群中，还能认识我的人只有一位老妇人和一位宗亲金判南而已。金君拿出当时我亲手写的一本书给我看。我当时在此地停留期间，和我特别亲近并与我同庚的宣君已经作古，当年曾把亲手特制的笔囊作为礼物送我的宣夫人和其子孙们特地从宝城邑出来欢迎我，据说夫人也与我同庚。

从光州到罗州途中，咸平的同胞们挡住了我的去路，要求我到咸平，于是我先在咸平学校运动场所举行的欢迎会上作了演讲，然后起程去罗州。在罗州打听六角亭李进士的家，有人告诉我说李进士的家不住在罗州，而在刚才路过的咸平，在咸平欢迎会上领头高呼万岁的就是李进士的族孙，原来时隔多年，我混淆了咸平和罗州这两个地方，尔后李进士（据说和我分别后做了李承旨）的族孙在昇、在赫两兄弟，带着礼物到汉城来看我，我乘机向他们道歉，说明我误把咸平当做罗州，所以没有去拜访他们。

这次顺路到了金海，恰值首露王<sup>①</sup>陵的秋享大祭，有许多金姓和许姓的族人在参拜，我也生平第一次穿着他们替我准备的纱帽和角带行参拜之礼。

在全州见到了老友金亨镇的儿子孟文和他的堂弟孟悦、他的叔伯内兄崔景烈三位，感到很高兴。全州的欢迎会结束之后，跟他们三位的家属聚在一起追忆故人，并摄影留念。

在江景打听孔钟烈的消息，得知他年轻时便自杀了，没有子嗣，我留宿他家的那天晚上的悲剧，据说是发生在亲戚之间的事。

之后到江华去拜访金周卿先生之家，和他的家人一起照了像，并见到了当时我所教过的三十名学童中的一位。

我巡回开城、延安等地途中，拜谒了李孝子墓——  
“故孝子李昌梅之墓”。

---

<sup>①</sup> 金海地区古有伽耶国，始祖为首露王。——译注

回想起我四十九年前从海州监狱被解送到仁川监狱途中,曾在此墓碑前休息过,我在墓前拜了一拜,并坐在约莫是那一天母亲坐过的地方。我现在坐在那里,然而再也见不到母亲的慈颜了,顿感凄然惆怅。回忆起母亲在重庆临终时最后说的话:

“我真是死不瞑目啊!”

我想她老人家怨恨的是不能亲眼看到祖国的独立,从而母子们不能同返故国,共叙往事。一想到在遥远西方的和尚山一角和孙子一起安卧的母亲,我就无法抑制住心里的悲伤,我想如果母亲的灵魂能回到祖国,看一看我所受到的同胞们的热烈欢迎,也许对她老人家在天之灵多少也是一种安慰吧。

在白川我回忆起崔光玉先生和全凤薰郡守的旧事。在长端皋浪浦我参拜了祖先敬顺王陵,那时住在陵村的庆州金氏家族知道我要来,特地为我准备了祭典。

我决定等待大韩民国独立自主之日到来时,再续写未完的篇章,现在就此搁笔。

——于汉城新门外——



백범일지

## 我的愿望

### 民族国家

如果上帝问我的愿望是什么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的愿望是大韩的独立。”

如果再问我下一个愿望是什么时,我的回答还是:

“我国的独立。”

即使第三次问我其他的愿望,我也大声回答:

“我的愿望是我大韩的完全自主独立。”

诸位同胞!我金九的愿望仅此一个,别无所求,我过去的一生七十余年都是为这个愿望而活着,现在也是为了这个愿望而生存,将来还要为实现这个愿望而活下去。

我是一个没有独立国家的百姓,在七十余年的生涯中受尽了欺侮、耻辱和苦难,对我而言,这世界上最好的事就是作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国家的百姓,终老死去。我很早就愿意做我独立政府的门卫,其意就是,只要我国成为独立国,我即使做个最微贱的人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在自己的独立祖国生活,即使贫贱,也比寄人篱下的富

贵更快乐、更光荣,更有希望。古代到日本去的朴堤上<sup>①</sup>说:

“我宁可做鸡林<sup>②</sup>的猪狗,也不愿当倭王的臣子享受荣华富贵。”

由此可见其节操。他拒不接受倭王授予的高官厚禄,终于成仁就义,这就是所谓的“宁为故国之鬼魂”。

近来,听说在我们同胞之中,竟有人希望把我们的国家并入某大邻国的联邦,我不忍相信这话是真的,万一真有这种人存在的话,他一定是丧心病狂。

我虽然学习过孔子、释迦、耶稣之道,尊崇他们为圣人,但即便存在着他们建立的天堂和极乐世界,我也不能引导我们的民族去那里,因为那不是我们民族自己建立的国家。血统和历史截然不同的民族,宛如我的身体不能变成别人的身体一样;这个民族不能变成那个民族,正像兄弟都难在一家相处的道理一般。若把两个以上合而为一的话,一个身居高位,一个地位低下,一个在上面命令,一个在下面服从,这就变成了根本性的大问题。

对于这个,一部分所谓的左倾分子否认血统的祖国,说什么思想的祖国;轻视有血亲关系的同胞,而主张所谓思想的同志及无产阶级是国际性的阶级,好像一提民族主义,似乎就不合乎真理似的,实在是愚蠢的想法。

哲学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经济的学说也是暂时性的,可是民族的血统却是永久性的。过去任何民族都有为了宗教或学说,或是由于经济、政治的利害冲突而分裂为两派、三派,以致于流血互斗的事例,但是事后看来,那就好像是吹过的一阵风,是暂时性的,民族毕竟还是在风刮过以后,如草木之欣欣向荣,根与枝叶相扶相助长成森林一般地绵延不绝,绝对不要忘记,所谓的左右倾终究不过是永远的血统之海洋里暂时掀起的风浪而已。

所有的思想、所有的信仰都会改变,但是,只有同一血统的民

---

① 新罗纳祇王时之忠臣,去日本遣返权充人质的王弟未斯欣,自己则被捕遇害。——译注

② 韩国之别称,原为新罗古名。——译注

族,才能共同肩负起盛衰与兴亡的共同使命,屹立于世,垂诸永久。

世界人类不分你我,天下一家固然是好事,但那是人类最高、也是最后的理想,是希望。然而,这种希望、理想现在仅能期待于遥远的未来,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人类向着四海一家的伟大而美丽的目标努力追求、前进,这固然是好的,也是应当做的事,但决不能脱离现实,现实的真理是每个民族建立其最好的国家,发展最好的文化,与别国相互交流,互相合作。这是我所确信的民主主义,这是人类的现阶段中最确实的真理。

因此,我们民族任务的最高目标是:首先建立不受别人牵制,也不依赖别人的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因为倘非如此,不仅我们民族的生活无以保障,也无法发挥我们民族的精神力量以创造光辉的文化。待建立了这样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之后,其次才创建天下一家共享和平安乐的思想,并且应该首先由我们的国家来实现推广这种思想。

我了解今日之人类文化是不完全的。每个国家,对内有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不平等、不合理,对外有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猜忌摩擦和侵略,由于对侵略的报复导致大大小小的战争不断发生,不但牺牲了许多生命和财物,也不能解决问题,反倒使人心惶惑、道德沦丧,日甚一日,如此下去,战争就不会有停止的一天,人类最后终必灭亡。因此,在人类世界中,必须要发现一种新的生活原理和实践的方法,我相信这才是我们民族的使命,也是我们民族所必须具有的自觉。

如此,所谓我们民族的独立,绝不仅是三千里、三千万人的事,实际上也关系着全世界的命运。因此为了我们民族的独立而奋斗,也就是为了全世界人类而奋斗。

如果只看到我们今天的贫穷,就产生了自卑感,因而怀疑我们自己建立的国家怎能成就那么伟大的事业的话,这是妄自菲薄。我们民族过去的历史并非不光辉灿烂,而且那还不过是序曲,今后是

我们民族以主角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时候了,谁敢说三千万大韩民族不能做出古代希腊或罗马民族所做出的事来?

我所希望的我国民族大业,绝 以 力 或以 力  
其他民族,而是 借博爱、和平的文化,求我民族的生存与全人类之繁荣福祉。迄今尚没有一个民族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请不要说那是空想。唯其没有一个民族这样做过,所以要由我们来做。当我们醒悟到这件大事业是上天特为我们而留下来的时候,我们才算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才明白了自己的责任。我希望我国的男女青年们抛弃过去狭隘的思想,放开眼界展望我民族的大使命,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倘若我们的青年人都能有这种精神,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么我深信不出三十年,我民族必使其他民族刮目相看。

## 政 治 理 想

---

我的政治理想以一句话来表示的话,就是自由,我们所建立的国家应该是自由的国家。

何谓自由?若是以个人绝对不受拘束的生活谓之自由的话,这是在有国家之前,或者像列宁所说的在国家消亡以后才能出现的。对于过着国家生活的人类来说,并没有这种无条件的自由。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国家,就是一种规范的束缚,束缚着我们过国家生活的是法律。个人的生活受国法的限制,这在有自由的国家 and 无自由的国家里都是如此。自由与不自由的分别是要看限制个人自由的法律是从何而来。有自由的国家之法律,来自国民自由的意志;无自由的国家之法律是出于国民中某一人或某一阶级。

我不希望我国变成独裁的国家,在独裁国家中,除了参与政权的一阶级外,其他的国民都沦为奴隶。

在独裁中最可怕的独裁是什么呢?就是以哲学为基础的阶级独

裁。君主或其他个人独裁者的独裁，只要除去其个人就行了。可是由多数个人所组成的一个阶级，成为独裁的主体时，想要除去它，则非常困难，如此的独裁若非是比它更大的组织或国际性的压力，是难以将它破坏的。我们的两班政治也就是一种阶级独裁，而且继续了几百年。至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则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所有的阶级独裁中最可怕的是以哲学为基础的阶级独裁。几百年间，李氏朝鲜所行的阶级独裁是以儒教，尤以朱子学派的哲学为基础的独裁，这不仅是政治上的独裁，就连思想、学问、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乃至个人的生活无不受其影响。在这种独裁政治下我们民族的文化被抹杀了，元气被消耗了，由于朱子学以外的学问得不到发展，因此又影响到艺术、经济、产业。我们的国家灭亡，民力遭受摧残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此，为什么呢？国民的头脑里产生了再好的思想和经纶，如果他不是掌权阶级中的一分子，就逃不出所谓“斯文乱贼”的范围以外，他的思想学说也不能公诸于世。

就这样新思想正待萌芽而又遭窒息，被摧残的新思想新经纶不知道有多少！言论的自由是如何的重要，我们痛切感到，唯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才会有进步。

以某一种学说为标准来束缚国民的思想，和定某一种宗教为国教强制国民信仰是同样错误的。山上不只是生长一种树木，院子里不止只开一种花，各种树木的参杂配合，成就了森林的伟大美丽，百花吐芳竞艳，才构成春天田园蓬勃的景象。我们所建立的国家中，儒教固可盛行，佛教、基督教也可自由发展。又以哲学来说，输进所有人类伟大的思想，使之开花结果，这样才算是自由的国家，只有在这样的自由国度中，人类的最伟大崇高的文化才得以萌芽成长。

我不是绝对相信老子之无为而治的人，也不赞成干涉太多的政治。大凡所谓人类，无法全知全能，所谓学说也无法完美无缺。故以一个人的思想，一种学说的原理来统治人民，一时也许可以见到迅速的功效，但毕竟会出现问题的，那倒将引起辩证法的暴力革命。由

于所有的生物都具有适应环境,保存自身的本能,所以最好的途径是放任自由,凡用谋略手腕的都是弊多利少。

过分干涉个人的生活,决非好的政治。国民不是军队里的士兵,也不是监狱中的囚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命令来驱使人们,是极不自然的,也是危险的,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悲剧不是最好的证明吗?美国和这些独裁国家比起来好像较为散漫,做起事来进展也慢,但其结果却发出巨大的力量,这是由于其国家实行民主主义政治的效果。

议论任何事的时候,最好先让百姓们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虽然意见有形形色色,好像杂乱无章茫无头绪,但经过互相辩驳,彼此讨论,意见就渐渐整理出来,最后归纳成为一两个主要论点,再以多数通过的方式达到结论,经国会的决议元首的裁决,制订成法律并公布之,如此把国民的意愿制订成法律才可以永垂万世。

以上所说的民主主义,只是调查国民意见的一种程序或方法,并不是其内容。言论的自由,投票的自由,对多数的服从——这三项才构成了民主主义。国民舆论,也就是国民意见的内容,是由当时的国民自由辩论而形成的,不受任何个人或党派的特定哲学理论所左右,这是美国式民主主义的特色。换言之,只要经过所谓辩论、投票、服从多数的步骤就可定出任何以哲学为基础的法律和政策,唯一的限制是宪法的条文而已。可是宪法也绝对不是像独裁国家的宪法一样神圣不可侵犯,而可以通过民主主义的程序来修改。因此,民主就是百姓自己掌握国家的主权,在这样的国家中,要想改变国策的话,改变其中的某个人或党派是不行的,要改变全体国民的意见才行。百姓的小意见虽然是以利害关系而定,但大意见则是由国民性、信仰及哲学决定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文化和教育的重要性。因为保存国民性或修正、发扬国民性的力量就是文化和教育,决定生产方向的力量也是文化和教育。

所谓教育,绝非仅仅意味着培养生活的技能,教育的基础是关



于宇宙、人生及政治的哲学。在某一种哲学基础上培养某一种生活技能,这就是国民教育。因此,好的民主主义政治,发轫于好的教育。没有健全的哲学基础的知识和技术的教育,对于个人和国家都是有害的,从人类全体观之亦然。

通过以上所说,可以大致揣度到我的政治理想。我是彻头彻尾反对独裁政治的。我向我们同胞呼吁,要警惕绝对不可成为独裁政治。要建设一个每个同胞都享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并依照国民全体的意见而治理的国家,不以一党一派或某一阶级的哲学强制其他大多数人接受,不以我们现在的理论来束缚我们子孙的思想和信仰自由。要建立一个像天地一般宽广而自由的国家,发扬博爱的德性,遵守法律秩序,好像遵守宇宙的自然法则一样。

然而我并非主张一定要模仿美国的民主主义制度,只不过是比較一下苏联的独裁“民主主义”及美国言论自由的民主主义,并衡量其价值。倘若必须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的话,那么我们应选择以思想和言论自由为基础者。

我并不以为美国的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是最完善的,政治形态也恰如人体的各部分,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和进化力量。尤其像我国,五千年以来,经历了许多种国家形态,也有无数的缺点,但其中也不乏巧妙精奥的政治制度。就从最近的李朝时代来看,像弘文馆、司谏院、司宪府,就是把国民中贤人的意见反映到国政中的制度,像科举制度和暗行御史也是值得研究的制度,如果详考历代的政治制度,相信一定还有许多有价值的发现。如此吸收别国的优点,发扬我国固有的优点而创造出我国独特的好制度也将是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 我理想中的国家

---

我盼望我国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而非期望我国变成最富强的国家。因为我心里还留着有被人侵略的创痛,所以不愿我们的国家侵略别国。我们的富裕只要能使我们的生活丰足,我们的强大只要能抵抗外来的侵略就足够了,唯一期望的是高度的文化力量。因为文化的力量能使我们自身得到幸福,并且进一步也可给予别人幸福。现在人类所感不足的东西既不是武力,也不是经济力。自然科学的力量虽然越大越好,但从人类整体来看,仅以现有的自然科学也足以使人过上美好的生活,人类现在不幸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缺乏仁义,缺乏慈悲,缺乏博爱的缘故。只要能发挥这几种德行的话,以现在的物质力量,二十亿人口很可以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

唯有文化才能培养人类的这种精神,我希望我们不要专门模仿别的国家,而要成为崇高而新颖的文化的根源、目标及模范。同时希望真正的和平将是由我国推广到世界。所谓“弘益人间”是我们的国祖檀君的理想,我相信我们民族的才能、精神及所经历过的磨炼,足以完成这个崇高的使命,我国国土的位置和其他的地理条件也莫不如此,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的要求也是如此,这是在这种时代我们改建新国家的时机,我们民族以主角的姿态出现,活跃于世界舞台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建立确保思想自由的政治模式,完善国民教育。我在上面强调自由的国家以及教育的重要性,其原因就在于此。

能完成建设最高文化使命的民族,一言以蔽之,要求全体皆成为圣人。韩国人不管到哪儿都应该受到人家的信赖和尊敬。我们的敌人压迫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养成了憎恨、暴戾、杀戮及斗争的习

性,但现在敌人已退却,应是我们放弃憎恨和斗争而从事于和平建设的时候了。

家庭不和则衰败,国家内部分派系互相争斗则会灭亡,同胞之间的憎恨和斗争是灭亡的征兆。我们的容貌应当是和颜悦色的,我国国土之上应永远飘拂着和煦的春风。这是我们国民只要一下决心改正就会成功的,然后,再本着这种精神教育后代,使其永远延续下去。

我们的民族既然愿意把拥有最高文化以成为人类模范看成是自己的使命,那么每个成员就不能成为利己的个人主义者。我们竭诚主张个人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并非禽兽般的各自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要使自己的家族,自己的邻居,自己的同胞美好地生活下去,我们的自由并非是采摘公园花朵的自由,而是栽种公园花木的自由。

我们不想掠夺别人的东西,也不想占别人的便宜,我们的人应当乐于将爱心施予我们的家族、邻居、同胞,他们应当像我国俗话说的那样做个“读书人,做个正正经经、规规矩矩的人”。

因此我们要勤勉,切勿怠惰,只有勤勉的家长才是真正爱护家庭的,才是慷慨施予的人。困难的事我领先做,这才是爱护同胞,把欢乐让给别人,这才是真正地爱人。这也就是我们祖先所津津乐道的“仁厚之德”。

这样,我国的山岭就会森林茂盛,田野就会五谷丰登,村落和都市都会清洁、富裕而和平。这样,我们的同胞,即大韩人民,不论男女都是面呈喜色,身上都会散发着“德”的芳香。这样的国家想不幸也无法不幸,想灭亡也无从灭亡。民族的幸福决不会来自阶级斗争,个人的幸福也不会出自利己的观念。阶级斗争将产生无止境的阶级斗争,国土上流淌的鲜血将永远不会干涸;我以利己之心来妨害别人,天下的人也会以利己之心来害我,这必然是贪小失大,日本这次受到报应,就是最好的例证,它证明国际上民族间也是如此。

以上所说的,是我所希望的新国家形象的一端。同胞们!建成这样的国家是多么好啊!在这样的国度里使我们的子孙延绵繁衍是何等有意义的事啊!以前汉土的箕子,因思慕我国而东来,孔夫子也曾说过想到我们民族所居的地方来,说我们是崇仁的民族。古时候是那样,难道我们不想在将来也让全世界的人都如此地仰慕我们民族的文化吗?

我相信以我们的力量,尤其以教育的力量,一定是可以办得到的,如果我国青年男女都有这样的抱负,新国家的建立决无不成之理。

我很早以前就在黄海道从事教育工作,我之所以从事教育其目的即在于此。我的年龄现在已过七十,亲身从事国民教育的时日恐已无多,我殷切地盼望全国教育家及男女学生都能痛下决心,则国家民族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1947 年于新门



백범일지

## 白凡金九先生年表

公元 (干支)	年 龄	重要事项	时事	中国 纪年
1876 (丙子)	1	8月29日(阴历7月11日),作为安东金氏金白点旁系之后孙,生于黄海道海州邑以西80里的白云坊基洞。父亲金淳永,母亲郭乐园。生时难产,独子。金白点是朝廷叛逆,为免遭灭门之祸,遂隐居下来,沦为平民。父嗜酒如命,自暴自弃。幼时名昌岩。	高宗13年,檀纪4209年,正月,日本全权大臣黑田清隆、副大臣井上馨来韩。2月,签订韩日修好条约(丙子条约,江华条约)。	光绪二年
1878 (戊寅)	3	此年或翌年,三四岁时患天花,母亲给挤脓,脸上留下疤痕。	8月,日本军舰在全罗、忠清进行海岸测量。11月,日本设参谋本部。	光绪四年
1880 (庚辰)	5	迁居康翎。	8月,修信使金弘集访日返国。11月,日本办办公使花房义质入境。	光绪六年
1881 (辛巳)	6	窃取父亲藏于被褥里的穿孔钱20两去买糕饼,被发觉挨打,长连堂祖父进屋救助。	4月聘用日本陆军少尉堀本礼造进行新式军训。	光绪七年
1882 (壬午)	7	迁还海州故里基洞,耕种为生。父亲金淳永,一年内多次酗酒肇事,殴打邻近两班姜氏和李氏,被拘禁于海州监营。	6月壬午兵变,闵妃逃往忠州避难,中国拘大院君,置于保定。11月,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到任。	光绪八年
1884 (甲申)	9	学习国文和千字文。为了改变平民的地位,要求父亲送学堂念书,以便考取进士。于是与村内平民子弟合办学堂,拜李生员为师。三个月后移至申尊位家念书。	10月甲申政变,金玉均、朴泳孝等亡命日本。清、日两军发生冲突。	光绪十年

公元 (干支)	年 龄	重要事项	时事	中国 纪年
1886 (丙戌)	11	父亲全身瘫痪,以后转为半身不遂。		光绪 十二 年
1889 (己丑)	14	师从鹤鸣洞郑文哉,走读。郑为当时屈指可数的文人。	3月,美国公使哈德到任。	光绪 十五 年
1892 (壬辰)	17	在郑氏指导下赴海州壬辰庆科考试落第。对科场感到失望,回家开始学麻衣相书,后又中断,改学《孙子》、《吴子》兵书。	12月,东学教徒集结于全罗道参礼驿。	光绪 十八 年
1893 (癸巳)	18	正月初,访浦洞吴膺善,履行东学入道手续,从此时起改名为金昌洙。后为“接主”,被选为黄海道十五名道儒之一,前往忠清道报恩拜见大道主,受接主帖子。	3月,东学教徒在报恩集结,4月解散,6月,仁川府数百名吏民袭击官衙。	光绪 十九 年
1894 (甲午)	19	黄海道东学党起事,设八峰都所,与京军、倭兵作战时身任先锋,骑马向海州城进发,后向西后退80里至回鹤洞,与东学党李东焯发生摩擦,战败。黄海道东学党被全部消灭,往梦金浦避难三个月。	1月,发生“东学之乱”。2月金玉均在上海被暗杀。6月,中日战争爆发。12月全琫准在淳昌被捕押送京城。制定洪范14条,向宗庙誓告自主独立。	光绪 二十 年
1895 (乙未)	20	2月,作为败军之将,与住于九月山下的郑德铉一起前往信川郡清溪洞拜谒安泰勋进士(安重根义士之父),侍奉父母移居清溪洞,在此与学者高能善相遇,接受其教诲,深受其影响。与南原人金亨镇一起前往满洲,至惠山镇渡鸭绿江,至满洲通化。	3月全琫准被处决。8月发生“乙未事变”,日本公使三浦梧楼拥立大院君,杀害闵妃。11月,公布“断发令”。	光绪 二十 一年
1896 (丙申)	21	返回清溪洞,与高能善重逢,并与其长孙女订婚,但由于父亲先前曾在酒店许婚于人,遂即解除婚约。重又浪迹天涯,去平壤。因宣布断发令,国内大哗,遂返回故乡,途中,在鵝河浦杀死化装的日本陆军中尉土田,因此被拘往海州,后又押送仁川监狱,以杀人罪被判死刑。母亲也来此帮佣,以便于探监。因是为国母复仇,国王下令赦免死刑。	1月各地义兵起义。7月徐载弼等组织独立协会,创办《独立新闻》。	光绪 二十 二年

公元 (干支)	年 龄	重要事项	时事	中国 纪年
1897 (丁酉)	22	在狱中读《大学》、《泰西新史》、《世界地志》等书,接触新学。父母均前来探监。	8月,改年号为光武,11月,为闵妃举行国葬。	光绪二十三年
1898 (戊戌)	23	越狱逃走,至京城又转向南道。藏身于公州麻谷寺,削发为僧,法名圆宗。	2月,大院君死亡。8月,伊藤博文来朝。12月西大门·清凉里间电车工程竣工。	光绪二十四年
1899 (己亥)	24	年初离麻谷寺赴海州神光寺,途中在西大门外遇见慧定,偕同北上。至神光寺附近之北庵,请慧定去家探望父母。父母跟踪来北庵,一家团聚。后又去平壤,遇见克庵崔在学,成为灵泉庵住持,接来父母同住。暮秋还俗回乡。	5月,京城电车通车。6月,日本公使林权助到任。9月,京仁铁路通车。	光绪二十五年
1900 (庚子)	25	叔父让其从事耕作,志不在此,遂于是年春离家偷渡江华暗访金周卿,改名“金斗来”。随李春伯往汉城拜访柳仁茂,由此出入于士大夫两班之家,改名为“龟”,字“莲上”,号“莲下”。	2月,俄国公使巴甫洛夫再次来任。7月汉江桥竣工。京仁线全线通车。	光绪二十六年
1901 (辛丑)	26	夜做不祥之梦,即返故里,途中赴海州访高能善先生。返家后父病危,看护十四日终不治去世。	9月,中国李鸿章死。中国公使许台身离任。	光绪二十七年
1902 (壬寅)	27	阴历正月赴长渊远亲家拜年,由远房堂祖母为媒,与如玉小姐订婚。	3月,京城开城间京义线铁路工程开工。	光绪二十八年
1903 (癸卯)	28	阴历2月,未婚妻如玉病歿。迁居于长连邑社稷洞,任长连公立学校校长。是年夏,在平壤耶稣教主办的师范讲习所与崔光玉相遇。由崔之介绍,欲与岛山安昌浩之妹安信浩订婚,旋即告吹。	12月,俄国东洋舰队司令官来仁川。	光绪二十九年
1904 (甲辰)	29	与信川谢平洞崔遵礼女士结婚。	2月日俄战争爆发。8月李容九集合东学教徒组织进步会。	光绪三十年

公元 (干支)	年 龄	重要事项	时事	中国 纪年
1905 (乙巳)	30	11月以镇南浦 ML 青年会总务的身份参加在京城尚洞教会召开的全国大会。参加者尚有金德基、郑淳万、李俊、李东宁、崔在学等人。大会决议组织上疏，在大汉门前与倭警发生冲突。复致力于国民教育运动，返黄海道任文化草里面钟山西明义塾教员。	9月，日俄签订和约。11月日本特派大使伊藤博文至汉城。订立第二次韩日协约(乙巳保护条约，或称五条约)，四方义兵起事。闵泳焕等自杀。	光绪三十一年
1909 (己酉)	34	阴历正月十八日应金庸济等人之邀迁往安岳，任杨山学校教员。长女夭折。与崔光玉等组织海西教育总会，任学务总监。巡回道内各地，在白川、松禾等地发表反日演说，遭日刑警逮捕，拘留在海州监狱，后被释放，任杨山学校小学部幼年班教员，兼任载宁郡北栗面武尚洞保强学校校长。在安岳遇见卢伯麟、李在明。	10月26日安重根在哈尔滨枪杀伊藤博文。12月，一进会长李容九向政府建议韩日合邦。李在明在钟岷刺伤卖国贼李完用。	宣统元年
1910 (庚戌)	35	参加由新民会成员梁起铎发起在京城召开的秘密会议，出席者有梁起铎、李东宁、安泰国、李升薰、朱镇洙、金道熙、金龟。会议决议制定满洲(东北)移民计划、创设武官学校，培养武官。11月离京城与梁起铎之弟梁寅铎一起返回。安明根来杨山学校访晤。	3月安重根义士被处死于旅顺监狱。5月，日本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任统监。8月22日签定韩日合并条约。10月公布朝鲜总督府官制。12月安重根之弟安明根计划暗杀寺内总督被捕。安昌浩自美国返回创办大成学校，组织新民会。	宣统二年
1911 (辛亥)	36	阴历正月初五日晨被倭警拘捕，同被拘留者有金鸿亮、都寅权等人。后移送载宁又被押往京城，在总监部临时拘留所受审，备受酷刑，后被移送至钟路拘留所。母来探监。在2号法庭被判17年有期徒刑，囚于西大门监狱。和三南江湖好汉头领外号金进士者结识，向其了解盗贼秘密结社的真相。	7月，梁起铎、安明根等30余人被起诉判刑。10月，鸭绿江铁桥竣工。	宣统三年



公元 (干支)	年 龄	重要事项	时事	中国 纪年
1912 (壬子)	37	日本明治天皇死,大赦减刑8年,数月后明治皇后死,又大赦,减为5年。改“金龟”名为“金九”,改“莲下”号为“白凡”。在狱中扫院子、擦玻璃时,暗下决心独立后为政府打扫卫生当门房。	7月,日本明治天皇死,9月大赦。	中华 民国 元年
1914 (甲寅)	39	刑期仅余2年移监仁川狱。从事仁川港筑港劳动,7月被假释出狱。当日至京乘京义线火车经新幕于沙里院下车,经余物坪赴安新学校。母出迎。当时妻为安新学校教员。女儿化敬于三四个月前夭折。	9月,朝鲜大饭店落成。11月日军占领中国胶州湾。	中华 民国3 年
1915 (乙卯)	40	在安新学校教书,并接受金庸震委托,去其农场监理收割稻子。	5月,总督府修改官制。	中华 民国4 年
1917 (丁巳)	42	接受金鸿亮、金庸震一家之好意,赴东山坪致力于农村改良事业。女儿思敬夭亡,妻之姐亦死,葬于公墓。	3月,俄国发生革命。11月,革命成功,成立苏维埃政府。	中华 民国6 年
1918 (戊午)	43	11月长子仁出生。	11月,居住中国东三省的独立运动者发表独立宣言。	中华 民国7 年
1919 (己未)	44	爆发了三·一独立运动,接受金庸震劝告,经平壤、新义州至安东,乘英轮抵上海。访李东宁、李光洙等人,组织临时政府,安昌浩由美国来沪任内务总长,自己先要求当政府门卫,未获准,任警务局长。与国务总理李东辉发生摩擦。	2月,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独立运动会议,大韩青年团吕运亨、金奎植等在上海法租界计划独立运动。3月爆发三·一运动。在上海成立临时政府。	中华 民国8 年
1920 (庚申)	45	妻子率仁儿来沪。	3月,在海参崴组织韩人社会党。10月发生青山里战斗。10月柳宽顺在狱中殉难。	中华 民国9 年
1922 (壬戌)	47	母亦来沪,次子信出生。妻跌伤,并发肺炎。	10月,吕运亨等在上海组织韩国劳兵会。	中华 民国 11年

公元 (干支)	年 龄	重要事项	时事	中国 纪年
1923 (癸亥)	48	任临时政府内务总长。	3月在钟路青年会馆召开朝鲜青年团大会。9月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	中华 民国 12年
1924 (甲子)	49	妻崔遵礼女士患肺病在上海虹口肺病医院隔离治疗,不幸于1月1日不治去世,葬于法租界嵩山路公墓。	临时政府国务总理李东宁代行总统职务。	中华 民国 13年
1926 (丙寅)	51	母携次子信回国。	4月,梁起铎等在吉林组织高丽革命党。6月10日爱国青年发起独立万岁事件(6·10万岁事件)。12月,义烈团员罗锡畴向东拓会社投弹成仁。	中华 民国 15年
1927 (丁卯)	52	长子仁返国。11月就任临时政府国务领。临时议政院议长为李东宁。	2月,组织民族单一战线,民族独立运动者与共产主义者联合组织新干会。	中华 民国 16年
1928 (戊辰)	53	与李东宁等组织韩国独立党。开始撰写《自凡逸志》上篇。临时政府处于低潮,有脱离者,有变节者,剩下不到数十名,遂决定函告美洲侨胞。	10月,蒋介石任中国政府主席。国内联通制被日寇发觉,被捕者无数。	中华 民国 17年
1931 (辛未)	56	兼任民团长,和李奉昌秘密接触,派李奉昌赴日暗杀日皇。尹奉吉来访。	6月,任命宇垣一成为总督。	中华 民国 20年
1932 (壬申)	57	李奉昌勇士向日皇裕仁投掷手榴弹未中。4月,尹奉吉勇士在上海虹口公园日皇生日庆祝仪式上投弹炸死白川大将等人。因遭日本宪警搜查,先生暂避于美国人费吾生先生住宅,后又藏身于嘉兴、海盐等地。化名张震球、张震。	1·28上海事变。3月发布满洲国独立宣言。临时政府迁往杭州。	中华 民国 21年
1933 (癸酉)	58	经中国国民党党员朴赞翊介绍,赴蒋介石官邸与蒋会谈。笔谈后协议建洛阳军官学校分校,任李青天、李范奭为教官、校官,仅培养一届即停办。	中日两军在山海关发生冲突。	中华 民国 22年

公元 (干支)	年 龄	重要事项	时事	中国 纪年
1934 (甲戌)	59	为了维持因五党统一论而陷于无政府状态之临时政府,奔赴杭州。组织大韩国民党。返回南京后遭日本宪警追捕,逃往淮清桥藏匿,为了掩护,与划船妇朱爱宝同居,伪称海南岛人。	9月,中国共产党离开江西根据地。金元凤、金科奉等召开五党统一会议,建朝鲜民族革命党,但有始无终。	中华 民国 23年
1937 (丁丑)	62	中日战争爆发,日寇轰炸南京,家屋被毁,先生与中国女子朱爱宝一起幸免于难。居住在马路街的母亲也平安无事。决定避难长沙,遂召回在安徽屯溪中学读书的信儿,侍奉母亲一起乘英轮赴汉口,大家族百余名则乘木船离开南京。	7月发生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	中华 民国 26年
1938 (戊寅)	63	至长沙后,恢复本名“金九”。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帮助和美国侨胞的支援下,生活问题得以解决。三党合一问题提上日程,遂在朝鲜革命党本部南木厅聚会共商统一问题,突遭狙击,中弹昏迷,住院治疗。在此事件中,玄益哲中弹身亡。长沙危急,临时政府迁往广州,后又经贵阳移至重庆。母患咽喉病,不治去世。	正月日军在青岛登陆,10月广东沦陷。武汉三镇失守。	中华 民国 27年
1940 (庚辰)	65	民族阵营三党联合组成韩国独立党,执行委员长金九,监察委员长李东宁,委员李始荣。临时议政院任先生为国务会议主席。组织光复军,任命李青天为光复军总司令,并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光复军成立典礼。司令部设在西安,往该地派去30多名干部。因人员不多,数月间有名无实。	3月,汪兆铭在南京,另立伪政府。11月日军攻击山西之八路军。临时议政院院长李东宁在重庆去世。	中华 民国 29年
1941 (辛巳)	66	长子仁亡故。	10月,日本东条内阁上台。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华 民国 30年

公元 (干支)	年 龄	重要事项	时事	中国 纪年
1943 (癸未)	68	被强行编入日军的韩籍学生兵 50 余人逃出,投奔临时政府,在中韩文化协会食堂召开欢迎会。开始写作《白凡逸志》下篇。	11 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开罗会谈。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美英苏三国元首在德黑兰会谈。	中华 民国 32 年
1944 (甲申)	69	3 月,改选临时国务委员,主席金九,副主席金奎植。	7 月,日本东条内阁总辞职,成立小矶、米内合作内阁。	中华 民国 33 年
1945 (乙酉)	70	为了和美国作战部长陀诺裴将军进行军事协商,乘美机飞赴西安,考察光复军特种训练。出席陕西省主席祝绍周的晚餐招待会,宴会后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光复军之计划遂化为泡影。乘客机重返重庆。决定以个人的身份返国。11 月 5 日,临时政府国务委员分乘两架飞机离开重庆至上海,改乘美国飞机返回阔别 27 年的金浦机场,踏上了祖国的大地。先生住在西大门崔昌学家,其他国务委员住韩美大饭店。在德寿宫召开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先生一行。	7 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发表波茨坦宣言。8 月 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中华 民国 34 年
1946 (丙戌)	71	巡视祖国各地,迎回尹奉吉、李奉昌、白贞基三义士之遗骸,葬于汉城孝昌公园。召开紧急国民会议。金九任总理。	3 月,召开第一次美苏共同委员会。4 月召开促成建立政府的市民大会。	中华 民国 35 年
1947 (丁亥)	72	12 月 15 日发表《白凡逸志》。	7 月,吕运亨被暗杀,12 月,张德秀被害。	中华 民国 36 年
1948 (戊子)	73	2 月 6 日与金奎植一起提出南北协商案。10 日发表反对南韩单独建立政府声明。3 月 1 日美哈奇中将公布 5 月 9 日举行总选举。8 日向北朝鲜发出南北会谈邀请书。与金奎植联合发表反对南韩地区单独总选声明。25 日北朝鲜接受南北会议,28 日发给 15 人邀请书。4 月 19 日与金奎植一起赴平壤参加南北协商会议。5 月 5 日自平壤返回汉城。	5 月 10 日举行总选举。李承晚被选为第一任总统,副总统是李始荣。宣布成立大韩民国政府。	中华 民国 37 年

公元 (干支)	年 龄	重要事项	时事	中国 纪年
1949 (己丑)	74	先生反对南韩地区总选不参加竞选,事实上已自政坛隐退,在汉城西大门崔昌学私宅读书自娱。6月26日12时36分,在京桥庄遭暴徒陆军少尉安斗熙手枪狙击,中弹殒命,享年74岁。7月5日举行国民葬,安葬于汉城孝昌公园。	1月美国承认大韩民国。	中华 人民 共和 国成 立



백범일지

## 跋

《白凡逸志》一书，是先父为抗日复国流亡在中国上海、重庆时，以给我们兄弟二人的遗书形式陆续写就的。为了祖国的独立与自由，他蹈死不顾，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大韩民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部流亡者的记录，殉道者的史册，仰之弥高。之所以这样认识，是因为它体现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它记载了先辈们的奋斗史，所以它是民族的财富，而不仅仅属于我们家族。

先父在中国长达二十六年，其间曾得到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追怀往事，开辟未来，随着韩中两国建交，两个鸡犬相闻的亲密邻邦开始谱写友好合作的新篇章。我也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中国，徜徉在这片亲爱的土地上。1922年我出生在上海，抗日烽火中又随父转辗到重庆，可以说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是“半个中国人”。在艰苦岁月里，先祖母、先母以及唯一的兄长相继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的一家与中国有割不断的情谊。

《白凡逸志》一书在中国大地出版，完成了我的一大心愿，也更可告慰九泉之下的先父。希望本书有助于增进韩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了解，尤其希望有助于青年一代了解韩国的独立解放运动。我衷心感谢为翻译本书而付出极大心血的宣德五、张明惠伉俪，他们

的译笔信达雅,简直无瑕可摘。此外,还要感谢国际知名学者季羨林先生欣然为中译本作序,感谢支持并推动了本书出版的庄浦明先生和所有予以关心的朋友们。

金 信

1994. 4. 19.



백범일지

## 译 后 记

今年是大韩民国开国元勋金九(白凡)先生(1876—1949)不幸遇害逝世 45 周年。为了缅怀先生的斗争业绩,我们翻译了金九自叙传《白凡逸志》,把它奉献给中国的广大读者。

金九先生的一生是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一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不平凡的一生。他的毕生愿望,是“大韩的独立自主……仅此一个,别无所求”。

金九先生把自己的一生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了祖国的独立,为了民族的生存,他先国后家,义无反顾,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白凡逸志》就是他充满血与火的一生的真实写照。

此书分上、下两篇,以 1919 年朝鲜三·一独立运动为分水岭。上篇是作者在二十年代旅居上海,领导韩国临时政府进行反日斗争时开始执笔的,1929 年完成。当时他处于十分险恶的境地,日寇悬赏六十万大洋“捉拿金九”,他随时都有为国捐躯的危险。1943 年,作者开始执笔撰写本书的下篇。全书于 1947 年公开发表。《白凡逸志》倾注了作者的心血,着意刻画了作者的亡国恨、爱国心、同胞爱、骨肉情,读之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堪称是一部不朽佳作。此书在韩国



广为流传,前后出版过多种版本,已印行一百次、约三十万册,被列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读物。

原著《白凡逸志》是金九先生用韩汉混合体的文字写成的,其中运用了不少汉文式的表述方式。正式出版时根据规范的韩文拼写法用现代韩国语译成了韩文本。我们这次的中译本是根据金九先生的亲笔原著、手抄本和韩国瑞文堂 1992 年出版的禹玄民的韩文译本,并参照 1969 年台湾出版的金在先的中译本重新翻译的。

在翻译过程中,金九先生哲嗣金信将军(1922 年出生于上海)为我们提供了原著手稿、手抄本以及许多有关珍贵照片,在翻译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承蒙金信将军当面指教,在此谨向金信将军,向为出版此书多方联系的、韩国革命志士后裔李素心女士,向原中文版译者金在先先生和韩文译本译者禹玄民先生,表示由衷谢忱。

原著正文中本无小标题,这个译本的小标题是根据韩国瑞文堂的禹玄民韩文译本补加进去的,目的是便于阅读。书后年表则主要根据瑞文堂本并参照金在先的中译本编译而成,以便读者查阅。对书中极个别段落作了一点删节,尚祈见谅。

本书承蒙国际著名学者、东方学泰斗、我们的恩师季羨林教授在百忙中慨允赐序,使这部中译本倍增光彩;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杨通方老师和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的李玉洁先生对出版此书给予热情支持,鼎力相助;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同仁为出版此书竭尽心力,备受辛劳。在此书付梓之际,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说来凑巧,也可以说是有缘,我们两人,一是上海生、上海长,一是土生土长重庆人,因此对《白凡逸志》中所谈的许多人物事件,习俗地名,都记忆犹新,倍感亲切。我们能享此殊荣,将此名作介绍给我国读者,感到十分庆幸。

由于水平所限,时间仓促,译文疏漏之处,敬请教正。

译 者

1994 年 4 月 19 日于北京